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大革命史纲要



后 记

中国大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奏，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转折，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留下的经验教训对其后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习大革命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都是必要的。在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开设中国大革命史专题课，对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专题课教材，适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作中共党史系、政治教育系和政治学系开设中国大革命史课程的教材，还可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学生和干部阅读和参考。

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力图实事求是地记述大革命的全过程，阐明其规律性，总结其经验教训。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近几年来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利用了《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上、下册）〔主编王宗华，副主编马菊英、顾群、曾宪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一书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有关编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山大学教务处和中大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武汉大学王宗华、张光宇、陈宁生，中山大学马菊英、黄萼辉、祁汉斋、夏炳才、甄欣、王付昌和湖南师范大学范忠程分工编写，由王宗华、马菊英修改定稿。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2年10月

中国大革命史纲

第一章 大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大革命前的国内国际状况

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新加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转入萧条，农村经济破产

1.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繁荣转入萧条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便利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于战争的影响，他们甚至还要向中国进口大量面粉和一些民用工业品。1915 年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强迫中国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把抵制日货的斗争推上了最高峰。这几年时间，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从 1912 年民国成立到 1920 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情况如下表：

行业	项目	1912	1920 年	发 展 速 度 1912=10 0	年平均增 长率%
棉纱	棉纱产量指数	100.0	422.4	422.0	17.4
面粉	面粉产量指数	100.0	516.9	516.0	22.8
缫丝	厂丝出口量(担)	57157.0	77855.0	131.6	3.5
卷烟	资本额(万元)	137.8	168.0	1220.0	36.7
火柴	资本额(万元)	294.2	745.9	253.6	12.3
电力	发电容量(千瓦)	12013.0	20602.0	246.4	11.9
水泥	启新厂产量(吨)	59405.0	119741.0	184.7	8.0
矿冶	生 产 指 数 (1913=100)	79.1	158.0	199.7	9.0

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见《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重点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远不如轻工业，而且绝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

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卷土重来。他们在“回到市场”的口号下大幅度地增加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19 年以后，中国进口贸易总值激增，加以 1913 年为 100，则 1919 年为 113.6，1920 年为 133.7，1921 年为 158.9，1922 年为 165.8，1923 年为 162，1924 年增至 178.6。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把战前已在中国设立的许多垄断公司扩充，增设分公司，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1921 年以后，英、美、日三国在中国展开了剧烈的投资竞争，他们通过增设工厂、开办银行及“中外合办”企业等形式加强控制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事业，使中国的金

融和产业变成其附属品。

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猛烈冲击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转入萧条。

首先是一些商品失去了国际上的市场。例如上海福新面粉厂的产品 1915~1921 年间远销西欧，1921 年英国经济恢复后即借口福新面粉掺有杂质禁止输入。1922 年以后欧美列强各国的面粉大量输入中国，国产面粉由出超转为入超。

其次是民族工业在国内同帝国主义的廉价商品竞争中亦处于劣势，因而利润缩减甚至亏本，一些工厂被迫停工减产以至倒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建厂高潮至此转为低潮。1920 年新建工厂还有 70 个，1922 年降为 46 个，1923 年猛降为 14 个，1924 年只有 11 个。中国民族工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便转入萧条。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扩大了，经济力量也增长了。而战后帝国主义的重新加紧经济侵略，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更大的阻碍，这就促使力量增长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增强了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更迅速的成长壮大起来。到 1919 年，中国产业工人已有 261 万人。其中半数集中在工厂、矿山，而且在地域上大多数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和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因此，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小，但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1922 年掀起了罢工运动的高潮。

2. 农村经济破产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集中的现象仍在发展。佃户比重不断扩大，自耕农日益减少。如江苏省昆山县 1905 年佃农占农户总数 57.4%，1914 年上升为 71.7%，1924 年则升至 77.6%，南通县 1905 年自耕农占农户总数 20.2%，1924 年下降为 13%。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军阀官僚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河南彰德（今安阳）、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约 400 顷。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以及地方军阀张敬尧、李厚基等占有土地都在数万亩以上，黑龙江省军阀吴俊升“攫取土地几遍全省。”

与军阀官僚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外国商人也大量购买土地。例如：英美烟草公司在 1914~1915 年间，在河南许昌西门外用“半霸占、半收买”的手段攫取了数百亩土地。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占有农田、榨取地租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军阀、官僚、地主、中外商人和高利贷者掠夺下的中国农村，其经济形式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实物地租仍占主导地位。地租不断增加，小农日益陷入困境，高利贷者接踵而至，把小农迫上了破产的道路。如江苏南通县，1920 年谷价比 1905 年上涨 2.72 倍，而钱租竟涨至 3.46 倍。在松花江流域，高利贷的利率月息从 1909 年的 1% 上升至 1922 年的 3%，最高的达 6%。湖南桃源县甚至有每月一对本的高利贷，借洋 1 元，1 个月期满，即须还 2 元。农民遭受极其凶残的剥削。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发展的影响下，中国

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但是产品的逐步商品化，并未给中国农村经济开辟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中外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不是把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利润投入农村以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农业，而是通过土地兼并和商业垄断，对小农进行日益严重的榨取，使整个农村经济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据统计：加以 1914 年全国耕地面积指数为 100，则 1915 年为 91，1918 年降至 83。全国荒地面积指数如以 1914 年为 100，则 1915 年上升为 113，1918 年达 237。

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各地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二、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

自袁世凯窃国后，民国已徒有其名，体现民主政体的《临时约法》、国会以至大总统职位全都成了北洋军阀手中的工具，任由他们随意篡改或废黜、更换。1916 年 6 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病死，北洋军阀随即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派别，加上投靠袁世凯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形成了北洋军阀的三大势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虽以副总统名义接任了民国大总统职务，实际上皖系头子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身份控制了中央政权。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甘肃等省属皖系势力直接掌握。直系军阀主要占据着江苏、江西、湖北等省，拥有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在中央政权中亦有相当势力。奉系张作霖加紧在东北扩张，不久便控制了东北三省。

皖、直、奉军阀为寻找国外支柱，都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皖系得到日本的支持，直系则与美国亲近，奉系地处东北，同日本也有密切关系。

盘据各省的地方军阀主要有山西的阎锡山（晋系）、广西的陆荣廷（桂系）、云南的唐继尧（滇系）、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湘系）、广东的陈炯明（粤系）、四川的熊克武、刘存厚、刘湘（川系）等，其他各省或地区还有数不清的地方军阀。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从此，北洋军阀三大势力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厮杀，地方军阀为扩大或保存地盘而火拼，整个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

1916 年 6 月至 1920 年 7 月，是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的时期。1917 年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在日本怂恿下决定参加对德奥的战争，以此为借口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举借款，名为编练“参战军”，实则扩大皖系军事力量。此后皖系势力日益骄横，直皖矛盾日益加剧。1919 年冯国璋病死，直系主将曹锟、吴佩孚联络奉系及西南各省军阀建立反皖联盟。1920 年 7 月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双方各投入兵力达 10 万人，在京畿一带及天津附近展开激战，结果皖系失败。7 月 19 日，段祺瑞通电辞职，北京政权主要落入直系军阀手中，奉系作为同盟者也参与了掌握北京政权。

皖系失败后，直奉两系的矛盾逐渐尖锐化，经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至 1922 年 4 月 29 日终于爆发战争，双方分别在马厂、固安、长辛店等地激战，互有胜负。5 月 3 日，直军迂回敌后，使奉军腹背受敌，处于不利态势。5 日，奉军第 16 师倒戈，奉军失败。6 月双方议和，奉军撤回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

此后，直系进一步向美国靠拢。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2 年到 1924 年，美国供给吴佩孚的军火价值 328 万美元，又通过军火商人卖给吴佩孚步枪 1 万枝，子弹 200 万发，机关枪 250 挺，美国还帮助吴佩孚培训了飞行员和修

建飞行机械厂。

在美国大力支持下，吴佩孚继续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消灭各地军阀。面对直系的威胁，各省军阀则加紧进行“联省自治”以自保。

为了直接把政权掌握在手上，1923年10月，曹锟表演了一幕贿选总统的丑剧。曹锟先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选举之日，又以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曹锟为大总统。

曹锟贿选的丑闻引起举国震怒和唾弃。直系军阀由此更加声名狼藉。

在直皖、直奉大战的同时，各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此伏彼起。

四川是川、滇、黔三省军阀争夺的焦点。1917年，川军刘存厚同滇军罗佩金为争夺地盘在成都激战。1920年滇军头子唐继尧一再发动以夺取四川为目标的战斗。稍后，黔军亦卷入战争。川、滇、黔军阀为争夺四川，“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护法战争期间是南北军队作战的主要战场。1918年3月，北军张敬尧曾以优势兵力击败南军。1920年5月，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在桂军陆荣廷支持下打败了张敬尧。1921年7月赵恒惕发动援鄂战争，川军刘湘与赵联盟，亦于8月进军鄂西，结果，湘军被吴佩孚击败，湖南落入吴佩孚控制范围，川军与吴议和，退回四川。

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各派军阀不断扩充军队，据统计：1914年全国陆军为45.7万人，1918年已超过85万人，1919年初，猛增至138万人。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军阀们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同时千方百计向人民搜刮。

1916年，张作霖向日本的朝鲜银行贷款日金300万元，使日本得到了控制东北金融货币市场的机会。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间，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达5亿元，其中只“参战借款”一项，日本就以2000万元的低廉价格，换取了日籍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的权利。

向人民的搜刮更是花样繁多，主要有：

1. 苛捐杂税——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各地税捐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如河南、奉天（辽宁）、福建等省只杂捐就有20多种到30多种。各种正税之外还有任意加收的附加税。有些地方还搞所谓田赋预征，最典型的如四川梓潼，1926年已预征田赋至1957年。

2. 滥发公债——1912年至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共发行公债27种，实额6亿余元。江苏、广东、湖北、河南等省都曾经发行公债。这些公债都是强迫摊派，从不还本。

3. 滥发货币——各地军阀通过铸造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钢元，或发行军用票、军需兑换券、加印官票等直接向人民夺取钱财。

由于战乱频繁，内政不修，在战祸中直接受害或遇自然灾害而得不到救济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以至冻饿而死。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掀起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暴。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

1. 世界革命潮流的起伏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给正在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深渊的欧洲各国人民以巨大影响，立即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

1918年1月28日，芬兰无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控制了赫尔辛基，成立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同年11月，德国工人阶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社会民主党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工人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奋斗。巴伐利亚工人在首都慕尼黑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纷纷举行示威和总罢工，农民起来夺取土地。11月15日喀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和波兰等新的民族独立国家。

美、英、法等国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罢工工人提出“不许干涉苏俄”的战斗口号，码头工人拒绝装运进犯苏俄的武器弹药。意大利的罢工工人开展夺取工厂的斗争，农民也起来夺取土地。日本在1918年爆发了“米骚动”，劳动群众捣毁搞投机买卖的商店、袭击警察署，对当局的反动统治表示抗议。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1919年3月1日，朝鲜革命群众在汉城集会，发表《独立宣言》，进行武装起义。亚洲的印度、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洲的埃及，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古巴都先后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工农革命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

尽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反扑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的背叛，到1920年前后，欧洲、北美的革命运动逐渐转入低潮，但十月革命的风暴已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仍在不断发展。

2. 第三国际的成立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提出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织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明确了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原则，给各国共产党指出了行动方针。大会还对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并作了专题报告。《提纲》和《报告》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如下：

（1）关于民族问题，首先要把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明确地加以区分” ，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将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 。因此，“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 因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2）共产国际应当支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 。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同时也“必须坚持反对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

（3）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必须援助反对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4）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同时也给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为了与中国革命势力建立直接的联系，1920年间，共产国际先后派遣维金斯基和马林等前来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和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包含有国共两党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3. 社会主义苏联的稳步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经过几年的努力，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国内白军的叛乱，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个体工商业者自由经营，以租让制、合作社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废除实物配给，活跃商品经济等。

新经济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活跃了城乡经济，到1924年，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逐步有所改善。

在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1922年苏维埃国家把国内各民族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在战争结束之后，在加紧镇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到1924年，资本主义世界已治好了战争的创伤，经济开始向前发展。

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扩大殖民利益，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1919年巴黎和会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西方的关系。1921年11月又召开了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和中国九个国家参加的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目的是调协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的关系。中国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中心。最后签订的《九国公约》确定了让中国“门户开放”，使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个原则反映了美国势力的上升。过去在划分势力范围时期，美国未得到相应的利益，而“门户开放”政策则有利于美国凭恃强大的经济力量，在“机会均等”的竞争中处于优势。从而形成了所谓“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使帝国主义各国在重新瓜分世界中求得暂时的妥协，资本主义世界步入了和平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这就有利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干涉和破坏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

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情况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还缺乏认识，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只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而没有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强调对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①，而没有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

1922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陈独秀等提出中共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这年4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和各地共产党人传达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建立革命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因此，在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及保护人民政治经济利益的11项原则和邀请国民党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②。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7月间，中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党在目前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立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当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④。并提出了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一代表会议等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

但是，这时孙中山已明确表示：“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⑤。因此，“民主联合战线”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

这时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共产国际同意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的建议。8月，马林回到中国，极力劝说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党内合作”的办法。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

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但由于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迅速实现国共合作，组织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办法还存在各种顾虑，因而，积极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是党内少数领导人，更多的党员依然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于是，加速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代表们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精神，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对共产党员是全部加入国民党还是部分加入国民党和要不要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国民党组织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张国焘、蔡和森等主张：需要到国民党那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不同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马林、陈独秀等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认为应该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反映出党内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马林、陈独秀等在积极赞成国共合作的同时，在认识上表现了右的倾向。马林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为“反对剥削统治，争取民主和所有平民都得到人的生活”，因而对改造国民党抱过分乐观的态度。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去进行政治工作”，国民党的领导人将会“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马林还根据国民党支持了1922年的海员罢工的成绩，夸大了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威望。因此，他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建议把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以便全力做好国民党的工作。

陈独秀对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曾经持反对态度。经过西湖会议，特别是经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对于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在大会上贬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同时他却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

“只有500余人，工作只能做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且党“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努力于国民党”。因此，他赞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

马林、陈独秀等主张目前应集中党的力量“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并且主张帮助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思想。

张国焘、蔡和森等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则有“左”的倾向。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们反对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到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主张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的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参加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这种反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害怕工人阶级加入国

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的观点是“左”的错误观点。

经过激烈争论，与会代表对下列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中来。在此基础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注意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尚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大会在讨论中出现分歧是难免的，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前进道路和研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中产生的分歧。最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基础。

“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于9月迁回上海，同年11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开展国民运动，加紧进行国共合作问题，并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还说：“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断不宜强行之”。会后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

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逐步形成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民主革命斗争。十年间，他进行了讨袁、护法两大革命运动，经受了严重挫折。这期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了重大发展，逐渐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有其内在因素和客观条件：

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救中国，他义无反顾地穷毕生之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晚年获得重大发展的内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指引，五四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启发，共产党人主动热情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给他的无情打击则是促使他的革命思想向前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天，（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公布的一系列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法令，特别是1917年12月3日公布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国民劳动者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政府与东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瓜分东方各国的条约，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在1918年1月间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曾经提出要着重在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认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苏俄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同年夏，孙中山又千方百计以重金托人在美洲发电报给苏俄政府，热烈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电文写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这表明，孙中山早有联俄的意图。

当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一切特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孙中山正因护法失败蛰居上海。苏俄政府的声明，又一次使他受到鼓舞。后来他致电列宁说：苏俄政府的声明“使我国人民充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将俄国视为友邦，从此，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取

得民族解放也就有了指望。”__1920年秋，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金斯基，详细询问了苏俄革命的情况，表示要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他希望同苏俄建立经常的电讯联系，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21年6月14日，孙中山收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来信，这是孙中山收到苏俄政府的第一封信。在回信中，孙中山着重谈的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问题，他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

能告诉我们一切。”__这封信，生动地反映出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迫切要求。

孙中山深感遗憾地指出：“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__为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他迫切要求了解和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以便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道路。

就在孙中山对十月革命经验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刻，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揭露和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否定了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决定。孙中山热情支持爱国群众的斗争。

他在上海多次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他应邀出席爱国学生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当南北军阀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的时候，孙中山立即发电报谴责军阀政府，营救被捕学生。

在爱国群众运动浪潮推动下，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在发展。

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搬掉“旧官僚、军阀和政客三种陈土”。并发出了“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__的号召。

孙中山对五四爱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__。

可以说，孙中山是在五四运动的怒潮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看到了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此期间他给海外国民党党员写信表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__。可见，五四运动既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启示，又推动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晚年革命思想的发展，还得力于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之后，共产国际随即派遣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前来中国。1921年12月马林通过国民党北方支部长张继的介绍，前往桂林访问了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同行。双方进行了几次详细的会谈。马林应邀向国民党在桂林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张太雷也作了关于青年工作的介绍。会谈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建议。

这次会见收到积极的效果。会见马林之后，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说，他过去认为“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

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他催促廖仲恺快些办理联俄的事，并准备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加强同俄国的联系。

但孙中山认为，要同苏俄建立正式的公开的联盟，时机尚未成熟。他准备待北伐胜利之后才同俄国公开建立联盟。

次年陈炯明的叛变促使他加快了联俄的步伐。陈炯明于 1909 年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后回国参加护法斗争，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被委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21 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时，陈炯明除继续担任粤军总司令外，又兼任政府陆军部长、内政部长和广东省长等要职。随着权力的增加，陈炯明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企图独霸广东，拥兵自重。他为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决策，竟与英帝国主义及吴佩孚暗中勾结，制造障碍，阻挠北伐。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公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虽然孙中山及时得到情报，转移脱险，但广东革命根据地却因此得而复失。8 月 12 日，孙中山被迫再赴上海。

在陈炯明叛乱事件中，帝国主义国家都或明或暗地站在陈炯明一边，英帝国主义一面给陈炯明以经济援助，一面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当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持斗争时，英国籍的粤海关税务司登上永丰舰求见孙中山，以白鹅潭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无理要求孙中山的舰队离开白鹅潭，甚至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护法政府同美国的贷款谈判，也因陈炯明叛变而告吹。

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俄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受挫而改变态度。当时正在同孙中山谈判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坚定地表示支持孙中山，并祝愿他取得胜利。在达林即将离开中国时，孙中山通过陈友仁对他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的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

中国共产党人也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谴责陈炯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向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即与之断绝关系。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改变与孙中山合作的立场。当孙中山困守永丰舰，同陈炯明作殊死斗争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农群众，直接参加了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斗争。6 月 22 日，黄埔地区农民千余人，自动组成义勇队，协助海军扼守长洲要塞，保卫了孙中山舰队的陆上支援基地。7 月 11 日，广州电力、自来水和铁路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陈炯明叛军撤出广州。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政治上给予孙中山有力的支持。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李大钊也立即由京去沪，同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

此时，孙中山已认定同苏俄政府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的必要。8 月 25 日，他同马林会见时，接受了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的建议。随即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吸收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9 月 4 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干部会议，到会者有国民党在上海的高级干部 53 人。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6 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等九人组成党章起草

委员会（由于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四人要到北京出席国会会议，又指定叶楚傖、刘芷芬、孙科、彭素民为替补），负责拟订改组方案和国民党章程草案。9月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始。接着，孙中山又于11月15日和12月16日至18日两次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改组计划，审查改组方案，讨论修改党纲党章和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提出了“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的要求；关于民权主义，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指出“现代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主义之弩末”，提出了废除“阶级选举”，实行“普选制度”的主张；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规模宏大的工商业应由国家经营，并且应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此外，宣言还提出了“制订工人保护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反映工农群众利益的内容。这个《宣言》在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和扶助农工的政策。

1923年1月17日，苏俄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同孙中山会见，经过几次谈判，于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中俄关系中几个重大问题阐明了双方的立场，并取得相互的谅解。宣言的积极意义在于，苏俄政府重申遵守过去对华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支持中国完成独立和统一事业。《宣言》发表后越飞即离上海赴日本热海养病，孙中山也即派廖仲恺到日本同越飞进一步谈判关于苏俄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的具体事项。《宣言》的发表是孙中山正式联俄的标志，连同上述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标志着孙中山三大政策基本形成。

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受到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孙中山丝毫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坚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同时，耐心开导教育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为什么要联俄？孙中山指出：俄国的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这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来说，正是反帝斗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孙中山还提到联俄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为什么要联共和扶助农工？孙中山痛切地指出：“国民党已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他要借助共产党人强劲的革命活力以振兴国民党使它复活过来。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他决心广泛发动群众，“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这就必须把工农大众吸引到自己的革命旗帜之下，扩大国民党的阶级基础。

“三大政策”的形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铺平了道路。

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 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的完成

1922年8月，孙中山决定同共产党人合作，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加紧部署军事行动，决心夺回广州根据地。9月间，他将原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以黄大伟、许崇智（兼）、李福林为第一、二、三军军长。又于10月25日派邹鲁到香港联络滇军杨希闵，

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还致函湘军将领鲁涤平、蔡钜猷，约他们联合讨伐陈炯明。12月间，许崇智部从福建出发向广州进军（称东路讨贼军），杨希闵等部由广西出发（称西路讨贼军），1923年1月14日克复广州，陈炯明败走东江。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军大元帅，广州重新成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中央党部随即迁回广州，加紧筹备改组工作。

10月6日，苏联政府派遣的鲍罗廷到达广州，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8日，孙中山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28日，国民党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改组工作。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林森、孙科、谭平山、陈树人，邓泽如、许崇清、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委员，林直勉、谢良牧、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等五人为候补委员。鲍罗廷被聘为该委员会的顾问。

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下，国民党开始办理党员登记、训练基层组织的干部、指定专人起草宣言和党章等工作，并决定于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取得经验，先以广州上海两地作为改组工作的试点。

广州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杨匏安、刘尔嵩、阮啸仙等人努力下，进展十分顺利。11月1日，广州开始进行党员登记。接着召开党员大会，将全市划分为12个区党部、66个区分部和3个特别区分部，确定各区党部、区分部的负责人，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上海的改组工作，因受国民党内右派势力阻挠，进展较慢。12月1日，孙中山派廖仲恺、鲍罗廷前往指导工作。9日，召开了在上海的中央干部会议，由廖仲恺作了报告，说明改组原因、方针，强调自下而上进行改组，健全各级基层组织的必要。16日，成立临时执行部主持改组工作。通过党员登记，于23日召开了上海市全体党员大会，整顿和健全了基层组织。

由于上海工商业发达，又是国内重要文化中心，因此基层党组织除按地段划分7个区党部、36个区分部之外，在较大的工厂、商场或高等院校、群众团体中均设立特别区分部。

继广州、上海之后，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整顿组织的工作，同时进行选举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按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定，各省代表名额均为6名，其中3名由孙中山指派，3名通过选举产生。

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97人。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开幕典礼。他宣布这次大会的宗旨是改组国民党，并指定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守常（大钊）五人为大会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

会议的第一项重要内容是审查和通过大会宣言。首先由孙中山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讲演，他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指出国民党组织不严密，“使反革命派能乘虚以入”，以致那些本来是“反对革命之人及杀革命党之人（在革命胜利之后）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这必然要“把革命事业弄坏”。他表示这次改组，就是要重新做起。

提交大会的《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等草拟的。大会审查通过了这个《宣言》草案。《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宣言突出了它的反帝内容，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说“承

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实现中国国内的民族团结，共同完成争取“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的任务。因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关于民权主义，宣言强调民权的广泛性，规定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同时又强调民权的行使服从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指出：民权“只给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对那些“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及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权利。”关于民生主义，宣言在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改善工农生活的一些措施，如“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供其匮乏”。同时，《宣言》还高度评价了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

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三民主义的新发展。反映在宣言中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

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审查和通过新的党章。1月22日，大会执行主席林森把党章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在讨论新党章时，一些代表对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还有异议。广州代表方瑞麟在大会上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这个建议，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最后表决时方瑞麟的意见被否决，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右派势力妄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终于失败。

大会还听取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的代表所作的党务报告，组织了由谭平山、廖仲恺、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刘芦隐等九人组成的《审查党务委员会》，审查各地党务，特别是改组以来的组织整顿工作。大会对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大会进行期间，于25日获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决定体会三天以示悼念，并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了隆重的追悼仪式。30日下午，大会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经过民主选举，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24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杨希闵、叶楚傖、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韦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会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在41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10人，占24.9%。

1月31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中央党部于广州，另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执行部，加强对地方党部的领导。

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和8个部。秘书处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3人组成，8个部的负责人分别为：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青年部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妇女部部长曾醒、秘书唐允恭；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调查部部长暂未定。

3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海外部，以林森

为部长。并决定派出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一大”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它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其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功绩。从此，中国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此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

中国共产党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于2月间召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其态度决议案》，要求共产党员主动和国民党员搞好团结，并在工作中模范带头、以身作则，带动他们前进。决议指出：“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以便通过“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¹。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肯定了前一阶段工作的成绩，分析了国民党内存在左右两派势力。会议批评了为维护国民党的统一而调和两派斗争的做法，要求共产党员应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对右派作斗争。会议又指出，我们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的时候，有“偏重组织，忽略宣传”的倾向，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宣言’里的反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²以此推动国民党继续朝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第三节 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沉寂。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强调“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地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领导他们把日常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工农部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会后中共中央工农部设立了以邓中夏为书记的工会运动委员会。这次会议及时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广州地区的工会没有受到摧残。国共合作前夕，共产党人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就在工人群众中做了一些坚实的工作。但，当时广州工会派系林立、行会性质比较严重。因此，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首先展开“劳工统一运动”，并派出工运干部刘尔崧、冯菊坡、施卜等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任职，具体领导工人运动。此举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

经过初步工作，1925年3月，召开成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就统一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对国民革命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70多个工会的代表160余人参加了会议。工人部长廖仲恺主持开幕，孙中山发表了演讲。他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大团体”，在国民革命中作“全国人民的指导”，成为“国民革命的先锋”。代表大会通过了：整顿工人组织、各行业建立统一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建立职业介绍所等内容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以刘尔崧、鲍武等20人为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7月，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帝罢工。沙面是帝国主义租界。6月中旬，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在沙面行刺法驻安南总督麦尔林。租界英法当局以此为借口，制订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的“新警律”。因而激起沙面华工和广州各界群众的极大不满和坚决反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即和其他团体组织了“广州各界反对沙面苛例大会”，发动团结沙面工人与英法租界当局作斗争。15日，沙面华工上至洋行、银行雇员、下至清洁工，一致离开沙面，举行罢工。次日，沙面华捕也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

沙面工人罢工，使沙面的金融、商业活动陷于瘫痪，连日常生活也发生极大困难。英帝国主义增调军舰，恐吓罢工工人及广州市民；租界英法当局压迫广东革命政府取缔罢工。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坚决抵制。孙中山指出：工人“此次因争人格发生合理循轨的罢工，政府实不能加以取缔”；沙面为中国领土，“外人实无取缔华人权”。^①广东省长廖仲恺致函法领事，申明，此次罢工，实因沙面“英法工部局颁布新律所激动而成”，是合理的举动，不是本政府所能够制止的。^②

在恐吓和压迫无效后，沙面英法当局被迫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沙面工人代表提出：取消“新警律”，恢复罢工工人原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要求。沙面英法当局开始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后又佯装接受略加修改的罢工工人的要求，但又节外生枝，中断了谈判。

帝国主义者破坏谈判，激起中国各界人民的愤慨，掀起援助沙面罢工的浪潮。广州许多团体发表宣言谴责英法帝国主义的行径和破坏谈判的阴谋，向罢工工人表示支援。北京、上海、长沙等不少城市的工商学界积极声援沙面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海外华侨闻讯也纷纷来电来函，向租界英法当局提出抗议，并声援或解囊资助罢工工人。

罢工的坚持和扩大，使外商的损失越来越大；日本总领事主张对沙面事件从速和解。在内外压力下，英法当局也表示希望早日和解。后经磋商，罢工工人于8月16日复工。但当华捕回到沙面复工时，巡捕头子诱骗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法文辞职书上签字。英法当局便以此为依据，强令他们离开沙面。罢工工人闻讯，无不义愤填膺，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采取“劳工绝交”、“经济绝交”、“断绝沙面交通”等办法回击英法帝国主义的挑衅。广东革命政府也派人向英法领事交涉，责其失言背约。沙面英法当局害怕罢工风潮进一步扩大，遭受更大损失，于是向广东革命政府表示道歉，表示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于是，罢工工人于19日复工，华捕则在报到后集体辞职。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

沙面罢工是一次反帝政治罢工。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这次罢工的意义是：（1）锻炼了广州工人阶级，提高了政治觉悟，并积累了罢工斗争的经验；（2）初步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的标志。

沙面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规模也较前扩大。早在1924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军阀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已逐步恢复。2月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秘密成立。铁路工会经过整顿恢复，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人。但到5月间，全国铁路总工会又被军阀政府查封。从2月到7月，上海、芜湖、苏州、汉口、长沙、镇江、九江、济南、杭州、宁波、镇海等城市的许多行业的工人也都举行过罢工。但这些罢工斗争规模不大，以经济斗争为主，并多数发生在江浙地区。1924年下半年，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复兴。8、9月间，浙江余姚盐民，苏州、湖州丝业工人，上海烟厂、丝厂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工人，武汉人力车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其中，余姚的盐民1万人为反对盐运使设立公仓而罢工，不怕当局派军警镇压，捣毁了盐局，迫使当局取消了公仓，罢工取得胜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7000余人，为反对资方新订苛规，无故开除女工，阴谋解散工会，在向警予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4个月，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产生较大影响。

10月，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形势，营救被捕工运骨干，恢复铁路总工会，领导铁路工人开展斗争。1925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和京津、正太、陇海、京绥、京奉各路工会已先后恢复或部分恢复。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的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也于2月7日在郑州开幕，到会代表45人。会议通过了：整顿铁路工会，加强团结和统一；争取工人基本的政治、经济权益等决议。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斗争经验，进一步促进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各行业的工人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北至奉天辽阳，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全国有20多个城市工人为争取政治、经济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开展罢工斗争的有纺织、码头、电车、香烟制造等近20个行

业的工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是因第八厂工头殴打女工，继而又无理开除与厂方评理的40多名粗纱间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发生后，中共中央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沪西工人俱乐部具体指导这次罢工。俱乐部向厂方提出：不准殴打和无故开除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被辞退工人完全复工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政治、经济要求。厂方对此置之不理，并继续捕捉工人。于是，在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工运领袖的指导下，沪西工人俱乐部以“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口号，发动日商内外棉其他厂工人参加，使罢工迅速扩展到22间纱厂，4万余人。日本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组织御用工会，发赏钱引诱工人上班；另一方面勾结淞沪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封闭工会，拘捕邓中夏等工运领袖。但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在上海和全国各界人民支持下，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工要求。上海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启封了工会，释放了邓中夏等工运领袖。这次罢工的胜利意义很大：（1）提高了工会的威信，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和健全起来；（2）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邓中夏说：这次罢工“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4月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2.3万多人举行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以上事实说明：自沙面罢工后，各地工人运动从沉寂逐步复兴，至1925年2月间，全国工人运动已由复兴开始走向新高潮。

二、农民运动的兴起

国共合作前，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曾在浙江的萧山衙前村、广东的海陆丰、湖南的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但，这些地方的农民运动都因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受到挫折。

国共合作建立后，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兴起。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农民运动。中共“三大”决定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之一，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应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应当开始派宣传员到乡村去”，积极领导农民斗争。根据党的决议，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广东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先后由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人担任书记，领导农民运动。（2）广东农民运动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国民党“一大”后，成立了中央农民部，林伯渠担任第一任部长，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先后出任农民部秘书和干事，具体领导农民运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时开展农民运动最迫切的是解决农运干部缺乏的问题。农民部根据彭湃的建议于1924年7月创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主任。创办农讲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的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在教学方面，除课堂教学外，还注意到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与宣传活动，使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孙中山和廖仲恺曾为第一届学员作了题为《耕者有其田》和《农民运动所应注意之要点》的讲演，强调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从1924年8月至1925年12月，农讲所又先后举办了4届，分别由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任主任。总计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共培养454人，其中1/3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担任农运特派员，2/3回原地从事农

民运动，多数成为农村开展农运的骨干。

在创办农讲所的同时，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7月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对农会的性质、组织机构，农民入会的条件、手续，农会及会员的权利、义务等作了规定。其后，广东革命政府又两次发表对农民运动宣言，宣布农会受法律保护，有请求罢免横暴官吏和参与各级政府商讨有关农民问题的会议权。广东省长公署还发布命令，责成各县政府帮助各地农民按章程组织农民协会。

国民党农民部成立后，选定广州市郊及顺德、广宁、香山、佛山、东莞、鹤山、花县等地开展工作。彭湃、阮啸仙和其他农运特派员深入各地宣传、发动农民，收到显著成绩。广宁和花县的农民运动声势尤为浩大。

广宁地处广东西北，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在军阀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农民极端贫苦，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意识比较强烈。1924年4月，共产党员周其鉴以农运特派员身份带领一批有志于农运的骨干来到广宁，他们通过演说、谈心等方法，启发农民的觉悟，使广大农民很快就认识到组织起来才能谋求解放的道理，于是纷纷组织农民协会。5月中旬，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到广宁，和周其鉴等人一起，教育启发农民积极分子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东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以党支部为核心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农民。6月中旬，已成立8个区的农会，入会农民达6万余人。10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同时组建3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花县位于广州北郊，国共合作前，阮啸仙等人已到当地宣传、发动农民，农民运动有一定基础。1924年春，共产党员陈道周前往花县，与当地农运骨干深入各乡宣传发动农民，到10月底，全县成立农会的有30余乡，达3000多家以上，人数3万余，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广宁县农会根据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决定在成立农会的地方减租“四成”，发布了《减租宣言》和《给田主的一封信》。广宁地主组织“保产大会”、“业主维持会”与农会对抗，叫嚷“乱世无主，强奴压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不承认减租，从农会者自误”。11月下旬，地主武装先行向农民协会进攻。广宁农会在彭湃、周其鉴等人的指导下，坚决反击，广东省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等武装支持农会。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击败了地主武装，迫使地主接受农会提出的“七成交租”，“统一使用农会正斗”、取消“田信鸡”等减租条件。花县农会与地主的斗争更为复杂。农会成立后，土豪劣绅即组织“田主维持会”和“民团总局”，并公开出重金悬赏农会干部的头。当县农会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额外剥削后，花县地主出动民团捣毁了县农会，并杀害农会干部。花县惨案发生后，彭湃前往调查，将地主摧残农会的罪行书面报告广东革命政府。花县农会也派人向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廖仲恺获悉后，即责令花县县长严惩祸首，并指示拨发一些武器给农会，这才把地主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些情况说明，农民的经济斗争一开始便遇到地主豪绅及其政权的强烈反抗，因而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政治斗争，直至激烈的武装冲突。

1925年3月，东征军收复海陆丰后，在海丰农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恢复县农民协会，选举彭湃为会长。大会决定恢复各地农会，实行“二五减租”。不久又组建了农民自卫军，李劳工任总队长，吴振民、卢德铭任

教官。农民运动在海丰如火如荼地展开。随着东征军收复东江，农民运动在东江各县也开展起来。

在国共合作和中共的领导与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到 1925 年 5 月前“全省有农会组织之县 22 处，有组织之农民 21 万以上。”海丰、陆丰、广宁、花县、顺德、东莞、番禺、中山等县建立了县农会。开展农民运动的区域逐渐扩大。在农民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1925 年 5 月 1 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有关农民问题的 7 个决议案，修改了《农民协会章程》，成立了省农民协会。这次大会，总结了农民运动经验，提出了农民斗争的目标和今后工作方针，把广东农民运动推向高潮。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农民运动也在军阀统治的一些省区兴起。1924 年 7 月，南昌市郊扬子洲农民组建了江西第一个农会。11 月，吉安延福一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石安农民也秘密组织农会。这时，湖北的黄梅县建立了农民研究会；广西东兰县韦拔群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1925 年 2 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在韶山和银田一带发动农民建立了 20 多个乡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与地主奸商展开斗争。虽然这些省区的农民运动由于没有政权和武装的支持，此伏彼起，但为尔后农民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三、青年、学生和妇女运动的开展

国共合作建立后，青年、学生运动日趋发展。

中共“三大”决定把青年运动作为“党重要工作之一”，努力引导广大青年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的决议。在广东，青年、学生运动比其他省份发展得更迅速和广泛。国共合作建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以青年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为核心，“与国民党之学生党员合作”做“学生统一运动”。经过努力，“广州学生联合会”进行了改组，新学生社社员蒋世明、杨石魂、周文雍等 10 多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成为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力量。学联在改组宣言中，不仅强调青年、学生自身的团结；而且明确指出：“实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设真正民主完全独立国家”是当今奋斗的目标。从而把广州青年、学生的斗争，引导到反帝反军阀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广州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反帝废约运动。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教育主权，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因而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24 年 4 月，广州教会学校“圣三一”学生不满学校当局对他们思想和活动的严密控制，举行罢课。在新学生社的支持下，学生们发表宣言反对奴化教育，提出“不得干涉学生集会结社”等要求。因学校当局顽固不化，随后许多学生宣布退学，致使“圣三一”学校停办。在此前后，徐州、南京、福州、长沙、汉口、重庆、开封等地的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也进行了反对奴化教育或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1924 年 8 月，全国学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收回关税权、司法权与教育权”的坚决主张，响应正在开展的反帝废约运动。接着，各地学生团体还与其他团体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活动。他们出版反基督教运动的刊物，揭露教会侵略的罪行，宣传反基督教斗争的意义。在年底开展的“反基督教周”运动中，广州、上海、长沙等全国数 10 个城市的广大青年、

学生走上街头，或是示威游行，或是宣传、演说，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高潮。这场猛烈的“反基督教运动”，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提出一些不适当的口号，但它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提高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国共合作建立，也为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中共“三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强调引导妇女加入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确认了男女平等原则。1924年3月8日，广州各界妇女2000多人集会，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何香凝主持大会，各主要妇女团体代表发表了演讲。大会提出了努力争取妇女政治、经济权利，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等奋斗目标。这次大会是我国妇女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开端。它起了团结广大妇女，提高妇女觉悟，促进妇女运动开展的积极作用。

随着妇女界的觉悟，各地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斗争。在上海，1924年6月，14个纱厂女工举行联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反对无故开除工人。罢工取得部分胜利。在广州，电话局女工在新学生社领导下，为组建工会与电话局当局开展斗争，取得胜利。斗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电话女司机联合会”。这是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女工工会。这些斗争表明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24年，全国各地许多妇女团体和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国民会议运动。上海、广州、长沙、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妇女团体先后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3月，各地妇女团体选派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推选5人组成“妇女运动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29日，正式成立了“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它号召“全国学校的、工厂的、田间的、商店的以及家庭的姐妹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妇女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和地位”。5月10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正式成立，它发表宣言揭露了妇女受压迫的命运和原因，指明了争取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新阶段。

四、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以中俄协定的签订为契机而掀起的。它与不断发展的工农运动、青年学生和妇女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浪潮。

中苏协定的签订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1919年7月，苏俄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就宣布“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归还有关权益于中国，建议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但北京政府仰承帝国主义鼻息，不曾与苏俄接触，到1920年6月才派出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俄。这时苏俄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对中国人民友好，建议两国订立专约解决悬案。宣言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北京政府只得于1921年2月表示同意与苏俄政府谈判，但北京政府又在帝国主义压力下，设置重重障碍使谈判无法进行。1923年越飞来华，也未能与北京政府进行正式谈判。1923年9月，苏俄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从此双方代表王正廷、加拉罕开始接触。由于中国政府不敢承认苏俄，谈判未获成果。1924年2月，英意等国承认苏联。这时北京大

学 47 位教授联名致函北京政府，提议先行承认苏联，再以平等原则和苏联谈判解决悬案。全国各界人民也主张无条件承认苏联，北京政府才又与苏联恢复谈判。3 月，中俄（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他文件拟定，并签了字。

在谈判即将成功的时候，由于法美日等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干涉，北京政府又以种种借口将条约的修改和签订搁置下来。帝国主义的干涉、北京政府的软弱和在外交上的出尔反尔，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3 月 21 日，北京教育会等 9 团体发表抗议宣言，呼吁各阶层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22 日，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说：“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北京大专学校 40 余校代表开会决定示威游行](#)，因反动军警事先严密控制未实现。与此同时，广州、长沙、武汉、上海、芜湖、保定、哈尔滨等许多城市的群众团体纷纷通电，要求速签中苏协定。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吴佩孚等也电曹锟尽早签署协定。在这种形势下，中苏双方于 5 月下旬达成协议，31 日由顾维钧和加拉罕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

中俄（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主要内容有：1. 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及合同书，概行废止，重订平等条约。2. 帝俄政府与第三国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3. 苏联政府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所得之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及特许。4. 苏联政府放弃庚子赔款。5. 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6. 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

这个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定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了范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开展。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和庆祝中苏协定的签订。北京、上海、长沙等许多城市的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或通电表示祝贺。

6 月中旬，北京公使团拒不把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企图阻止中苏协定的实施。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在全国掀起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7 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学生联合会等 10 余个团体和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亦称大同盟），吁请全国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短短几天内，北京就有 50 多个团体加入，并正式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郭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反帝大同盟，董必武等在武汉参与组织了反帝大同盟，王烬美等人领导成立了济南反帝大同盟。与此同时，上海、广州、青岛、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各地反帝大同盟利用报刊、集会游行、演说等宣传手段和方式广泛地进行反帝废约宣传，使反帝废约的呼声响彻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9 月初，反帝废约运动达到高潮，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倡议发起了“中国反帝运动周”。“九·七”国耻日这一天，广州几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洗雪国耻。上海各界群众集会演说，控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宣布反帝废约运动的意义。长沙、济南、杭州等许多城市

的各界群众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集会游行或宣传演说，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废约运动极为恐慌和仇视。他们以“排外”来指责中国人民和欺骗其国内人民。对此，许多报刊载文予以驳斥。指出：中国人民反对的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对尊重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受不平等条约压迫，要求摆脱“桎梏生活”、“回复平等自由之地位”，这是“情理之常”，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之诬蔑。

尽管这场反帝废约运动存在局限性，如参加者成分复杂，只主张“采取和平手段”，矛头仅指向帝国主义，而不敢指向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军阀，未能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动员组织和训练了广大群众，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从而促进了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第四节 黄埔军校的创办

一、黄埔军校的筹建

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逐步认识到组建一支革命军队对取得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他决心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就邀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8月，又派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代表团在访问期间，曾直接向苏方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制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1]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国内积极进行筹建军官学校的工作。在10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恳亲大会上，孙中山提出在广州设立陆军讲武堂，“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材”^[2]的建设，号召海外革命青年回国学习军事。11月26日，孙中山又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作出了建立“国民军军官学校”的决定，招生对象包括党内外一切有志献身国民革命事业的，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3]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军官学校的筹建。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李济深（邓演达代）、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7人为筹备委员。择定广州近郊黄埔长洲岛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旧址为校址，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2月6日，设筹备处于广州南堤2号（今广州沿江中路239号对面），正式开始筹建军校的工作。

由于被委任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2月21日突然辞职，且未经孙中山批准便擅自离开广州返回浙江老家，使军校筹备工作一度中断。孙中山批示不同意蒋介石辞职，但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又于2月23日任命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直至4月21日，蒋介石才返校。

当时，筹措办校经费是一大困难，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回粤后曾电询廖仲恺，问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复电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4]实际上，从筹备到办校，廖仲恺为解决军校经费问题，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甚至要跑到杨希闵的鸦片烟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5]

军校筹备委员会从1924年2月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至5月9日工作结束，共举行会议32次，对军校的体制、规章制度、教练计划、教职员甄选、学生招考以及校舍修葺等都作了初步安排。在筹备过程中，军校初定设立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部，由各筹备委员暂行分工主管。各级办事人员则从各军军事学校在职人员中选拔，经严格挑选后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关于学生来源，筹备委员会决定在全国19个省进行招考。为切实作好招生工作，筹备委员会决定成立军校试验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

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黄埔军校招生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尽管当时全国大多数省区尚在军阀统治之下，军校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只能委托各地党组织及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物色和介绍，但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三倍多。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门学校毕业生。但也有一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示，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经严格考试，第一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的工作，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50~60人， 来自湖南的考生、共产党员蒋先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入学。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创办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1924年初，苏联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还给军校赠送了武器和经费。随后，苏联又派遣军事顾问团，团长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将军）率领40多个苏联军事专家在黄埔军校工作。这是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能在短期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十分重视，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他与校长、党代表三人组成校本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校本部之下，除原设五部外，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决定增设政治部。另设教官室主管战术训练工作。后又增设教育长一职。

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为主任，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骏彦为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李其芳为副主任。以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柏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又增设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

1924年5月5日，第一期学生入校，编为四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1、2、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分别以吕梦熊、茅延楨、金佛庄、李伟章为各队队长（其中茅、金是共产党员）。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出席典礼并发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孙中山首先郑重宣布，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创造革命军，求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强调办军校要学习苏联经验，指出俄国革命之能成功，是“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他勉励军校学生要立大志做革命军人，“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还指出：做革命军，除了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理想，还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因此，一定要学好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孙中山对第1期学生寄予极大的信赖和深切的期望，在他结束讲话时，表示“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 以完成拯救中国的大业。

二、军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在办学方向上主要吸收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教学工作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方针，尤其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是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事学校的重要标志之一。军校在党代表直接领导下，通过政治部对全校进行政治教育和开展政治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奠基，而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因对国共合作有异议，在军校开学 12 天就辞职。戴离职后由邵元冲继任政治部主任，邵是旧文人，不会做政治工作，因而打不开局面。要搞好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当务之急是必须选派得力干部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极其重要的职务。经共产党人推荐，由廖仲恺电邀在法国的周恩来回国任职。1924 年 7 月，周恩来离法返国，9 月到达广州，11 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工作。从此，政治部成为对学生进行政治训练的中心，也是共产党人在军校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继周恩来之后，先后有包惠僧、邵力子、鲁易和熊雄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还有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于树德、安体诚、高语罕等先后担任政治部秘书、总政治教官和政治教官。这些共产党人在军校，为培养国民革命的军事人才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到任后，首先充实政治部的机构，在第一批学生中抽调共产党员王逸常、杨其纲、洪剑雄到政治部当见习干事，设置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制定工作条例，明确职责范围，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彻底改变过去以蒋介石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作为治军思想教育依据的状况，认真推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

在课程设置方面，大量开设政治理论和有关的基础知识课程，帮助学员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主要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的解剖、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第四期政治课程大大增加。除系统政治课程外，政治部又经常邀请当时掌握实际领导工作的重要人物来校演讲。国民党的汪精卫、胡汉民，共产党的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都曾应邀来校演讲。这些讲演对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和加深学生对革命形势任务的了解都是非常有用的。

政治部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文娱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一期学生组织了文艺团体——“血花剧社”，共产党员陈赓等是剧社的领导人，也是主要演员。他们经常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文艺节目，既活跃了课余生活，又宣传了革命思想。

此外，政治部还配合重大事件组织宣传队开展政治工作。第一、二次东征时，都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通过宣传队的活动，既教育了军校的学生和战士为人民而战，又宣传教育群众拥护革命军，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行。政治部和校本部编印报刊也是加强宣传和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先后创办的刊物主要有：《政治军事月刊》、《黄埔日刊》、《黄埔潮》等。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主要由国民党军官和苏联顾问承担。军事教育课程分学科和术科。第一期只设步兵科，学科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和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四大教程以及其他理论课程。术科主要是制式教练，特别注重战斗教练和实弹射击等军事技术。从第二期起分设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宪兵五科。后又增设机关枪科、骑兵科和航空科。除步兵科外，其余各科根据专业需要，增设技术性课程。

从第一期至第三期，每期学习时间均为7个月。新生入学后，先进行1个月的新兵训练，再进行6个月的教学及野外实习。由于当时革命形势急剧发展，黄埔军校学生在学习期间，常常参加实际战斗。实际上，黄埔军校对学生的培养，更重要的方法是让他们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第一期学生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第二期学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的战斗，第三期入伍生参加了平定杨刘和第二次东征的战斗，第四期学生也曾担任驻防惠州和警卫黄埔的任务。这样的火线练兵，使学生把在军校学习的军事知识与技术付诸实践，这又是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能在短期收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25年7月起，军校增设政治科，聘请胡汉民、汪精卫、甘乃光等为教官，加紧培训军队的政治工作骨干。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以蒋介石为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并将所属各军的军事学校全部并入该校。军校在培育出大批军事骨干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出色的政治干部。北伐出师后，黄埔军校继续招收第五期和第六期学生入校学习。为适应战争需要增设了无线电工兵大队及军医班、担架班。各期毕业生陆续奔赴北伐前线，参加北伐战争。

三、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

黄埔军校既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随着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左派力量同右派的分歧，在校内也在不断扩大。

建校初期，校内政治气氛热烈，学生思想活跃。1924年7月6日正式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选出了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为第一届执行委员。这个领导机构，包括了国共两党成员（严、金、李是中共党员）。8月间，第一期学员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共党支部，以蒋先云为书记，直属中共两广区委领导。周恩来到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该支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成为军校政治部的得力助手。

1924年8月，“扣械事件”爆发后，面对商团蓄谋叛乱的严重局势，各军事学校和有关部门都有团结起来挽救时局的要求。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下，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桂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和海军学校等联合组成青年军人代表会，商定每周碰头一次，每团体（校）派代表2人出席，研究支持革命政府，制止商团破坏的有关问题。各团体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商团叛乱平定后，“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称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由团体会员改为个人会员。1925年2月1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人数约2000人。国民党中央党部、各群众团体都派代表出席。大会发表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痛切指出：祖国的大好河山已成“兵匪军阀帝国主义共同捣乱之残局”，呼吁青年军人奋起救国自救，“警惕自己变成新军阀的工具。”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本会会员将遵守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誓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女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会后游行庆祝，盛况空前。该会出版的期刊《中国军人》，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主张，紧密结合当前形势提出“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打倒陈炯明”的战斗口号。黄埔军校的左派学生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王一飞等都在该会担任领导职务。青年军人联合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团体。它的成立，不但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地位，而且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各军中的影响。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本着既定目标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些矢志于革命的青年军人纷纷加入联合会，到 1925 年 8 月，会员已达 2 万多人，还有一些青年军人经过联合会的教育和引导，迅速提高政治觉悟，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军人联合会队伍的迅速壮大及其政治影响的不断提高，引起右派势力的恐惧和不满。王柏龄、冷欣、贺衷寒等加紧筹划建立右派群众组织同左派组织相对抗。在第一次东征出师前数日的学生聚餐宴会上，就出现了贺衷寒起草的发起组织孙中山主义研究会的油印文件。 东征期间，冷欣等右翼学生曾集合 30 多人，在梅县召开会议，酝酿成立组织。4 月 24 日，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宣布成立（后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6 月 3 日，该组织发表宣言，含沙射影地攻击左派势力。在王柏龄、冷欣等人的活动下，右翼分子纷纷加入该会，原被推选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会的曾扩情、贺衷寒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

从此，黄埔军校左右两派的分化日益明显，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孙文主义学会出版了《革命导报》等刊物和组织“青白剧社”公开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常常借故向青年军人联合会挑衅，甚至殴打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学生。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二次东征结束后，孙文主义学会作为一股反共势力已在社会上形成。1925 年 12 月 29 日，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操场召开成立大会。他们打着研究孙文主义的旗号，欺骗不明真相群众，组织有武装力量参加的示威游行，向左派进行挑战。在黄埔军校内，围绕着是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是否定三大政策、是拥护国共合作还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原则问题，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展开了辩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否认三大政策，声称谁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孙文主义，谁便是国民党的“叛逆”，并扬言要“在统一战线中开除共产党。” 面对右派的猖獗进攻，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了有力的反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人论证了两党坚持合作、保持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破坏统一战线只能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有利。蒋先云在《怎样做革命派》一文中指出：“在革命阵营中，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破坏的人，才是孙中山的叛徒。”

蒋介石对左派力量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壮大早怀疑忌，他对两派斗争表面上采取局外人姿态，暗中则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压制左派的活动。当东征军克复潮梅之后，右派分子王柏龄乘周恩来因公离开总部之机，指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无理取闹，甚至殴打共产党员李之龙。事后，蒋介石不但不处理肇事分子，反而将李之龙调离黄埔军校。蒋介石偏袒孙文主义学会的行动引起群众不满，青年军人联合会即发动师生，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罪行。由于证据确凿，使王柏龄威信扫地。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行动，打在王柏龄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他曾私下对人说：“打击了王柏龄，等于打断了我的一只臂膀。”

此后，蒋介石压抑、打击左派的行动变本加厉。11 月间，他向周恩来提出要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员名单的要求。周恩来婉言拒绝。12 月 8 日，蒋介石又在潮州行营召集政治部人员和各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两党团结问题的名义，作出了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两条规定：1. 共产党员在军校“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2. 国民党员如加入共产党，“须向特别党部声明，请得照准。”

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召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职员开联席会议，达成四点协议：1.“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2.两会在军校和党军内的活动，“领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的指导”，3.“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4.“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把青年军人联合会置于他的监督之下。紧接着，蒋介石制造了“3·20”事件，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4月7日，又下达“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宣布“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10月，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也完成了作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面的任务，于21日宣布“解散”。

至此，蒋介石已得到进一步控制黄埔军校的条件。他立即授意组织“统一的”“黄埔同学会”，并指令曾扩情、贾柏涛和蒋先云等8人为筹备委员，6月27日宣布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会章规定“一切会务均听命于会长”，蒋介石达到了主宰黄埔同学会的目的。28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讲话，正式宣布军校学生不得跨党，凡跨党者必须在3天内向所在连队的连长声明，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或者退出共产党。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再向蒋介石让步，蒋介石得以加强自己对黄埔军校的控制。

四、各地分校的设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共招收六期学生，从第五期起，先后在潮州、南宁、长沙、武汉等地设立分校，培训军事干部。

潮州分校设立最早，1925年3月第一次东征期间，黄埔军校的校军到达潮汕后，为给随军的第二期学生补课，筹建了潮州分校。后因回师讨伐杨刘而中止。11月第二次东征克复潮汕，12月正式成立潮汕分校，以何应钦为分校校长兼教育长。该校共招学生两期348人，北伐开始即宣布停办。

南宁分校设立于1926年春，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由俞作柏担任校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校落入桂系军阀之手。

长沙分校亦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于1926年2月开始筹办，以石醉六为分校校长，共产党员夏曦担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政治气氛非常活跃。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该校被许克祥摧残。

武汉分校是在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开始筹办的，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政治科大队和炮科、工兵科大队先后迁至武昌，进入武汉分校学习。同时，武汉分校开始在各省市招生，并开始招收女生。经考试录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还有一些来自朝鲜、越南和琉球的革命青年，进入该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分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徐谦、恽代英为校务委员，邓演达代校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招收六期学生，共1万余人，已毕业的约5千人，各分校招收8千5百人，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大部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作出贡献。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也表明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并积累了军事工作的初步经验。

第五节 孙中山出师北伐和平定商团叛乱

一、广东商团的反动倾向和扣械事件

广东商民的武装组织——商团军，原是商民自卫性组织。清末民初广东省政权落入军阀手中，他们巧取豪夺，纵容军队横行霸道，奸淫劫掠，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老百姓惶惶不安。广州商民为保卫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在 1911 年夏组织起商团军，进行自卫。随后，佛山、江门、石岐、九江等中小城市亦相继组建商团军。他们宣布成立武装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商场，维持治安”、“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至于“其他事项，概不干预”。商团军在“官不卫民，不如民之自卫”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民众利益的积极作用。

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广东兴起并将向全国各地推进。因此，广东革命政权也日益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妄图利用各种手段扼杀这股革命力量。于是，商团控制的武装组织逐渐变成为反革命的别动队，成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工具。

1922 年，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掌握了商团军的领导权。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加入了英国国籍。国共合作实现后，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分子怂恿下，抱着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目的，加紧扩充商团军，至叛乱前夕，已发展至 10 个团 4000 余人，加上后备力量达 6000 余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同革命政府“扶助农工”政策相对抗。从此，商团军日益成为资本家压制工人运动的反动工具。各地商团军拷打、囚禁、枪杀工人，捣毁工会的事不断发生。“如江门之役，围困渔业工会，乱枪射击油业工友，惨被拘囚拷打者二十一人，失踪者六十二人。其余香山小榄理发工会之被捣毁，枪击与强虏，石岐集贤工会工友因罢工制止起运而被枪伤与击沉。新会葵业工友之报行纠察而强被囚禁，大良辗谷工会，去年罢工时之横遭围困。四会理发工会因加价而惨遭蹂躏”^①等。

1924 年 5 月，商团与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发生直接冲突。当时，政府为解决经济困难，增加财政收入，决定向各商号征收铺底捐。这个决定受到商民强烈反对，甚至酝酿罢市。最后政府作出让步，取消了征收铺底捐的决定。可是在陈廉伯控制下的商团，已走上了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军阀相勾结，直接阻止国民革命的反动道路。因而，征收铺底捐的决定虽已取消，商团反对政府的行动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28 日，商团秘密召开“团务会议”，研究所谓“商团联防”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商团联防总部”，把各城市的商民武装同城郊地主武装“乡团”联合一起，组成所谓“大联团”，推陈廉伯为“总长”，邓介石（丝店老板）、陈恭受（佛山市买办兼大地主）为“副总长”，定于 8 月中旬在广州举行“大联团开幕典礼”。还打着商界武装自卫的幌子，决定购买军械，加强装备，扩充实力。甚至鼓吹购买巡逻舰只，筹设团军制弹厂，组织商团军校，设立银行等，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

广东省长廖仲恺对商团的狂妄行为非常气愤，不批准他们成立联防总部，并宣布商团应按政府有关规章进行改组，归民团统率处管辖。商团则蓄意对抗，陈廉伯擅自筹集百万元巨款，通过香港南利洋行向国外定购长短枪 1 万支，子弹 300 万发，由粤汉铁路局局长许崇灏（商团成员）向大本营军政部骗取了军械入口护照，雇用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轮船“哈佛号”将武器偷运进口。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8月8日，哈佛号轮船到达虎门，停泊在沙角炮台附近，偷运武器之事即被政府获悉。孙中山得知后十分震怒，立即命令杨希闵、刘震寰进行查办。但刘、杨对孙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拖延不办。至8月10日清晨，哈佛号已抵达距沙面英法租界只有咫尺之遥的白鹅潭江面。孙中山以事态紧迫，即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号押至黄埔，并当场搜出偷运的全部枪支弹药。孙中山即下令将偷运的军械全部扣留封存在黄埔军校，等待彻查处理。“扣械事件”就这样爆发了。

二、围绕扣械事件的严重斗争

扣械事件爆发后，广州地区出现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展开了生死搏斗。8月11日，商团总头目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庇护下逃往香港后，商团军总部由副总团长陈恭受、邓介石出面主持。他们蓄意扩大事端，于12日，组织了2000多人的商民请愿队伍到大元帅府要求发还枪械，并以煽动罢市相要挟。孙中山亲自接见请愿商民，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劝他们同坏人划清界线，不要受人唆使，做反对政府的事。15日，商团头子不顾政府警告，纠集各地商团军武装进入广州，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强行举办所谓庆祝联防总部成立的活动，实际上是向政府进行武装示威。当天，他们又一次组织队伍到大元帅府请愿，蛮横地要求发还枪械。

8月20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通缉陈廉伯的命令后，商团将非法组织的联防总部移往佛山。在此前后，广州银行业集团开始罢市。接着粮食业买办停止办粮，罢市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和地方。至22日，已有佛山、九江等数十个城镇出现罢市行动。对于“一些不愿罢市的商民，商团头子则雇用流氓，备溺粪，见有开铺者即浇掷” ，用暴力强迫其罢市。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造反动舆论，攻击孙中山“赤化”，将实行“公夫公妻主义”，多方煽惑群众参与反对革命政府的行动。23日，商团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1.允许成立联防总部，2.无条件发还扣械，3.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他们还加紧组织反动武装，陈恭受还在石湾集中佛山、南海等14埠商团及各城镇近郊乡团共3000多人，自任“攻城总司令”，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并通电各县城镇商团，煽动他们起来驱逐革命政府的官员，宣布独立。于是，革命政府又发出了通缉陈恭受的命令。

对于商团的猖獗，孙中山的立场是严正的，他表示：偷运武器进口之事“非彻查不可”。8月19日，为了教育争取商民群众，孙中山曾派代表携带他的亲笔信件到商团总部，揭露陈廉伯的反动面目，指出他“欲借商团之名以颠覆政府，而步墨索里尼之后尘” 。罢市发生后，孙中山在接见商团代表时更是义正辞严地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明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齑粉” 。从22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部分滇、桂、湘军和黄埔学生军开进广州，维持社会秩序，防备商团叛乱。26日，大元帅府大本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解决罢市问题。孙中山主张立即下令解散商团，以武力制止罢市，并准备在29日进攻西关，拔掉商团活动的据点。同时还决定采取武装工团军、农团军，管理全市粮食，接管罢市商店等果断措施。

孙中山以坚决的态度处理商团偷运武器进口、图谋发动叛乱事件，一直得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当商团煽动罢市后，总工会立即发表《劝告商民复业书》，告诫商民不要被反动头子愚弄。广州工代

会亦召开紧急会议，发出声讨商团罪行的通电，表示“誓为政府后盾”，要求政府把已扣留的军械“全数没收”，拨为组织工团军、农团军之用，“以利国民革命之进行”。8月24日，广州海员、机器等工会和军事干校学生等革命群众2万余人集会，声讨商团反动头目陈廉伯、陈恭受，表示坚决支持政府对商团的斗争。会后发表了由84个团体联合署名的反对罢市宣言，又决定成立“市民治安维持会”。26日，工团军在工人部指导下开始接受编练。广州近郊的农会也纷纷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参加战斗。正在学习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也组成农民自卫军，承担警卫省长公署的任务。在省长廖仲恺支持下，革命群众还准备成立平糶委员会，接管罢市商店，同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27日，作为幕后支持者的英帝国主义眼看商团阴谋不能得逞，终于赤膊上阵，以沙面各国领事团的名义向广东省长廖仲恺发出警告，声称如果革命政府炮击“商民”，各国决不会“袖手旁观”。28日，九艘英舰集中在白鹅潭江面示威，炮口直指中国军舰及大元帅府，向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战争讹诈。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致函大元帅府，蛮横地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孙中山毫不示弱，9月1日，发出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和《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宣言》严厉谴责英国工党政府支持商团叛乱的丑行，严正宣布：“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在抗议电中，孙中山以极大的义愤表示：“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一最新行动我不得不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但是，在处理商团问题的过程中，孙中山却受到革命政权内部的制肘。国民党内部中间势力的动摇和右派力量的破坏，给孙中山制造了很多困难。首先是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和粤军将领李福林，暗中都与商团勾结，对孙中山的决定总是阳奉阴违，从而在内部削弱了同商团斗争的力量。范、廖二人还大耍两面派手段，打着“调停”的旗号，于8月29日私下同商团达成了所谓六项条件。内容是：“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下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2.范军长、廖师长担任向大元帅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3.省团联防改组，应受省长节制，其细则则须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被驳之点，由范军长、廖师长出面主持公道，要求立案；4.各商店应须一律29日复业，军队于商店复业后，立即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回省部队，一律请帅令各回本防；5.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于领械时缴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军长、廖师长担任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这六条名为和平解决，实质要政府向商团屈服。这样的条件，竟然得到汪精卫、伍朝枢的赞同。

当范、廖二人企图强迫孙中山同意上述六条条件时，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和一些中间力量都力主与商团妥协，孙中山在他们的包围下，同意了采取调和办法。于是商团以报效50万元军费的代价，获得政府答应同意成立联防总部、发还所扣军械和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8月30日各城镇商店恢复营业，局势表面上得到缓和。但商团仇视革命政府之心未息，暗中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三、孙中山出师北伐

“扣械事件”刚告“和解”，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和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互相火拼。4日，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师北伐，履行过去与奉、皖的反直同盟协约。会议决定以湘、赣、豫军全部和粤军、滇军一部分组成北伐军出师北伐，并将大元帅府大本营迁往韶关，在广州设留守府。孙中山督师北伐期间，以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任广东省长。以廖仲恺为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前敌总指挥。部署既定，9月5日孙中山发布了《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和《告广东民众文》，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说明北伐的必要及其重大意义。孙中山认为：“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但目前窃据北京中央政权的正是曹锟、吴佩孚一伙，“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因此，“扫除军阀，实现民治，在此一举”。为了稳定广州局势，使北伐无后顾之忧，孙中山又于9月10日发布《告广东民众书》，宣布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并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民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孙中山希望通过上述三项措施，调整政府与广州市民特别是商民的关系，从而达到与商团真正妥协的目的。

9月13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李烈钧等前往韶关督师北伐。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表示“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并郑重指出：“此战之目的，不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28日，北伐部队分两路向湘、赣出师，10月6日，孙中山将北伐各军命名为建国军，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云南的唐继尧表示响应，组织建国联军参加北伐，孙中山任命唐为副元帅。

孙中山对北伐表示了极大的决心，甚至“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其中亦有隐衷。这在他给蒋介石的信中有所反映。9月9日，孙中山给蒋的复信对当前广东局势作了如下分析：“惟广东一地，在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动。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从信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这次北伐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为消灭曹吴，毋宁说是为摆脱他在广州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的策略性措施。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这个决定采取批评和劝阻的态度。蔡和森撰文指出这次北伐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

军事局面，不过又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军阀做买卖的基础”^{__}。邓中夏也著文指出：“北伐与国民革命的正确意义丝毫没有关系”^{__}。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真正的出路是以严厉的态度处理商团事件，先求得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稳固，才能考虑北伐。当商团违抗命令，擅自成立联防总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向导》周报撰文向政府提出警告，指出：“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__}。

尽管共产党人未能立即说服孙中山放弃与商团谋求妥协的愿望，但事实上孙中山也很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虽然远在韶关，他仍然时时密切注视着广州的局势。

四、商团叛乱及其被平定

孙中山高举北伐旗帜，离开广州，把商团问题留给“长于调和现状”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处理，希望通过他们实现政府同商团之间的真正和解。胡汉民任代帅后对商团多方迁就，在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政府的一纸空文欺骗之下，呈请孙中山批准，于9月20日，宣布取消对二陈的通缉令，发还被查封的财产。同时又派人陪同商团头目到黄埔察看扣械，答应分批发还。特别是“民选”市长，实行“民治”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分子李福林当上了广州市长，商团骨干分子之一的李朗如当上了公安局长，加以廖仲恺的省长职务已由胡汉民接任，于是商团的反革命气焰更高。9月下旬，广东商业联合会竟公开煽动海外华侨不要支持广东革命政府。30日，由地主买办阶级代表组成的广东省临时大会，甚至去电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为“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月4日，全省188个商团集中佛山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反抗政府的种种决定。主要有：停止纳税，向政府实行经济封锁；以扣械尚未发还为借口再次举行罢市；从10月10日起“规复武装出巡”，“如有扰乱治安，定即迎头痛击”^{__}等，此时商团武装力量已达7万余人。国外反动势力也为它摇旗呐喊，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10日，胡汉民慌忙答应发还部分扣械。

政府的软弱可欺，使商团更加得寸进尺。当商团从政府手里取回部分武器之后，不但不履行向政府报效50万元北伐军费的诺言，反而立即向革命群众进攻，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13周年纪念日。当天，广州工农兵及各界群众等40多个革命团体五六千人，在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在广州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纪念大会。大会揭露了商团的反革命面目，并向它发出警告。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号召工农兵学商各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__}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经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时，全副武装的商团军即向游行群众袭击，参加游行的工团军死伤100余人，被捕者数十人。灭绝人性的商团军“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头断脚，把

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 ，令人发指。这就是商团头子制造的“双十惨案”。接着，即加紧发动武装叛乱，胁迫商人罢市，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下野”的反动标语。同时在西关等地修筑防御工事，准备以武力推翻革命政府。他们声势汹汹地向政府提出：1.“全部械弹发还，不得少欠”；2.“一律永远取消苛捐杂税”；3.“商团不照民团条例改组，仍依照旧章办理” 。这三条说明，在商团眼里，已经不是商团服从政府，而是政府听命于商团了。

在“双十惨案”和商团叛迹日益明朗的情况下，广州局势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联合发表《为双十节屠杀告广州市民》，愤怒声讨商团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向政府方面郑重指出：“争斗开始了，革命的界限严明了，广州政府果欲使此革命政府真能彻底实现，除掉领导工农兵学革命群众向所有反革命派势力进攻外，别无他道”。并号召各界人民认清商团的反动面目，团结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 。

10月11日，广州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广州工代会、民族解放协会及市郊农民协会等30个团体联名通电全国，揭露商团屠杀革命群众罪行。工、农、兵、学各团体致电省长胡汉民，坚决要求解散商团，惩办凶手，赔偿死伤者损失等。香山、顺德等地农民自卫军立即武装起来，监视当地商团，阻止他们向广州集中，防止商团叛乱。

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对商团的暴行非常愤慨，急电孙中山要求坚决予以镇压。可是省长胡汉民和市长李福林，仍然继续谋求与商团妥协，把“双十惨案”说成是“误会”，甚至压制革命群众“不得借端生事”。

商团制造了双十屠杀事件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商团军在市内武装巡逻，随意封锁交通，目中已无政府。12日，商团发出公开蔑视政府职权的通牒。13日，商团头子在沙面租界集中，密谋叛乱。决定“新老团友一律14日下午5时集中西关待命”，“15日拂晓开始行动，收复省署、公安局及各财政机关” 。“从14日起由于商团封锁粮食，粮价陡涨三倍” 。

盘据东江的陈炯明亦蠢蠢欲动，策动石龙土匪进攻石滩，准备与商团叛乱相呼应。

广州形势的急剧恶化，使一切调和妥协的希望化为泡影。孙中山对广州的严重局面日益关注。10月7日，苏俄巡洋舰“沃罗夫斯基号”运来大元帅府大本营订购的枪炮弹药，已抵达黄埔港，孙中山非常高兴，亲拟祝词表示欢迎。9日，孙中山去函蒋介石，指示应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表明，把广州交给胡、汪二人是想发挥他们“长于调和现状”的特点，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必须由革命委员会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成败在所不计”。但是同一信中又说，如无罢市，先将政府存于黄埔之枪械运往韶关，“商械当必照所定条件分交各户可也。” 就在同一天内，孙中山又三次给蒋介石去函电，令他火速将黄埔军校学生及枪支弹药调往韶关，并按李福林所拟办法，发还商团枪械 。他对于同商团和解尚抱一线希望。

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作为处理有关事变的权力机构。当孙中山得悉“商人不肯就政府所定条例领枪，且供给陈逆以百

五十万，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等消息后，即电胡汉民、杨希闵、刘震寰、古应芬、李福林，指出商团已“叛道显露，万难再事姑息”，叫他们“当机立断”，“万勿犹豫，以招自杀” 。同一天，孙中山又给胡汉民等去电，叫他们令西关居民限三日内迁山西关，免遭意外 。11日，孙中山明令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并给以高度信任，聘任状声明“如遇本会长缺席时，（鲍罗廷顾问）得有表决权” 。同日，孙中山又令革命委员会“用本会长名义便宜行事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

12日，孙中山在接到广州发生“双十惨案”及商团准备叛乱的消息后，以万万火急电胡汉民着他“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 ，同时致电蒋介石，命令他同许崇智一起，组织可靠的部队“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 。13日，孙中山在批复香山县（今中山市）县长林警魂的电报中指示“如有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要” 。革命委员会根据孙中山指示，令胡汉民解散商团机关，收缴商团军武器。14日，胡汉民下达解散商团的命令。孙中山亦在同一天命令警卫军及部分湘粤军连夜回师广州，加强镇压商团叛乱的力量。

当日晚，商团发动武装叛乱，控制城内制高点，“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布满了商团军，“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 。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湘、桂、赣军均奉命投入战斗。滇军范石生、廖行超部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向商团开火。15日上午西关商团大本营在革命政府军队五路围攻之下，迅速崩溃，商团军土崩瓦解，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四散逃命。其他各地商团不堪一击，立即就歼，只有清远商团负隅顽抗，两次进攻县城，亦被平定。

商团叛乱事件，是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商人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是广东革命政府铲除心腹之患的革命与反革命之战。商团叛乱的平定，保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和地主豪绅，锻炼和提高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平定刘杨，消灭南路军阀邓本殷，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北伐铺平了道路。

第六节 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成立

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随之占了优势。在它们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并于1923年10月贿选曹锟为总统。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暴政的斗争日益高涨。战败的奉系军阀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宣布独立，重整军备，扩张实力，并多方联络各派反直势力，准备共同倒直。在反直的共同目标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直三角同盟逐渐形成。直系谋求拆散反直三角同盟未成，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除以重兵防备奉军入关外，调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入闽，图与陈炯明勾结进犯广东，同时联合苏、闽、赣、皖直系势力包围浙江皖系卢永祥。直系与反直系势力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终于爆发了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浙江卢永祥控制着江苏境内的上海。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早就想将上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4年春，卢永祥收编了在福建被孙传芳击败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两部。齐燮元对卢永祥更感不满，于是与赣、闽、皖三省军阀联合逼迫卢解散臧、杨两部，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3日，江浙战争（齐卢战争）爆发。卢永祥的实力远不及苏、闽、皖、赣的联合力量，且处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卢在开战之初虽进展顺利，但旋即陷于被动。16日，孙传芳攻占江山，杭州震动，卢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住龙华，将兵力集中于松江、上海一线继续作战。但在齐、孙军联合进攻下，10月初，松江等地失守。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至此，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被任为浙督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江省长。

江浙战争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4日，张作霖即通电响应卢永祥，并将奉军17万人编为6个军，于15日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出动。曹锟乃于17日下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18日，吴佩孚命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分向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三路迎敌，同时以曹瑛、胡景翼等分任10路援军司令。直军共有兵力约25万人。

9月15日，奉军袭击热河朝阳。17日，两军主力在山海关一线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在热河前线，22日，奉军已占领开鲁、朝阳、凌源、平泉等地，10月7日，又攻克赤峰。在山海关方面，直军守备较强，10月6日，奉军始克九门口，进至石门寨。两军在山海关和石门寨激战，伤亡均甚重，直军已开始出现颓势。12日，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企图扭转局势。但这时奉军已与直军第三军军长冯玉祥达成共同推翻曹吴的协议，热河方面奉军转而南下冷口，给山海关直军以很大威胁。10月22日，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更给直军以沉重打击。吴佩孚不得不于10月26日率少数部队回救北京。山海关前线直军因冯部倒戈，主帅离去而军心动摇。奉军乘机全线出击，将直军主力部队包围。除少数将领逃回天津外，直军官兵全部被俘。

吴佩孚回到天津后，将所率部队集中于北仓、杨村一带，准备进攻北京，同时向苏、浙、鄂、豫等省直系军阀求援。然而，在段祺瑞授意下，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均宣布中立，并分别出兵沧州和石家庄，截断津浦、京汉两线交通，使南方直军无法北上增援。11月2日，冯玉祥部攻占杨村和北仓，

吴佩孚退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已进至唐山、芦台附近，吴佩孚在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下，被迫于 11 月 3 日率残部登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直系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是因为：一方面它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对内镇压工人运动，进行贿选，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承认帝国主义对临城案的要求，媚外辱国，从而使它与全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这就促进了反直各派的联合，使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孤立，遭到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同时其倒行逆施也加深了其财政危机，使其军费困难，装备不得更新，军饷和军需物资不足。另一方面，是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它分崩离析。曹锟上台前，原有洛（阳）、保（定）派之分，曹上台后，又有津、保派争夺内阁总理职位之争，使政局不稳。同时，吴佩孚与王承斌、齐燮元、冯玉祥等争夺兵权和地盘的矛盾斗争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在内部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在这次战争中倒戈，给了吴佩孚致命的一击。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奉系的胜利，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争霸中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是由来已久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冯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吴佩孚长期驻洛阳，一向视河南为其根据地，要求冯在河南督署安置其亲信，并为他筹饷，遭冯拒绝。吴为削弱冯的兵力，企图将冯部李鸣钟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以脱离冯的管辖，也因冯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冯为加强自己的实力，成立了五个补充团，吴屡电制止，冯均置之不理。吴冯争夺地盘和兵权的矛盾已很尖锐，吴为压制冯，在冯任职不到半年即促使北京政府调冯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使冯失去河南地盘。冯被迫北调，吴还令冯将五个补充团留下，冯不顾吴的阻拦，仍将其部队全部运到北京。冯部北调时，吴原应允每月由河南协助军饷 20 万元。但冯部到京后，吴不履行诺言，加以北京政府不能按时拨给冯军费，使冯部处境十分困难。冯吴之间的矛盾成了直系内部诸多矛盾中最为突出的。冯认为一旦直奉之间爆发战争，直胜则他受吴的压迫将更甚。这是冯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的基本原因。

冯玉祥原非曹吴的嫡系，其某些政治军事行动表现他具有一定的朴素的爱国思想。如 1918 年 2 月，他两次发出通电主张对南方停战，和平解决，因此受到孙中山的称赞。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支持其驻地常德学生的反日斗争。1923 年他发出通电支持根据条约收回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能够接受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势力的影响。1920 年秋以后他与孙中山之间常有信使往返。1923 年冯收到孙中山赠的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同年孙还派人转达了对冯的殷切期望。加以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的推动，使冯开始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也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原因。

冯吴之间既存在尖锐的矛盾，反直势力就得以利用这个矛盾进行分化直系的活动。在孙中山争取冯转向革命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也拉拢冯以对付吴佩孚。而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也需要得到段、张的支持。冯的军费困难，段即利用张作霖提供的经费，接济冯军饷。张并一再派人到京与冯联络。段、张的拉拢和支持，使冯敢于反戈倒直。

江浙战争爆发后，9月10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岳来京访冯。冯向孙表露了反吴的意向，孙表示全力相助。又经孙与驻彰德（今安阳）的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接洽，胡也同意合作，于是在直系内部也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这就加强了冯倒戈反吴的信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奉令出师时即预为回师发动政变作了准备。他建议曹锟调孙岳部来京加强京畿防卫。曹即任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冯留一营兵驻城内原司令部，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以搜集、传递情报；将召募的新兵万人编为三个旅留驻南苑等地。这样就在城内外都安置了回师的接应部队。他还采取措施延缓其部队的行动，而且在部队到达古北口后即以筹措给养为名暂时停留下来，使其部队大都没有远离北京，便于迅速回师。

冯到古北口后，段祺瑞通过黄郛敦促冯倒吴，同时派其亲信与冯联系，双方达成了推倒曹吴的协议。张作霖也派人来见冯，双方也达成了协议。奉方同意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和奉军不入关两个条件。冯则同意热河方面暂缓行动，以便奉军调兵加强山海关战线的主攻力量。

当直军山海关战线危急，吴佩孚将驻长辛店一带的第三师调往前方时，冯认为回师时机已至，遂于10月19日在滦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班师回京，推翻曹吴。

10月21日，鹿钟麟派一营先头部队回京秘密作侦察等工作，其他部队随即以急行军速度回师北京。先头部队到京后于22日夜截断电报、电话，包围总统府，并与孙岳的守城部队取得联系。鹿钟麟率部队于22日午夜抵安定门时，守军即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由北向南，分派部队守卫各要地，迅速将全城占领，同时缴了曹锟卫队的枪械，将曹锟监禁起来。回师部队布置周密，行动机密迅速，未费一枪一弹即实现了控制北京全城和囚禁曹锟的计划。23日晨，北京市民看到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的士兵遍布市内交通要道，才知道昨夜发生了重大事变。

这次政变顺利实现原定计划，在客观上是由于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反直系斗争正在高涨；反直势力结成了联合战线，而直系内部则矛盾重重，曹吴处境孤立，形势对直系很不利。在主观上则是由于冯玉祥等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又在直奉大战方酣时，把握住了直军前线出现颓势，吴佩孚倾全力以图挽回，北京城防空虚的最有利的时机。

二、国民军和摄政内阁的成立

10月23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随即发出由他和胡景翼、孙岳等署名的主张和平的通电。这时冯虽控制了北京，但战事尚在进行，而且直系在南方还有颇大的势力，冯企图用曹锟来压制吴佩孚和南方直系各督，于是在政治上采取“暂维现状”的办法。

在他的要求下，经颜惠庆内阁通过，以曹锟名义下达了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等命令。25日，冯玉祥召开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及各部高级将领和幕僚出席的军事政治会议。在政治方面，会上决定：“（一）内阁仍就颜阁改组补充，以维持现状作为过渡时期。（二）召集元老会议，解决国是。”并电请孙中山北上。稍后，28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速开和平统一会议的通电，主张“一国贤豪同集京师”，“将一切未决之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但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的，因为“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

可能，亦不过各军阀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冯玉祥等没有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孙中山所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军事方面，会上决定将冯、胡、孙所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并决定在北京组织国民军联合办事处和总军法处。这样，在北京就出现了一支从直系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

26日，吴佩孚回师天津准备向北京进攻。同日，鄂督萧耀南发出讨冯通电。冯等决定请段祺瑞出山，以促使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出兵阻截直系援军北上。同日，冯、胡、孙联名通电拥段为国民军大元帅。随后，30日，张作霖、卢永祥等也联名通电拥段为反直联军统帅。

冯玉祥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反而使吴佩孚得以借曹锟以号召各方，使自己处境更为困难。27日，直系长江各督继萧耀南之后通电讨冯。30日，冯得到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等图谋不轨的报告。当夜，驻丰台英军闯入冯军步哨线内，殴打卫兵，拘留团长冯治安，几经交涉，才得释放。面对内外的压力和财政上的困难，冯玉祥不得不作出请曹锟退职并改组内阁的决定。

31日，颜惠庆内阁辞职，冯玉祥以曹锟名义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同时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11月1日，黄郛内阁成立。次日，曹锟被迫提出辞职，并下令由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这个摄政内阁中，黄郛、王正廷与冯关系密切，张作霖认定它为冯所操纵，因而不让奉系阎王永江、王乃斌到职。实际上这个内阁只有黄郛、王正廷、张耀曾等人在活动。它得不到奉系的支持，更为直系各督所反对，也不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

摄政内阁成立后，冯玉祥将他在政变后所发通电中提出的“建国大纲”五条送交内阁作为施政纲领。这五条是：（一）“打破雇佣式的体制，建设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扰夺、欺诈之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这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纲领，它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没有响应当时正在开展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它也没有触及封建军阀势力，而只是要求改革任用官吏的制度和整饬吏治。

摄政内阁作为一个正式政府成立之前过渡性质的政权，只存在了23天。在这期间，它作了一件有进步意义的事，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根据民国成立时所订《清室优待条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尊号仍存不变，沿用宣统年号，继续住在紫禁城，拥有一大批大臣、太监和宫女，颁爵赐谥，发布谕旨，依然是一个小朝廷。它成了复辟的祸根。这次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即日移出宫禁等项。11月5日，溥仪被迫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日迁出紫禁城，清室小朝廷从此消灭。这样就完成了辛亥革命应作而未作的一件大事，不仅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并且有利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珍贵文物。这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孙中山也来电嘉奖。

从上述北京政变到摄政内阁成立的全过程看来，这次政变是一次具有进

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而不是一次革命。首先，从政权问题上，政变中冯开始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和后来让曹锟退职，成立摄政内阁，都是按现政府法定程序行事。既为此实际上承认现政权的合法地位，就不能说是革命行动。不过由于他们的行动，终于迫使曹锟下了台，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因而在政治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其次，从政治纲领上看，冯玉祥等在政变中发出的一些通电表示对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不满，主张和平统一和改革，以“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他们还提出了“建国大纲”五条。这些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作为改革纲领的五条，如以前所指出的，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只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纲领，没有任何革命意义。再次，从实现和平统一和改革的途径看，冯只主张召开主要是各实力派军阀首领和著名官僚政客参加的和平统一会议。但召开这样的会议，即使成功也是军阀的联合，不可能达到国家统一。它没有什么革命意义，人民不需要这样的和平会议。可见这次政变不是一次革命，不能称之为“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虽然不是一次革命，但仍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一是它促使曹吴政权倒台，北方直系势力崩溃，造成了有利于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形势。当时革命最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减少了革命的阻力，这既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其二是促成了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对以后的北伐战争也起了积极作用。其三是促成了孙中山的北上，从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后是使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实现，将溥仪驱逐出宫，既铲除了复辟祸根，又有利于清除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文物。

三、临时执政府的成立及其内外政策

当直军溃败之时，张作霖不顾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将奉军大批开入关内，占领天津后，又沿津浦线向南推进，并收编大量直军部队。冯玉祥原想政变后取得华北为其地盘，奉军大举入关使其打算落空了。冯、张矛盾尖锐起来。张作霖采取联段以制冯的策略。冯为加强自己的地位，11月初三电孙中山，敦促早日北上。8日，孙中山正式电告冯，准予13日由粤起行。

如前所述，冯、张都拥段为军事领袖，但段一直不表态。实际上他不愿作空头的统帅，而有重掌政权的野心，且南方直系各督对他态度如何尚不可知，因而迟迟不出。直系南方各督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当然不愿中央政权落在冯、张之手，而宁愿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上台，以借段保存自己的实力。于是11月初，他们纷纷通电拥段出山。段既得到南方直系各督的拥护，不仅去了南顾之忧，而且可借他们以牵制张作霖和冯玉祥。至此，段认为上台的时机成熟了，因而当他得知冯敦促孙北上的消息后，便电促冯玉祥、张作霖到天津开会，共商收拾时局的办法，以图抢在孙中山到京前把政权拿到手。

11月10日，冯、段、张在天津开始举行会议。会上，段既利用冯主和愿望，拒绝张对南方用兵的主张，以笼络南方直系势力，又联合张以制冯，听任奉系改编冯部所收容的直系军队，对冯施加压力。冯张矛盾虽尖锐，但形势尚不容他们公开破裂。13日，苏、浙、鄂、陕、闽、赣、皖、豫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在南京举行，组织八省同盟，并通电宣称对摄政内阁所发布的命令概不承认。冯、张于是不得不共同解决政权问题。冯受国民党人的影响主张采取委员制，但不为段、张所接受。张提出，在新政府产生之前，暂组

临时执政政府，执政政府不设国务总理，而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并推段为临时执政。这就是要取消黄郛内阁，而将权力集中于段手里。冯玉祥受到段、张的压力，加以他对段有错误的认识，听信段“以革命政府相标榜”，并对段抱有幻想，希望段解决其地盘问题，于是采取妥协的态度，同意了张作霖的建议，并于 15 日与张作霖、卢永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11 月 22 日，段祺瑞到达北京。23 日，摄政内阁辞职。24 日，段祺瑞宣誓就职。同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按其规定，临时执政实际上是总统兼内阁总理，大权集于一身。25 日，段祺瑞组成了以安福系为核心的政府。

段祺瑞东山再起，是北京政变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段祺瑞虽已无军事力量，但在山西、山东等地军阀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且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政变后各实力派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段祺瑞处于有利的地位。由于国直的矛盾，他得到国民军的推戴；由于国奉的矛盾，他得到奉系的拥护；由于国、奉与直系的矛盾，他又得到直系南方各督的支持。他利用这些矛盾加强自己的地位，得以因利乘便，重掌政权。

段祺瑞上台后实行的对内对外政策，迅速暴露了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

在对外方面，当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列强亟欲取得中国政府遵守条约的保证，段祺瑞在就职誓词中就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对外政策，公开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以迎合帝国主义各国的意愿，从而获得了它们的承认。随后段政府与法国公使秘密谈判金法郎案，同意庚子赔款不按中国银两换算贴值的法国法郎支付，而按汇兑美元折算。当时美元价格并无变动，按美元折算与按纯金折算并无区别，这就实际上满足了法国按金法郎折算的要求，而使中国损失 8000 余万元。段政府不仅承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而且承认了帝国主义的新的无理要求。

至于对内方面，他上台后立即筹备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正在蓬勃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他积极扶植自己一系列的势力，如派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兼军务督办，卢永祥为直隶军务督办，旋又任卢为苏皖宣抚使，支持卢夺取江苏地盘，并任卢为江苏督办等等。他纵容溥仪逃往日本使馆，后又听任其逃往天津。他还以对曹锟严行监视，听候公判为名，将曹从国民军手中解救出来，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而他对群众爱国运动则实行高压政策。1925 年 3 月间，他派兵弹压北京教职员反对官僚政客王九龄任教育总长的风潮。5 月 7 日，派军警阻止学生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将前往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向章提出质问的学生打伤三四十人。

段政府的内外政策表明它与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它没有直接掌握大量的军队，又处于各种矛盾冲突之中，难以巩固起来，加以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京及其外围驻有重兵，段政府还不能为所欲为，这还是有损于革命势力的。

四、国民军的发展和奉系向南扩张

天津会议后，冯玉祥在段、张联合的形势下，为解决地盘等问题，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段再三提出辞职，并退居京郊天台山。段为利用冯以牵制张，不同意冯辞职。为了拉拢冯，段上台后不久，先后任命冯部下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使冯取得这两个特别区的地盘，同时还

批准冯所部扩编为六师三旅。冯的要求既有所满足，他遂于1925年1月间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

至于国民军第二、三军的地盘问题，摄政内阁原已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11月中旬，两军已陆续向河南进发。这时吴佩孚已率残部回到洛阳。胡军进入河南后受到吴军张福来部阻击。当两军相持于彰德时，段祺瑞密令陕西督办刘镇华出兵驱吴。刘为向豫扩张，派憨玉琨师出潼关，向洛阳进发。12月2日，吴佩孚逃至郑州。这时胡军已自彰德南下，吴乘车去湖北，被萧耀南阻于武胜关，不得已退入鸡公山。

憨玉琨于12月5日占领郑州，企图阻止胡军南下，霸占中原。但段政府已于8日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乃令憨退出郑州。憨虽被迫退出郑州，但仍占据豫西广大地区，并收编了大量驻豫军队。胡景翼部进入河南后，胡憨矛盾日益尖锐。至1925年1月下旬，双方加紧备战，战争已迫在眉睫。2月下旬，段政府派孙岳前往调解，并令胡憨两军各退50里，避免冲突。但孙于2月23日到达郑州时，两军已在白沙开火。

战争开始后，刘镇华率军来洛阳助憨。胡景翼集中其主力沿陇海路向西进攻荥阳、巩县，其友军樊钟秀部则由禹县侧袭偃师。胡军攻克巩县后，两军在黑石关前激战，至3月5日，刘憨军溃败，退往洛阳。8月，胡军克洛阳。刘镇华部向渑池、陕州退却，憨玉琨部向洛宁退走。胡军在观音堂击溃刘之援军，21日入陕州，刘渡黄河逃往山西。憨玉琨由洛宁退到嵩县后，于4月2日服毒自杀。至此，镇嵩军土崩瓦解。

打败镇嵩军，河南就成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但战后不久，4月10日，胡景翼病死。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后，大肆扩军。这时国民三军也驻在河南，与国民二军难免也有矛盾。冯玉祥、胡景翼电请段祺瑞任孙岳为陕西督办，以便国民三军取得陕西地盘，但不为段祺瑞接受。孙岳于是以实力来解决地盘问题。7月9日，孙部入陕，迅速打败吴新田军，16日进入西安。于是陕西也基本上为国民军所控制。至此，国民军一、二、三军控制了北京及其附近各县、察哈尔和绥远两特别区、河南和陕西两省，兵力也有了很大发展。

国民军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分析了北京政变后的政治形势和冯玉祥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策略。李大钊亲自做冯玉祥、胡景翼等的工作。中央还派了王若飞、宣侠父等许多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李大钊还帮助国民军获得了苏联的援助。1925年2月，苏联即派了军事专家到胡景翼部队，协助胡拟定战略计划。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不久，两个军事顾问组分别被派到张家口和开封。国民军也派遣军官去苏联学习。苏联还向国民军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弹药和药品。

当国民军向河南进军时，奉军也沿津浦路向南扩张。

1924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军将领讨论长江问题，决定调奉军一部协助卢永祥驱逐齐燮元取得江苏地盘。段祺瑞为形势所迫，于11日下令罢免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一职，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派李景林接替卢永祥署理直隶军务督办。奉系遂取得了直隶地盘。

1925年1月11日，齐燮元与孙传芳联合发出组织江浙联军的通电，并于同日击溃淞沪护军使张允明所部，控制了上海。卢永祥于10月到达南京后，组织宣抚军，以张宗昌为总司令，准备向上海进攻。上海总商会提出上

海不驻兵等意见，以免上海成为战场。段祺瑞同意上海总商会意见，于 15 日下令裁撤淞沪军使，以后上海永不驻军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次日，段又下令查办齐燮元，并任命卢永祥兼江苏军务督办，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同时还任命方本仁、郑士琦、周荫人分任江西、山东、福建军务督办。孙传芳既有了浙江地盘，对战事也就采取观望态度。

17 日，张宗昌所部奉军由高资向齐军进攻，18 日至 19 日相继占领镇江、常州。22 日，孙传芳撤回派往无锡的军队，使齐军孤立，更无斗志。25 日至 26 日奉军连克无锡、江阴。27 日，先头部队进至上海。28 日，齐燮元逃往日本，齐军被缴械，齐卢之战至此结束。

战后，2 月 3 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了和平协定，双方同意从上海撤兵。张宗昌部调驻徐州。在奉系压力下，段祺瑞于 4 月 24 日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将郑士琦调任安徽督办。奉系取得了南下必经之地的山东为其地盘，为它以后继续向长江下游扩张势力准备了条件。

第七节 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

一、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广泛兴起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10月30日，孙中山由韶关北伐前线返回广州，立即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和办法。11月4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命令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建国军总司令谭延闿驻守韶关，全权办理北伐事宜。为了配合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秘密通告，指出“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各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号召“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全面陈述了北上的目的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为此，对外必须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内实行国家统一，保障人民自由，发展经济文化，改善劳动人民生计。宣言总结了长期的斗争经验，指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由人民掌握武力，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

孙中山在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建议，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式等等。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种团体派出代表参加。宣言提出，在会议召开之前，必须释放各省政治犯，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的自由。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所陈述的政治立场，是他北上与军阀进行斗争的政治纲领。

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来的。当时正值曹锟发动驱逐黎元洪的政变，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方面为解决时局危机提出许多方案。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即“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次国民会议”。并且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依靠工农商学各界广大群众来解决国家政治问题。孙中山此时接受了这个主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也表明了他改变了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关于国家建设的程序。《北上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于11月19日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不仅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且提出迅速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等主张，把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共产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是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而采取的一种合法斗争。通过它既能揭露军阀的反动面目，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又能利用军阀政权尚未巩固的有利条件迫使军阀对民众的意志作某些让步，为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准备自己的力量。

孙中山深知，要实现他的统一与建设中国的理想，必须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因此，他到处演讲，宣传他北上的目的，动员群众起来支持他的主张。11月12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送会并发表演说。他勉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地把广东搞好，使之成为一个基础巩固的革命策源地。他要

求留在广东的革命同志，团结南方的力量，把业已进行的北伐推进到武汉，以响应他在北方和北洋军阀进行的斗争。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广州北上。14日抵达香港。同日改乘“春阳丸”赴沪。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万余人的欢迎。

孙中山北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孙中山抵上海前夕，上海英商《字林西报》公然说：“上海无需乎孙，应阻止其登岸。”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法巡捕竟阻拦路经租界的群众欢迎队伍，并捕去群众团体的领队数人和夺去群众队伍的旗帜。企图以此来阻止孙中山在上海停留和动摇孙中山的反帝决心。

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午，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对《字林西报》的言论进行严正驳斥。他说，“外人发此言论，不胜骇异。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隔日，孙中山余怒未息，在和记者谈话时又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样便可以怎样。”孙中山义正辞严的讲话，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他这种大义凛然的立场，受到国内外进步人民的敬重，也为他的北上增添了不少光辉。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期间，广泛接见各界人士，宣传他北上的主张，他说，北上的任务是“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使全国人民能“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深知要完成此项任务是艰巨的危险的。但他坚决地表示，他不畏惧，只要全国民众了解，行动起来，就能成功。

11月22日，孙中山乘“上海丸”离沪赴日。23日抵日本长崎，24日抵神户，在日本共停留八天。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先后多次接见新闻记者、中国留学生，并出席了所到各地中国国民党人以及旅日华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和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北上任务，首先是“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取得民族的独立。他谈到国内的不安宁和不统一，主要是军阀听从外国人的话来残害人民。因此，要使中国和平与统一，就“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他认为解决国内问题，“第一步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由全体国民自动地去解决国事。”这时，孙中山把北上的任务明确为两个方面：（一）召集国民会议，对付军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付帝国主义。孙中山根据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要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主权，不能“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请他们“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象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

11月30日，孙中山乘“北岭丸”离开日本。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2万多群众的欢迎。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亦前往迎接，并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于是留在天津治疗。孙中山在卧病期间，仍坚持工作。12月5日，他在卧室会晤了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人。18日，他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斥责段政府的《外崇国信宣

言》的主张。他愤怒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³¹ 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 10 余万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车站散发了书面讲话稿，指出：“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³² 表明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

在孙中山北上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给予积极支持。11 月中旬，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大规模的示威运动。12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领导，统一促成会的组织和名称，使之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团体。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下，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群众运动蓬勃兴起。11 月 26 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劳工青年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平民教育研究社等 27 个公团代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成立了筹备会。12 月 14 日，由 143 个公团组成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选出向警予、邵力子、俞秀松等 21 人为委员，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并要求执政府立即召开人民代表的预备会，明令取消治安警察条例，恢复被解散的工会、农会和学生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于 29 日发出通电，提议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推动下，在各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共同努力下，汉口、徐州、广州、天津、保定、济南、太原、厦门、北京、南京、长沙、杭州等数十个地区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前后，各人民团体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广州，1924 年 12 月 20 日，100 余团体和学生 2 万余人举行了促成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大示威游行，并发表宣言。1925 年 1 月，广州学界 3 万余人举行了预祝国民会议成功的提灯大会。9 日，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等 400 余团体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善后会议，赞成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中国共产党注意把国民会议运动与各阶层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各阶层人民除向国民会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共同要求外，还提出了其特殊要求。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号召全国青年竭尽全力促成国民会议，并代表青年向将来的国民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制、改善青年工人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禁止使用童工等 18 项要求。工人、农民、妇女、军人也都结合自身特点提出得各要求。

国民会议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已从大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已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普遍开展起来，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成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后盾。

二、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后，于 1924 年 11 月 21 日发表通电宣告，准备在一个月內召开善后会议。他企图以召开善后会议对抗孙中山号召的国民会议。12 月 24 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人员为：有大勋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以及有

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接着又公布了 123 人的邀请名单，其中除孙中山外，绝大多数是各省军阀头目，所谓的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也多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客和遗老耆绅。从参加人员成分看，善后会议的反动性质十分明显。

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后，国民党中央于 12 月 26 日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善后会议。1925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告和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危险性，指出段祺瑞企图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以对抗直系军阀，其结果必然引起新的军阀战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新机会。段祺瑞悍然召集善后会议，是企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孙中山和广大人民，强行卖国政策。通告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对策：坚决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的权利；继续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行使人民当政的权利，倘若段祺瑞拒绝接受，当即组织罢工、罢市和罢课等示威运动，以示抗议。根据这一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政治生活》等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揭露段祺瑞破坏国民会议的阴谋。

孙中山到北京后，对段祺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 年 1 月 17 日，他发出《复段祺瑞电》，要求善后会议作如下改变：1. 容纳人民代表，2. 会议虽可涉及军制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应为国民会议。20 日，正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主张人民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揭露“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并号召全国人民赶快组织起来，制止军阀的阴谋，努力于国民会议之召集。31 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根据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研究了对善后会议的具体对策。认为善后会议召集已成定局，所争之点不在名称，而在构成分子。因此决议：1. 力争人民代表参加；2. 人民代表人效应占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3. 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亦应选派代表参加。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要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使之具有人民性。这与段祺瑞要把善后会议作为御用工具的目的相违，必然不为他所接受。1 月 29 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再要求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也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 2 月 1 日（后因故延至 13 日）召开善后会议，邀请代表 166 人。他们都是各地军阀的代表、各派系政客、前清遗老和趋炎附势的学者。大会推出 80 余岁、连起居都难以自理的前清官僚赵尔巽为议长。但实权操纵在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许世英手中。段祺瑞多次到会讲话，对与会者软硬兼施。经过争吵，会议最后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于 4 月 21 日草草收场。

善后会议开幕后，各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示威，声讨段祺瑞的倒行逆施行为，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通电、宣言揭露善后会议的反动面目，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善后会议，支持召开国民会议。

为了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善后会议还在进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 3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开幕式。先后到会代表 229 人，列席代表 100 余人，其中有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民族资本家。他们代表全国 120 多个地区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出席大会的共产党人有赵世炎、恽代英、苏兆征、高君宇、邓颖超、于方舟、安体诚、朱务善等。国民党人有顾孟余、白云梯、张善予等。大会推选王乐平、顾孟余、赵世炎、朱务善

等6人为主席，安体诚为秘书长，具体主持大会的工作。大会宗旨是：“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武装民众，向掠夺和压迫阶级手中夺回人民的自由和自己建设独立之国家。”大会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军阀混战、财政实业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等问题。赵世炎、苏兆征、朱务善、韩麟符、李勃分别就帝国主义侵略、工人问题、关税、太平洋会议和国民会议运动问题作了报告。大会经过讨论，否认了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指出“真正的国民会议条例必须由人民的预备会议来制定。”大会最后通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国际问题决议案》、《内政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并选举成立了联合总会的执行委员会，苏兆征、邓颖超、安体诚、朱务善和顾孟余、王乐平等2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6日，大会宣告闭幕。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是各界各阶层人民代表参加的一次大集会。大会揭露了段祺瑞企图通过善后会议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阴谋；提出了各阶层人民反对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行动口号，对推动人民群众投入政治斗争，将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段祺瑞政府不但拒绝采纳这次大会议案，反而采取强暴手段，于4月30日下令查封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和设在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无法贯彻，召集国民会议、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更不能实现。尽管如此，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仍然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并动员人民为其奋斗；它揭露了封建军阀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面目，教育了人民，使之认识到通过会议这种和平方式实现独立和民主是不可能的；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斗争的锻炼，为“五卅”运动打下思想基础。

三、孙中山逝世

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使孙中山积劳成疾，得了肝癌。他这次北上，由于长途跋涉，操劳不息，病情加重。他扶病进京后，在病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仍坚持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1月26日，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经多方医治无效，于3月12日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寓所与世长辞。

孙中山在逝世前一天，签署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他在《国事遗嘱》中，总结了一生革命的经验，指出：要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经验的最宝贵的总结。孙中山在《致苏俄遗书》中，对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寄以很大的期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他要求宋庆龄代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其未遂之愿。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哀痛，国内外进步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达着亿万人民对一代伟人的无限哀思，赞颂他伟大的革命的一生和他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所建树的不朽功勋。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出唁电，对孙中山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的革命业绩表示极大的敬意，并希望国民党能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告民众书，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

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__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继续开展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段祺瑞、张作霖对于这次运动的破坏；一方面保卫南方革命根据地——广东。

国际友人也纷纷哀悼孙中山的逝世。苏联在各主要报刊上登载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和哀悼文章。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都发来唁电。俄共中央唁电指出“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__国际妇女书记部等国际进步团体亦发来悼念孙中山逝世的唁电。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外国友人，也召开追悼大会或举行悼念活动。

全国各地群众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哀悼孙中山的逝世和缅怀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功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积极参与组织，使各地区的追悼活动，成为一次大规模的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政治宣传运动。4月2日出殡那一天，10万北京市民为他送丧，形成了一次悲壮的示威游行。广州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

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孙中山早年怀着救国救民的志愿投身革命，他奔走于国内外，组织革命团体，宣传民主革命纲领，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尖锐的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他领导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为维护这个共和国，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在晚年，为实现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带病北上和北洋军阀开展斗争。他的一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__

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他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吸取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政治纲领，开始了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屡遭挫折之后，又根据不断发展的世界潮流和人民的需要，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他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他弥留之时，还提出“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正如鲁迅所赞扬的那样，“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__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他也和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缺点方面。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所以不能提出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基本任务的纲领，从而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劳动大会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党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五大”的决议。这个决议的精神对大会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中共“四大”中心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革命高潮。围绕这个中心,大会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大会指出:北京政变后国内形势的特点是:军阀统治极端脆弱,即“处在旧统治军阀倒台新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之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操纵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得到迅速发展。党的任务就是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把人民革命运动引向高涨,以便加速军阀统治的崩溃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破产,为民主革命胜利创造条件。

2.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主义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于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大会进一步指出,从当前统一战线的现状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而中国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的革命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3.明确提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和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大会文件指出,农民“天然是无产阶级之同盟者”。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否则“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基于以上认识,大会批判了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提出对现阶段农民运动的具体要求。

4.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指出:共产党要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要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5.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农、青、妇群众运动的领导。大会开始认识到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基,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党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并在总结群

众工作经验基础上，规定了今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勋是：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重新审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并从理论上把“二大”以来相继解决了的有关问题加以新的概括，特别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原则问题。它的提出是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程的重大进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主要标志的全国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大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还不能参加革命运动”，那么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自然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就取消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任务。这一缺点与彭述之的影响有关。在大会前他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的是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唯不敢出来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地位，却无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严重的事实。大会的缺点固然受到彭述之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也与中共在纠正陈独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倾向之后，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又产生了过低估计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倾向有关。大会还对革命实践中已经日益紧迫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极端重要的政权和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明确决定。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共“四大”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迅速发展。为扩大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4个团体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77人，代表165个工会团体，54万工会会员。

大会开幕的同一天，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会代表联合广州工人、郊区农民和青年革命军人举行10余万人的示威游行。他们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一致认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显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精神。

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工农联盟、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等30多项决议案。在政治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在斗争中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特别要团结广大农民，“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取得领导地位。”在经济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而目前的迫切要求是，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规定8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之生活，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

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了由 25 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等为副委员长,并设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邓中复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委派邓中夏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总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设办事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大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有了指挥工人斗争的总机关,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

二、“五卅”运动

1. “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1925 年 2 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后,日本资本家不履行先前达成的复工协议,并暗中决定:不承认工会,对罢工采取强硬措施,不惜关闭工会,与租界及中国当局交涉取缔工会。对此,工会以怠工手段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各工会酝酿罢工。5 月 14 日,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15 日,日本内外棉第七厂资本家以棉纱供应不足为借口关闭工厂。工人在顾正红带领下与厂方交涉。日本大班(相当厂长)率打手向工人们开枪,打死顾正红,打伤数十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日本资本家的残暴行径,激起广大工人的极大愤慨。16 日,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共 8000 多工人一致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提出惩凶、赔偿等八项要求。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号召社会各团体及广大群众支援罢工工人。当日下午,上海工商学界 33 个团体立即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作为罢工工人的后盾。19 日,中共中央提出把罢工斗争发展成为向日本帝国主义总攻击的宣传运动,指示各级党组织发动民众参加,造成一个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声势。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广泛组织演讲队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通过全国学联转请各地学联会发动募捐和抵制日货。上海一部分学生首先响应共产党号召,上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持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租界巡捕不断地拘捕这些爱国者。

5 月 24 日,日本棉纱厂工人、学生、市民 1 万余人公祭顾正红,共产党员刘华担任会议总指挥,会场气氛悲壮。工人代表讲述了顾正红被害经过,控诉了日本资本家的罪行。与会者高呼“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工人、学生代表还分头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大家誓死反抗日本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准备于 6 月 2 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以前提出的:增订印制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等四项提案;并越出租界筑路。这一切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商界利益,进一步激起包括中国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各界人民要求当局制止越境筑路的文字“当在千份以上”。反对四提案的声势也日益高涨。到 5 月下旬,反对越界筑路和反对四提案的斗争与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学生支持罢工的斗争迅速汇合起来,他们企望有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来迫使帝国主义者让步。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作出《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

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于 30 日发动群众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一方面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 4 个法案，一方面援助沪西工人罢工。

2. “五卅”惨案和三罢斗争

5 月 30 日，上海各校学生 2000 多人打着“演讲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到公共租界和闹市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讲，进行反帝宣传，又有 100 多人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这更加激怒了群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时，租界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徒手群众。当时的报纸记载说：“西捕和印捕借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西捕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学生死五人，市民死十一人，重伤十余人，在狱尚有四十余人。”南京路上顿时染上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罗亦农参加了会议，决定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会议决定成立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还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出版《热血日报》，推动反帝斗争的发展。中共上海地委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派出许多干部到各群众团体开展工作，迅速掀起三罢斗争。

31 日，租界当局在南京路上实行戒严，但工人、学生冒雨继续上街散发传单，奔走呼号。中小商人组织——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和华人会表示赞成罢市。而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对罢市顾虑重重。当总商会与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群众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罢市。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署了 6 月 1 日总罢市的命令。

上海各工会于 31 日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推选李立三、刘华为正、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号召“全埠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上海大、中学生，在上海学联发动下，纷纷举行罢课。

上海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激发，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6 月 1 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在总工会领导下，各工厂陆续罢工，其中最主要的是纱厂、电力、海员、码头工人的罢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电话电报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及各洋行的华人职员也转入罢工，连租界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相继罢岗。至 6 日，罢工工人数达 20 余万。在上海学联发动下，上海大学率先通电罢课，其余各校紧随其后，一些帝国主义创办的学校，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校学生也纷纷加入罢课行列，有 5 万多学生罢课。在商人方面，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接着华界、法租界的商人也纷纷响应，罢市的规模为上海开埠以来所未有。

为了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4 日，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组成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同日，《热血日报》创刊，该刊宣传报道“三罢”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激发民族精神，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7 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解决帝国主义交涉的 17 项条件。其主要条款是：“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撤销领事裁判权”、“华

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撤销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惩凶、赔偿、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收回会审公堂”等。这些条件，反映了反帝联合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成为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具体纲领。17条公布后，得到各界群众的拥护。11日，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坚决要求实现17条。

面对中国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风暴，帝国主义者又怕又恨，叫嚷要“扑灭”反帝运动。他们一方面，向上海增派大批军队，在公共租界宣布戒严，武装巡捕不断向手无寸铁的上海民众开枪，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从6月1日到10日，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他们还指使军阀政府实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分化反帝联合阵线的策略。对资产阶级以“司法调查”、召开“关税会议”相利诱；同时又以停止借款、停止通汇、供电等进行威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运动一开始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于6月3日回到上海后，组织“五卅委员会”，并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等最重要内容，使之成为13条。当13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他们终于妥协以至屈服，于26日无条件结束罢市。上海总商会后来不仅毁弃了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的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迫其复工。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屈服，学生因暑假到来纷纷离校，工人陷于孤军奋战。这时，军阀政府加紧镇压罢工。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为保存已得的成果，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实行逐步退却，将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的政治要求。“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上海总工会发表《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指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等9项条款为最低复工条件。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上海各业工人在资本家接受了工人们的部分经济要求后陆续复工。这时，由于奉系军阀查封了上海总工会，通缉李立三等工运领袖，迫使工运领袖转入地下，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3. 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上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怒，反帝斗争迅速席卷全国。

6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分别电告各地所属团体，一致援助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举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5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全国各大小城市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投入这场斗争，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高潮。

在北京，6月3日，北京师大等数十校宣告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100余校，5万余人。5日，北京各界280多个团体组织“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同时要求北京政府向英、日帝国主义交涉收回租界，严惩驻沪领事及制造惨案者，取消领事裁判权，抚恤死难者，赔偿罢工损失等。此后，相继举行一系列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不少激愤的演说者当场断指血书“誓死救国”，工商业者议决“抵制外货”。30日，在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大会，到

会 20 万人。宋庆龄、于右任、刘清扬等出席了大会。还有许多国际友人到会。大会通电广东革命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示慰问和赞扬。

在天津，6 月 5 日，5000 余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议决交涉条件和行动计划，下午数万群众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者的暴行。14 日，举行市民大会，到会者约有 10 万人，强烈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0 日，各界约 10 万人举行总示威，追悼“五卅”死难烈士，邓颖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会后示威游行。

在武汉，6 月 3 日，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4 日，50 多间学校 2 万余学生集会提出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办祸首，抚恤死难者等交涉条款。8 日和 9 日，商界和学界各数万人分别举行援助沪案大游行。11 日，汉口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遭英水兵枪杀。汉口惨案发生后，各业工人陆续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在董必武、陈潭秋领导下，各团体决定成立外交后援会，不畏军阀肖耀南的镇压，勇敢进行斗争。30 日各界群众 6 万余人在武昌举行沪汉死难同胞追悼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此外，在济南、太原、郑州、西安、吉林、南京、长沙、广州等数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据统计，全国各地约有 1700 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吼声。许多工商业者，一面捐款捐助罢工工人，一面积极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原来畅销的日货、英货被视为“仇货”，为广大群众所抵制。实行关税自主，取消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成为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海外，广大爱国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旅日华侨组织了外交后援委员会，通电并募捐支持国内人民斗争，还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揭示“五卅”惨案真相。旅欧华侨和留学生用各种方式向欧洲人民解释事件真相，驳斥帝国主义捏造的种种谎言。东南亚和旅美华侨积极筹款支持罢工工人。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还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和支持。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人国际发表了宣言和告人民书，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支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莫斯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苏联的许多大城市也举行集会，游行或募捐支援中国人民。日本劳动总同盟等团体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反对压迫中国人民。法国、德国工人阶级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此外、英、美、朝鲜、埃及、印度等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团体也都分别向中国工人表示同情和声援。这一切使“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阶级发动，有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为运动制定了正确的策略和方针，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具体发动和领导了各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政策，高举反帝爱国大旗，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人民，使“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

“五卅”爱国运动从 1925 年 5 月 30 日起至 9 月底止，坚持斗争 3 个多

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悟，表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坚决勇敢的斗争精神，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它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并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它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揭开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帷幕。

三、省港大罢工

1. 省港大罢工爆发和沙基惨案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6月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6月19日，香港工人大罢工爆发。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起来响应，并且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关。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人，这次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联合会的17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和劳动立法等6项条件。这表明省港大罢工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有20万人返回广州各地。

6月21日，沙面英、日洋行华工离开租界举行罢工，并成立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接着，广州市内的英、日、法、美等洋行中的华工也参加罢工。沙面工人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谴责英日等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表示要和上海、汉口、青岛等地罢工工人一道“为上海案而奋斗，为解放我自身之痛苦而奋斗。”至此，香港、广州两地工人大罢工实现了。这两股强大力量汇集成震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

6月23日，由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发起组织召开广东工商学兵各界援助沪案市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大中学校学生、教员，各群众团体，黄埔军校师生代表，市民10余万人参加。胡汉民代表广东革命政府在会上发表了《敬告全国人民》书。廖仲恺和李森等人分别就这次反帝运动的由来、目标和意义作了演说。李森还代表广东对外协会提出了收回海关、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铲除与帝国主义妥协之汉奸等解决沪案的16条条款。这些条款均得到与会者赞同。会场气氛庄严热烈，到会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

会后，游行开始。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等亲自率领五六万民众游行，航空局飞机亦凌空散发传单。下午2时许，当游行队伍经西堤沙基口，直过东桥及沙基马路一带。当前头的游行队伍已转入内街，后面的游行队伍进至沙基西桥口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白鹅潭的英法葡等国军舰也发炮助虐。游行队伍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地，路狭人众，死伤惨重。据不完全统计，这次事件中被打死50余人，重伤170人。这便是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发生后，更加激起省港各界群众的义愤。当晚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300余人，代表120余个群众团体。会议情绪激昂悲愤，当即通过：通电全国及世界；请广东革命政府向肇事各国提出严重抗议并组织调查队，收回沙面租界；致电北京政府，迅速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请革命政府抚恤与惩凶，公祭死难者等14项决议。27日，该会就进一步实行经济封锁及援助罢工工人提出几项办法。当天下午，各界联合会代表赴省署请愿。省长胡汉民接见了请愿人员，双方一致表示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收回租界，对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24日，省署召开了各界会议，省长在会上表示“政府对此，只知顺从民意”，“本公平之态度”办理，“以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向英法等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先后两次照会英法等国领事馆，责成他们对沙基惨案应负完全责任，提出谢罪、惩凶、撤舰、赔偿以及收回沙面租界等五项要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谴责帝国主义。

广东各革命团体：工会、商会、学生会、外交后援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也都陆续发表宣言、通电，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呼吁援助罢工工人，表示愿作革命政府的后盾。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广州市外资工厂和商店的中国工人，都参加罢工。省港罢工工人发表通电，表示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决心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通电说：“吾省港工友经此次惨案之后，宁愿与之皆亡，不愿偷生屈服。现在纠合同人封锁沙面及香港，以制彼帝国主义者之死命。”

2. 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斗争

为加强对斗争的领导，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以苏兆征、何耀全、李森、林伟民等13人为执行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廖仲恺、邓中夏等被聘为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建立了中共党团为领导核心，其成员有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徐成章、何耀全等，以邓中夏为书记。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武装、纠察、审判、法制、财政、调查、交际、交通等办事机构。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并且组织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行动，实际上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省港罢工工人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指挥机关。各罢工机构的重要干部都由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重要决策也必须经过代表大会议决，由罢工委员会执行。罢工工人代表密切联系广大工人，通过代表们使罢工委员会的各项重要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和广州的各种工会，并组成2000多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的广大农民，对香港实行封锁。罢工和封锁，使香港这个昔日繁华的港口城市，车辆、轮船停驶，码头停工，商业■业，贸易锐减，百物飞涨，盗贼出没，垃圾粪便堆积如山，或为“死港”、“饿港”、“臭港”。也使沙面的金融、商业活动停顿，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8月，罢工委员会实行了团结各界人民，孤立英帝国主义的“单独对英”政策。即“凡不是英国货、由英国船运载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这项政策的实施，对“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促进广东的独立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

罢工工人的斗争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积极支持。革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安置回省的罢工工人，明令广州市政府征收租捐和发动各界捐款资助罢工工人，每月拨款万元资助罢工委员会，以政府名义下令封锁各口岸并拨发一些武器给罢工工人纠察队作为封锁口岸之用。

省港罢工工人斗争还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许多群众团体及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或声明，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表示愿与省港罢工工人一道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爱国华侨也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慷慨捐赠钱物支援省港罢工工人。据不完全统计，到 1926 年 3 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共收到捐款 290 余万元，其中华侨捐款数达 190 余万元。国际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也给罢工工人有力的支持。苏联工人阶级和政府从道义和物质上援助省港罢工工人，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的工人也声援省港罢工工人的斗争。侨居广州的印度、朝鲜、越南等国工人集会谴责英法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由于罢工委员会实行正确政策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省港大罢工坚持 16 个月之久。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罢工委员会于 10 月 10 日宣布“将各属驻防纠察队一律撤回”，停止对香港、沙面的封锁。同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布《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指出“革命形势已需要从广东的单独反帝斗争扩为全国的反帝斗争。……在准备全国向帝国主义总攻击时期中，广东应对英退让，从事巩固内部，故特将这久经战争的革命先锋队——省港罢工工友从前线调回休养，暂时停止封锁”。在广东革命政府增加 2.5% 关税附加税用以安置罢工工人的条件下，省港大罢工结束。

省港大罢工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规模、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篇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 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不仅使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声名狼藉，而且使其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如封锁香港使香港商务停顿，“平均每日损失约四百万元，每月一万万二千万元”；2. 罢工斗争时间之长、组织之严密、斗争之坚决、力量之强大，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和伟大力量；3. 罢工斗争有力地帮助广东革命政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

第二节 国民政府成立和国民革命军组成

一、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

1. 广东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

1924 年秋冬，商团叛乱虽已被扑灭，广东局势仍然极不稳定，拥有较强实力的地方军阀盘踞广东大部分地区。其中尤以东江的陈炯明实力最强，对革命威胁最大。1923 年初，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拥兵惠州、潮梅一带，与革命政府对峙。他在东江各地实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三位一体的残暴统治，欺压民众，盘剥农民；并与北洋军阀曹锟、段祺瑞以及邻省军阀互相提携、狼狈为奸。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港英当局紧密勾结。为了讨伐陈炯明，孙中山曾利用滇、桂军在 1923 年春和 1924 年春两次进攻东江，都由于陈逆负隅顽抗，滇、桂军屡攻屡蹶，无所进展。从 1924 年起，以黄居素、吴稚晖为主的一批国民党内人士，曾发起“调和孙陈运动”以撮合孙陈关系，最终因陈及其部属的反对而破产。是年底，孙中山离粤北上，卧病京师。陈炯明等认为广州大元帅府群龙无首，有机可乘，于是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在汕头组织“救粤军”（又称潮梅粤军），自任总司令，林虎、洪兆麟任正副总指挥。全军统编十个军，号称 10 万之众。1925 年 1 月，陈炯明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悍然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

当东江战事将爆发时，广州大元帅府所辖滇、桂、湘、粤各军多数将领对东征持消极态度，军事委员会对此也争执不决。而担任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则力主东征讨陈。正当东征问题议而未决时，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宣言，指出：陈炯明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走狗，是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在反动势力支持下向广东革命政府进攻，是企图“剿灭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一网打尽工农群众”，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发挥革命柱石作用“立刻起来，要求革命政府颁发全副武装，保卫革命！”^①共产党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有力地促进革命政府作出东征的决定。在加伦的帮助下，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经过 1 个月的酝酿和讨论，军事委员会终于决定于 1 月底前开始行动。

1925 年 1 月中旬，大本营发表《东征宣言》并决定将所辖之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及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东征讨伐陈炯明。下旬，陈炯明军向广州进逼至虎门、石滩一线，广州局势告急。东征军以杨希闵的滇军为左路，由增城、博罗向河源、老隆、五华、兴宁攻击敌军林虎部，以刘震寰为中路，进攻扼守惠州之敌杨坤如部，并策应两翼。以许崇智的粤军和黄埔教导团为右路，沿广九铁路向淡水平山进发，进攻敌军洪兆麟部，期以三路并进直捣东江，打破陈炯明的攻势，并消灭陈军。卧病的孙中山，十分关心东征，2 月 5 日来电督促各将士“努力破敌，以安内以立威信于外。”^②

东征军中，担任左、中路的滇、桂军首领杨、刘本是地方军阀，对革命政府怀有异志，虽迫于压力同意东征，却抱消极观战态度，徘徊观望，逡巡不前。担任右路的粤军和军校教导团以及铁甲车队，是革命政府的依靠力量。右路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兼任参谋长，先后出发东征的有张达民第二师，许济第七旅、陈铭枢第一旅和欧阳驹的警卫团等等。其中以张达民任师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的二师是东征右路军的先锋。共产党员古大存率领的中央政治宣传队，随该师到前线进行战地宣传。黄埔军校教导团及一个学

生总队，在大军出发之际加入右路军。

军校教导团成立于1924年10月。教导第二团成立于11月。教导团的特点是：（1）共产党人参与部队的领导。周恩来、茅延桢、金佛庄、曹石泉、曹渊、胡公冕、蒋先云、陈赓、许继慎、唐同德、孙一中、郭俊、彭干臣、卢德铭、周逸群、黄锦辉等一批共产党员，有的是部队的指挥官、党代表或骨干分子，有的是军校特别党部的执委或监委，实际上参与了对部队的领导。（2）部队中开展了政治工作。周恩来以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主持教导团的政治工作。该团规定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振奋我军，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主要做法是：加强各级党代表的职能，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坚持部队的正确政治方向；开展各种政治宣传，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政府、军队的政治影响；扶助工农运动，发展革命形势。（3）部队中聘有苏联顾问。

1925年2月1日，革命军各路按计划出发，第一次东征之役宣告开始。这次东征历时2个多月，经过的主要战役是：（1）肃清广（州）九（龙）路之敌。2月1日，粤军和黄埔校军分别从驻地出发攻击敌人，铁甲车队也参与战斗，所向皆捷，11日占领深圳，至此完全控制广九路。（2）淡水之役。控制广九路后，右路军乘胜追击，直指淡水城。15日拂晓攻城开始，经过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激烈战斗，于当日攻下淡水城。（3）进攻平山、海丰和潮汕之战。下淡水后，右路军于20日向平山挺进，与敌相遇，经过鏖战敌全线溃退，当即攻占白芒花，次日攻克平山。26日又夜出奇兵，破敌于三多祝、占领洪兆麟的指挥部。敌军叶举、洪兆麟部全线溃败。27日攻占陈炯明家乡——海丰县城。陈炯明已于前日逃往香港，洪兆麟、叶举也相继脱离部队各自从海上出逃。洪、叶残部土崩瓦解。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右路军各部协同作战，从3月3日至7日，相继攻克普宁、揭阳、潮安、汕头等地。（4）棉湖之战。这是第一次东征史上最著名的战斗。这次战斗，面对的是号称拥兵2万的林虎部。此役开始于3月11日，战斗延续竟日，教导团终于以两个团打败林虎6个师，取得空前胜利。（5）夺取五华、兴宁。取得棉湖之役的胜利后，右路军分兵奔袭五华、兴宁。17日至20日相继攻下五华、兴宁；接着又占领梅县、蕉岭、大埔各县，洪兆麟残部逃向闽边，林虎军窜入赣省。至此，潮梅地区全部被东征军收复。东征右路军所向披靡，迫使惠州的陈军所部接受改编。4月22日，左路——滇军开进惠州城。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历时两个多月，战斗数十次，东征军能每战皆捷，摧垮强敌，主要原因是：（1）东征右路军将士的英勇奋战，特别是黄埔校军的不怕牺牲、屡摧强敌。黄埔军校教导团，组建虽不足4个月，但由于军队的政治教育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它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纪律严明、充满活力的革命军队，成为东征军的中坚。在战斗中，国共两党党员密切合作、顽强奋战，建立了赫赫战功。这次一举打破陈军，荡平潮梅，黄埔校军起了关键作用。（2）人民的支援。东征军所到各地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援，如为部队运送弹药、救护伤员、传递消息、侦察敌情、甚至拿起刀枪直接参战，是东征军获得胜利的力量源泉。（3）苏联政府的支援。苏联政府不仅资助了枪械弹药，而且派出顾问随军东征，帮助制订具体作战战略和策略，纠正指挥中的失误，这也是迅速获胜的原因之一。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主要是：给陈炯明等反动武装以沉重的打击；发展壮大革命军

的力量；扩大了革命势力在东江的影响，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2. 平定杨刘叛乱

1925年5月，正当东征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反革命叛乱。杨、刘统率的滇、桂军虽然在驱逐陈炯明出广州和讨伐沈鸿英叛乱等战役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进驻广州，实为争夺广东这块地盘。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充军事实力，以控制南方政府的实权；并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在粤称王称霸，胡作非为，干尽祸国殃民勾当。他们开烟馆、设赌场坑害民众；霸占税收机关，袭击政府财政；武装包庇不法商人，走私牟利；克扣军饷，纵兵抢劫等等，无恶不作。他们倒行逆施，使人们怨声载道。他们虽然参加了东征战斗行列，但心怀异志。当右路军与叛军苦战之际，他们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杨、刘此时不仅暗与林虎有勾结，而且还北结段祺瑞、西联唐继尧，以谋对广东的统治。1925年5月，当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经过赴港密谋后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对杨刘谋叛，大元帅府早有察觉，但是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等态度软弱，主张调和，欲以妥协方法挽救时局，但遭到杨刘拒绝。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主张兴师讨伐。胡、汪等迫于形势才同意。5月13日，廖仲恺、朱培德和加伦到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等东征军领导人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革命障碍之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21日东征军班师回省城，并令湘军谭延闿部及滇军朱培德等部开进省城一带，以资策应；并对杨、刘叛迹进行揭露。这时，杨、刘在“拥护革命政府”的词藻掩盖下，喊打喊杀，妄图与革命政府“较量”。6月3—4日，杨、刘指挥叛军攻占省长公署及财政厅等机关，并发表伪令，任命广州卫戍司令和广东省省长。

面对杨、刘公开叛变，广州大元帅府迁到河南之士敏土厂办公，5日下令免杨、刘之滇、桂军总司令职，随后宣布他们的罪状。为一举歼灭叛军，大元帅府动员各军协同作战。各路人马组成对叛军的大包围圈，形成瓮中捉鳖之势。10月11日，政府各军先后开展总攻，势如破竹，锐不可挡。12日，叛军基本被消灭，杨、刘逃往沙面转赴香港。15日，杨、刘残余全部被消灭。不久国民党中央公告开除杨、刘党籍。

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固然是靠革命军的英勇作战，但工农群众的支援及政治宣传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广东工会组织的推动下，广九、广三、粤汉三条铁路和电船、民船工人罢工，使滇、桂军无法调遣；水厂、电厂工人停止供水、供电，使市内外电话不通、交通中断，各路叛军彼此情况不明，坐困一隅，以致败逃。在广东农民协会号召下，农民和农民自卫军协助政府镇压叛乱。政治攻势对平定杨、刘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滇、桂军将士作了大量工作；黄埔军校的滇、桂系学生组成宣传队对滇、桂军开展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和大元帅府发表宣言揭露叛逆罪行，号召滇、桂军将士们服从命令，巩固革命政权，等等。士兵们受到宣传教育，多不愿为杨、刘卖命，因而革命军能在一周之内平定了杨、刘叛乱。

二、国民政府成立

孙中山生前为组建国民政府作了许多努力。早在国民党一大后，他就曾设想立即着手组织国民政府，并于1924年2月13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上通过了组织部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案》。由于当时广东境内大小军阀尚未肃清，大本营制易于策应，故到 11 月，孙中山离穗北上时仍保留大本营制，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政府的领导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国民党中央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

1924 年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下，大元帅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对外，实行联俄反帝、特别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在反帝方面，政府最先着手的是率领群众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行争取“关余”、“邮余”和反对金法郎案的斗争。在国内，开展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以及为广东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作了不懈的斗争。并根据国民党一大确立的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广东的工农运动。以上事实说明，大元帅府是一个反帝的革命政府，但是它“还算不得有力的决心的反帝国主义政府”。因为，建立在以西南军阀武力为基础上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也由于各军防区制在作祟，致使政令不能通达全省，无法开发实业、整顿纲纪，实现军政、财政统一。尤其是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是当时各派军阀之首。大本营平定杨、刘叛乱，压下了反革命气焰，使广州政府转危为安，为组建国民政府创造了条件。

6 月 14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商讨组建国民政府事宜，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并议决政府组织法六条。这六条是：（1）设置国民政府，管理全国之政务；（2）设置军事委员会，统辖军事；（3）设监察院，监督政府各种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项之开支；（4）设惩罚院，专治官吏之贪赃不法及不服从命令者；（5）设省政府，管理全省政务；（6）设市政府。不久又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该法首先鲜明标志出党治原则，即“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其次规定政府的政制采取委员制，即国民政府以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一人为主席。15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就成立国民政府事作出决议：（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2）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3）建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4）整饬军政、财政。之后，在鲍罗廷参与下，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汪精卫等晤商了组织国民政府人选等具体问题。24 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及代行大元帅名义，发表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通电。与此同时，发表了革命政府改组通令。至此国民政府成立的条件完全成熟。

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当天发表的《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了国民政府的职责和对外、对内政策。宣言指出政府的职责是“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属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对外方针：“最先着手，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号召国民一致督责北京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方针：是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从而实现“致中国于独立之平等自由”的“国民革命的最大目标”。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等 16 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为常委。聘鲍罗廷为顾问，

推汪精卫为主席。政府采委员制，以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之效”，避免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比改组前的大元帅体制前进一步。广州国民政府设立外交、军事、财政等部，分别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后由邓泽如、宋子文继任）等任部长。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坚定地倡导“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消灭军阀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势力。” 政府还以实力赞助粤港民众运动。它公开宣称：省港罢工是“吾民族独立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举” ，并在政策上和物质上给予有力支持。如训令广州市“拨借东园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之用”；动员商界酌拨赢利捐助省港罢工委员会；拨发武器武装工人纠察队；封闭赌馆、烟馆空屋为罢工工人食堂、宿舍，使返省工人得以安置；安排罢工工人修筑中山路，得以经济接济。10月3日，对沙基死难烈士举行国葬。在政府支持下，罢工委员会建立和健全了组织，各机关分头办事，秩序井然；反帝的省港工人罢工坚持1年零4个月之久。罢工工人的反帝斗争，也从各方面声援了国民政府。“罢工工人与国民政府差不多相依为命，有存者俱存、亡者俱亡之势” 。国民政府还着眼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而广东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在广东还有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以及工农商学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民众运动十分活跃。在工人阶级率领下，各界群众团结战斗。“真可算是劳工神圣的黄金时代” 。“五卅”运动后，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全国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群众运动；支持民众的反奉倒段斗争，并于1925年11月提出“以国民政府代替军阀政府的对时局主张”。面对军阀的残暴统治，这个主张在当时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但这仅是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

国民政府还致力于军事、行政、财政的统一。军政统一是政府统一之首。为谋军政统一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了《整饬军队决议案》。《决议案》强调整饬军队的必要性，指出：从1923年以来，广东境内的军队各自为政，虽有最高军事机关，形同虚设。军队不但以筹集饷源为借口，对地方行政乱加干涉；而且对地方财政机关，也争先占据，于是行政经费、教育经费等等，都被他们吞蚀，广东政务也都停滞。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其保证；交通梗塞；市廛凋敝；工失其业；农失其事。广东乃革命根据地，这一切现象，无不与革命之主义及政策相悖，“故整理军队实为整理一切先著”。整理的方法是：（1）军令统一，严禁军队各自为政之习。（2）民政统一，严禁军队干涉用人之习。（3）财政统一及军需独立，严禁军队分割及霸占财政之习。（4）所有军队需经政治训练，使成为有主义、有纪律的革命军队。 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发表接受国民党整饬军队决议案宣言，表示“于最短时间，力求军民财政之统一，对于抗令者，予以严厉之制裁；对于阳奉阴违者予以严厉之惩罚。”为实现军令统一，国民政府于7月初公布了《军事委员会组织法》，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着手整饬军队。

国民政府还致力于民政的统一。自西南军阀进驻广东以来，政出多门；军队防区如同封地。地方官更多不明主义，又不听命，政府为完成主义之实施对民政也力求统一。7月初宣布成立监督院及惩吏院，以监察政府各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项之收支状况和惩治官吏之贪赃不法及不服从命令者。为发展教育事业，政府宣布教育经费独立，并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加强领导。财政统一是政府统一的基础。政府采取诸多措施治理财政。如统一国家财政收支，建立国家预算制度，统一税则、废除苛捐杂税，谋财政关税的自主权，

建设国家银行、统一币制、改善信贷及专制制度，发行公债等等。国民政府还努力发展实业，开展市政建设和修筑公路等等。为开发实业，特成立实业投资委员会，“欢迎以平等待我之外贸”^①。

以上事实说明，广州国民政府“始终还是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的旗帜”^②，努力整饬军队、改革行政、统一财政；注意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力图扫除内部反革命势力。国民政府委员会中虽然成分复杂，但当时的大多数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革命潮流影响下，其中大多数或多或少倾向革命。因此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共产国际称其为“依靠城乡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顽强反帝斗争的东方革命民主政权的第一个样板。”^③对国民政府、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采取了“在野党”的错误政策。

三、国民革命军组成

孙中山建立革命军的工作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的骨干，从而组织一支革命军；一是改造旧式的地方部队，使之为革命服务，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

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具有革命精神，有主义有理想的军事人才是建立革命军的根本。黄埔军校造就了一批为革命而奋斗的军事人才，为建立革命军打下了基础，当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这期毕业生为骨干，从广东、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一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于1924年底先后组建了两个教导团。教导团学习苏联红军建制，采取三三制：每团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26至30名战斗兵。教导团实行党代表制，从连队到团设有党代表。1925年4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秉承孙中山遗愿，通过了建立党军案。随即以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23日教导第三团成立。7月，教导团与军校分离。这时教导团已扩大为一个旅，下设三个团。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一支新军。这支新军的建立是组建革命军的开端。

孙中山还致力于改造大元帅府所辖的粤、湘、滇、桂、豫、赣、川、黔、晋、闽、陕等地方军以及一切杂牌军。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命令取消那些自行扩充的杂牌军，有些“照枪数目，归并正式编制军队，以资整饬。”^④7月，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孙中山还亲自到各军演讲，宣传救国救民道理，宣传整顿军队，建设革命军的必要。为统一各军，10月，将各地方军一律改称建国军。但是，用建国军名称统辖了各军，并未解决这些军队的积弊，许多部队还是“为个人所设，事功为个人所图”；“军官之富者，多积资在万数以上，而士兵则穷至衣不蔽体”；“为害地方，更触处皆是”；“人人畏兵，甚为畏匪”。^⑤

孙中山改造旧军队的设想，在他生前并未实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整饬军队，组建国民革命军。7月3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8人为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北伐前夕，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中设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担任。统一军队，由统一名称开始。军委会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名称，统一称之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粤军许崇智公开通电声明：将军队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联合发表通

电，宣布辞去湘军、滇军、攻鄂军总司令职，以示拥护国民政府统一军队的指令。

1925年8月26日，在黄埔党军一旅和建国各军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共五个军。第一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蒋介石任军长。第二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由谭延闿任军长。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朱培德任军长。第四军，主要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以李福林的粤军第三军为基础扩编组成，李福林任军长。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又相继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至第八军。第六军，以程潜的援鄂军为基础改编组成，程潜任军长。第七军，由李宗仁、黄绍竑的定桂讨贼军改编组成，李宗仁任军长。第八军，由湘军唐生智的第四师改编而成，唐生智任军长。

国共合作创立的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在部队设置党代表，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战。国民革命军组成后，公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条例》规定设置党代表是为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扬三民主义之教育”。“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为军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须一律执行。”部队“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等等。由于党代表制度的实行，使军队逐步“由私人工具”，“变为党的武力”，更进而使作为一种工具的军队，成为实现“理想的先锋”。

各军设政治部。政治部是军队组织的一部分，“辅助各部处的工作，进行政治教育”。军队中政治工作，大约可以分为宣传和组织两类。通过部队政治工作，“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使“革命军的行动要依靠党的政策”；“使官佐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遵守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从而使部队：“革命化，由武力与民众合作，进而为人民之武力”；“统一化，而不致有互相侵扎之事”；“成为明主义，认清敌友、懂得斗争方法的很有能力、有经验的战斗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作军队政治工作，比做军事工作责任还重要。因此，国民革命军在努力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加强政治训练。在刚建立起来的各军先后设立了政治部。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组建，甚为关切。选派自己的优秀党员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和某些军事工作，推动军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当时，所有各军政治部主任，几乎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相继任命了各军党代表。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兼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周恩来（后为缪斌）、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后为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黄绍竑、刘文岛等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军副党代表或党代表。对独立师、军事机关及海军、航空队等也陆续配备了党代表。1926年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机关的党代表增至1000多人，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影响遍及广东及东南各省。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从连到军的各级党代表。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等皆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担任师及师以下各级党代表尤以一、二、三、四、六军中为多，如曾担师党代表的有：周恩来（兼）、鲁易、包惠僧、李富春（兼）、

方维夏、肖劲光、廖乾五、吴少默等人。北伐战争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派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营、团党代表。第一军，初期在连、排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第四军独立团的军事、政治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支部设在团上。

国民革命军初建时之党务、政治文化工作，在政治训练部指导下进行，陈公博为主任。北伐前夕在训练部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不久改称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许多共产党员在总政部任职。北伐战争开始后，总政治部在广州设留守处，其余都随军出发，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宣传队随军北上。在改组成立总政治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增设军人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人部长。军人部有任免及提名师以下党代表之权，从此，任免军中党代表之权，实际上被蒋介石独揽。

以共产党员为革命核心的政治工作，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在军队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对军队，进行政治的、纪律的、知识的宣传教育，经过教育，不仅使官兵懂得了为什么要打仗、打倒谁；而且增加了组织纪律性。对群众，深入乡村，宣传部队的宗旨和政策，密切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在组织工作方面：对军内，组织国民党小组，俱乐部，图书馆，抚恤调查委员会等，以加强部队纪律，活跃文化、娱乐生活；对地方和革命群众，帮助建立政权，组织国民党部，成立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人民团体，因而深得群众的拥护。

为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国民政府聘请苏联军事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顾问。顾问的工作，不仅促进部队本身的进步；而且协助军委和各军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战术和作战计划。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优秀军事干部来华。最先担任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是巴甫洛夫。他不幸去世后，布留赫夫（加伦）继任军事总顾问。古比雪夫（季山嘉）曾在加伦回国养病期间代理总顾问职。在军事委员会各机关任职的有：政治训练部顾问拉兹贡，总参谋长罗加觉夫。在他们两人离开广州后担任加伦将军参谋长的，先是斯涅戈夫，后是勃拉戈达托夫（罗兰）。总政治部顾问泰依罗尼（铁罗尼）。此外，在炮兵、海军、空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以及军以下主力部队皆聘有苏联顾问。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尽力深入研究军事状况，熟悉指挥员和士兵群众，积极指导部队军事训练，经常给军官进行政治、军事演讲，组织示范教学，直至参与作战指挥等等。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政部顾问铁罗尼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加伦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的决策和指挥。苏联政府还多次给予革命军以武器支援。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聘请苏联军事人员为顾问，推动了这支军队的改造和进步，使它成为一支有革命理论为指导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较强的，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战的革命武装。

但是，这支军队除第一军以外的各军多为原地方军阀部队改编而成，军官多属地主阶级。第一军军官虽多由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调任，他们也多是出身于旧的军事学校。这些军官参加国民革命的动机不一，固然不乏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但更多的是为了给自身寻找出路，或为升官发财而来。他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而或多或少的倾向革命，但是这时实行的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但不足以改变他们视军队为其私人

所有的观念，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监督。军队的领导权仍完全控制在指挥官手里。党代表实无兵权，是不可能使主管官的命令不执行，政治工作人员更没有监督指挥官行使其权力的可能。此外，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复杂，除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外，还有国民党右派、旧军官、政客等，这后一类人一般都与主管官关系密切，声息相通，更不可能对主管官起任何监督作用。这时，中国共产党对于独立地掌握正规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认识，没有注意争取军队的领导权，以彻底改造这支军队。苏联政府只要求他们派来的顾问充当中国将领的“拐棍”，而“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¹因而，他们对这支军队的改造所起的作用很有限。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民革命军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造。大批军官仍视其控制的军队为私人所有，并利用革命口号提高自己的威信，使部队继续忠于他们；还利用职权任用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当革命深入发展到触及其阶级利益时，他们就有可能利用其掌握的军队危害革命。国民革命军的这种状况，使革命发展潜伏着危机。

四、第四军独立团的建立

1925年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将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是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大部分成员和黄埔军校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组建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是国共合作后，由共产党人倡议、经孙中山批准建立的。它的任务是：拱卫大元帅府。中共广东区委先后调来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廖乾五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苏联政府除对铁甲车队予以武器支援外，还派来顾问指导工作。队内成立共产党小组。铁甲车队在完成拱卫大元帅府任务的同时，还先后支援了广宁的农民运动，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封锁香港的斗争。在这些战斗中，官兵们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作出应有贡献。在组建三十四团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车队大部分成员加入该团。与此同时，从黄埔军校调来杨宁、董朗、吴兆生、卢德铭、袁炎烈、练国梁、蔡晴川、张堂坤等共产党员参加工作，为把该团建设成新型的革命团队打下良好基础。

以叶挺为团长的三十四团，于1925年11月在肇庆正式成立，北伐前扩编为第四军独立团。全团2000余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第一营营长周士第（后为曹渊）、第二营营长许继慎、第三营营长杨宁，各连连长及侦察队等队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团内设中共党支部，是团队领导核心。党支部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干部任命、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周恩来经常给团以具体指导。

叶挺等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努力把独立团建设成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要求，在团队成立初期就认真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团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²制度。“要红才能打胜仗”是独立团领导坚信的真理，十分重视政治训练。采取多种形式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和对革命的责任感；增强了官兵的纪律观念和团结。独立团做到了团内官兵平等，亲如手足；对群众情同鱼水。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独立团，是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武装。

独立团成立后，积极支援西江的农民运动。1926年初，独立团先后派遣该团官兵，支援高要县第一区农会反击地主武装的进攻，并和农民自卫队一

道捣毁罗建反动地主老巢，拔掉反动地主武装据点。结果，不仅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而且以缴获的枪支武装了农民自卫队，扩大和加强了农民武装力量，推动了广东省西江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北上。独立团在北伐各次战斗中所向披靡，威震全国，成为百战百胜的北伐先锋。全团官兵为北伐战争胜利，作出巨大牺牲。“诸烈士的血铸成铁军的荣誉！” 叶挺战功卓著，获得“北伐名将”之称。

第三节 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一、肃清内奸运动

随着“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相继爆发，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反帝斗争成为大革命高潮的起点，而7月组建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全国民族解放斗争强有力的支柱和全国反帝统一战线的中心。因此，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视国民政府的成立为其侵略中国的极大障碍，不惜采用种种阴谋手段，力图分化瓦解以至武力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他们伙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大肆造谣，说什么“广东赤化”，将要实行“共产共妻”，中伤广东和上海工人群众是“布尔什维克派”，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是“排外”，是“拳匪之乱”的再起，以便在帝国主义间重组反苏反共的反革命联合阵线，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和抑制苏联。香港英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召开所谓“公民大会”，通过决议电请英国政府向广州国民政府下最后通牒。与帝国主义反共分子相呼应，国内反革命派声称要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广东省内的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右派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首先是，1925年夏秋已被革命军打败的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乘机而起重祸东江。6月间，当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时，陈军窜回东江。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到处捣毁农会、进攻农军，捕捉、屠杀农会干部；鼓动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大搞阶级报复。真是“陈军每到一处，闾阎为之一空。”^①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破坏省港罢工。他们最先恢复了汕头与香港的交通，派舰运粮往香港，为帝国主义解围；强迫罢工工人返港复工。此外，陈炯明还接受了香港和北方及邻省军阀的大批饷械，策划进攻广州。

其次，盘据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蠢蠢欲动。邓本殷原是陈炯明部属，1923年孙中山组织讨贼军驱逐陈炯明，重新在广州建立政权时，他独树一帜，并联合南路各军、纠集豪绅地主和民团土匪，凑成了所谓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邓本殷投靠北洋军阀，并得到北京军阀政府大批粮饷军械的支持。邓军在南路琼崖随意掠夺，拉夫抽税，开烟设赌，给人民造成无穷灾难。省港罢工爆发后，邓本殷接受香港政府80万元的购买，甘为所用，以大批粮食、物资接济香港。邓本殷盘据南路、琼崖地区，已成为实现广东统一的严重障碍。

再次，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势力，惶惶不可终日，加紧了反革命阴谋活动。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军政、财政的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这都是自有国民党以来的创举。但这种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却与军阀、官僚、国民党右派割据地盘、独霸一方的利益相冲突。于是，右派分子称支持工农运动者为共产派，指责执行革命政策的人过激。在被攻击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廖仲恺。1925年7月初，邹鲁、孙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树巍等多次在胡汉民家中开会，集中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挑拨各方恶感”。他们密谋通过推倒廖仲恺，从而全盘推翻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8月初，广州有不少谣言，说香港已出款30万元收买凶手暗杀某某等。

面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势力勾结向革命势力进攻的严重局面，只有彻底消灭陈炯明、邓本殷反动军队，进而统一广东全境，并打退右派势力的猖狂

进攻，才能改变国民政府的被动局面，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因此，不但东江人民纷纷要求征讨陈军，南路八属各界团体，要求肃清邓军，而且广州及各地人民也积极催促国民政府出兵，同时肃清内部一切反革命。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广东区委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肃清内奸、统一广东的示威请愿。1925年8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请愿书》，苏兆征发表《肃清内奸》的文章，请求“国民政府肃清南路，收复东江，扫清一切破坏罢工之国贼。” 11日，统一广东全省运动大会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到会者达5万余人。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及请愿。大会分东、北两会场，到会群众情绪激昂，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收复东江！”、“肃清南路！”、“统一广东！”等口号。会后游行队伍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青年部长甘乃光、组织部长谭平山接见了请愿代表，对代表的要求表示支持。

在广东人民向一切反动势力发动攻势的面前，国民党右派，反动官僚政客向革命势力反扑，于8月20日晨暗杀了受民众崇敬的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与其同时遇难的还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

廖仲恺被杀害，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军阀政客企图以恐怖手段阻挠革命发展的严重事件。由于廖仲恺为实现总理遗嘱而奋斗；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态度最强硬，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最坚决，整顿军政、财政最得力，因而为反动军阀、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所忌恨。反动派谋杀廖仲恺，决不单是为刺死他一人，而是要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廖仲恺之死，使“国民革命殒一员大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失一位导师”，国民党内“失一柱石”。 廖仲恺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深切的悼念，许多工人、农民为之痛惜流泪，广东各地工农群众纷纷举行追悼会。国民党中央发出讣告，通令各机关团体下半旗致哀三天。苏联等国在华代表参加悼念活动，泰国等发来唁电。中共中央为悼唁廖仲恺被刺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廖仲恺被刺逝世“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唁电最后表示“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 周恩来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高度赞扬廖仲恺，称其是“孙中山革命志愿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党中的重心”；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两大伟业之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廖先生”，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唯一急先锋”。 宋庆龄也特别发来唁电称：“吾党损失甚巨，实甚痛切”。8月31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廖仲恺党代表大会。9月1日，廖仲恺灵柩出殡，送殡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机关人员和市民群众共20余万人。

廖仲恺遇难后，中共广东区委即组织广州工农群众举行追悼会，并要求国民政府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9月26日，又通过对外协会发动10多万人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统一广东，“扫除暗杀阴谋”，肃清“卖国卖广东之内奸”。 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还联合发表了《对广州各界示威运动宣言》，呼吁政府及军队和民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阴谋，造成统一和幸福的广州，巩固向全国发展之国民革命之基础。

廖仲恺被刺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召开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案。特别委

员会决定并命令逮捕了涉嫌案犯；并通过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对案犯进行审讯。由于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庇护、干扰和转移目标，对案犯的追查、审讯很难深入下去。据当场被击伤捕获的凶手陈顺在昏迷中的供词证明，他是被收买来行刺的。据在现场缴获的手枪证明朱卓文是刺廖主凶的最大嫌疑犯，而在他的背后显然还有主使人物。当时特别委员会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反动组织“文华堂”的领袖胡毅生是刺廖的主要主使嫌疑犯。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弟弟，因而也牵涉到胡汉民。而廖案审理的结果是：胡毅生、朱卓文等一些主要嫌疑犯均闻风逃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的胡汉民则于9月23日乘苏舰“列宁号”启程赴苏。

在廖案发生后开展的肃清内奸运动，虽然打击了右派势力，但廖案的主犯并没彻底查清，而且蒋介石利用这一案件，很快把主要矛头指向许崇智的粤军。许崇智在蒋的逼迫下，辞去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及财政监督等本兼各职，于9月20日离粤赴港，从此长作上海寓公。蒋介石则趁革命政府肃清内奸运动之机夺取了粤军的军权。从此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二、革命军第二次东征

陈炯明重祸东江，再次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威胁。1925年9月间，陈军的林虎、洪兆麟、叶举等各部驱逐了驻汕头的许崇智部，占领了汕头及其周围各县。随后，分三路入侵海丰、陆丰、紫金、老隆等，逼许崇智部退守平山、淡水一线。9月16日，陈炯明由沪抵港，筹划进犯广州事宜。他指派刘志陆为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指挥，并约同南路邓本殷一致行动，分头并进，企图一举攻下广州。面对这种形势，国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下，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的促进和帮助下，作出了出兵东江的决定。

第二次东征打击的目标和进军地点虽然和第一次东征相同，但敌我阵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从革命军方面看，由于国民政府统一军政、组建了国民革命军，初步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工作地位的确认，使共产党人在军队中能发挥重大作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其中70%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这对国民革命军的发展和第二次东征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消灭了杨、刘叛军，整肃了不轨军队，各部门、各部队加强了合作，从而能够团结战斗去争取胜利。同时，由于这次东征是同保卫省港大罢工、保卫东江农民运动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因而它更广泛地得到工、农和各界人民群众的支援。总之，同第一次东征相比，革命军的实力以及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大大发展了。而陈炯明方面，经过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的打击，精锐已丧失殆尽，虽然得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扶植，但新败之余，元气未复，士气与实力都远远不如往昔。这时，陈军内部又矛盾重重，各军不相统属。林虎、洪兆麟对陈炯明怀有异志；而陈炯明为防备林、洪势力强大，难以指挥，改任刘志陆为总指挥。这就自然使陈军实力受到削弱。加之人民群众对陈军重祸东江恨之入骨，这就注定他必然再次失败。

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下辖三路纵队：第一纵队以何应钦为纵队长，兵力1.5万人，任中路，是这次东征的主力；第二纵队以李济深为纵队长，兵力约1.2万人，任右路；第三纵队以程潜为纵队长，兵力约6000人，任左路。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切列潘诺夫等分别随总指挥部和各纵队出发。这次东征吸取第一次东征的经验，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出征前夕，总政治部组织强大的政治宣传队，人数共200余人，

以随军出发。在周恩来领导下，总政治部制定了《战事宣传大纲》，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还成立了社会运动科，以大力扶助工农运动，并提出发展党务工作的规划。

东征前夕，中共广东区委指定杨石魂等共产党人率领岭东革命同志会部分人士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党团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以策应、援助东征军。共产党员古大存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五华县组织群众武装配合革命军东征。

10月1日起，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预计1个月内完成战事。10月初，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广东省政府分别发布宣言、布告，宣布东征目的、革命军纪律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宣告第二次东征开始。

第二次东征经历的主要战事是：（1）惠州之役。这次东征采取中间突破，直捣惠州的作战方针。因此，惠州是东征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地势险要、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惠州守军杨坤如部是第一次东征时唯一未受损失的部队，他们企图利用天险将革命军阻于惠州城下，然后反守为攻，歼灭革命军。能否攻下惠州，成为第二次东征胜败关键。10月11日，东征军抵惠州城郊，形成对惠州的包围。13日上午开始攻城，重点攻击北门，以第一纵队第二师刘尧宸的第四团担任主攻，多次冲锋皆未成功，团长不幸牺牲，全军伤亡过半。次日，东征军调整兵力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破北门进入城内。此时，以蒋先云为团长的第七团也攻破西门。经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军攻占天险惠州。杨坤如负伤败逃，所部来不及逃走的尽被俘获。革命军能在两天内攻破素称“南方第一坚城”的惠州，是由于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以及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战的献身精神起了主要作用。据统计，第一军有27名连党代表参加的攻城先锋队，其中21名牺牲，6名负伤。亲自经历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围墙还要坚硬”。此役胜利为第二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2）占领海丰、陆丰、紫金、老隆。惠州克复后，东征军军威大振，从此长驱直入：第一纵队于10月22日占领海丰，26日占领陆丰；第二纵队20日占领三多祝，后经过各师配合战斗于26日进克紫金。第三纵队22日克河源，25在蓝口击败敌军，26日占领老隆。（3）华阳、河婆之役。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东征军总指挥部与谭曙卿所率第三师与陈军林虎部遭遇，由于三师轻敌冒进和蒋介石判断失误，使敌有机可乘，致使三师全线崩溃，仓惶败退。这时组织抵抗为时已晚。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候，陈赓指挥警卫连掩护蒋介石渡河，脱离险境。华阳之役失利后，五华县有组织的农民积极帮助东征军脱险。何应钦、周恩来率第一师于26日占领河婆，后又当地人民支援下与三纵队所部以及第三师配合在华阳、罗甘坝一带经过激烈战斗，大破林虎和洪兆麟部，使其精锐尽失，终于扭转了蒋介石等轻敌冒进造成的失败。经华阳、河婆之役，“逆敌势潜”，这对取得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4）占领潮梅，歼敌闽边。当右、中两路激战于华阳、河婆时，左翼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不战而取五华县城。31日攻克兴宁城。11月3日进驻梅县县城。至此兴梅之敌被肃清。第一纵队第一师在河婆取得胜利后，于11月2日攻占普宁，3日克揭阳，4日进攻潮汕，下午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第二纵队张发奎部攻占紫金后，奉命开赴南路参加讨伐邓本殷之战。陈济棠师继续东征，于11月7日攻占饶平。11月中旬，何应钦、谭曙卿、程潜三路入闽，追歼

残敌，分别在永定、平和等地全歼逃敌刘志陆部。至此，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

在东征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共产党人主持的政治工作收到显著效果。据统计，东征中散发的各种政治宣传品共达179万多份。宣传队各支队沿途不断向群众发表演讲，其中第一支队就达878次。蒋介石对政治宣传工作的成绩颇为赞赏。他说：“此次行师，各军中有党代表政治人员，则官兵咸有顾忌。演讲使明主义，方能勇敢摧敌。住行一地，开军兵联欢会，宣言、标语播扬革命宗旨，故民众愿与合作。有连夜砮谷宰豕拔蔬菜相饷，沿途设坐备茶以供。此得力于宣传，及严肃军纪，不拉夫，与购物公道之效果也。”^①总政治部积极支持、帮助各地工农运动，不但拨发枪械武装各地农会、农军，并派出人员加以指导，从而推动了东江各地的革命运动很快复兴并迅猛发展。各地区普遍组织农会，新学生社、妇女解放协会、教职员联合会、商民协会等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总政治部在东征中大力开展党务工作，周恩来担任国民党东江党务组织主任。东征军每到一处，政治部即派员宣传党义，登记党员，恢复和整顿或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12月8日成立了以彭湃、邓颖超、赖先声等为委员的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1926年4月，成立了以肖鹏魂、冯明光等为委员的国民党惠属特别委员会。经过一系列工作，东江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重整旗鼓，朝气蓬勃，一度成为先进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之一。周恩来和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还为建立和发展共产党、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10月20日，中共海陆丰特支改组为海陆丰地委，由彭湃任书记。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惠州地委，由肖鹏魂（隽英）任书记。11月成立了汕头地委，由赖先声任书记。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消除了来自东面的威胁。广东的局势大为改观。

三、革命军南征

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北江和南部地区，还举行了驱逐熊克武部川军和讨伐邓本殷“八属联军”的战争。

熊克武曾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国民党有很深的关系，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初，熊部川军被逐出川境，退至贵州。9月熊派代表到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一致行动，共同出兵北伐。11月间熊部川军由黔东南入湘西。但此举引起湘军赵恒惕猜忌，并派军向湘西进攻，迫使熊克武率部经广西地区到达粤北与谭延闿部湘军会合。国民政府曾派人携饷慰劳，并划连山、连县、阳山、乳源四县为其驻地。

9月25日，熊克武率少数人员到广州。10月3日，蒋介石设计诱熊至其寓所，将熊及其军长、师长等拘捕。5日，国民政府发布重要通令，宣布熊“谋危政府”的经过，主要内容是：熊克武与陈炯明有秘密往来，关系复杂。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扣留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并派员安抚川军的“布告”；随后，又发布《告川军将士书》。国民政府派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围歼连、阳川军，将川军包围在连县境内。川军有的被缴械，有的进入湖南。后来经桂军的阻击和赵恒惕的收编，熊部川军全部瓦解。然而，这一事件的性质与东征、南征应有所区别；熊克武与陈炯明、邓本殷是不应相提并论的。

第二军和第三军在北江各地，做了许多政治宣传工作，帮助地方组织党部、工农团体，使北江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扩大了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北江地区，特别是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连、阳各县的影响。

国民政府在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时，就决定举行南征，讨伐邓本殷。

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准备南征，在大军出征前，就派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潜赴南路、琼崖等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大军出发之际，共产党员黄学增、王文明等在广州又发起组织“广东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旅省革命团体联合会”，动员组织一批革命青年随军出发，到南路、琼崖各地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共广东区委还通过省港罢工委员会派出宣传队、卫生队，到前方宣传和运输救护。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为配合南征，组织了由潘兆銓任主席，林丛郁、黄学增、谭竹山、彭刚侠、朱蔓任委员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并任命朱克靖为国民党南路组织主任，协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

南征之役开始时，以第四军第十师为主力。10月初，国民政府命该师担任南路警备，任命师长陈铭枢为前敌各军指挥。陈曾与桂军俞作柏和第四军十二师梁鸿霖商定向邓军进攻计划，后因苏廷有突然倒戈并策动梁鸿霖叛变而未执行。

10月22日，邓本殷下达《本军对省方作战纲要》，提出要以“与东、北江友军协同消灭赤化奠定粤局为主旨，对省方取攻势”，“先消灭西江南岸之敌，以全力攻取肇庆，候机会合东江友军，围攻省垣”。邓逆军以邓本殷任总指挥兼左翼指挥官，陈德春任中路指挥官，苏廷有任右路指挥官，企图趁革命军东进潮梅、后方空虚之机策军进犯广州。这样，就在东征军攻克惠州、乘胜东进时，南征之役也拉开战幕。

为适应敌情变化，10月16日第十师主力从肇庆移驻江门，力图确保“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而苏廷有等部却集结数千兵力图取新会和江门。第十师各团合力反攻，挫败敌军的攻击，随后又占领台山。这时，第三军赶到，进驻开平。革命军防御战取得胜利，“四邑”转危为安。

国民政府平定北江后，调第二军一部和第三军全部南下，与原南征部队组成“南路联军总指挥部”，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朱克靖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下分兵四路：以第四军第十师为第一路，陈铭枢任指挥；以第三军为第二路，王钧任指挥；以第二军为第三路，戴岳任指挥；以广西的桂军为第四路，俞作柏任指挥。另以陈章甫所率新编第二师为右侧支队。10月31日，总指挥朱培德在鹤山下达《国民革命军南路各军作战计划》。命令各部分别从台山、开平、新会和广西陆川出发，以期首先肃清两阳（阳江、阳春），然后攻占高雷（高州、雷州）和钦廉（钦州、廉州）。部署既定，第一路所部从指定地点出发攻击前进，11月初相继攻克恩平、阳江；第三路未经大的战斗，便占领新兴和阳春。陈章甫部在革命军攻克两阳后，进行反攻，从敌手中收复罗定。至此，南征军完全扫荡了罗、阳之敌。14日，南征军各部离开阳江城，大举南进征讨高雷和钦廉。这时，俞作柏率南征军第四路从广西入粤，进逼化州、高州和茂名。邓本殷退守雷州。南征军势如破竹，18日陈铭枢师进占电白，20日占梅■（吴川）。俞作柏部经艰苦的攻城战并在陈部的策应下，21日攻克高州，次日占领化州。攻克高、化后，革命军分头疾进；相继占领廉江、遂溪等地。此时，雷州已在革命军严密监视之下，邓本殷又退到琼崖，雷州守敌在革命军的震威下，弃城逃跑。南征军进占雷州后，俞作柏部与陈铭枢部密切配合，全力肃清钦廉之敌。30

日攻占廉州。12月初桂军胡宗铎部从广西灵山出发，次日占领钦州。钦、廉守敌除其首领逃往安南（越南）外，大部向革命军投降、缴械。至此，南路各地基本肃清，南征第一阶段任务宣告完成。

革命军克复南路各属之后，开展了艰苦深入的善后工作，张善铭、廖乾五率政治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安置灾民，整顿社会秩序，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和国民党党部，建立学生军、学生会、农协会、除盗安民会和各行业工会。针对匪患严重，大力发动群众清剿土匪。1925年12月，第四军政治部召集雷属人民代表，商谈治匪安民问题，提出联合人民及军政两方，一面剿灭强暴，一面抚恤善良，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扬。

随着南征的胜利进展，南路各地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吴川、遂溪、阳江、廉江、电白等县，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从秘密状态转入公开活动，迅速发展，并成立了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南路特委，在各县有计划地吸收党员，建立党部，团结、吸引了大批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

革命军在开展艰苦深入的善后工作的同时，积极准备渡海作战，进攻琼岛消灭邓本殷军。这时，革命军已作了调整，即在进攻雷州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奉命率领从东江调回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加入南路作战；第二军、第三军被调回原地驻防，任命李济深为“南路军总指挥”。1926年1月，第四军开始进攻海南岛。1月中旬，先遣军渡海在琼海北岸临高一带登陆；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乘舰强度琼州海峡，进入琼岛东北岸的新榄港，随即发动猛击，当夜即占领文昌县铺前市。接着又占领锦山市、湖山市和琼山县三江市。22日，革命军进入琼山县城，邓本殷乘日舰逃往安南。第四军第十一师等，也都随之登上琼岛。邓本殷负隅海南抵抗革命军的计划，终成泡影。南征军在海南，追歼残敌、清剿土匪，于2月中旬肃清了全岛。至此，南征之役取得完全胜利。

南征军进攻海南岛时，第四军政治部张善铭，廖乾五等，率部赴琼工作。当即发表《敬告琼崖同胞书》，号召人民起来“帮助革命军肃清邓匪”。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出琼籍共产党员王文明、冯平等随军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省农民协会鉴于海南农民“甚富于革命性”，“尝有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之革命行动”，因此决定成立省农会琼崖办事处，委任冯平为办事处主任，何毅为书记，符向一为委员。在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海南各地纷纷建立农会、农军和农运讲习所。到当年8月琼崖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农会会员已发展到20万人。为统一琼崖全岛工作，革命军抵琼之初，成立了琼崖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张善铭任主席。后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行政委员，临时行政委员会才宣布取消。2月3日，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成立，以罗汉、吴国鼎、黎竟民等为委员。同年上半年，中共琼崖地委成立，由王文明任书记，冯平等为委员。在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的努力下，琼崖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东征和南征是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战争结果，消灭了长期以来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占据广东三分之二地盘的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动军队。从此，从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以来就称为革命根据地，而实际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广东，真正实现了统一。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鼓舞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斗争。这场战争锻炼了革命的政党和军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不仅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巩固，也为后来举行北伐战争，将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广东省行政、财政的统一和两广统一

一、广东省政府成立和行政、财政的统一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只辖广东一省。1925年7月3日，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1926年初改为“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命令管理全省政务”，鲜明体现了党治原则。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广东省政府在广州政治分会指导下处理本省政务。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7厅，分别以古应芬、廖仲恺、许崇清、孙科、宋子文、陈公博、许崇智为厅长，采用委员制。由各厅厅长联合组织省务会议，推军事厅长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与广东省政府初时的分工是：外事、国家财政和国防用兵由国民政府主持；地方治安及其他政务，在国民政府监督下，由省政府主持。广东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规定的省府权限范围，宣布了它的施政方针是：“使军队负保护人民之责，绥靖地方，肃清匪患；蠲除苛捐杂税，重新订定合乎财政原理之税则，以充实政费；减轻人民负担；禁止一切赌博，并颁布禁烟条例，切实奉行；整顿吏治，运用中国国民党考试考查之制，以期为地方得人；扶植地方自治，以树立民权之基础；整顿交通无阻；发展工业；保护商业；实行裁厘加税，以苏商民痛困；保护农民工人利益，扶助团体组织，以谋其发展；教育经费独立，谋教员生活之保障，及救济失业儿童。”

在广东省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25年10月20日在广州召开。大会选出省执行委员14人，以陈公博、杨匏安、甘乃光为常务委员，陈公博为主席。杨匏安兼组织部长，彭湃任农民部长，刘尔崧任工人部长，何香凝任妇女部长，陈孚本任青年部长，范其务任商务部长，谭秀萼任秘书长。广东省党部改组成立后，相继任命了各行政区的国民党组织主任和特别委员会委员。如东江和南路的组织主任分别由周恩来、朱克靖担任；彭湃、邓颖超、赖先声等为潮梅特别委员；黄学增、潘兆奎、谭竹山等为南路特别委员。在省党部的直接领导、监督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的影响、推动下，随着军事上的胜利，省政府在吏治、行政、财政、治安、实业等方面都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整饬吏治方面，省政府首先进行市、县两级的体制改革。将“市分两种，60万人口以上为特别市，用委员制”，设立市政委员会。如广州市成立了由18人为委员的市政委员会，以市长伍朝枢为委员长。关于县政府，决定各县“除县长外，加派党代表1人，财政厅代表1人，3人合组县行政委员会，对全县负责。”整饬吏治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铲除苛政”，即“肃清奸商买办”、“惩治贪官污吏”以整顿内部。据此目的，省政府相继撤换了一批县长并任命新县长，委派了各县财政厅代表，力求政治清廉。制定“惩处条例”惩治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玩忽职守者。广东省政府在整饬吏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并未做到吏治清廉，任用的官吏仍多是旧式人物。如广宁县从1924~1927年初的六任县长，都是旧势力的代表，有的竟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用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也屡见不鲜。

在整饬吏治的同时，省政府致力于全省行政的统一。1925年11月，省

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计划，决定组织行署，分广东省为六个行政区，即东江、北江、西江、南路、广州、琼崖。每区设行政委员一人，对该地区行政负完全责任。周恩来、甘乃光、宋子文、古应芬、张难先分别任东江、南路、广州、西江、琼州行政委员。由各行政委员组织广东省行政委员会。各行政委员的职责是：在省政府指导下，履行民政厅职责，管理、监督所属区域县长之施政，有任免县长之权。行政委员到任后，开始对各区的工作进行整治，并取得一定政绩。这样，就使广东省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政令基本上可以下达，初步实现全省行政的统一。

周恩来在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期间，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他为东江行政公署题词：“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必须打破这两大障碍物。”为实现反帝、反军阀这一根本目标，东江行署在周恩来主持时期，致力于：（1）“铲除苛政”以整饬吏治。为此，行署先后委派一批检查官赴各地督促整饬吏治；并及时撤换个别反动县长。（2）在东江各地实行“民权”，坚持“民治”。周恩来认为“党政府下之民权，是大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劣绅的”。因此东江行政公署解散了徒具虚名、甚至为反动势力操纵的各县议会，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或大会，“凡行政事项，如交通、建设、商务、生产、治安、警政、农工、教育诸要政悉付讨论”。“各县官吏及人民代表，齐集一堂共议革命治理”，“开东江革命政治之新纪元”。（3）为巩固地方政权，行署决定取消各县团防局，组织武装警察和人民自卫军，以维持社会治安；并开展清匪斗争。（4）严禁烟赌。（5）积极支持东江革命群众运动，发展为人民谋利益的团体。如积极支援省港罢工；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使东江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支持各属工人、学生反帝斗争和妇女群众应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的解放运动。

广东全省行政统一后，国民政府拟定的改善财政计划在广东开始实行。

（1）统一全省财政收入。根据国民政府统一国家财政收入的指令，省政府财政厅训令：“从7月15日起，所有财政收入应一切由法定征收机关征收关理”，财政厅为全省收款总机关。为加强财政管理、健全财政机关，在财政厅下分地区设财政处，管理所属地区财政。（2）制定省预算。根据国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家预算制度、力求财政平衡的要求，省政府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拟定了省预算，要求各机关的支出，依照预算进行。（3）改善广东省币制。根据国民政府统一货币要求，广东省各地设中央银行分行，以政府纸币“为本省商业周转之基本，而外国纸币当逐渐离去广东”。（4）“蠲除苛细杂捐、撤厘加税”，“保护商业、整理交通”。（5）积极扩大产业收入。如设法增加铁路、邮电等方面的收入；注意改善盐务组织及盐务之收入；改善专利制度，以及产业收入等。（6）努力从事经济建设。省内军事已告结束，省政府拟议开设工厂、修筑公路、开辟黄埔商港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整理省财政的计划、措施，对改善财政经济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省政府之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25年10月、11月收入较往年平均月收入“增长6倍有奇”。省政府在改善财政方面，虽取得成效，但也存在严重问题。如农村的正赋（田赋），多由一般地主、土豪劣绅、旧粮站差所包办，结果地主劣绅不用出粮，粮差则到处勒索。擅自收税仍然存在，不但地方官更加派加征，而且驻军也设局、设卡私抽税捐。许多不合理的捐税还未废除，当时“存在的税捐约有百种”，走私漏税也很严重。发展

生产、广开财源方面寥寥无几。由于开支庞大，财政收支不得平衡，亏欠累累。

广东省政府还致力于取缔危害人民的烟、赌陋习。7月初，省政府颁布了《禁烟条例》和《禁赌条例》，并采取实际行动禁烟赌。如查封烟馆、赌馆，没收贩运的鸦片和惩处贩运者等等。由于省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吸食鸦片及聚赌等恶习，得到一定控制。然而吸烟、聚赌等陋习并未得到根除，而私下种植、贩运、吸食者，就是在军界、政界也不乏其人。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发展生产，省政府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清剿土匪，掀起一个除盗安民运动。省政府除召开除盗安民大会外，还组织了省除盗安民委员会，主持除盗安民事宜，杨匏安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拟定全省绥靖计划；派军队到各区配合地方武装全面进剿；民政厅委派绥靖委员24人会同各军负责指挥各地除盗剿匪工作。为根除匪患，省政府一方面拟议先行筹备款项成立农民银行为垦荒资本，以安插失业者，再令地主实行“二五减租”，使农民不致贫而为盗；另一方面，编练四个劲旅，专充剿匪之用，并组织政治警察以杜绝土匪与反动派勾结。广东省剿匪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彻底消除匪患，在当时也只能是美好愿望，而无法实现。

广东省政府给予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省政府公开宣布：在这里“各种人民团体，对政治问题”，都有“自由讨论和建议之权”；保护保护农民工人利益，扶助其团体组织，以谋其发展。在省府下特设农工厅，具体指导农工运动及农工行政。由此，广东民众运动得以发展。但到北伐出师后，广东省政府就开始限制农工运动了。

二、广西省的统一和两广统一

1. 广西统一的实现

在广东省实现统一的同时，广西省在李宗仁、黄绍■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实现了统一。

1921年孙中山发动了援桂讨陆之战，结果桂军战败，陆荣廷等出逃。桂系残部不是化整为零逃匿民间，就是退到桂西的百色，桂北的黔桂、湘桂边，入山为寇，待机而动。不久这些残部，以及地主武装和占山为王的土匪等都打起自治旗号，于是广西自治军蜂起。他们借自治之名，各据一方，称王称霸，造成广西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给广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陆荣廷、沈鸿英等桂系首领趁广西混乱之机，先后于1922年9月和11月重返广西。陆荣廷出任北洋军阀政府所委任的“广西边防督办”职，不久又任“广西全省善后督办”。沈鸿英经过与吴佩孚进一步勾结，得到吴佩孚的支持。陆、沈都怀独占广西的野心，于是在广西发生了此两大军事势力你争我夺的战争。1924年夏，陆、沈为争夺桂林，激战3个月之久，结果使桂林人民“死于炮弹下者数百人”，“城内居民，咸迁徙山居”。战区一带，田园荒废，断瓦颓垣，使广西人民蒙受了更大的苦难。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结束此动乱局面，实现全省统一。

正当广西全省干戈扰攘之时，以李宗仁、黄绍■为首的两股武装力量在玉林、梧州崛起。李、黄是桂系军官，李宗仁是旧桂系将领林虎的部属，当孙中山援桂讨陆时，他已是桂系统领。旧桂系失败后，他率溃部潜入大山，后依附粤军，改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粤军撤离后，李宗仁在玉林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陆、沈重返广西后，改李宗仁部为“广西

陆军第五独立旅”，李不听命，以玉林为据点，统辖玉林、陆川、北流、博白、贵县、容县等县，自成系统。他网罗人才，招兵买马，整军经武，势力日渐强盛。黄绍■原为旧桂系将领马晓军部下，并随马依附粤军，时任营长，不久升为统领。当马晓军部被自治军击散后，黄绍■部投奔李宗仁，担任李部第三支队司令，驻兵容县。从此，开始了李、黄的合作。李、黄为谋取广西，进一步与广东革命力量建立联系。在粤军帮助下，黄绍■在梧州起义成功，梧州成为黄绍■的根据地。黄绍■在相继消灭了梧州附近的敌部之后，势力不断壮大，也成为称雄一方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随着李、黄势力的不断壮大，在广西形成了陆、沈、李黄三方鼎立的局面。此后，李、黄开始筹划肃清陆沈，以统一广西。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他们采取了各个击破即先陆后沈的政治军事策略。1924年夏，当陆、沈在桂大战时，李、黄乘虚攻陆后方，于6月26日占领省会南宁。后又联合沈鸿英在柳州消灭陆的主力。9月，陆荣廷宣告下野，离开广西。此后，在广西形成了李、黄和沈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峙。不久，李、黄与沈鸿英的战争爆发，在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所部陈济棠旅的支援下，于1925年2月中旬歼灭沈军主力。广西的旧桂系势力基本被肃清。这时，滇军唐继尧侵桂图粤的先头部队龙云部已侵入广西。广州大元帅府鉴于广西形势严峻，在命令李、黄力拒唐军南下的同时，并派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增援。李、黄在消灭沈军后，即回师全力驱唐。经半年之久，打败入侵滇军，龙云部于7月7日全部退回云南。至此广西全境统一。

广西省之所以能由李宗仁、黄绍■等新桂系实现统一，首先是由于旧桂系的政权腐败，它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其次，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也是广西统一的极重要的客观条件。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孙中山对李、黄给予关怀和支持，不仅使李、黄得到政治上的依靠，而且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出师有名。在经济上，孙中山也给李、黄一定的援助。1923年黄绍■赴粤谒见孙中山，在当时大本营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助黄2万元毫洋和2万发子弹。特别是在军事上，孙中山两次讨伐陆荣廷的战争给陆以致命打击，为李、黄独立发展、统一广西创造了一定条件；粤军的直接军事助战，使李、黄从梧州起义到消灭陆、沈的各次战役获得胜利；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助李、黄逐唐继尧部出境。这一切表明：广西的统一，是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实现的。而李、黄二人归附孙中山，揭起反桂系旗帜，则是广西统一的内部因素。黄绍■在梧州起义后，即接受孙中山任命，公开倾向广州大元帅府；李宗仁于1924年11月正式接受广州大元帅府的任命。李、黄从旧桂系中分化出来，归附广州大元帅府，虽然包含着借助革命力量，消灭异己、占据广西的意图，但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在客观上对广西的统一，以及两广的统一，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李、黄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统帅军队，结果是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也赢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援，从而在广东革命政府支援下统一了广西。

广西省统一后，国民政府于1925年8月4日令广西政府在改组之前，所有广西省军政、财政由李宗仁、黄绍■，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负责办理。李宗仁任广西省督办，黄绍■任会办。不久李宗仁、黄绍■在南宁设立广西省民政公署，黄绍■任广西民政长，于同年8月15日正式通电就职。

2. 两广统一和统一后的广西省政府

1926年1月，广东全省统一后，广东、广西统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6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等前往梧州会晤李宗仁、

黄绍■、白崇禧，谋求实现两广联合的步骤，并取得初步成果。2月，广西方面委派白崇禧为代表，赴粤具体商谈两广统一事项。为此，广州国民政府特组成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专谋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并核定桂省军队，应如何改编训练。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和白崇禧6人组成。两广统一会议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1）广西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现有军队全部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应编地方军与否及其数量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及由改组委员会拟具办法呈军事委员会决定；（3）凡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对会议决定，李宗仁、黄绍■来电表示“至诚领受，遵照实行。”^①6月，黄绍■按照国民政府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广西省政府机构，并电告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从此广西受辖于广州国民政府。

广西统一和两广统一，是广西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对广西省，而且对华南、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它结束了广西内部军阀长期战乱和分裂局面，有利于本省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而且为扩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提供了条件。

两广统一后，广西省政府按照“省政府组织条例”，将民政长独裁制改为委员制，由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分掌职权，重大事件由省政府会议决定。省政府进行了民政、财政方面的整顿、改革，较突出的是整饬吏治和整顿财政。在吏治整饬方面，广西省政府根据政治分会关于“刷新吏治，造成有建设能力与廉洁的政府”和“整饬地方行政机关”的方针，认为澄清吏治是广西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设立课吏馆，根据公布的“县知事审查资格暨荐委程序暂行简章”标准，审查县长资格；（2）设立吏治调查委员会，派员分季赴各区视察，考察吏治，分别优劣，呈报省务会议，以作撤留之参考；（3）根据“县官吏犯赃治罪暂行条例”和“知事官俸晋级暂行条例”对县官吏给予“惩罚或奖功”；（4）开办地方行政人员养成所，以养成地方行政人员，以刷新吏治，以实现民主政治。还曾设想召集乡民、县民大会，以进一步打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隔膜，以期人民与政府通力合作改造广西。这一切条例、设想，无疑都推动了广西的某些改革。但是，由于“政治不良，人才缺乏，尚未见若干成绩。”^②在整顿财政方面，主要措施是：（1）收入杂币，改铸新币，统一货币；（2）设立广西银行以活跃广西金融，保证现金充足及钞票之信用；（3）改良税则，废除厘金，撤销若干局卡，设各关监督稽查，以杜员司之中饱；（4）设立学校，以养成税务人才。由于采取一些措施，广西财政日上轨道，政府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经济落后，全省收入主要靠烟、赌两项，因之政府的财源无法巩固；同时支出较大，仍亏欠甚多。因此，广西省政府曾注意发展建设事业，当时曾提出：修筑公路，整理河道，以发展交通事业；开设工厂、经营矿山、恢复农业，以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办职业学校，以培养专业人才；整理市容，以利民众等等。

广西统一和两广统一后，政府对民众组织、民众运动，给予一定支持，因此，广西省一些革命组织得以发展。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1926年1月，国民党在原各地党部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广西省国民党党部。早在1925年下半年，梧州、柳州、南宁、桂林、贵县、玉林等地已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1926年1月，中共梧州地委（后改

为中共广西地委)成立,由谭寿林任书记。梧州地委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是当时共产党在广西的最高领导机关,成为广西革命群众运动的坚强领导核心。6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委员会。

广西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广西省国民党党部成分复杂,思想也较混乱,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但它毕竟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党员参加国民党党部工作。如梧州市党部就是在共产党人参与下组建的,9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5人,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人、青年、妇女部部长。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梧州市革命运动呈现一派新气象。共产党员陈勉恕参加国民党省党部的筹建工作。省党部成立后,陈勉恕、李省群分别担任青年部和组织部部长。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和省政府在成立初期尚执行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扶助农工的政策。公开宣称:对农工阶级一切运动“积极倡导,开诚指导”;对任何摧残者“国法俱在,绝不姑息”。因而,广西各地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尤以农民协会为盛”。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先后举办了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许多共产党员以农运特派员身份,到各地区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工作,使农民协会和会员有较大发展。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妇女、商民掀起了反帝、反军阀、反土豪劣绅的群众斗争。

广西省各级政府,在广西统一、特别是两广统一后,虽有较大进步,但步伐迈得不大。在民政方面,各县仍是官僚政客、封建乡绅当道。按选县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他在地方有声望,最好还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篇二是要他在地方上有相当武力,而且有相当胆量,与民团有良好关系”。结果当选者只能是地主豪绅、官僚政客。各级官吏“安插私人”、“侵吞公款”更屡见不鲜。在财政方面,“其下级机关,仍多为有力者所把持”。而且赌博的规费一直“作为军饷的重要来源” 。“民众饱尝滥发纸币的痛苦”。在群众运动方面,当真正的农民革命运动深入发展时,先后发生了多起地方当局摧残农运事件。就是广西省政府,对待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也是采取两面派态度。一方面,迫于形势,表面上不得不允许革命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限制他们的发展,并进行“矫正引导”,使其等“循己守法”,勿“超越常轨”,否则即“枉为‘赤化’、‘过激’等而被屠杀”。 以黄绍■为首的广西省政府,不是建立在民众势力基础上的政权,因而,潜伏着叛变革命的危机。

第五节 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一、批判戴季陶主义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但也有一些地主买办阶级分子混杂在其中。因阶级利益和对革命态度的不同，国民党内自然形成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之间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歧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激烈。

“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形势广泛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努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便扭转革命的方向。这使国民党又发生了新的分化，出现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领的新右派。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老右派互相呼应，加紧进行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这种反动政治需要，成为他们反共的理论纲领和思想灵魂。

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他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还在国民党“一大”之前，他就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表面上同意国共两党合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但大会闭幕后，他即离粤返沪，不愿就职。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戴即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规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所有党员务必“确实信守”，违者即“一律以纪律制裁之”。以此限制共产主义，约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言行。会后，他回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的理论著述，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6月，他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戴季陶借口“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阉割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内容，而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极力加以利用和夸大，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动理论，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在思想上，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歪曲为以“仁爱”为核心的“道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戴季陶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其“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完全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崇高伟大”，就在于他“用革命的功夫”，把被埋没了几千年的孔子民生哲学理论，“重新发扬光大起来！”他认为以“仁爱”为核心的“纯正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它“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只有它才能作为“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不能指导中国革命。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2.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戴季陶说，“仁爱是人类的天性”，“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即使存在“阶级的差别，并不是能够绝对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况且中国还没有阶级的对立，“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而应当用“促起国民全体觉悟”的办法，恢复他们的仁爱性能，“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他攻击中国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

3.在组织上，宣扬团体的“排拒性”，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凡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理论和政策不同，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同志”。他宣称，信奉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共产党却信奉共产主义，则与国民党格格不入，“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同时有两个中心”，成为“一个畸形的团体”，难以生存和发展。他把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视作“癌肿”，主张切除。他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退出共产党，作单纯的国民党员，绝“不可跨党”。

上述内容表明，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右翼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歪曲。由于它披上了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伪装，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而适应了“国民党右派反俄反共而苦于没有理论的需要”，成为他们修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在戴季陶主义的鼓动下，“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小团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右派刊物出版了，形成了一股新的反共逆流，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和最后叛变革命作了舆论、组织的准备。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共中央发表通告，号召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它作坚决的斗争。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也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的批驳。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指出：

1.中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心论的道统说，这是个严重的歪曲，是“要把一个死了不能自白的唯物的孙文主义，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金克木，水克火’式的东方的什么‘仁’的基础之上了”。这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而如果说它的哲学基础，那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说明：中国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由于这些要求是现实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才有“联合战线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这是唯物史观对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孙中山所以能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其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赋予革命的内容，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这正是由于他经过共产党人的帮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和指导的结果。中共北方区委指出：“中山主义是中山革命观，而不是孔子道德说；山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理论，而不是和平的道德学说”。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宣扬“纯正的三民主义”，其实质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¹，这“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它既不能“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更不能“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而只会“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²

2. 无产阶级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取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针对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这个革命本身既包含着“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戴季陶宣扬“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主张，借口民族斗争的需要而否定工农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³，使国民革命化为乌有。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说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之尊重工农群众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因为“‘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它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它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它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⁴。戴季陶宣扬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是极其虚伪的，“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⁵。他“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

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⁶

3. “戴季陶式的国民党”，决不是革命党。在批驳戴季陶

宣扬国共两党没有“共信”，便不能实行党内合作的谬论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在国民党是存在着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共信”的，那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正是两党所以能够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由于“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

存在”，戴季陶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⁷，企图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这也就是戴季陶所要建立的“纯粹的国民党”的目标。

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宣扬“团体是有‘排拒性’的”，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 CP 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 CP，消灭无产阶级政党”。他要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这种“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即“戴季陶式的国民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也“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走向胜利¹。戴季陶排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企图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独立”进行国民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这是“一个幻想”，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对这一理论的严正批判，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人们对戴季陶主义的愤慨。广州、北京、武汉等地愤怒地烧毁戴季陶的小册子，斥责他是“新右派”的头目。戴季陶自己也供认：由于“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国民党内许多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使他的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使他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们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²但由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缺乏深刻的了解，所以在论战中出现过某些弱点，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在国民党内，戴季陶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反动思潮，新老右派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共反革命事件。

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不久，以谢持、邹鲁为头子的国民党老右派，率先打出“反共清党”的旗号，并于 1925 年 11 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结成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小集团。

在国民党“一大”时，由于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伪装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三大政策，邹鲁、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谢持、张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在世时，他们还有所顾忌，对三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孙中山去世后，这群老右派便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加紧进行反共反苏，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5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了孤立英帝国主义，阻止北京段祺瑞政府同帝国主义妥协，决定派遣“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北上，到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真相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决定林森为总代表、邹鲁为秘书，限期率领代表团北上。邹鲁、林森从广州抵达上海后，即与谢持、戴季陶、叶楚傖、邵元冲等密谋，决定在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清党”。在上海、北京等地，他们到处搜罗反共分子，建立和发展“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并到处攻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散布“广东被赤化”、“如果国民党不举行清党，国民党就不存在了”等耸人听闻之词，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孙科、伍朝枢、邓泽如等则积极地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和孙文主义学会筹集活动经费。

1925 年 10 月 21 日，邹鲁、林森二人来到北京执行部，限该党部于两天内召集在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但会议内容又秘而不宣。执行部常务委员李

李大钊、于树德、恩克图巴、王法勤、丁惟汾等“以为这事破坏党纪，没有商量之余地”予以拒绝。谢持、邹鲁等恼羞成怒，遂纠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反动分子到北京执行部捣乱，并准备强占北京执行部。

这一事件发生后，北京执行部即据实报告国民党中央，痛斥“邹（鲁）林（森）等的违犯法纪行为。与此同时，谢持、邹鲁等人则联名发出“寝电”，极力洗刷自己捣乱北京执行部的劣行。11月16日，他们发出“铣电”，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于23日来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由邹鲁执笔，谢持、张继、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连署，给在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人发出长信，诬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煽动广州的国民党人和他们共同来做反共清党的勾当。但广州的国民党人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挑唆。

11月18日，邹鲁、林森、叶楚傖、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举行预备会议，由监察委员吴稚晖当主席。会上，在反共反苏、打击国民党左派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清党，何时清党这些方法步骤上，产生了分歧。由于吴稚晖、戴季陶等认为清党时机尚未成熟而受到“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分子的凌辱和威胁，戴便愤然离京返上海。吴稚晖出席第一次预备会后，也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国民党中央获悉谢持、邹鲁等人的阴谋后，即于20日开会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复电谢持、邹鲁、林森等人，指责他们非法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开会的反党行为“实为可耻”。并就邹鲁发表反共文章《告陈孚木文》一事，决定予以惩处：“一、邹鲁着北京执行部查办；二、邹鲁着即取消北上外交团代表”。

谢持、邹鲁及其一伙，对国民党中央的警告置若罔闻，悍然于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与会者，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仅有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和叶楚傖等8人；在5个中央监察委员中，亦只有谢持、张继2人；另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3人。“西山会议”从23日开始，到1926年1月4日收场，其间断断续续开会22次，由林森当会议主席。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通过一系列反动决议，主要有：（1）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2）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之国民党籍；（3）解雇鲍罗廷之顾问职务；（4）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1.开除党籍六个月；2.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5）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7）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8）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傖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9）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10）决定国民党此后对于苏俄的态度；（11）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

上述决议内容表明，“西山会议之目的及其主要的决议案，乃是反共反苏，乃是抛弃了孙中山的政策而采用了冯自由的政策”。会后，这伙右派

又在上海环龙路另立伪中央党部，并于 1926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非法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伪中央，而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更有组织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他们的反动行径，博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阵阵喝彩声。日本驻华公使致函邹鲁、林森，对他们表示支持。国家主义派头目曾琦肉麻吹捧他们为“真正信仰三民主义者”，表示“吾人对于纯粹国民党之清党运动，实不胜同情”，乐于为其进一步反共出谋献策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西山会议开会不久，11 月 27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佑任、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图巴，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即联名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出无论“就法理而言”，抑或“就时势而言”，西山会议都是非法的。宋庆龄通电谴责西山会议，她说：“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 67 号通告，指出右派西山会议通过开除共产派的党籍等议案“最为荒谬”，要求各级组织推动各地国民党党部“一致通电痛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广东、江苏、四川、江西、浙江各省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特别党部，广州、香港、澳门特别党部，南京市各区党部，上海市所属第一区、第二区各分部，以及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谢持、邹鲁等右派“在军阀势力范围之内，而开本党最高会议”，“迹近叛变”，“系留有阴谋，于本党前途与革命事业大有不利”，“其危险殆甚于反革命之敌人”，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立行制止，严加查办，以重纪律”，“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反党纪之非法会议”。从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发出通电之日起，仅一周之内，国民党中央就收到各地声讨西山会议的文电 20 多件。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言行。其时，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主编。在第一期《政治周报》上，全文刊登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重要文告，揭开了反击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序幕。在《政治周报》上，毛泽东开辟“反击”专栏，并用“子任”、“润”等笔名著文，专批西山会议派的谬论。他指出：西山会议派“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的最大本领”²；他们用“窝里反”的方法，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³。针对有人把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说成是由于“左派分子的操纵”，说成是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批驳了这种错误论调，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这是因为，“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什么左派的操纵。”他断言，“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⁴

在上海，恽代英和张廷灏等于 12 月 18 日联名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

严正指出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委员会是非法的。并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希望他能发表“公正之说论”，以壮我声势。柳亚子立即仗义执笔，载文痛斥西山会议派反革命所为。同年底，恽代英、沈雁冰等奉国民党中央之命，重新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同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斗争，“反右空气，弥漫域中”，“打倒右派”的呼声震撼中国大地，它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陷于孤立。原来打算参加西山会议或给予支持的一些右派分子如戴季陶、吴稚晖等，这时都表示不和西山会议派合作。一些列名西山会议派第二次大会的代表如叶楚伦、邵元冲等，也纷纷刊登启事表示不参加会议。这就为国民党从组织上处置西山会议派做好了舆论准备。1925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研究了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有关事项，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在“二大”上给他们以党纪处分，并决定由吴玉章负责大会筹备工作。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78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图巴、经亨颐等7人组成。大会秘书长由吴玉章担任。大会期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承担了主要的工作，他们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干扰和破坏，使大会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确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革命纲领，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大会强烈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大会秘书处共收到弹劾西山会议案60多件，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大会正式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给西山会议派分子作出如下的处分：（1）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2）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叶楚伦、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提出警告，如不接受警告即开除党籍。（3）大会训令戴季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在对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反动分子实施党纪制裁的同时，还进一步重申了党的纪律，强调指出：“森严的纪律，为党的生命所寄托。以后凡违反总理遗嘱，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各党部之决议者，应依总章之规定惩戒之。”这不但对国民党右派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现象，使孙中山逝世后被动摇了的国民党的基础又重新稳定下来。

国民党“二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正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指出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谴责了这个右翼，肯定了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人结成战斗联盟，从而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革命活动方针，使国民党保证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但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在中央执委中，中派、右派占了很大比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尤其是，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就为蒋介石后来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有

利条件。陈独秀等人不懂得，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首先必须掌握对国民党自身的领导权。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他们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自愿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反动气焰，而使“团结”归于破灭，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第六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

一、中共中央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革命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今后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了宣传教育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首先，中国共产党创办出版机构，并通过它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革命报刊和社会科学书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和研究、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192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上海书店承继了人民出版社的使命，竭力搜求全国出版界反映社会新思潮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贡献于读者。上海书店从开创到1926年3月被查封为止的两年时间里，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随着书店业务的增长，先后在长沙、湘潭、南昌、广州、潮州、安庆、青岛、宁波、太原、重庆等地建立了发行机关，在海参威、巴黎、香港等地设代售处。上海书店被查封后，中国共产党又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及长江印刷厂。长江书店和长江印刷厂除继续印行新青年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的一部分书刊外，还出版许多新书。长江书店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店。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设立了秘密印刷所，专印内部文件和刊物。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出版、发行机关，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战略、策略，批判各种反动思潮都作出了贡献。

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有《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杂志、《中国青年》周刊等。

《向导》周刊，是1922年9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它从创刊到1927年7月停刊，共出版201期。蔡和森、高君宇等负责编辑工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张国焘、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金斯基等都为该刊撰写文章。《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它注意研究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评述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宣传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各种反动政治主张和思潮。在实际斗争中，不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党的纲领和政策，而且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向导》创办共5年之久，到1926年4月间，每期总印刷量达2.9万份，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刊物。一些读者来信称颂《向导》“实是引导一班被压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之下的人向光明路上走的一盏明灯，实是真正能够解放一班被压迫的人们的言论”。它的“呼号——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

《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在上海出版第1期，至12月底共出版4期，后又改为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季刊问世时曾宣告于中国社会：“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它的最高发行量达1.5万份左右。《新青年》在介绍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国际，特别是苏俄共产党的情况和经验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虽然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有某些缺点，但它的功绩还是巨大的，在思想和理论上影响和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革命者。

《前锋》杂志，是1923年7月1日在广州创刊，至1924年4月停刊，共出版3期。瞿秋白任主编。它在《本报露布》中，明确地宣布其宗旨是在驱逐帝国主义，革除军阀政治，以图中国之振兴的国民运动中“当前锋”、“打头阵”。它是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在揭露帝国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很有说服力。

《中国青年》周刊，是1923年10月20日创刊的青年团机关刊物。先后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出版，至1927年6月，共出版167期。恽代英、肖楚女等曾任该刊主编。邓中夏、陈独秀、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等常为该刊撰稿。《中国青年》在青年学生、知识界和一部分工人中有很大影响力，发行量很快增至万册。它在分析中国实际情势的基础上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斗争中，特别是对国家主义派散布的反动观点的批判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它犹如闪烁在中国夜空上的启明星，指引广大青年前进的方向；它教育、培养了无数革命青年。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策略的宣传，共产党的许多地方组织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政治生活》、湖南的《战士周报》、广东的《人民周刊》、湖北的《武汉政治评论》和《群众》、河南的《中州评论》、陕西的《西安评论》、江西的《红灯》、山东的《晨钟报》等刊物。这些刊物，大都能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深刻揭露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党的斗争任务和方针。一些刊物还用一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刊载马、恩、列的译著。这些地方组织的刊物，深受党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导者和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战斗的武器。为了宣传教育群众，各条战线也创办了一些刊物，如《工人周刊》、《中国海员》、《上海工人》、《工农旬刊》、《犁头》、《赤女杂志》、《劳动青年》、《中国军人》等。它们都在各自的战线上，发挥了动员和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特别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明灯，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军师”。

《新青年》季刊称它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理论的指导；是各地劳动运动的事实的纪录”。它的发行对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共产党在领导重大斗争中，为推动斗争的深入发展和争取斗争的胜利，也创办了一些刊物。在“五卅”运动中，创办《热血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在省港罢工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了《工人之路》周刊，后改为《工人之路特号》。它们在宣传、鼓动群众，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推动斗争的顺利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更广泛地运用纪念会等活动形式，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活动。例如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6周年，《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发表了《马克思年谱》等文章。年谱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并列出了马克思著作8种，学习马克思参考书17种。1925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7周年纪念日，《中国青年》在5月第1期特刊中，发表了任弼时为纪念马克思

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通俗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26年，一些地方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纪念活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成立了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新青年》为此发表纪念文章。1924年列宁逝世，中国共产党以介绍列宁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地介绍列宁革命精神和列宁学说的活动。如在北京、广州及许多地区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纪念列宁特刊等。1924年2月7日，李大钊在广州举行的纪念“二·七”及追悼列宁大会上发表演讲，介绍列宁学说以及列宁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会上散发了纪念列宁的小册子。全国许多报刊、杂志刊载追悼列宁的文章。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上，翻译刊载了列宁的《中国战争》、《革命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文，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和《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较全面地介绍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当列宁逝世1周年时，一些刊物出版了列宁专号以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列宁逝世1周年纪念宣言，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李宁主义”，掌握这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再次，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由共产党人主编或参与编辑的国民党出版的刊物，刊载马克思、列宁著作译文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刊物主要有：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农民部主编的《中国农民》，广州的《农民运动》，上海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新建设》和《新民国》，潮州的《岭东民国日报》等。如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等文，曾在《中国农民》月刊上发表。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杨贤江、蒋光慈等都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和讲稿；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也在该刊上连载，如《空想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论》等。潮州的《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也曾发表《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第1章，译作题为《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举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以及农民、妇女、青年运动讲习所等阵地，向革命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各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使马、恩、列著作的中译本，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活动都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显著增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并逐步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党的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在1925年“五卅”运动后，迅速掀起的全国大革命风暴中，各个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势力都在革命历史舞台上，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中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说明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尖锐化。在这革命和各种思潮极其尖锐的斗争中，许多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

求他们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及时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实际经验，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以及动力等问题，进行多方面的

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这就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 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的认识。

这时，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与欧、美、日本进行的民主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与“辛亥革命的性质也不相同”，欧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瞿秋白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的种子”，因为它“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这时的共产党人已把国民革命同过去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各个阶级、阶层都在中国广大的政治舞台上表现了自己，从而共产党人也进一步分清了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们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领袖”；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和帮凶；北洋军阀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瞿秋白进一步指出：“国内军阀和国外强盗互相勾结”，“使中国人民永远陷于两重压迫之下，莫由自拔。”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实现国民革命的任务，必须组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但他们在联合战线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当时一些共产党人也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2.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

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动力，那么，谁能担任革命的领导者呢？对这个问题，共产党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24年7月，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介绍中国情况时说：“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这表明李大钊已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必须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邓中夏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述。他认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民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所以“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四大”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党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

经过“五卅”运动的磨练，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当时的斗争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在“五卅”运动前

后，在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邓中夏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认为这种争夺不仅局限于对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方面。他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参加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权“预为准备”。__“五卅”运动，共产党人从自身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无比重要性。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__瞿秋白更是写了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他指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__毛泽东也认为：“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也应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__面对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猖狂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一方面，确立自己在工人农民中的势力，取得对革命民众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的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国民党左派结成强大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__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3.对农民同盟军问题的认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五卅”运动的实践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__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探索农民问题。李大钊著书考察中国农民问题并指出：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__彭湃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家，他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好朋友”；工人与农民“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__毛泽东从1925年起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他在总结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经验基础上，对各个阶级以及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他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部分，并指出由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也不同。他特别精辟地说明：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贫农的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__他高度评价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这就要求：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自卫军，推翻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__有步骤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当时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4.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

在国民革命中，如何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妥协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并起过重要作用，而后却妥协动摇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性在实际斗争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从而为共产党人认识这个阶级的特性提供了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剖析，毛泽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还进一步将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左右两翼，以及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指出：其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必须“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特点的科学分析，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情况，为党后来深入地认识和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5. 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

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二大”和“四大”都曾涉及到。“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指出：“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由于时代已进入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而“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办法是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他强调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共产党人对以上诸问题的论述，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设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争取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就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国民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思想还不成熟，有些问题还不确切、不完备，彼此之间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论断，对农民各阶层的分析，工农联盟思想的阐述，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揭示，以及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特点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卓见等光辉思想，都代表了党内的正确主张，已表明他们提出了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随着“五卅”运动以来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在中国共产党内对革命领导权问题也存在分歧。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已有进一步认识，而陈独秀等人仍持消极态度。为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革

命的经验，确定今后斗争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局的报告，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发表了《告农民书》。会议还听取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议决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 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和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涨的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已明显地站在领袖地位，“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 and 主力军”。而由于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已经一天天地明显出来，这种分化的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因此，会议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导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方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会议在讨论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进一步分化问题时，陈独秀提议“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这时如果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将严重削弱国民党左派力量，右派将乘机夺取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因此，会议不同意陈独秀的提议，认为这时看不到右派的妥协，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但是，认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错误。”会议决定“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但由于受陈独秀的影响，决定将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分离称为共产派，并规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同时还决定：非必要时“新党员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些决定虽然否定了退出国民党，但显然没有准备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

2. 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会议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南部和中部省份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要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历史上的责任”。党应该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这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会议于10月10日发表了《告农民书》，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但这“须革命的工农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实现。当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应是：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遍选举法直接选举；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等。

3. 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的趋向，确定了党在职工运动中应采取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五卅’运动奋斗中得到一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并且比‘五卅’以前有了更深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又加以已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是不会因被压迫而消沉的了。”但需要“积累更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剧烈的斗争。”为此，这个时期，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方针主要是：要努力工会的发展及巩固，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同时不可忘了经济要求；要力争工会组织公开的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秘密组织之准备”；要通过党在工会中的组织，做宣传“使工会与党日渐有事实的接触”，“使工会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等等。

4. 分析了党组织的现状，强调了扩大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组织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措施。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指

导者，“应当指示群众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为此，要扩大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并决定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和党团。会议还决定设立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等机构。这也表明党已开始重视军事工作。

这次会议在总结“五卅”运动以来，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基础上，确定了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决定壮大党的组织、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等机构，为迎接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斗争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会议对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的严重意义，以及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没有足够的认识。

第七节 反对国家主义派和对甲寅派、现代评论派的批判

一、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五卅”运动前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同时，也进行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由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反动分子组织指挥的极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别。1922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是这个政治派别形成的标志。由于这个组织的名称长期保密，对外活动一直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目出现，又标榜所谓国家主义，故人们称它为国家主义派。1924年秋，他们开始在国内建立组织，并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反革命宣传的主要工具，开展所谓醒狮运动，敌人们又称之为“醒狮派”。

在初期，国家主义派把活动的中心放在法国，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等旅法中国共产党人，在《少年》、《赤光》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批驳了他们的谬论，“使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完全孤立。进步分子都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1924年国共合作成立以后，曾琦一伙“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他们“以哀者的心情，抱勇士赴难的决心，准备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以对付国际共产党在中国的动乱”。从1924年秋起，曾琦等陆续回国，把其活动中心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五卅”运动后，他们在《醒狮》周报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并发行书籍30余种，到处讲演，扬言要“宣传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举该党（指共产党）一切似是而非的邪说，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论上直无立足之余地”。国家主义派宣扬的谬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否认我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说，“中国旧式的封建阶级已因政治的平民化而早已消灭，新式的资产阶级又因产业落后而无从发达，因此，中国根本无发生阶级分化及对抗的可能”。污蔑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是“削足适履”，使“本来谐和之各界人士，必因之而大起斗争，驯至社会秩序骚然”，“减杀对外之战斗力”。主张在国家主义旗帜下，“一致趋赴，协力图强”，进行“全民革命”。

2. 在国家问题上，宣扬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国家不是任何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其作用在于“用实力以拥护道德”，“谋群众生活，防止阶级斗争”，“只有全民政治，才能实现国民政治机会均等，经济生活的均等”。主张维护打着共和招牌的北洋军阀政权，“以奠定国基”。

3.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岂得为友”的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不赞成依人为活的国际主义”。污蔑社会主义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把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说成是“引狼入室”。他们反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说“空嚷几声打倒帝国主义，不惟表示国民浮浅无知，对于国事没有相当的步骤，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谋我”。

4. 盗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们的所谓国贼，就是指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所谓“强权”，就是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把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的“倡乱”、“亲俄卖国”和苏联的“侵

略”，叫嚷“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

国家主义派同国民党右派狼狈为奸，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积极从事反共反苏反革命活动，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帮凶走狗，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忠实的弁护士。但由于他们打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以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相标榜，摇唇鼓舌，大造舆论，确曾使一些无知与落后的青年受骗上当。

为了肃清国家主义派的流毒，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和《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严肃的抵制。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批判国家主义派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肖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文中指出：只要“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产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他列举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以及工人反抗斗争的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和外国一样，不但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劳资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这是每个妇孺都知道的事实，醒狮派却“故意装做不见”，反而“硬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所鼓吹的”。肖楚女质问他们：“醒狮派既言国内尚没有阶级，则又何畏他人之主张阶级斗争？既言尚无资本家，则又何劳醒狮派为资本家着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并指出由于它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所以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是各异的。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戳穿了国家主义派否认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着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谰言。

对国家主义派宣扬阶级合作、“全民革命”的反动实质，共产党人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这是国家主义派企图使无产阶级“甘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谋自己阶级利益的斗争” ，“使得每个被压迫者，都成为很驯服的甘被剥削者” 。这“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充当剥削制度的卫道士。共产党人还指出，国家主义派并非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他们反对的只是工农群众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面对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是狂热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他们的全部反革命言行，“正足以见得他们从事于‘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地位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 。

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驳斥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肖楚女指出：“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 。国家主义派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宣扬所谓“均平利益”的“全民国家”，纯属欺人之谈，在现实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人不及共产党人有生命的危险二事看，就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 在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又有哪一国不是在德谟克拉西面目之下，实行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专政？

共产党人认为，既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自然也就无所谓超阶级的爱国思想。恽代英说：“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了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 。国家主义派“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无非是“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妨害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他们真正所爱的“国”，乃是北洋军阀政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但不爱，并非把它推翻不可。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领导人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组织新国家” ，建立“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的独裁制” 。

瞿秋白在驳斥国家主义派捏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就要搞“一阶级专政”、实行“共产”的谎言时指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谁都知道的”，他们这种攻击，“和其他攻击一样故意自制其‘共产主义政策’来做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理论上驳难共产主义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谣的伎俩来中伤” 。

3.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驳斥国家主义派鼓吹资产阶级

狭隘民族主义，破坏反帝斗争的谬论。共产党人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野蛮侵略，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发生反帝斗争，它就必然“是世界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革命运动，亦不能脱离国际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相互间之公友公敌的关系而单独发展” 。

同样，“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无产阶级共同作战，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 。肖楚女用“五卅”运动时各国无产阶级积极援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大量事实，驳斥国家主义派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岂得为友”的谬论。

共产党人在驳斥国家主义派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时指出：

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它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于“扶助中国民众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并发展民众的革命实力，使中国达到独立与自主的成功”。 正因为如此，“中山先生才诚心信俄”，“而欲与之一同来革命” 。国家主义派攻击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引狼入室”，其用心是十分刻毒的。瞿秋白指出：

“帝国主义者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大家想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功劳多么大！”

4. 揭露国家主义派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的反动实质。共产党指出，“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 ，是只反苏而不反帝的，因为他们主张“对于外国一切之现成条约，均照旧遵守”，公开声称世界上不存在“国际帝国主义”，甚至叫嚷“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他们所说的“内除国贼”，也是只除共产党而不除军阀的。共产党人认为，国家主义派如此疯狂地反对共产党，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御用的“单打最革命的共产党的镖手” ，是毫不奇怪的，这正是共产党的光荣。毛泽东在《政治周报 发刊理由》一文中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

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这是因为“他们唯恐中国革命运动因中国工农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之参加而有快的发展，所以拼命的反对共产党”，为的是“维持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统治”。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充当其反革命鹰犬。北伐期间，余家菊投在孙传芳门下当金陵军官学校教务长，替孙传芳制定过“三爱主义”；曾琦则斩头分尸的改名王奇，往来宁济之间，参加孙传芳的机要，并为张作霖造过“四民主义”。他们竭力反对中国人民进行北伐战争。当北伐开始胜利进军时，他们就恐吓革命人民说，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和华北一带，必然要引起英、日等国的干涉，并编造北伐必败的理由。及至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整个北洋军阀统治发生根本动摇时，他们又演出一场“拥护五色国旗运动”的闹剧。

纵观国家主义派的全部反革命言行，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剖析了它的阶级本质及其反动性。他们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指出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施，日事诬蔑破坏”，“近且于我国国民革命军势力进展中原之际，益加狂妄，为彼主人帝国主义者张目，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要求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

在同国家主义派斗争中，共产党人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对其反动头子进行无情揭露，坚决斗争；而对被蒙蔽的青年群众则努力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许多蒙蔽青年觉醒，纷纷声明抛弃国家主义和脱离其团体，有的还要求参加革命组织。

经过多年论战，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更以无情的事实宣告了国家主义派的彻底破产。到1926年下半年，其声势便一落千丈，终于走上了分崩离析的穷途末路。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它以马克思主义的辉煌胜利而载入史册，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场斗争：（1）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必须分清敌我，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把革命进行到底；（2）既彻底孤立了国家主义派，又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从而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3）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锻炼、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二、对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批判

甲寅派，因章士钊主编《甲寅》杂志而得名，是大革命时期一个有权势的反动文化派别。专以宣传封建旧文化，鼓吹复古倒退为职志。

章士钊是甲寅派的挂帅人物。1925年4月，他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部长兼教育总长。他加入北洋军阀政府统治集团后，成为段祺瑞的亲信，直接参与镇压爱国学生革命运动。他以教育部名义连续向北京各学校下达两道命

令，严禁学生在“五·一”、“五·四”、“五·七”集会游行。这些反动措施，激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公愤。5月7日，北京学生及各界群众举行纪念国耻游行，并赴章宅质问章士钊为何禁止召开“国耻纪念会”，结果遭到血腥镇压。9日，各校学生4000余人再次集会，要求释放学生，罢免章士钊。章在群众指责下，被迫辞职赴沪。“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爱国学生运动更为活跃。7月，段祺瑞又调章士钊再次出任教育总长。此时，章秉承段执政的旨意，采取一系列取缔、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8月，段祺瑞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扬言：“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11月，在章士钊主持下，教育部又通过了学校读经的决议，规定学生自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12月，章又亲自出面迫害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步教员，并派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警察强行接管北京女师大，大打出手，造成许多学生流血与被捕。

7月，章士钊还把已停办多年的“甲寅”月刊复刊，并改为周刊，作为“整顿学风”，钳制舆论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间，共印行35期，章本人在其中发表各类文章不下数百篇，其宣传内容不外是：在政治方面，颂扬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反对民主制度，反对革命，压制爱国学生运动。他们说：中国是“农村立国”，“重礼义，尊名分”，“科举取人” ，“代议制”不适合中国，“革命革命，无命不革，己命且莫之逸，遑言其他”，“共产共产，试问民穷财尽，尚复何产可共？” 污蔑爱国学生运动是“赤化”、“过激派”行为，是受“野心家”所指使，咒骂爱国学生是“横逆”、“暴乱”的“不逞之徒”，鼓动军警“切实查办”。

在文化方面，他们宣传封建旧思想，提倡尊孔读经、恢复科举制度，认为拯救“国粹”，“振兴东方文化，确是当今世界共通之业” 。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矫枉过正，流于极端” ，毁弃固有之文明，造成了“精神界大乱”；攻击白话文“故作不流乡曲之语”，是“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 ，谩骂做白话文的人为“今世文妖”，“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 。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说“所有德先生、赛先生、物观先生也，皆论也，而非法也”，用之于中国则“乱天下有余” ，说中国是“礼教之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尤格格不入” 。

甲寅派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人民强烈的谴责和反对。8月19日，北京50余校决定组织驱章同盟，开展驱章运动。上海、天津、广州等12个城市的报馆和学联通电响应。24日，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所属53个团体，发表了《为声援女师大致全国同胞海外侨胞通电》。8月26日，鲁迅等41名北京女师大教员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11月间，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政府，驱逐段祺瑞。11月28日，北京学生捣毁了章士钊等人的住宅。章携带全家避居北海公园，随后化装潜逃天津。

当时，许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莽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甲寅派的反动政治思想，指出甲寅派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弁护士，号召文化界联合起来同封建复古派斗争。鲁迅写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古文与白话》、《再来一次》、《这个与那个》等大量杂文，对甲寅派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指出，甲寅派这帮带有“欧化色彩”的封建士大夫，“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

习”，是“要新本领旧思想的人物”，是新的复右派__。鲁迅在批驳甲寅派的复古谬论时，阐述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他说：“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__，“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金人玉佛，……全都踏倒他”__。他对甲寅派宣扬读经的伪善面目和可耻用心加以彻底的揭露，指出他们不过是想“用旧习惯、旧道德、凭着官力将一切新生的力量压下去”__，另外就是给自己“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__

除鲁迅外，成仿吾、郁达夫、蒋光赤（慈）等也发表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各方面，批驳甲寅派的谬论。他们指出：白话文所以能“风行草偃”的流行，所以“不必假执政和督办的势力来强制”，其原因是它“顺应时代潮流”，“为大多数的头脑明晰者所赞同”__；是因为一般青年“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认旧文学为衰弱的象征，不是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__，这个“时代潮流”是孤桐先生所“不明白”的。

甲寅派是没落阶级的代表，理论空虚，思想腐朽，不堪一击，他们掀起的复右逆流很快被大革命洪流所淹没。《甲寅》周刊也于1927年4月停刊了。

现代评论派，是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因其出版《现代评论》周刊而得名。这个刊物是在胡适支持下，于1924年12月在北京办起来的，主要刊登政论文章，同时也发表一些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其主要撰稿人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周鲠生、徐志摩、唐有壬、石瑛、皮宗石、燕树棠、王星拱等被称为现代评论派。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思想领袖。

现代评论派并不是什么单纯的文化派别，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形式的团体”，其代表人物多为右翼学者、文人。其代表人物拥护段祺瑞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攻击人民革命斗争和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底至1925年初，王世杰、周鲠生等在《现代评论》上接连发表《时局之关键》、《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等文章，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为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制造舆论，鼓动孙中山向段祺瑞妥协。他们说，“在现今局势下，国民会议这个主张，却没有现成的地盘助他实现”；而执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则是今日“解决时局比较切实的一个步骤”，要人们“尽可大胆参加”，“不可徒持一味反对的态度”。与此同时，唐有壬、燕树棠等则鼓吹“借重关税会议，恢复中国关税自由！”妄图用召开关税会议分裂反帝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发生后，现代评论派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诋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陈西滢污蔑说：“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见到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__。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竟对满腔热情的爱国青年学生进行讽刺和打击，他说：“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他教训学生说：“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最要紧的是，“能立定

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把自己“铸造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周鯁生、燕树棠等也相继发表文章，攻击学生运动是“徒然盲目的冲动”，“不是真正爱国的态度”，咒骂学生和民众的反帝斗争是“恐怖烧杀的暴民运动”，“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应该受到惩罚”，煽动军阀政府出兵镇压。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派诬蔑学生是自投“死地”。为了替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军阀政府洗刷罪恶，他们竟称这一惨案是“‘民众领袖’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是中了共产党的“苦肉计”。

共产党人通过《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批判现代评论派的谬论。针对现代评论派散布对关税会议的幻想，《政治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谈不到，……什么自主都行不通，只有推倒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关税自主”。《中国青年》接连发表文章批驳胡适等人攻击反帝爱国运动的谬论，指出：爱国学生运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决非受人“引诱”而“跟着大家去呐喊”；反帝爱国“民众运动之勃兴，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加紧”所至，“这种民众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最大力量”，它使军阀“战心、寒胆”，“虽老牌的帝国主义者英吉利亦叫苦连天”。《中国青年》还揭露胡适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诱惑青年脱离革命运动的险恶用心，指出青年人若“不识世界潮流，不懂社会需要”，一味追求个人志趣，是决不可“铸造”成为“有用人才”的，将来也干不了真正的“救国事业”，告诫青年警惕胡适之类“指导者”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拖我们青年和他一路下水。”

鲁迅在《语丝》、《莽原》、《猛进》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锋利的杂文，对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军阀帮闲、叭儿狗的真面目。他说，胡适、陈源这帮伪君子，常以青年的“导师”、知识界的“领袖”自命，欺骗和愚弄“未经老练的青年”。其实，他们是“媚态的猫”，“比它的主人更厉害的狗”，是“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他们的反动作用，正像“走在—群胡羊面前”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其目的是“把青年引向歧途”，“稳妥平静”地“循规蹈矩”地听凭反动派的驱使，“虽死也应该如羊”。鲁迅还指出：“他们是羊，同样也是凶兽；但遇见比它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它更弱的羊时便出现凶兽样”。为了揭穿胡适等人引诱青年学生脱离社会运动而去“整理国故”，埋头于故纸堆的骗局，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写道：“少读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对陈西滢、徐志摩这类“恶意闲人”用“流言”替军阀屠杀人民造舆论，却又装出“公允”、“局外人”的假脸孔，作了无情的揭露。他说：“谣诼”、“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它和事实对照，看上去是可笑的，但它造成的结果，“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3月18日的惨案事件“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网罗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鲁迅以锐利的笔锋击中了现代评论派的要害，使他们“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让人们看清了这帮“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和“阴险”。

这场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锻炼了新文化队伍，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思想

的伟大转变。

第八节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一、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及其一伙制造了一个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第一军军权为目标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从开办黄埔军校开始，唱着联俄联共的高调，利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支持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发生后，他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壮大非常恐惧，对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中的发展，尤其感到害怕。他采取联合右派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方针，以篡夺革命领导权。在他阴谋篡夺党政军领导权的活动中，首先以夺取第一军的军权为目标。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即在军队中大力扶植右派势力，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的力量。1925年11月，蒋介石在他召集的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要把所有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以及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单交给他。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周恩来拒绝后，他又提出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军校和国民党。1926年3月8日，蒋介石再次表示：“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②他要寻找机会，制造借口，来打击排挤共产党。

随着蒋介石地位、权力的提高和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他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常以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自居，一心想当国民党领袖。他说：“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③又说：“我自信我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我敢说我可以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我可以做总理真正一个信徒。这句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④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存在，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严重障碍。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但要公开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蒋介石当时还是有所顾忌的。

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农运动正在向前发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还占有相当优势，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又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不满，本身实力又不足，他深感自己“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处境不妙，并为此忧虑抑郁至深夜而不能安眠。开始，他想“以屈求伸”，以退为进。后又改变主意，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搞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求“奋斗决战，死中求生”。^⑤于是蒋介石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对他毫无戒备，对共产党人采取了闪电式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早在3月初，蒋介石授意王柏龄等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为他发动反革命事变制造舆论。他们在军校和广州市区不断散布各种政治谣言，诸如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共产党准备倒蒋”，“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等等。10日，蒋介石则亲自登台，煞有介事地说：“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次显明”。^⑥并诬赖共产党员、军校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影射他为“新军阀”。蒋介石及其一伙造谣惑众，为其发动军事政变制造借口。

3月18日晚7时40分，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到海军局，交

涉派舰事。适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外出。海军局派传令带欧阳钟前往广州文德楼李之龙的寓所，就派舰事宜当面请示李之龙。又逢李不在家，他们便留下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给李之龙，该函写道：“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飭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云云。李之龙阅后，便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并用笺纸写了两道命令，一交宝璧舰黄舰长，一交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命令“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

19日上午7时，中山舰遵命开赴黄埔。当日，邹科长向军校驻省办事处补索要舰公函一封回海军局。该函称：“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两艘为要。” 当日，邹科长又报告李之龙：苏俄顾问询问中山舰是否在省城，说苏俄考察团想要参观军舰。李之龙即打电话请示蒋介石：可否调中山舰返省供考察团参观。经蒋介石允许，李之龙又下令中山舰于当日下午6时返固广州。章代舰长向李之龙报告，中山舰开抵黄埔后，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他不知道有此事，恐为日本商船谋事，可稍待后。后得李的电报及军校通知，才驶回省城 。

这时，蒋介石正因为与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而疑虑重重，担心有人要搞掉他。3月19日上午，蒋介石因同一个人三次给他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而感到纳闷。同时他对中山舰未得他同意而开去黄埔，又因他不在黄埔而要开回广州一事，也感不安。他怀疑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人要陷害他，可能要将他劫上中山舰，强迫他去海参威。于是，蒋介石经过犹豫之后决定进行镇压。当时王柏龄等人已到处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阴谋暴动”，“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

蒋介石就乘机于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悍然调动大批军警，宣布广州全城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火车站和中央银行，使广州大沙头、东山、北较场、东较场和惠爱路一带，顿时出现一片紧张恐怖气氛。在蒋介石坐镇指挥下，陈肇英、欧阳格派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由欧阳格的卫兵带领六七个人到文德楼逮捕李之龙，强行押解到造币厂。随后，陈肇英又派人到李之龙寓所搜查3次，把邹科长就派舰一事写给李的函件搜去毁灭。与此同时，二师师长刘峙和团长惠东升指挥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营长李森树率该营包围苏俄顾问的参谋部和住宅，收缴卫队武装，把苏俄顾问监视起来；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武装警察，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的住宅，并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团长蒋鼎文率兵占领海军局机关，解除该局武装；二师党代表缪斌则以集合该师全体官兵训话为名，当场逮捕了团党代表胡公冕等40多名共产党员，押赴造币厂看管。当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又派二师两个营的兵力赶赴黄埔，把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监视起来，并令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和军官团长张治中等人，“以防变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逮捕在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后，蒋介石得意地叫嚣：“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博得中外反动派一片喝彩和支持。香港总督金文泰欣喜若狂地在西商会议上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①帝国主义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办的英文、中文各报，连日来以显著的版面，醒目的标题报导这一事件，并鼓动蒋介石等驱逐在广州的俄国人，实行分共。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连忙致书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恭维他们“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主，于短时间僦平叛党祸国之分子。”^②3月29日，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开其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每至一段落时，全体皆鼓掌称快”，并以伪大会名义致电蒋介石，对其反共行径大加赞赏。帝国主义和右派都在积极地鼓动蒋介石彻底抛弃三大政策，破坏中苏两国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

事实说明，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推行戴季陶主义，经过精心策划，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击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反革命军事政变。这一事件表明，蒋介石已由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成为同老右派互相呼应的新的右派。蒋介石就是“武装的戴季陶”。^③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变，受到共产党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与谴责。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到苏俄军事顾问团驻地，会见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商讨对付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对策。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一切真诚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给他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他还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一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他还提出，首先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撤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④。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也认为，“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⑤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召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刚从东江前线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⑥。3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政府的阴谋”的谣言，并严正声明：“共产党员是努力于组织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政府的基础”，“共产党决计不会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革命的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革命学生在校内贴出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并联络各方面革命势力准备上街示威；在广州法政学校、南洋医科大学、女子师范等校园里，出现“打倒新军阀”的标语，影射蒋介石。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何香凝听到消息后，立即冲破重重岗哨的盘阻，来到造币厂要求蒋介石立即解除包围并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她指责蒋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背叛三大政策，对得起谁！”^⑦邓演达斥责蒋介石说：“三

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反革命。”柳亚子则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汪精卫对蒋也深感不满，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谭延闿、朱培德去拜访苏俄军事顾问季山嘉时，“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谭延闿还准备返回曲江二军防地，计划联合三、四军共同讨蒋。李济、宋子文等亦表示反对蒋介石的所为。

蒋介石受到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和谴责，陷入四面楚歌、进退两难的窘境。这时他发现自己权力毕竟有限，地位不稳，力量又不足，若继续一意孤行，势必一败涂地。他被迫释放了被拘捕的 50 多名共产党员，发还缴去的枪支，并表示中山舰事件只是一场“误会”，不认为“共产党有什么阴谋”。为了掩盖其反革命罪恶真相，蒋介石还玩弄了一系列骗术。他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请汪出山；把特别引人憎恨的亲信作为他的“替罪羊”分别作了处分，罢免了陈肇英、王柏龄、欧阳格、吴铁城等人职，以示其公允。为了迷惑人，蒋介石又说什么：“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明明是背叛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高喊拥护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在当时形势下，如果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以季山嘉为首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却从单纯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蒋介石武力占优势，不敢回击。总书记陈独秀在蒋介石的突然袭击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他错误地认为，“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决定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他甚至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强调今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方针。

4 月初，他派张国焘来广州代表中共中央处理中山舰事件一案。张国焘积极贯彻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在同蒋介石谈判时，张国焘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当时在广州考察的、以布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对蒋的反苏反共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在 24 日苏联顾问团举行的会议上，布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半暴动”。但是会议仍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顾问。布布诺夫在对《向导》记者的谈话中为蒋开脱。他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党之事发生，他本人并无反俄反共，……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委员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党确未有谋危及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4 月底，鲍罗廷和胡汉民回到广州。于是广州盛传胡蒋合作。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等反共口号，并向蒋建议逮捕鲍罗廷，全面反共。蒋表示不同意，并利用这一形势向鲍罗廷施加压力。鲍罗廷遂决定支持蒋介石以避免出现蒋胡合作反共的反动局面。在此情况下，汪、胡离粤。为谋与蒋介石妥协，鲍罗廷同蒋等会谈了调整国共关系等问题，达成所谓三项“君子活动”：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鲍罗廷同意支持北伐。

由于陈独秀、鲍罗廷等对中山舰事件采取右倾退让政策，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清算，反而轻易地达到了反共排俄、篡夺军权的目的。在4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取得了“考察任免”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各级党代表的权力，随即下令党代表“统统调回政治训练部来再行训练”，迫使250多名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季山嘉、罗加觉夫和拉兹贡等苏俄顾问被解聘回国，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也被削弱。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这一阴谋事件达到了打击、孤立和分化国民党左派的目的。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离粤去法国。汪精卫隐退后，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逐渐分化：“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解决现状，■徨无主”；“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 。谭延闿、朱培德等原来主张反蒋，这时反而赞成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俄顾问实行制裁。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填补了汪精卫出走后两项要职的空缺。

陈独秀等在中山舰事件上妥协退让，是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又一次大让步。从此，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更加猖狂起来，准备向我党和革命人民发动新的挑衅和进攻。

二、整理党务案

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了他精心炮制的“整理党务案”，从党务方面向共产党发动新的进攻，以篡夺国民党的党权。

4月1日，他乘中山舰从虎门返回黄埔后，即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商议处置广东政局的办法。他炮制了一项所谓“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并要求“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建议从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自中山舰事件发生以来的党政问题。他说：“自前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必要。” 会议接受蒋介石的提议，决定于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的新行动，在全会召开之前，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右派麇集广州，积极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制定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窜来广州活动。他们指使爪牙大量散布所谓共产党将要“宣布共产”、“将要没收商人财产”、要“暴动”等政治谣言；到处散发张贴“拥护西山会议”和“打倒国民政府”等反动传单，以此煽动群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唆使商人罢市，到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扰乱财政金融市场。与此同时，由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广东机器工会等组织，也加紧活动，公开反对共产党，故意在各种场合制造摩擦和纠纷，挑起两派工人、学生和群众之间的冲突和斗殴，破坏广东革命群众运动的团结和斗争。这时，蒋介石又忽然宣布戒严，军警梭巡，更使广州满城风雨，局势紧张，人心惶恐。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分子蓄意制造这种复杂而紧张的局面，为的是使共产党和“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周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发展”，使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不期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整理党务案’” ，接受蒋介石排挤打击共产党的苛刻条件。

这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就在蒋介石等右派的实际操纵下，于5月15

日至 22 日在广州召开了。会议选举谭延闿、蒋介石和谭平山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蒋介石担任首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会议期间，蒋介石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名，接连抛出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的第一个提案名为“整理党事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改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其内容是：第一，确定整理党务之四项原则：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第二，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联席会议：“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三、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四、联席会议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五、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六、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决议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八、联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此案通过后，国民党方面即推选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稚晖、顾孟余五人为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

蒋介石的第二个提案名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此案也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并改名为“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它规定：“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第三

蒋介石的第三个提案名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提议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监督党务进行。此提案通过后改称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它规定，“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本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中选任之”，其职权是：“（甲）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其主席；（乙）依照整理党务案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妥为保存；（丙）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之工作进行。”

蒋介石的第四个提案是他在大会上的临时提议，他主张：一、本党全部党员重行登记；二、各处党部须统一，无中央命令之党部应一律取消。此提

案经 20 日大会修正通过，定名为“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

显然，蒋介石及其一伙制造“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因为就其核心内容来说，就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不得占委员总数 1/3 以上，共产党员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员的指示须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才能下达，等等。这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进一步打击削弱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对蒋介石等右派制造的这一新的反共事件，毛泽东、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和与会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都竭力反对。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但党的领导人却又一次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继续采取右倾退让政策。

在鲍罗廷、张国焘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对于此项议案并未表示异议”。整理党务案被顺利通过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务上的大让步，也是第三次大让步。

蒋介石的“提案”被通过后，陈独秀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什么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6 月 4 日，他在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中竟然说：“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 3 月 20 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步，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又一次得逞。“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立即把老右派张静江捧出来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充当他的傀儡。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一无例外，全部辞职，大部分都换上了国民党右派政客。叶楚傖当上了秘书长，邵元冲当上了青年部长，甘乃光当上了农民部长。蒋介石自己则当上了组织部长（不久即由陈果夫接任）和新设立的军人部长。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领导机构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占据了极大优势，而共产党在党务方面则毫无地位了。

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借“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于 5 月 23 日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全面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坚定立场，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没有诚意”，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谋“一党的私利”等反动谰言。并指出：反革命政客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在革命内部搞分裂，都是破坏国民革命的最恶毒的手段。中共广东区委还指示所属组织对整理党务案要加以抵制，不把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并要加强、扩大工会和农会组织，加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群众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预防和对付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

但这时，蒋介石还不敢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而要暂时维持某种“合作关系”。一是因为他力量尚不足，还有所顾忌；二是因为还要继续借助共产党和工农的革命力量，借助苏联的援助，在北伐中做一番更大的买卖，以实现他取代北洋军阀充当全国独裁者的政治野心。蒋介石当时也承认：两年来联俄、联共，“对于革命势力的增厚，革命方略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对敌帝

国主义的影响，实有一日千里之势。由此观之，对于此二种势力，仍有联合之必要”。 他要利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威力继续为自己服务。因此，在“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大唱革命高调，表示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说他的“整理党务案”不是放弃国民党联合共产党的政策，而只是规定国民党联合共产党的方法，以此掩饰他右派的真面目，麻痹人们对他的警惕；另一方面则伙同陈果夫等右派，利用他们的地位和职权，加紧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排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攫取实权，以便等待时机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

第九节 工农运动继续发展

一、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五卅”运动后，工人阶级并未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摧残和压迫，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顽强奋斗，1926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潮。工人运动继续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工人组织之扩大与趋于统一。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工人群众的觉醒，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对自身解放的重要性。因此，工人群众纷纷加入工会，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日益增加；原来各自独立的工会组织，也逐步实现了同产业、同行业的联合，掀起了统一工会运动的热潮。据统计，1925年5月至1926年5月这一年中，全国工会组织从166个发展到400余个，工会会员从54万人发展到124万人。上海、河南、天津、北京、香港等地的总工会相继成立。在统一工会运动中，成绩最显著的是上海和广东、香港的工会组织。“五卅”前，上海工会组织甚少，更谈不上建立统一的总组织。“五卅”运动后，不仅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而且各行各业的工会迅速增至70余个，同性质的产业工会也建立起来，如纱厂、铁厂、印刷厂都成立了总工会。各级工会组织都统一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从事各项政治、经济斗争。1925年9月，上海总工会和各行业的工会组织虽被反动军阀所封闭，但它们不屈不挠，仍以秘密形式坚持工作；上海的工人阶级万众一心，“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在粤港地区，统一工会运动同样卓有成效。“五卅”前，粤港地区的工会组织大都处于分散独立的状态。省港罢工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导下，粤港地区“统一工会之呼声随之而高，异口同声要求一个统一的地方总组织”。于是，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东火柴总工会、广东运输工会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纷纷成立。广东的一些市、县也成立了总工会。1926年春，广州的工会组织发展到200个，有组织的工人达19.8万余人，在此基础上，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同年4月1日召开，显示了广州工人的大团结和统一工会运动的成果。与此同时，香港各分散独立的工会组织，也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实现香港工会组织之统一的号召，先后成立了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煤炭工人联合会、金属业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同年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纷纷建立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统一领导香港各工会为夺取反帝斗争尤其是省港罢工的胜利而斗争。

随着工人组织的扩大与统一，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在蓬勃展开。当时除省港工人继续坚持罢工外，上海、武汉、青岛、天津、济南、郑州、焦作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其总次数在200次以上，时间最短者一周，最长达数月，参加罢工者达80万人以上。以上海、武汉的罢工斗争为例。上海工人在“五卅”政治罢工后，又紧接着举行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仅在1926年1月至4月，上海丝业工人罢工斗争共18次，参加人数1.6万多人。“五卅”周年纪念后，上海的罢工斗争更为频繁和浩大，仅在同年6月里，就有7万工人罢工，次数达107次。在武汉，仅1926年5月至6月间，就先后爆发了武汉■口英国香烟厂女工为反对厂方以添设装烟机器为由裁除工人而举行的大罢工；■口日商纱厂工人反对厂方的压迫、虐待而举行的大罢工；汉口全体人力车夫为反抗汉口特别巡捕

打死车夫而举行的同盟大罢工等。这些罢工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五卅”后，全国工人运动能不畏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摧残和压迫继续向前发展，其原因除了在于工人的政治经济待遇低劣，迫使工人不得不起斗争外，主要的还在于：（1）工人已经有了自己直接的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工会总组织。这些总组织，不仅把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更加具体化，而且使工人组织的战斗力大为增强；（2）工人阶级经过一系列斗争，特别是“五卅”运动的锻炼，已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工人斗争较前老练了。

为了总结“五卅”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继续发展的工农运动的领导，制定新的策略，迎接北伐战争，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召开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大会召开前夕就致来贺信和祝词，号召工人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猖狂反扑的时期里，努力积聚力量，并与农民结成亲密的同盟，准备与军阀作决死战。中共中央的贺信为大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是统一工人阶级思想、准备迎接新战斗的誓师大会。大会由邓中夏致开幕词，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谭平山、鲍罗廷等分别作了报告。大会的重要报告有：《一年来职工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全国政治与社会状况》、《国民政府现状》、《世界革命状况》、《世界职工运动》、《苏俄状况》以及《全国总工会报告》、《省港罢工报告》、《工农兵大联合报告》、《出席职工国际经过报告》，以及各地代表团报告等。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这些报告和决议案回顾了第二次劳动大会以来全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分析了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现状，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等反动势力摧残人民，压迫民众的真相，并提出了今后发展职工运动的方针。

大会还发表了宣言，概括地总结了“五卅”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尤其是明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中最勇敢的先锋”、“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一支有力军队”；“农民是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者”。宣言号召工人阶级认清当前帝国主义与军阀等反动势力正联合进攻工人阶级的时局严重性，政治上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要求最低限度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济上要求最高限度的工作时间和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在国际上要与世界工人阶级发生联系。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朱少莲、何耀全、刘尔崧、项英等9人为常务委员。

二、广东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北伐战争前，广东农民运动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功绩之卓著，影响之深远为各省农民运动之冠。

1925年以后，随着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东的农民组织大力发展，并逐渐走上了全省大联合的轨道。东江和南路地区，随着军事的胜利，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起来；西江地区的农会组织不仅遍布各县、区、乡，而且具有大联合的趋势。中部和北部地区也相继建立了不少农会组织。据1926年5月统计，广东全省已有农民组织的县，从一年前同期的21个发展到66个，占全省县数2/3以上，其中23个县成立了县一级的农民协会；此时全省的农会会员从一年前同期的21万人增至62.6万多人。此外，为保卫农民协会，保障农民各项斗争的开展和维护社会治安，许多县还建立

和发展了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到 1926 年 1 月，全省农民自卫军达 3 万人。此时期的农民组织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当时领导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和组织系统逐步形成。1925 年 11 月 4 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彭湃为省党部农民部长；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林祖涵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并成立了有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毛泽东和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同年春，广东省农民协会特将全省划分为 7 个区域，分别在汕头、惠州、肇庆、梅■、韶关、海口设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领导的办事处：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惠州办事处、西江办事处、南路办事处、北江办事处和琼崖办事处，中路各县及广州市郊各级农会由省农协直接指挥。上述领导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与组织系统的形成，不仅加强了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而且使范围日渐广大的全省各级农会都统一于省农协的指挥之下，密切了各级农会间的联系，从而使广东的农民组织从过去同姓之组合变为了全省之大联合。

广东农民组织的大发展也伴随着农民斗争的大发展。此时期虽然农会组织普遍遭到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1925 年底至 1926 年上半年，不时发生反动势力摧残农会的血案，但是农民斗争并没因之而窒息，相反地它仍能在血与火中向广度与深度奋进。从斗争的广度来看，农民协会不仅在乡村开展减租减息、反高利贷剥削、抗捐税等组织斗争，而且还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禁赌、筑路、兴办学校等活动。广宁农军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表现尤为出色。广宁县是当时匪患严重的地区，1926 年初，当地的土豪劣绅为了破坏农民运动开展后社会上出现的安定局面，纠集大批土匪、民团封锁了当地主要河道，断绝交通，造成贸易中断，粮价上涨，人心动荡。为扭转这一动乱局面，广宁农会在西江办事处指导下，团结各界成立了“广宁人民维持治安委员会”，并以广宁农军为主力进行剿匪斗争，终于肃清匪患，恢复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深受各界民众的赞赏和广东省农协的嘉奖。从农民斗争的深度来看，农会的斗争已不光是停留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水平上，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反抗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改革乡村政治尤其是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政治斗争。广东农民在国民革命的几次重大政治斗争中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如：1925 年 6 月，各地农民协会响应省农协的号召，支援东征军迅速返穗镇压杨刘叛乱——东江各县派遣的 3000 余人的运输队与北江清远县 200 多人的运输队，为东征军运送物资；中路番禺县和广州市郊农军，帮助东征军侦察敌情；南海、顺德、宝安各县农民武装进城，枕戈待旦；西江广宁农军协助东征军切断滇桂军队西窜之路。当“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爆发后，全省农村中就有 50 万余人武装声援“五卅”运动，东江、南路、雷州半岛等地的农民主动协助省港罢工工友封锁沿海各港口、截留英日货，不少农民还踊跃捐款捐粮救济罢工失业工人。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与南征，同样得到东江和南路地区农民的大力支援，不少农民还献出了生命。

正是由于有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有共产党人借助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掌握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有从省农会到各办事处以至各基层农会自上而下的农民组织之系统化，加之有国民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才使 1925 年下半年到北伐前的广东农民运动仍能冲破反动势力的阻挠，得到迅速发展。

广东农民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南、湖北、广西、江西、

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北伐前后，这些地区建立了不少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日益增多，以湖南、湖北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到 1926 年 7 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20 万人，湖北全省农会会员也达到 7.2 万人。农民一经组织起来，便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和反军阀等经济、政治斗争。1926 年秋，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已从过去的秘密状态走向了公开大发展阶段。此外，江西等地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到 1926 年 6 月，全国农会会员共 98.1442 万人。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于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一次略具全国农民大会雏形的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214 人，列席代表 100 人。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等 11 个省的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有：《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会务工作报告》，以及各办事处工作报告。大会不仅对主要报告作出相应决议案，而且通过了下列有关农民切身要求的《除暴安良》、《惩办逆党》、《取消煤油专卖》、《取缔高利债》、《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等决议案。大会还发表了宣言。这次大会的主要报告、决议案和宣言，总结了省农民协会成立以来广东农运的经验，指出广东农运在国民革命中占“最主要的地位”，“它“已惊起全国农民运动”，“推动了中部、北部尤其是毗邻广东各省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大会号召全省农友要更努力团结起来，“与革命民众联合，尤其是与工人联合奋斗”。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罗绮园、阮啸仙、彭湃、黄学增、周其鉴、韦启端、杨其嫻、钟耀龙等 13 人为执行委员。

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把北伐与农民自身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指出“这次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就是大半解决农民问题。故北伐与全国农民运动是一致的”，“并提出要“拥护国民政府，肃清全国的军阀。”大会还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起，于 5 月 17 日联合组成 500 余人的请愿队伍，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北伐，并严正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口号。

工农运动的继续发展，对广东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6 年 5 月 1 日，一次体现教育界崭新面貌的会议——第六次广东省教育大会在广州市举行。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决议案是《新教育宗旨案》和《工农教育案》。《新教育宗旨案》把“注重平民化、革命化，以完成国民革命”定为教育宗旨；《工农教育案》明确表示广东教育界“已下了很大决心，将要培植一班有力的革命势力出来。”这次大会还致电与其同时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表示誓与工农群众永远携手前进。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省教育界要努力实现教育的平民化、革命化；拥护国民政府和工农群众，以全力促进工农教育案的实施等。

在工、农、教育各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浪潮推动下，广东商界也不甘落后。他们深感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压迫之苦，以及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之必要，并且日益认识到只有“一致团结，筑成坚固统一战线”，“才能把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打倒之。因此，他们也努力赶上国民革命的潮流，注重与工农各界的大联合。1926 年 5 月 11 日，广东商界联合会、省总商会、市商会和市商民协会联合邀请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以及第六次广东省教育大会的代表，在广东大学举行了工农商学联欢大

会，并一致通过了《组织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决议案和取消煤油专卖、除盗安良、设立劳资仲裁机关和肃清贪官污吏等 7 项切合人民利益，有利于北伐成功，有利于革命基础巩固的决议案。为实现上述决议案，又组织成立了“工农商学联合会”，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任委员。5 月 20 日，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各界代表 8 人组成的主席团，作为工农商学联合会的核心机构。主席团设宣传部、总务部，邓中夏为宣传部主任。工农商学联合会产生后，本着“建立巩固的工农商学联合战线，保护人民利益，拥护国民革命基础” 这一宗旨，努力促进 7 项决议案的实施，推进各界民众的大联合。如：选派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采纳 7 项议案；并通过请各界名流撰文登报、大量印发和四处张贴该会的决议案和有关标语、画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意义。5 月 30 日，国民政府颁发了重要命令，表示完全采纳工农商学联合会的 7 项决议案，各界民众为之振奋。为欢庆这一胜利，工农商学联合会于 6 月 14 日召集了 1000 余个团体、30 万群众，在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和游行，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誓达国民革命成功，把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活动推向高峰。在广州各界革命势力大联合的影响下，广东省各县纷纷成立了工农商学大联合会分会。工农商学联合会分会的产生，表明各县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这是广东以至全国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反映了北伐前夕广东国民革命势力的空前团结，成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强大后盾。

为培养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发展全国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1926 年 5 月 3 月，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正式开学，所址设在番禺学宫（即现在广州中山四路 42 号），毛泽东任所长。学员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奉天等 20 个省区共 327 人。

第六届农讲所在吸取前五届农讲所办所经验的基础上，办得更有成效。办学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聘请革命运动中的骨干组成优秀的教师队伍。在教师中，共产党员占多数，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李立三、周其鉴、张秋人、安体诚、赵自选等。此外，林伯渠、陈延年、阮啸仙、邓中夏、郭沫若、谭平山、张太雷等也曾到所作报告。（2）注意密切结合农民运动实际设置课程。为了向学员灌输国民革命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的理论，本届农讲所开设了“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农村教育”、“帝国主义”、“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苏俄状况”、“中国史纲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 25 门课程。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程。他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和革命目的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得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的结论。周恩来和彭湃分别讲授了“军事运动与农民问题”和“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3）注意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为了使各门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学员在短期学习期限里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这届农讲所采用课堂讲授和课外辅导、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式教学法进行教学。在学习期间，学员们不仅组织农民问题研究会，还结合研究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农讲所组织学员到粤北曲江和东江

海陆丰县进行实地调查和实习，大大增加了农民运动的感性知识，加深了他们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坚定了他们毕业后从事农运工作的决心。

农讲所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而且有紧张严肃的军事文化生活。为了使学员“学成后之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__所内设立了军事训练部，学员入学后实行军事编制，组成1个总队，下分两个中队，各中队下设6个区队，赵自选任总队长。学员军训时间占全部课程的1/3。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员既学到武装斗争的本领，也培养了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精神。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革命高潮的掀起，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提前结业。他们经过农讲所这一革命摇篮的培育，如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全国各地。第六届农讲所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也随之显示出来。

三、青年、妇女运动继续发展

“五卅”运动后，全国学生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为了确定全国学生运动的策略方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于1925年6月28日至7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宣传部主任恽代英分别主持了会议。大会号召全国青年学生要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并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普及到全国民众中去。大会还要求学生“与全国农、工、商、兵各界民众建立广大的联合以巩固并扩大民族运动的力量。”为此，各地学生组织应援助当地工人、农民，组织有力的工会和农会。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议决案》、《学生军组织问题议决案》、《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同胞事件议决案》、《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等议决案，并订正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章程》作为统一学生组织的具体规定。大会为“五卅”运动后全国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规定了正确方向。

大会后，许多地方成立了学生军；广东、广西、云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相继召开了全省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全省学生联合会。原有的四川、湖南、浙江等省学联，也依照大会规定作了组织上的整顿。经过整顿充实，到1926年初，全国学生总会领导的，已有16个省市级学联，320个县市级学联。组织上的整顿和发展，使一度消沉的全学生运动再次高涨起来，并从偶发状态逐步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

为了制定学生组织在这时期的斗争策略和部署工作，全国学生总会于11月3日在北京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学生的历史使命，是代表全国被压迫民众的利益，结合一切革命的力量，破坏封建社会的遗留物，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中国！”重申了全国学生总会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反对关税会议，支持反奉斗争的坚定立场。11月28日，“首都革命”爆发时，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在共青团北方区委直接领导下，和工人一道英勇斗争、冲锋在前。与此同时，湖南、湖北、四川、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青年学生，为抗议军阀政府查封学生组织，用暴力摧残学生运动的暴行，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有鲜明政治内容的罢课斗争。

随着青年运动的发展，共青团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到北伐战争前，共青团已建立了北方区、豫陕区、湖南区、广东区和浙江区等5个区委，湖北、四川、山东等46个地方团委，140个特别支部，团员达1万多人。

学生运动突飞猛进，招致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恨，它们联合起来，从各方面加紧对学生运动的反扑。一些地方的学生团体被封闭或禁止，学生领袖

遭通缉、逮捕，游行集会被禁止。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共青团团结广大青年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3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书》，要求各级团组织努力扩大这次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到工、农群众中去，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准备与吴佩孚、张作霖及英日帝国主义作一决死战争。”

为了加强学生自身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各级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一系列艰苦耐心的工作，青年运动和学生组织不断发展。到1926年6月，全国学生总会领导及影响的学联组织，已遍及除新疆边远地区以外的20多个省市。

“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几千年来深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封建礼教束缚的广大妇女群众，第一次广泛地发动起来，成为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出现了以工农妇女运动为主流的第一个高潮。

在上海，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及杨之华等人，以上海女界国民运动促成会为主，联合其他妇女团体，于1925年6月成立了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推动上海妇女运动深入发展。为了加强女工中的工作，共青团组织动员上海大学等学校女生深入纱厂和丝厂，结合反帝斗争在女工中开展宣传工作和帮助组建女工组织。并通过平民夜校、女子学校等提高女工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培养了一批女工中的积极分子，从而在上海建立起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联合战线。

广东是当时妇女运动的中心，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省妇女运动不断深入发展。1925年12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通过了《本会与国民党妇女部合作的决议案》。共产党员邓颖超、蔡畅等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各县帮助成立妇女协会分会，开展妇女工作。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实际上成为国共两党妇女领袖密切合作的、以工农妇女运动为主的妇女运动的核心组织。1926年3月，召开了省港女工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制定新工厂法提案》、《女工保护法提案》、《拥护省港罢工提案》。这些提案获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同意，成为该大会决议案的一部分。广东妇女运动帮助和支持了省港工人大罢工，省港罢工工人的斗争，也促进了广东妇女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妇协代表大会召开时，除全省许多地方建立了广东妇协分会外，还先后组织了车衣、缫丝等女工工会。在这些女工工会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相继取得胜利。在海丰、陆丰县还建立了农村妇协组织。8月，广东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这时广东妇协已发展到24个分会，会员4000人，成为广东妇女界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支队伍。

此外，京津等地的妇女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也不断向前发展。长达8个月之久的北京女师大学生的复校斗争，成为反段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学生复校斗争的胜利，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一“为全国女界争人权”斗争，推动了各地妇女运动的开展，对北方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产生积极影响。

第十节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郭松龄倒戈反奉

一、“五卅”运动后北方工农运动的发展

“五卅”运动后，北方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反帝怒潮的激荡下发展起来，罢工斗争不断发生。

1925年7月6日，英商福公司河南焦作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提出了承认工会；保障工人工作；增加工资等项要求。工人们坚持了长达8个月的斗争，终于迫使资方答应工人的要求，取得罢工的胜利。25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虐待举行罢工，遭到张宗昌的镇压。同月下旬，天津海员工人举行罢工，坚持斗争3个月。8月6日成立了由海员、纺织、印刷等20余个工会组成的天津总工会。

8月6日，北京英国使馆中国员工举行罢工，并于17日举行示威游行。7日，郑州豫丰纱厂4000名工人为争取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等条件而举行罢工，资本家雇用流氓捉拿工人上工，被铁路工人遇见，与流氓论理。军警向工人开枪，打死2人，重伤9人，轻伤70余人。工人坚持斗争，资方被迫承认工会所提条件，罢工取得胜利。9日，焦作中原公司煤矿工人5000余人为了增加工资和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等项要求未得答复而举行罢工。同日，天津宝成纱厂工人为反对监工虐待而罢工，美国资本家枪击工人，重伤2人，轻伤10余人。10日，天津太古、怡和各码头2000余工人罢工。11日，天津日商裕大纱厂工人为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而罢工，遭到日本资本家和李景林所部军警的屠杀，死8人，伤多人。12日，天津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举行示威游行。同日，天津宝成、裕大、裕元等厂工人举行抗议集会，李景林派军警包围会场，杀害工人，工人死60余人，被捕400余人。16日，北京各群众团体约5万人，为追悼青岛、南京、天津死难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9月7日，北京工学商各界数万人举行“九·七”国耻会，纪念辛丑国耻，通过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召开真正国民会议等提案。同日，太原110多个团体，约2万人，举行“九·七”纪念大会和游行。郑州等地也举行了“九·七”纪念大会。13日，开滦赵各庄矿工1.3万人因矿主压迫，工人领袖被捕，工会被封而举行罢工，遭到军警镇压而被迫于16日复工。28日，郑州、东三省电报局员工与上海、扬州等地电报局员工为加薪和整顿电政等要求未获交通部答复而罢工，并取得胜利。30日，哈尔滨成衣工人因聚丰农庄殴打工人和工资不足维持生活而举行罢工。

在北方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时，北方农民运动也开始兴起。1925年6月，河南焦作周围各县农民经学生发动，投入了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修武、泌阳两县有20多万农民到焦作矿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8月，河南信阳柳林镇、荥阳水磨区首先成立了农民协会。至10月间，中国共产党人已在河南10个县开展农运工作，并已经组织了15个农民协会，有会员4000以上。至1926年初，杞县、许昌、长葛、睢县、彰德、修武、郾城、汲县、郑县、开封、洛阳等10多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其中荥阳、信阳、杞县、许昌4县及14个区、284个村（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20万人，农民自卫军6万人。

河南农民组织起来后，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26年1月，杞县农民自

卫军万余人开进县城，向县公署提出废除该县特别捐，改组公款局，地方财政公开，清理以前地方公款等 11 项要求，取得了部分胜利。4 月举行了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河南省农民协会。这时，河南农民协会数目和农协会员人数仅次于广东^①。河南农民运动居于全国前列，当时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②”。

在山西，农民运动也初步开展起来。至 1926 年 2 月，赵城、临汾、静乐、离石、定襄等 13 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的组织，“全省共有正式县协会 7 处，可成立者 11 处，会员人数共约 3 万人之谱，可以影响 20 万人。”^③

与此同时，在直隶的天津、顺义、玉田、乐亭等地，山东的禹县、淄川、广饶、寿光等县，陕西的渭南，以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农民运动也初步开展起来。

北方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和国民军倾向革命而不干涉工农运动；在主观上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了组织，又通过国民党进行了有力的领导。这时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的李大钊和担任学生部长的于树德派遣了一些共产党员到北方各地建立国民党党部或担任国民党党部执委。如冯品毅、马文彦、张霁帆、刘少猷、杨介文被派到开封、郑州、信阳、彰德等地建立市县党部，陈毅被委任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等。

二、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和“首都革命”

1922 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关税应照实价采取值百抽五的原则，只是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政府得召集有关各国举行关税会议，商讨筹备裁厘，并在裁厘前加征值百抽 2.5 的附加税作为过渡的办法。1924 年 4 月，北京政府向有关各国正式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照会。各国以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不同意召开此项会议。次年 7 月，金法郎案解决后，法国批准了九国公约。这时，段祺瑞政府为加征 2.5 的附加税以解决财政问题，急需召开关税特别会议。有关各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维持关税协定制度，打消中国人民关税自主的要求，也需要召开这项会议。段祺瑞政府于是在 8 月 18 日向有关各国发出举行关税特别会议的正式邀请。

1925 年 10 月 26 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中、英、美、日、意、法、比、葡、荷、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 13 国全权代表出席。中国以外交总长沈瑞麟及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为代表。沈瑞麟被推为会议主席。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就提出了以下建议：“一、与议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实行，但至迟不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则除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开始征收。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④但由于在会前英、美、法、日四国已商定以二五加税为限，并须对加税用途附有一定的条件，故各国代表拒绝接受以上建议。美、日代表虽表示可以承认关税自主，但必须以裁撤厘金为条件，同时他们采取延宕手段，主张中国关税自主应在三年或五年后实行。会议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未多讨论即转入讨论裁厘办法和附加税税率和用途。美、日两国代表坚持附加税不得超过二五，并须对附加税指定用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有条件的关税自主，而段祺瑞政府则向帝国主义屈服，由代表王正廷于11月3日发表裁撤厘金宣言，表示“裁厘一事，将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一日以前完全实行。”¹ 各国代表遂于11月19日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其中规定：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同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声明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即1929年1月1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²

但是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厘金是各省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军阀割据局面不改变，裁厘就不可能实行。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议案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此后因时局混乱，段政府岌岌可危，关税会议时断时续，没有具体结果。至1926年4月段政府垮台，出席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随之逃亡，关税会议也就开不成了。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声称“决定暂时停止会议”。至此，关税会议毫无结果而告终。

关税会议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召开的。会议之前，1925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向导》和《政治生活》发表了《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关税会议与民众政权》、《帝国主义与关税会议》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企图借此会议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段祺瑞政府则企图垄断二五附加税；号召人民争取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并强调“在关税自主运动中，更不要忽视了民众政权的斗争。”³

关税会议在北京开幕前一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200多团体3000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运动大会，会后游行，散发传单20余种。次日，关税会议开幕，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召集北京180余团体，130余大中学校2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游行队伍散发传单100余种。11月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关税自主决议案》，要求关税会议只能讨论无条件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的问题。5日，新闻界关税自主促成会举行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6日，北京各大学教授关税自主促成会成立，并自10日开始由马寅初等轮流在各校举行关税自主问题讲演。10日，北京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与广东外交代表团等发起成立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并于同日举行第一次示威运动，通电全国采取革命行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还向段祺瑞发出最后通牒，令其即日下野。11日，广东外交代表团召开北京各团体各大学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关税自主三项原则：一、“无条件地收回中国自定海关税率权”；二、“中国自行保管税款及中国自定税款用途”；三、“中国自雇用洋员应不基于国际协定之束缚”。⁴ 13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对关税会议宣言》，提出“此次会议当要求完全关税自主”，但国民对于北京政府不能信任，因此，“会议应有本党政府参列”。⁵

关税会议于11月19日通过的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进一步暴露

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对关税自主的真实意图。中国人民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更加高涨。11月22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召开了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北京警厅派军警包围了各集合点，禁止集会游行，群众与军警搏斗，伤100余人，终于冲出包围，2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了集会，通过了关税自主决议案，要求绝对无条件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同时还通过了“民众自由”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在此前后，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迅速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10月18日，上海市民8万余人在闸北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关税会议。会上散发传单数十种，会后举行示威游行。26日，天津关税自主运动市民大会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有天津总工会、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等50余团体及各学校参加。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关税会议和组织关税自主运动大同盟的决议。会后举行游行。31日，湖南学生联合会致电段祺瑞，指出其违背民意召集关税会议，又纵警捕殴爱国群众，全国公愤，要求“惩凶释囚，停止会议进行”。11月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工学联合会等团体5万余人在武昌举行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通过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通电，会后游行示威。

此外，南京、广州、重庆、长沙、郑州、芜湖等地群众也先后举行大会、示威游行，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关税会议。

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促进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11月下旬在北京爆发了被称为“首都革命”的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群众革命运动。

在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中，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嘴脸进一步暴露，广大人民群众对它十分痛恨。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联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把群众运动推向以推翻段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斗争。区委发动北京各团体积极准备，并决定于11月28日开国民大会，逼段祺瑞下野。

11月28日下午，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约5万人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会场高悬“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的标语。大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报告大会宗旨“在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会后群众即整队出发赴执政府，迫段祺瑞下野。游行队伍以上书“首都革命”的大红旗为前导，工人、学生多手持木棒、长板等武器，沿途高呼“收回关税自主权”、“建设民众政府”、“驱逐段祺瑞”等口号，并散发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言》、《北京总工会宣言》等传单五六十种。国民军派出两个连随大队游行，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到达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时，因有国民军守卫，阻止入内，未能进入段宅。群众当即开大会，议决：“（1）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2）组织国民委员会的政府行政权。国民委员会之责任：（甲）对外极力谋国际平等地位。（乙）对内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及言论集会之自由。（丙）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大会并决定29日下午在天安门再开国民大会。游行群众随后分赴教育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以及梁鸿志、曾毓隽等人住宅，将杂物捣毁，同时纵火烧了警察总监朱深的住宅。

29日下午，北京群众5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大会通过了“即日起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责成国

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惩办卖国贼，先行查封其所属财产”；“由国民通缉卖国贼，听候国民公判”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少数群众冲入晨报馆，纵火烧毁了该馆部分房屋。

“首都革命”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__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向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致敬，并号召国民党党员“站在民众前列，为民众之领导与护卫。”__全国总工会也号召全国人民“乘机推倒卖国殃民之段政府。”__12月间，南京、上海、包头、广州、武汉、郑州、长沙等地革命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支持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

但是，这次北京人民的斗争，由于国民军上层人物改变了态度，没有达到驱段的目的。当时冯玉祥认为，如段下台，无人可代替，将导致混乱。同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等人造谣说共产党要在北京成立工农政府，赤化中国，也促使冯等改变态度。27日，冯致电段祺瑞表示拥护他，同时指示鹿钟麟拥护执政，维持治安。于是鹿也改变了态度。

“首都革命”虽未实现驱段的目的，但它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它沉重地打击了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使北京革命群众经受了锻炼，并将全国反奉倒段运动推向高潮。

三、郭松龄倒戈反奉和国奉战争

正当“首都革命”酝酿之际，11月23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发出了反奉的通电。郭松龄倒戈反奉是与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联的。

“五卅”运动以后，奉军再度南下，进驻上海，镇压上海群众革命运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迅速兴起。奉系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继续向南扩张势力，随后又取得了江苏、安徽两省地盘。奉系在东南的扩张，使浙江孙传芳受到很大威胁。孙于是积极联络反奉势力以对抗。他一面派员与冯玉祥、岳维峻联络，达成共同对付奉系的协议；一面与江苏、安徽地方部队陈调元、王普等联络，从苏皖内部进行分化活动。并派代表去岳州敦请吴佩孚出山领导对奉战争。10月间，孙传芳准备就绪后即准备向上海、南京奉军发动进攻。

这时，奉军从北至南形成了一长蛇阵，有被国民军拦腰截击的危险。为了缩短战线，保全实力，决定退出苏皖。10月14日，奉军从上海撤退。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浙奉战争爆发。16日，孙军占领上海。苏皖地方部队皆起而讨奉，奉军被迫迅速北撤。20日，孙传芳到南京，派部队追击奉军。23日，占领蚌埠，奉军退往徐州。

在孙传芳、萧耀南等敦促下，吴佩孚于10月21日到武昌，随即在汉口成立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吴佩孚所最痛恨的是冯玉祥，对讨奉并不热心，但借讨奉之机东山再起。张作霖见到长江流域各省形成了反奉联合战线，又受到国民军截击的威胁，于是转而改变压迫国民军的态度，以缓和与国民军的矛盾。而冯玉祥看到吴佩孚东山再起，就对奉军暂不采取行动，以观时局的发展。

11月8日，孙传芳军占领徐州。至此，孙不再北进，而由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进攻山东和直隶。国民军一路由兰封进攻鲁西，一路经徐州进攻鲁南。前一路进展顺利，11月底，前锋进至济南城外。后一路则未积极进攻，因此路主力为吴佩孚旧部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个师，此时吴佩孚已与张宗昌勾结起来一同对付国民军，故令此三师按兵不动。于是张宗昌得以集中兵

力对付进攻鲁西的国民军，使国民军在山东的进攻受阻。至于对直隶的进攻，则由于奉系同意让出保定、大名，国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保定、大名。

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高涨和奉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奉系内部起了分化，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的重大事件。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6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时，受到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的敬重。1920年张学良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荐郭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的。从此郭辅佐张学良练兵打仗，深得张学良信任，也渐为张作霖赏识，成为奉军的重要将领。这时奉军中派系分立，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与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的大学派互相倾轧。郭松龄既得张作霖不断提拔，即遭到杨宇霆等人的妒嫉，幸赖张学良的庇护得免于被排挤出奉军。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拟以郭松龄为安徽督办，为杨宇霆所阻，改由姜登选督皖。同时以杨宇霆督苏，张宗昌督鲁，李景林督直，杨等皆有一省之地盘，而战功卓著之郭松龄一无所得。郭与士官派的矛盾更深。这时全国反奉运动日益高涨，在其影响下，郭松龄对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感不满。李大钊看到郭有从奉系分化出来的可能，亲自作郭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到奉天，策动郭倒戈反奉。

1925年10月，郭松龄代表奉军到日本参观日军秋操时，得知张作霖将派代表来日签订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以进攻国民军的密约。郭对此十分义愤，当即将此情况告知代表国民军来日参观的韩复榘，并表示坚决反对张作霖的卖国勾当，决不昧着良心服从张的乱命，张若打国民军，他就打张。韩回国后将以上情况报告了冯玉祥。

郭松龄回国后即受命代表张学良编组奉军第三方面军。该方面军下辖第八、九、十军。郭任第十军军长，并亲自挑选三个军的高级军官，从而掌握了第三方面军的实权。郭上书张作霖力陈内战之害，建议停战撤兵，遭到拒绝。他于是在天津积极向部将宣传反对奉军打内战的思想，进行反奉战争的准备。

11月19日，郭松龄派亲信赴包头与冯玉祥商谈联合反奉问题。经过协商签订了反奉密约。其主要内容是：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疆，保存国土。双方约定不得为争夺权利向内地各省发动战争，不得订立卖国条约和向外国借款；不得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否则本约无效。密约中还具体规定冯玉祥赞助郭改造东三省政府，开发东三省，经营东部内外蒙古，并牵制反方面。郭松龄赞助冯开发西北，必要时以实力相助。为了拉李景林共同反奉，密约还规定：直隶、热河均归李治理；保定、大名和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均归李景林；冯军可自由出入天津海口等项。

李景林系直隶人，在奉军中一向受到猜疑，因而对张作霖有不满。同时，李军驻天津附近，如不与郭合作，势必首先受到郭的攻击，因此经郭和冯之代表与之会商，李同意合作，但以其母尚在沈阳，恐被杀害，不能举兵响应，只在暗中相助。这样就形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11月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阳一行。郭认定其暗中的活动已被察觉，当即决定立即行动。同日深夜，郭松龄发出三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宣布杨宇霆罪行，要求杨即日去职；声言国内应即

日停止军事行动。__23日，郭至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出关，主和罢兵的通电，与会者大都赞同郭的主张，但也有军官30余人不愿附和。郭将他们押送天津交李景林看管起来。这时，姜登选途经滦州返奉，当即被郭扣留，姜反对起事，随即被枪杀。

郭将所部7万人分编为4个军，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向关外进发。张作霖得知郭起兵后，一面免去杨宇霆职务，一面电劝郭不要意气用事。旋又派张学良乘军舰去秦皇岛邀郭面谈，遭郭拒绝。冯玉祥在郭起兵后，于25日发出通电谴责奉军争城夺地，横征暴敛，摧残群众运动的暴行；斥责张作霖有帝王思想，愚昧无知，应及时引退。同时，冯派兵进驻丰台；集结部队于多伦，并向热河进军，声援郭军。李景林也发出通电，重申主和罢兵的主张，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词委婉，为自己留下了退路。

郭军向关外进兵顺利。26日占领秦皇岛，27日攻占山海关，29日进驻绥中。奉军向锦州败退。30日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同时令奉军在连山至塔山一带布防，阻击郭军。同日，郭松龄发出通电，改称所部为东北国国民军，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以示与奉系彻底决裂。

12月5日，郭军全线发动总攻击，取得连山战役的胜利。6日占领锦州，8日占领沟帮子，沈阳震动，文武官员纷纷逃往日本附属地躲避。张作霖自己也准备下野，逃往大连。

日本帝国主义在郭起兵时，表面上声称“严守中立”，实际上是积极干预。11月27日，日本关东军派代表与郭会谈，要求郭保持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与张作霖妥协。郭表示没有与张和平解决的可能，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为了不给日本以干涉的借口，12月1日，郭松龄致电日使声明：尊重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保护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提出起兵之后，各省政府和张作霖与外人所订新约概不承认为有效。郭军占领锦州后，关东军为拉拢郭又派代表向郭提出：如郭应允割让金州、复州、海城、盖平（即辽东半岛），日本可援助郭军，被郭拒绝。

与此同时，日本趁张作霖危急之时，诱迫张作霖签订卖国条约。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长斋藤等与张谈判。这时张作霖将保住其地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上，不惜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之权利”；“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洮昌道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__。日本则助张反郭。12月8日，日本内阁决定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署”__。15日，关东军提出：“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点起二十华里以内”，“禁止两军直接战斗动作”及“军事行动”__。“警告”虽分送郭、张两军，实际上是为了阻止郭军前进。与此同时，日本增兵东北，支持张作霖。12月9日，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同时将该师团部分步兵、炮兵和骑兵调入沈阳。15日，日内阁决定增兵满州，从朝鲜及日本国内调派部队组成“满州派遣队”开往沈阳。日本还给张作霖提供贷款、军火和情报。

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助张，十分愤怒。12月18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参加中国内战，侵犯我国主权。2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名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民众》书，号召“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这次反奉

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 。同日，东三省公民团和东京留学生分别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书和要求日本撤兵。26日，南京、上海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31日，北京各团体召开国民反日进兵大会和示威游行。此外，天津、杭州、武汉、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群众也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出兵。

郭军占领沟帮子后，沿京奉铁路继续向沈阳逼近，同时以一支部队从营口侧击沈阳。但当郭军拟渡河开进营口时，遭到日军阻拦，未能实现两面夹击奉军的计划，失去了有利时机。这时，郭军因铁路、桥梁已被奉军破坏，加以天气严寒，进军转慢，21日才到达新民，隔巨流河与奉军对峙。

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支援，获得了喘息时间，得以搜集兵力，重整部队，并利用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从吉林、黑龙江迅速调来援军投入战斗。奉军采取“中央坚守，两翼出击”的作战计划，沿巨流河构筑工事，准备与郭军决战。日本派军事顾问为奉军布置炮兵阵地，并率领日本炮兵操纵重炮助奉军作战。而郭军在天寒衣薄的条件下，长途行军作战，官兵疲劳，伤病员多而无法补充兵员，已感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足，加以奉军宣传“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使士气受到影响。

12月22日，郭军发起总攻击。23日占领大民屯，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抄之势。但这时郭军左右两翼受到奉军猛烈攻击。奉军从右翼进占新民北高台子，截断郭军后路，同时从左翼进占柳河沟，袭击白旗堡，焚毁郭军粮秣弹械，使郭军后方一片混乱。奉军还与日军联合出动飞机轰炸郭军阵地。奉军两翼得手后，中路乘胜反攻，使郭军陷入包围中。郭军虽再三冲杀，终于大败。24日，郭松龄夫妇向营口方向逃走，途中被奉军逮捕，次日被杀害。

郭松龄兵败垂成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正如《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的干涉使郭军不能形成对奉军的夹击之势，失去了进攻的有利时机；使奉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正面，又有了喘息时间调来援军。此外，李景林背盟倒向张作霖；冯玉祥援助不力；郭松龄未重视政治方面的斗争，又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等等，也都是郭松龄失败的因素。

东北国民军反奉战争是在北方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和人民反奉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的。它以反对奉系军阀的内战政策和卖国政策为旗帜，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军阀之间的混战，它实际上是当时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一部分。这次反奉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奉系军阀，使其在军事上的损失超过了两次入关作战的损失；同时也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从而推动了全国人民反日反奉运动的发展。

当东北国民军与奉军激战时，原来与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的奉系李景林忽与国民军在关内打起来了，是为国奉战争。

李景林参加反奉同盟的目的在保有直隶地盘并进而取得热河为其势力范围。而国民军第二、三军占领保定、大名之后，有继续北进夺取直隶的趋势。11月30日，奉系热河都统阚朝玺率部退出热河增援锦州，冯玉祥即派宋哲元率部开赴承德，占领了热河。李景林因此对国民军极为不满。12月2日，国民军一军沿京津线开到落堡，要求假道出兵援助郭松龄。李景林不许国民军通过，宣布保境安民，并将郭松龄交他看管的奉系军官全部释放。国民军

不听阻止继续前进，李景林遂于12月4日发出通电宣布讨伐冯玉祥。国奉战争于是爆发。

国民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李景林军。南路以邓宝珊、徐永昌为正副司令，由保定进攻津浦路上的马厂。经反复争夺，于12月11日攻克马厂。北路以张之江、郑金声为正副司令，由落垓进攻杨村。12月9日发起攻击，次日占领杨村，并乘前进，三面包围北仓。李景林全力组织反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伤亡重大。李景林军一度夺回了杨村、落垓和马厂。冯玉祥从北京、热河等地调来增援部队于20日发起总攻击。22日，北路攻克北仓，南路攻克马厂。前此，驻滦州的国民军唐之道师已于14日进占塘法，19日占领新河，从东面迫近天津。天津于是处于国民军包围之中。李景林亲往前线督战也稳不住阵脚，部队向市内溃退。24日，李景林被迫放弃天津，所部向沧州、德州撤退。李本人乘轮经大连至青岛转赴济南与张宗昌会合，组织直鲁联军。国民军各部于24日会师天津，受到天津市民的欢迎。

国民军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后，段祺瑞政府先后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李纪才为山东查办使。至此，国民军除原来控制的北京及其附近各县、河南、陕西、甘肃及绥远、察哈尔两特别区外，进而控制了直隶省、热河特别区及山东的一部分。这时是国民军成立以来势力最盛的时候，但这个时期很短促，不久直奉军阀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军，形势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反奉斗争的全局看来，进行这场战争是失策的。战前李景林已开始动摇，有从奉系中分化出来处于中立状态的趋向。国民军谋取直隶、热河地盘而引起这场战争，把李景林重新推回张作霖一边。这就使郭松龄不仅得不到李的支援，反而不得不防备李从其后面进攻；同时也使国民军不仅不能援助郭松龄，自己的实力也受到较大的损失。这场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从全局看是得不偿失的。

第十一节 直奉的反革命联合和国民军的退却

一、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

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和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惊恐。帝国主义列强积极支援奉直军阀，并促使它们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军。1925年11月间，日本政府向美、英、法政府递交了建议在中国建立列强的外交统一战线的信件^①。他们在支援奉直军阀上采取了一致的行动。这时，“英国根据其驻沈阳领事的建议，秘密给予了张作霖 500 万英磅的军用贷款”^②。还供给吴佩孚 1.5 万支枪^③。1925 年和 1926 年头两个月，日、法、美三国供给了奉系集团 24.4 万支步枪、1.5 万支马枪、7000 万发子弹、4 架飞机及其他武器^④。在积极支援奉直军阀的同时，列强还促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他们认为，“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不但“能够把整个华北和华中紧紧地掌握在铁拳之中”，而且在以后“对付革命的南方就不难了”^⑤。当时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等报刊已在散布：“张作霖和吴佩孚协商对国民军共同采取行动的谈判已在进行”^⑥。

实际上奉直联合的酝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1925 年 12 月间，吴佩孚退居鸡公山时，张作霖曾派童好古往见吴，谋直奉联合对敌。浙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东山再起时，张作霖又派苏锡麟到汉口见吴，提出以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推荐王士珍任总统为合作的条件。张宗昌也派熊炳琦、童好古来汉向吴表示愿意退出徐州，并请劝告孙传芳和平解决。但这时各方反奉声势甚大，吴佩孚虽有联奉讨冯之意，暂时仍不能公开进行。不久，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奉，随后又爆发了国奉战争，使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更尖锐起来。张作霖亟谋实现张吴合作，吴佩孚又认为公开与张合作的时机到了。1925 年 12 月，吴佩孚致电张作霖，大意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⑦同月，吴佩孚派代表吴天民、杜孝穆等三人至奉天，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之计。^⑧同月，张作霖派杨宇霆与吴佩孚派来的蒋方震在大连会晤，大体上“成立了谅解”。^⑨同月 31 日，吴佩孚通电声明讨贼军事结束，也就是说讨奉军事结束。1926 年 1 月 5 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10 日，又派张景惠到汉口与直系张志潭多次会商，议定了共同消灭冯玉祥和国民党，事成之后，奉军出关，关外由张作霖处置；以直鲁归吴佩孚；以察、绥、热三特区归张宗昌、李景林。中央政权和陕、甘豫听吴主持^⑩。至此，直奉军阀在讨伐“南北二赤”的共同目的下，实现了反革命联合。

当直奉酝酿反革命联合时，国民军虽取得了直隶的地盘，但它面对敌对的奉军、直军、直鲁联军和晋军，处境是很严峻的。冯玉祥想与吴佩孚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奉系。他曾派段其澍携其亲笔信到汉口会见吴，表示愿与吴合作。张之江也表示欢迎吴入京主政，但吴均不予理会。这时在国民军内部因冯推荐孙岳出任直隶军务督办也使矛盾加深。在此形势下，冯玉祥为转移敌人的目标，缓和国民军内部的矛盾，以保存其实力，采取了及时引退的办法。1925 年 12 月 27 日，冯玉祥发出致国民军一军将领电，除表示本人下野外，并提出了保全实力的计划和人事上的安排。1926 年 1 月 1 日，冯正式发出通电宣布即日下野出游，同时向段政府辞去本兼各职。段政府根据冯的意见，任命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兼察哈尔都统，刘郁芬为甘肃督办，李虎臣

为陕西督办，李鸣钟为绥远都统，鹿钟麟为京畿卫戍司令。冯下野后，由张家口到平地泉，准备去苏联考察。

但是直奉军阀并不因冯玉祥下野而停止向国民军的进攻。直奉军在 1926 年 1 月 20 日前后开始从山海关、山东及河南三处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在山海关方面，郭松龄失败后，其驻山海关的魏益三军于 1926 年 1 月 3 日宣布与冯玉祥合作，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1 月 11 日，张作霖以讨伐魏益三为名发出通电，进兵关内。18 日向山海关发动进攻，魏军退守昌黎、滦州。国民军任鹿钟麟为援魏总司令，出兵援魏，并准备由朝阳进攻锦州，截断奉军后路。这时，段祺瑞劝张作霖收兵出关，以免引起大战。奉系吴俊升、张作相鉴于奉军元气大伤，反对继续用兵。同时因中东路与苏联发生纠纷、张作霖也不敢积极向关内用兵。1 月 25 日，张作霖召集重要文武官员开会，决定东三省宣布独立，与北京临时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实行“保境安民”。同日，张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职。26 日，张电令山海关奉军将领着所有入关部队即日撤退，守卫奉境。国民军因处境不利也停止进攻。山海关战线形势暂时缓和。不久，国民军第四军被调往丰台整顿，后又调驻保定。到 3 月中旬，直鲁联军向天津反攻时，张作霖又向关内发动了进攻。

山东方面，国民军占领天津后，第二、三军对山东采取攻势，由马厂克青县，进驻沧州，与直鲁军相持于沧州与德州之间。1 月 18 日，鲁军第二十师师长方振武在肥城通电与国民军合作，所部被编为国民军第五军。方部在开向直鲁豫边境途中，击退张宗昌的追击部队，与国民军取得联系。19 日，张宗昌向大汶口以南的国民二军李纪才、田玉洁两部发动进攻。这时驻邹县、滕县一带的靳云鹗军已与张宗昌勾结起来，李、田两部处于背腹受敌的地位，不得不撤出汶上、宁阳、兖州，退守洛宁。24 日，张宗昌与靳云鹗在泰安签订了以尊崇吴佩孚，一致行动为宗旨的和议协约，商定了合击国民军计划及互助办法等 66 条。24 日起直鲁军在靳军配合下，先后攻占嘉祥、巨野、郓城、曹州（菏泽），方振武部退往大名，李纪才等部退回河南。至此，国民军全部退出山东。

河南方面，1 月 20 日，吴佩孚发出讨冯通电，并下令由东、西、南三路进攻河南。东部靳云鹗由山东进攻豫东；西路刘镇华收集镇嵩军残部由陕西进攻豫西；南路由寇英杰率鄂军由湖北进攻豫南。同时还派人收编河南红枪会等地方武装为“豫卫军”、“自治军”与国民军为敌。这样就使河南国民二军处于三面受敌和内外夹击的极为不利的地位。26 日，寇英杰部向信阳进攻。2 月 1 日，岳维峻通电讨伐吴佩孚，接着 6 日、9 日国民一军张之江、三军孙岳也相继通电讨吴。

2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中国政局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即“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号召民众“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并“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1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训令，指出：国民军陷于奉直两系军阀夹击围攻之中，号召党员造成全国反吴空气，同时应促成国民会议。

吴军寇英杰部进攻信阳不下，绕道北进，于 2 月下旬攻占确山、驻马店等地。东路吴军靳云鹗部 2 月 17 日进占商丘，2 月下旬攻占柳河、归德、兰封等地。3 月 1 日占领中牟。同日，寇部占领鄆城、许昌。3 月 2 日，国民二军退出郑州，一部向北退往安阳、汲县、邢台一带，大部向西往荥阳、洛阳

撤退。吴军占领郑州后，分兵追击，北路占领彰德。山西阎锡山乘机出兵于3月6日占领石家庄。北撤的国民军大部溃散，仅弓富魁一旅转到津浦线与国民一军会合。向西追击的吴军5日占领洛阳。3月4日日，刘镇华军出潼关截击。国民二军在敌军追击、截击和红枪会袭击下，人员和武器辎重损失惨重。岳维峻渡黄河逃入山西，被晋军俘获看管起来。李虎臣率少数残部逃回陕西。国民军在河南完全失败。

国民二军在山东、河南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直奉军阀联合进攻的力量占了优势，而且国民二军是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地位。但更重要的是在胡景翼去世后，岳维峻任人唯亲，政治上日益右倾，大肆扩军，对人民搜刮苛刻，从而引起了人民的反感，战争一起，不仅遭到红枪会的打击，而且使部队的战斗力也受到影响。此外，部队派系复杂，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指挥难于统一等也是失败的原因。

二、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

在吴军进攻河南时，2月10日，张宗昌和李景林分别就任吴佩孚所委任的讨贼联军鲁军总司令和直军总司令，并联名通电讨冯。19日，李景林开始率部向北进攻，20日攻占直隶沧州、青县。24日攻占马厂后，大举北进。与此同时，张作霖为策应直鲁联军夹击国民军，派奉军陆续入关开往昌黎、抚宁等地，天津形势危急。国民一军派鹿钟麟赴天津督师，28日发出总攻击令。3月1日，李景林部退守减河南岸。张宗昌派兵援李，一度占领静海、独流。国民军经激烈战斗才在8日夺回马厂、青县。

张宗昌在派陆军增援李景林时，还令毕庶澄率渤海舰队进窥大沽口。3月8日，毕率舰队载海陆军6000人在炮火掩护下在北塘登陆，遭到国民军截击，被俘2900人，毕率舰队退去。3月9日，国民军为防止奉鲁军舰驶入海河，敷设水雷封锁大沽口。10日，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驻京使节向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最急切的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和国奉交战将天津秦皇岛铁路阻断，以致“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折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否则，“各代表保留保持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特权”。在帝国主义压力下，鹿钟麟于12日急电北京政府同意开放大沽口，但要求外交团确实担保“外国轮船不得代为敌军运兵运械。外舰入口，不得有敌舰混入”。

11日晚，日驻津总领事馆派员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称日驱逐舰一艘定于12日上午10时入口，请予免验放行。总指挥部同意其入口，并约定了入港时刻、旗号、停泊地点等项。但12日有两艘日舰入港，其时间、舰数均与约定不符，且至港口不停泊以待大沽炮台守军察看。大沽炮台国民军守军当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候查，日舰不理，并以机关枪射击炮台守军，国民军被迫以步枪还击，日舰遂撤退。在双方互击中，国民军死4人，伤8人，日军自称伤3人。这就是大沽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当日国民军向天津日总领事有田提出严重抗议。日领事也到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抗议。当晚双方派员至大沽口商谈船只通行办法。13日晨，鹿钟麟将经过情况电告北京临时政府。当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即派员向日使芳泽提出口头抗议。日使反诬中国军队开炮打伤日舰官兵，并随即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严饬前方军警，遏止此种不祥事件之再发”。

14 日下午，北京市民举行了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提出立即撤退津沽一带日本军舰；日舰非得中国允许，永不准在中国境内停泊和行驶等条件。次日，天津各界 4 万余人开紧急大会，议决请政府严重抗议和抵制日货英货等项。但日本不顾中国人民的抗议，联合英、美、法、意等国，向中国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就范。

16 日，驻京外交使团决定批准驻天津各国海军司令官之议案，根据辛丑条约，抗议封锁大沽海口，由辛丑条约有关国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公使联名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天下午，首席公使荷使欧登科代表八国向外交总长颜惠庆致最后通牒，提出五项要求：“（甲）由大沽砂州至天津之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乙）应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丙）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且须保证将来不再发生任何妨碍行为。（丁）一切兵船须停泊于大沽砂州之外，且须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戊）除海关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舶之一切检查。对上述各项，若于 3 月 18 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之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同日，日本外务省训令驻京公使芳泽，就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严重处罚加害者；向日本政府谢罪及赔偿损害等四项要求。同时，日、美、法、意等国向大沽口增调军舰，实行武力威胁，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下，17 日，段祺瑞政府外交部复函荷使，表示“该通牒所开条款，除飭由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外”，要求“有海军在天津之各国公使，迅即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企图由地方当局与之妥协了事。在此形势下，同日，国民军被迫承认八国最后通牒的五项要求。直鲁军也接受了这五项要求。

帝国主义列强的最后通牒，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慨。在最后通牒发出的当天，中共北京地委在北京大学三院召集紧急会议，李大钊号召发动各界群众，坚决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进行斗争。当晚，他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陈毅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会议，决定在 18 日八国通牒满期之前，举行群众大示威，督促政府驳回通牒，并发起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17 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发表《反对八国通牒通告》和《告民众书》，同时通知全体党员动员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由各区分部组织演讲队，在全城举行废除辛丑条约的讲演。随后就组织了 80 多个演讲队上街讲演。同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 200 多个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即日严重驳复通牒；不许日舰带奉舰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等项，并决定于 18 日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推举李大钊、徐谦等人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 13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各团体联席会议散会后，部分代表由安体诚、王一飞和陈毅分别率领分赴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赴国务院请愿的 100 多人遭到执政府卫队殴打，重伤 6 人，轻伤数十人。

18 日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举行会议，对大会的布置、口号、标语和游行路线均作了布置。上午 10 时，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 140 余团体和北大、清华等 80 余校大中小学学生共 3 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上徐谦、顾孟余演说，并通过了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通电全世界被

压迫民众一致反对八国政府进攻中国，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驳复八国通牒最后之要求，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殴打各团体代表之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等八项议决案。

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在李大钊、赵世炎、王一飞、陈延年、陈毅等率领下，向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进发，于下午 1 时许到达国务院门前。此时国务院门前场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群众代表丁惟汾、安体诚等 5 人进入国务院交涉，未见到负责人，即出来向群众报告。群众要求去吉兆胡同找段祺瑞。队伍尚未出发，卫队即向群众开枪，群众奔避，卫队追击，死 46 人，重伤 155 人，轻伤不计其数，造成空前的大惨案。3 月 18 日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__](#)。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贾德耀等人推卸罪责，反诬群众领袖制造事端。19 日，段政府发出通缉令，诬指徐谦、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率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__](#)。这一派谎言遭到各界人民的痛斥。即使是京师地方检察厅经过调查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__](#)。可见“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__](#)。

这次惨案又一次暴露了段祺瑞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狰狞面目，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国民军将领兼代京畿警卫总司令李鸣钟等人的向右摇摆。驻北京的国民军在惨案发生之前表示“不介入”，没有采取保护群众防止惨案发生的措施，惨案发生后，没有公开谴责段祺瑞的罪行，反而采取限制、压迫群众革命活动的措施，宣布戒严，不许群众再行集会，实行全市大搜捕，并派警察监视、搜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举行联席会议，议决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并决定次日北京各校一律停课，召开追悼会，慰问受伤同学和死难者家属。与此同时，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 150 多个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一院举行联席会议，组成北京惨案后援会，负责惨案善后事宜，由陈毅负总责。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急起联合起来，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达到打倒段祺瑞，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等目的。为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同时亦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__](#)。同时，国民党发表了《对北京惨案宣言》，国民政府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谴责段祺瑞的暴行，声援人民的斗争。

23 日，北京 200 多个团体，1 万多人在北京大学操场隆重举行三月十八日殉难烈士国民追悼大会，公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陈毅为主席，邵飘萍、王一飞相继讲话。大会通电全国定 3 月 18 日为废约纪念日。此后，北京学生总会派代表分赴各地宣传惨案真相，唤起人民声讨军阀。

3 月下旬，天津、上海、广州先后举行了声讨式追悼大会。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省一些大中城市民众及东京留学生也相继举行了追悼大会。各地民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谴责段政府，声援北京人民的斗争。

“三·一八”示威请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军阀的

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使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的手段而采取妥协的办法，使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历史未能重演。这次运动虽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以致北方革命运动暂时低落，但是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使广大人民受到了教育，认识到“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必须“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

三、国民军退出津京和执政府倒台

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直鲁联军乘机于3月16日分东、中、西三路向北进攻国民一军，21日晨攻占马厂。此时入关的奉军已于20日占领滦州，21日进占唐山。自河南北上的吴佩孚军18日进至石家庄，与先已到此的晋军取得联络，继续北进。天津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形势下，遂不得不于19日下令前线总退却，撤去京奉、津浦两线战备，放弃天津，退守北京。23日，直鲁联军占领天津。

当直奉军向直隶进攻时，段祺瑞为维持其政权，策动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等发起全国和平会议。3月15日，王士珍等联名通电前敌各军退驻原防，择定地点，派代表开停战分权会议。处于困境的国民军于3月21日由张之江、李鸣钟等联名致电张绍曾表示愿将所部队伍完全撤回原防地点。但吴佩孚、张作霖对和平会议反应冷淡。这不仅是表示对国民军的不妥协，也是对段政权的否定。王士珍等的和平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奉军和直鲁联军占领天津后，继续西进，3月25日至28日先后占领杨村、黄村和丰台。南线吴佩孚军27日占领保定后继续北上。在北面，26日国民军自承德退往多伦一带，热河为奉军占领。国民军在三面临敌、北京危急的形势下，谋求与直奉军妥协，以保存实力，固守北京。3月下旬，张之江三次致电吴佩孚请派使议和，同时也曾多次密电张作霖磋商，均无结果。

3月29日，张作霖抵秦皇岛，召集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等举行会议，商讨直隶地盘、“讨赤”、中央政权等项，吴佩孚的代表杨清臣亦列席。对于中央政权，张作霖主张推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形式上仍由吴佩孚负责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吴奉同盟的协定。同日，张作霖任命褚玉璞代理直隶督军。

4月1日，奉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事宜，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同日，国民军也在京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继续进行和平活动，但对方如进逼则不得已而应战。吴军将领靳云鹏、田维勤等原有联冯讨奉的主张，国民军将领于是希望靳、田等人促使吴佩孚放弃对国民军的成见，共同对奉。4月2日，国民军代表王乃模、何遂在保定向田维勤等接洽和议，提出释放曹锟；恢复法统；将京汉全线交吴佩孚；国民军驻屯京兆；协同吴军要求奉军退回关外等项谋和的条件。次日，王、何还到郑州会见靳云鹏。4日，田维勤派王文正等二人来北京与国民军进行和谈。5日，吴佩孚电复张之江，以先将国民军交阎锡山暂接收，张之江赴汉口接洽为谋和条件。国民军与直系谋和的活动引起了张作霖的疑虑，张急电吴佩孚询问有无此事。吴将复张之江电转张作霖阅以释张之疑虑。8日，张之江又派代表到天津，与张学良、张宗昌商谈停战议和，仍无结果。张作霖要求国民军移驻一定地点，听候改编。吴佩孚也坚持国民军将领自行解职，并将所部悉数交出，听候改编，否则按计划进军，迫令缴械。

这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4月3日，奉军派飞机轰炸北京。6日，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向北京国民军下总攻击令。7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分四路进

攻北京。在国民军大势已去的形势下，段祺瑞为维持其地位，勾引国民军师长唐之道脱离国民军，将其一旅部队调入北京，并将执政府卫队旅交唐指挥，同时派吴光新与张学良、张宗昌联络，准备利用唐部与奉军里应外合逮捕鹿钟麟，消灭或赶走国民军。但是这一阴谋事先已被鹿钟麟察觉。他先发制人，发动政变，于4月9日深夜关闭城门，切断电话，派兵包围段宅和执政府，缴了卫队的枪械，准备逮捕段祺瑞等归案。段祺瑞等事前已闻风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日，鹿钟麟发布警备司令部布告，宣布段的罪状，同时恢复曹锟的自由，并电请吴佩孚来京主持一切。鹿钟麟发动政变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在客观上确是做了民众所要做的事，确是除了一个卖国残民的东西”^{__}，但他企图利用曹锟实现联吴抗奉则是不切实际的。

11日，鹿钟麟等国民军将领致电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表示欢迎他们入京主持政务。同日，曹锟致电吴佩孚为鹿钟麟说项，希望曲与成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以后大计尽可协商。曹并派人偕鹿之代表赴保定迎田维勤来京谈和。13日，田抵京晤鹿后，电奉请先行停战，俾国民军退出北京。但鹿钟麟驱段、释曹、迎吴的行动使奉方十分痛恨。13日，李景林、张学良等联名通电痛斥鹿钟麟。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请勿受鹿钟麟之挑拨，并盼即日入京。吴佩孚向张作霖表示，国民军必须全部缴械，并劝张之江、鹿钟麟交出部队。至此，张之江、鹿钟麟等联吴反奉的计划终于失败。国民军不得不撤出北京了。

4月15日，奉军和吴军向北京猛攻。奉军占领通县，吴军进抵西苑，随后南苑防线亦被突破，鹿钟麟遂下令总退却。国民军向地势险要，已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南口一线撤退。撤退时，行动敏捷，秩序井然，部队未受损失，北京市民也未受骚扰。

国民军撤退后，段祺瑞从东交民巷出来，于4月17日通电宣告复职，并致电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表示依靠他们不能善后。但吴佩孚在段复职之次日即电唐之道，告以已委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令唐任副司令，并着“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__}。段于是寄希望于张作霖，19日派人去天津，迎候张学良。但张作霖在当天复电段，表示“法律政治问题，自有海内名流共同讨论，霖本军人，早经宣言不问政局”^{__}。至此，段祺瑞已不可能继续恋栈了。

4月20日，段祺瑞决定下野离京。行前发布命令改组政府，免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特任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同时发令称：“本执政兹已决定引退，自即日起，着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__}。当日下午段偕吴光新等离京赴津，执政府至此也就倒台了。

执政府倒台后，吴佩孚和张作霖对胡惟德的摄政内阁都不予承认，而他们又为中央政权而明争暗斗，于是北京一时陷于无政府状态。4月26日，吴佩孚提出由曹锟下台前的国务总理颜惠庆出任摄政内阁总理，但张作霖不同意，因颜曾于1924年9月副署讨伐奉军的命令。张作霖于5月2日致电吴佩孚，提出关于恢复宪法，约法及组织政府问题，可召开元老及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之。双方争执不下。5月4日，王士珍等调停奉直双方政见，提出颜惠庆复职后即召集阁议，通过新总理，替颜摄政。8日，经齐燮元与颜惠庆、张宗昌、张学良等晤商，决定推颜惠庆复职。13日，颜内阁实行复职，摄行总统职务。但内阁成员多不就职。6月11日，吴佩孚、张作霖代表在津开会，决定颜阁自动辞职，另组事实内阁。22日，国务院会议通过颜阁辞职，由海

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摄政。这时已是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的前夕了。

第三章 大革命的高潮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国内形势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一、北伐战争前夕的国内形势

北伐前夕，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出现了北洋军阀联合“讨赤”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拥兵 35 万人，占有东三省及京津和山东大部分地区。不但有一支久经沙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而且有一支力量可观的空军与海军，拥有飞机 260 架，军舰数十艘。奉天兵工厂日造子弹 40 万发，年产大炮 200 余门。军队数量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在北洋军阀各派中首屈一指。

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 20 余万人。拥有湖北汉阳、河南巩县两大兵工厂，控制了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和长江、黄河中上游，势力扩展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和四川。为了同奉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和北方地盘，北伐之前，吴佩孚把主要军事力量调往河北、津、保一带，留在南方两湖地区的多属湘鄂地方部队。他在联合“反赤”口号下，北联奉张，围攻国民军，南结闽、赣、粤、桂各省军阀，阴谋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敌人。

孙传芳控制闽、浙、苏、皖、赣等东南五省地盘，所部兵员 20 多万。军事实力仅次于奉张。东南五省多为膏腴富饶之地，其经济力量比吴、张都占优势。他以“保境安局”、“和平中立”相标榜，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在赣、粤边境弯弓盘马，布阵陈兵，时刻准备进攻湖南、广东，侵袭北伐革命军的后方基地。

北洋三大军事集团，奉张称雄北方，直吴争霸中原，苏孙在东南独树一帜，三足鼎立，虎视天下。他们在争夺北京中央政权问题上虽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在联合“讨赤”方面却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与北洋军阀并存的还有一个西南军阀集团。他们大都是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其中包括滇系、桂系、黔系、粤系、川系和湘系。北伐战争前，其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桂系军阀陆荣廷走向没落，被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所取代。粤系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经过革命军的东征与南伐，也已名存实亡。湘系军阀内部，几经内争而分裂和削弱：赵恒惕亲吴附北，谭延闿、程潜投奔广东而起义革命。在西南军阀中，兵员众多、实力雄厚，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危害最大的是滇、川、黔三省军阀。

滇系唐继尧，以西南军阀“盟主”和“领袖”自居，不满足云南一省的统治，妄图控制西南各省以“问鼎中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唐继尧出兵南宁、柳州，策应叛军陈炯明，阴谋颠覆广东政府。孙中山逝世后，他加入了“反共”、“讨赤”阵线，支持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调兵遣将，企图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北伐出师前夕，黔系军阀袁祖铭、彭汉章在军阀角逐中，先后被撵出四川、贵州，被迫就食湘西。表面上附和国民革命，实则投北伐之机。他们以湘西为大本营，控制“民财两政”，私委县长，截留税收，保留黔军番号编制，不听广州国民政府命令。将黔军扩编为 20 个师，从辰溪、沅陵等地向常德、桃源方向频繁调动，并以北伐左翼军的名义，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不仅给唐生智在湖南的地位带来危害，也对北伐后方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川军刘湘、杨森，虽被革命形势裹胁而归附革命，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改变其军阀

的“反赤”立场。刘湘一方面表示拥护北伐，另一方面又与奉系张作霖勾结，威胁国民政府，镇压四川工农革命运动。杨森在北伐军打到湖南后，仍未改变其拥吴的基本态度，声言“受子玉（吴佩孚字）殊遇”，拒绝通电反吴。8月14日，在万县宣布就任吴佩孚所委四川省长一职，并与吴佩孚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暗中勾结，准备进攻国民革命军。西南军阀对国民革命这种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对北伐的进军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严重的危害与后患。

1926年春夏，直、奉军阀依据讨伐“南北二赤”的反革命协定，加紧了进攻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军事部署。在北方，5月，直系、奉系、晋军、直鲁联军共数十万众，兵分几路，向南口、晋北、西安、甘肃等国民军驻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围攻。在南方，吴佩孚于湖北组织了援湘军，与东南军阀孙传芳、滇军唐继尧、川军刘湘、杨森等联络配合，发动了援赵（恒惕）驱唐（生智）的战争。阴谋先占湖南，后攻广东，一举将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扼杀在摇篮中。

为了打破军阀的包围和进攻，保卫和扩大国民革命的成果，为了援助北方国民军，支持两湖和长江流域的工农群众运动，要求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向长江、黄河流域推进。可见，北伐战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动的。

北伐战争又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巩固，北伐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国民革命军的组成，两广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为北伐准备了条件。“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国民会议运动、广东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为北伐胜利进军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北方人民，遭受直奉军阀的涂炭和蹂躏，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期待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推翻军阀统治，其迫切心情“若大旱之望云霓”。冯玉祥国民军血战南口，坚守西安，拖住了“反赤”联军的庞大兵力，消耗了北洋政府的巨额财富，极大地支援了南方的出师北伐，广州国民政府虽然完成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并将番号复杂的各省省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是，这么多的军队，拥挤在广东一隅，水窄鱼众，防区、军饷不够分配。主客籍军队往往因这些问题引起不快和纠纷。寄居广东的客军将领如湘军谭延闿、程潜、滇军朱培德等，想借北伐之机，摆脱困境，向外发展。粤籍军人，想利用出师北伐，使客军不逐自走，以减轻广东的负担和压力。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也认为只有向北发展，才能解脱广州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以及因权利不够分配而引起的各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只有出师北伐，彻底消灭北洋军阀，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广州国民政府才有出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正是上述各种政治力量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年3月12日，赵恒惕在湖南人民反吴驱赵斗争的高潮中，被迫通电去职，随即逃往汉口。3月25日，唐生智就任代理湖南省长职务。赵恒惕在湘六年的反动统治从此结束。

唐生智主持湘政，倾向广州政府，吴佩孚极为震惊。3月30日，他召开军事会议，调五师、两旅，在鄂南沙市、沔阳、蒲圻、通城、阳新一带布防。同时组织鄂、湘、赣三省兵力援赵驱唐。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4月初，叶开鑫率湘军贺耀祖师、蒋钊欧旅、鄂军王都庆师、余祖森旅、粤

军谢文炳师、岳州镇守使邹序彬部，分途反攻湖南，先后占领岳阳、汨罗、平江、醴陵、湘潭、长沙。唐生智退守衡山、攸县、安仁。5月上旬，叶开鑫受吴佩孚命令，指挥三路北军进攻唐生智部。唐军三面受敌，湘南岌岌可危，急电广州国民政府火速派兵入湘增援。

中国共产党积极援唐反吴，极力主张广州政府出师北伐。1926年2月7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参加反吴战争”，“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目前，英、日、张、吴结成了反革命的“联合战线”，镇压北方国民军，阴谋“推翻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为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同时指出：广东“是现时唯一的革命中心”，它拥有“奋起斗争的南方几十万工人和几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只有从这个地方发展国民革命”，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并提出：党在最近“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加紧兵运工作，以“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同时“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界群众组织和海外华侨团体，纷纷集会和通电，“敦请国民政府迅速北伐”，表示“誓作国民革命后盾”。

为了援助唐生智，阻止吴佩孚势力南侵，国民政府决定派第四、七两军先行入湘增援。第七军令驻桂林之第十五团尹承纲部于5月初先行向湖南进发。第四军以中共直接领导的独立团叶挺部为先遣队，于5月20日从肇庆出发援湘。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26年5月21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

6月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通过了出师北伐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立了总司令部，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总参谋次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苏联人加伦为军事顾问。28日，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奉命从韶关出师援湘。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北伐部队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出师北伐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9日，军民5万余人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给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总司令分别发布了告广东全省人民、告北伐士兵和告海外同胞书，重申北伐的目标是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完成国民革命，使中国不再遭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和统一的中国。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随即赴前线。

当时，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的部队共16个师又4个旅，计12万余人，以第四、七、八三个军所属师、旅的战斗力量最强，是北伐的主力部队。

如前所述，国民革命军面临的敌人，主要是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和原属直系后自成一系的孙传芳，合计兵力约75万，大大超过国民革命军的数量。当时奉张部队远在北方同国民军作战，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以“保境安

民”相号召，扩充实力，巩固内部，而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直接造成严重威胁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他除派遣一部分军队北上围攻国民军外，又在湘、鄂两省组织了号称 20 万人的所谓“讨贼湘军”和“援湘军”，并且做好了进攻湖南、广东的军事部署。

根据敌众我寡、敌人力量分散和指挥不统一的特点及弱点，国民革命军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即首先集中主力于两湖战场，消灭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势力，解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围，援助北方国民军；同时警戒敌人从江西、福建袭击北伐的后方。国民革命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的主力 8.4 万余人，担任西线两湖战场的作战，任命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称西路军。以第一、二、三、五、六军的各一部分驻广东的南雄、始兴和湖南的桂阳、■县、茶陵、安仁一线，防止孙传芳从江西南下广东、西进湖南，称中央军，直辖于总司令部。由第一军三个师防守粤东汕头、潮安、大埔、三河坝、梅县等地，防御福建之敌侧袭广州，称东路军，由何应钦指挥。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参谋总长名义辖四个师留守广州。计划在打垮直系吴佩孚部队之后，再与东路、中路的北伐军会合，进军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等东南五省，消灭孙传芳的军阀部队，然后挥师北上，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这一作战方针也叫“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部署进行的。

第二节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胜利

一、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

1. 湘南首战告捷

吴佩孚得悉广东国民政府派兵援唐后，即令鄂军孙建业、陆潭、余荫森等三旅组成“援湘军”，迅速入湘作战。又从汉阳兵工厂调拨大批枪支弹药运往衡山前线。

唐生智得广州国民政府军援后，发出《讨吴通电》，随即在衡山、衡阳、安仁、攸县同叶开鑫北洋湘军作战。5月5日，衡山战役打响，南北两军为争夺衡山境内军事要地护湘关、萱州镇开展了恶战。唐生智部得到尹承纲团、钟祖培旅及岳北农工会的有力支援，5月中旬，击退了进攻护湘关的北洋军。5月下旬，在萱州河打败了北军蒋锄欧、龚仁杰等四个团。

衡山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唐生智被动作战局面，稳住了湘南局势。6月2日，唐在衡阳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等职，参加北伐的行列。6月4日在衡阳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任省长。把所部的四个旅扩编为四个师：何键为第一师师长，李品仙为第二师师长，刘兴为第三师师长，周斓为教导师师长。

衡阳战役主要在金兰寺、渣江、洪罗庙等地进行。6月1日起，何键师和钟祖培旅，在金兰寺与叶部贺耀祖师、林拔萃旅激战两天，歼敌千余。6月3日，刘兴、周斓两师在渣江、洪罗庙击溃叶部邹振鹏旅和陈修爵部，敌伤亡人数在千人以上。

安仁、攸县战役主要在淥田、黄茅铺进行。6月3日，北洋粤军谢文炳部四个团进犯淥田，北洋赣军唐福山部两个团进攻黄茅铺。叶挺独立团与第八军第三十九团迎击来犯之敌。团长叶挺到黄茅铺指挥战斗，参谋长周士第赴淥田领导作战。6月4日凌晨，叶挺下达攻击令，独立团官兵同敌军展开猛烈的战斗，击溃了优势敌人的进攻，进而转入反攻。敌向醴陵、茶陵、莲花等地逃跑。安仁、攸县战役，北伐军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打败了敌军六个团的进攻，毙俘敌约400人，缴获枪支300多支。独立团伤亡63人。

衡山、衡阳、安仁、攸县诸战役，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肃清了北洋军阀在湘的势力，打破了吴佩孚“援湘攻粤”的计划，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入湘北伐创造了条件。在安仁、攸县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开创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北伐军在湖南战场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湘南首战告捷，扩大了国民革命的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加快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程。

2. 强渡涟水、淥水，攻占醴陵、长沙

叶开鑫部北洋湘军从湖南败退后，集结在湘东、湘中的涟水、淥水一线，布阵防守。湘军邹振鹏、刘雪轩、林拔萃各旅及贺耀祖师，布防湘江以西的易俗河、湘潭、湘乡、潭市一带，固守涟水防线；鄂军余荫森部、赣军唐福山部、粤军谢文炳部，在湘江以东的易家湾、株洲、醴陵、板沙铺地区结集，以淥水为屏障。吴佩孚命李倬章等援湘军，分四路援助叶开鑫。

为摧毁涟水、淥水防线，攻占醴陵、湘潭、长沙，6月底，四、七、八三个军，陆续抵达湖南北伐前线。并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兼前敌总指挥。入湘北伐军分成左、中、右三路，于7月上旬向敌发动攻势。三路大军不顾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和敌军封锁江防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渡河强攻，突破了敌人构筑的涟水、淥水防线。左路军于7月6日占领敌人重点防守的

娄底市，7日攻下谷水，9日占领潭市，敌涟水防线瓦解。中路军7月上旬占领易俗河、湘潭、湘乡。右路军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在同一时间内，拔掉了易家湾、株洲、板沙铺、豆田、泗汾、沈潭之敌。10日下午，叶挺独立团攻占了湘东军事重镇醴陵，敌之渌水防线彻底崩溃。

北伐军占领醴陵、湘潭之后，长沙防务空虚，省城无坚可守，叶开鑫惶惶不可终日。7月11日，中路第八军李品仙师，在省城工人保安队等群众武装配合下，消灭溃兵散匪，进驻省会长沙。至7月12日，左路军何键、刘兴、周斓三个师，总预备队胡宗铎、钟祖培两旅，分途追击敌军，先后克复了浏阳、宁乡、湘阴、益阳长沙为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伐军光复长沙，加速了北洋军阀在湖南反动统治的崩溃。

3. 捣毁汨水防线，攻克平江、岳阳

北伐军克复长沙前，吴佩孚把军事重心放在北方围攻国民军，并不十分重视湖南战场，以为国民革命军入湘作战部队不会很多，叶部湘军虽退至湖北，然其主力并未损失多少，得到鄂军援助后，兵力扩大到近20万人。湖南战争，可操胜券。然而叶军在涟水、渌水溃败，醴陵、株洲、湘潭、长沙相继失守，使吴佩孚大为惊愕。于是急令陈嘉谟、李倬章、叶开鑫调整作战计划，退守平江、汨罗一线。集结重兵于平江、汨罗、岳阳，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羊楼司、五里牌、云溪为第二道防线，待他结束南口战争后，再率直系主力南下，与北伐军在湘北决战。

北伐军根据长沙军事会议部署，决定在吴佩孚主力南下之前，摧毁汨水防线，拿下平江、岳阳。国民革命军将汨罗江防线截成三段，分兵三路纵队进攻。

平江城位于汨水北岸，是进入湘中的门户，为湘东北军事重镇，亦是敌方汨水防线的主要支撑点。敌方集中2万余人守平江，由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蒲平镇守使和平通防御司令陆潭指挥，在平江修筑了坚固周密的防御体系。8月19日凌晨，平江战役打响，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和十二师黄琪翔团为攻打平江的主力。他们在中共平江地委领导的农民武装配合下，经过一天浴血奋战，踏平了敌军精心布防的据点，彻底消灭了防守平江的顽敌。此役毙敌主将陆潭，俘敌军官79人，士兵1500余人，缴获大炮11门，长短枪2000多支。北伐军伤亡官兵173人，平江城破，汨水防线失去了重要支撑点，汨罗江防线亦随之动摇。

与第四军发动平江战役的同时，第七、八两军在李宗仁、唐生智指挥下，分途在汨罗江北岸追击敌军。从8月19日至22日，将汨水以北地区之敌各个击溃，占领了长乐、新市、浯口、将军坪、王狮桥、牛车铺、黄谷市、桃林、黄沙街、箴口、淡江、中洞等20多个城镇，前锋直逼湘鄂边境。汨水防线被摧毁，北军向岳阳、五里牌、羊楼司、通城收缩。

岳阳（岳州）为湘北重镇与两湖锁钥。位于长江、洞庭湖及粤汉路的会合处，系水陆交通枢纽，亦是攻武汉、守长沙的战略要地，为敌我双方重点争夺的目标之一。北军叶开鑫、宋大霈、董政国等自汨水防线溃败后，在岳阳以南的新墙河与粤汉线上的新墙、麻塘、北港等地赶修防御工事，固守岳州待援。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担任攻取岳阳的任务。8月21日傍晚，何键第一师向新墙之敌进攻。翌日拂晓，何师渡过新墙河（微水），向敌粤汉线上重要据点麻塘进击。敌恃险顽固抵抗，北伐军三次冲锋，破其防御阵地，敌向岳阳溃退。何师两个团尾追不舍。22日，八军何键第一师、李品仙第二师向

岳阳进攻。城郊、梅溪等地农民，拿起锄头、扁担，配合北伐军围剿叶开鑫、宋大霈部。叶、宋见湖南战场大势已去，难挽败局，决定撤离岳阳。宋大霈等鄂军大部撤往湖北，叶部湘军 200 余人向北伐军投降，一部分向华容、安乡逃命。22 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占领湘、鄂咽喉之地岳阳。嗣后，革命军将岳阳以北的城陵矶、梅溪、云溪、五里牌、羊楼司等敌军据点一一占领。至此，吴佩孚的北洋军阀势力被逐出湖南，北伐军的前锋部队已进入鄂南通城。

北伐军 8 月 18 日向敌汨水防线发动总攻以来，在汨水两岸人民的密切配合与支援下，19 日克平江，22 日占岳阳，23 日占领五里牌和通城。短短五天，拔掉了汨水以北 20 多个军事据点，捣毁了敌人精心构造的汨罗江防线。俘敌官兵 7100 余人，毙伤敌军无数，缴获步枪 5000 余支，机枪 30 多挺。给敌湘军和援湘军叶开鑫、宋大霈、董政国、余荫森等部以致命打击。汨罗江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湖南的统治，巩固和壮大了南方的革命力量，促进了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为消灭吴佩孚直系军阀、夺取武汉和开辟江西战场奠定了基础。

二、决战鄂南，会师武汉

1. 鄂南会战

鄂南会战主要是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北洋湘军、援湘军在湖南战场惨败后，其首领李倬章、赵恒惕、陈嘉谟等迭电向吴佩孚告急，诉述“前线赤军竭力前进”，平江已失，汨罗防线崩溃，将士不听指挥，“非帅座亲临，万难挽回”^①“务乞帅座兼程南下，”、“返鄂维持军心”^②。吴佩孚见电，心急如焚，即率精锐刘玉青、陈德麟等部，于 21 日“遄返汉口”。北方军事交齐燮元主持，在长辛店设留守司令部。25 日晚，吴佩孚抵达汉口，26 日在汉口查家墩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布置鄂南军防，策划向南反攻。陈嘉谟、刘佐龙、赵荣华、刘玉青、陈德麟、赵恒惕、董政国等 30 余人与会。决定调集宋大霈、董政国、孙建业、陈嘉谟各部 2 万余人防守汀泗桥，以宋大霈任指挥。

汀泗桥“后枕高山，前临巨浸”，三面环水，为“武汉之最险要门户”，“北军所恃为天险”^③。北伐军第四军担负攻占汀泗桥的作战任务。8 月 23 日下午，军长陈可钰召开团以上军事会议，决定抢在吴军大举南下前攻克汀泗桥。25 日，全军到达指定地点。26 日清晨，开始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陈可钰及各师师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遇到守敌顽抗。当晚，36 团攻入敌军中央阵地。27 日清晨，第四军发动总攻。右翼三十六团、三十团、二十九团和叶挺独立团一营经过激战，占领敌主要阵地。左翼三十五团及炮兵营摧毁敌炮兵阵地及桥上铁丝网，冲过铁桥，与迂回至敌后方的独立团主力前后夹击敌军，使敌溃不成军。上午 8 时左右，北伐军占领了“鄂南第一门户”汀泗桥。独立团抓住战机猛追溃敌，27 日上午率先占领咸宁城。

汀泗桥战役毙敌 1000 余人，俘敌军官 157 人，士兵 2296 人，缴获大炮 4 门，机枪 9 挺，长短枪 3000 余支，革命军第四军伤亡官兵 379 人^④。

与第四军攻占汀泗桥的同时，北伐军第七军占领了崇阳、蒲圻，在咸宁与第四军会师。第八军收复嘉鱼、金口、新堤、宝塔洲，掩护与配合了第四军攻打汀泗桥。

汀泗桥战役，是北伐军入鄂后的第一仗，也是吴佩孚南下后，北伐军同他直接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英勇善战的第四军，以少胜多，重创强敌，攻克

了汀泗桥，挫败了吴佩孚的嚣张气焰，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威。为革命军占领鄂南、进军武汉打开了门户，有效地巩固了广东、湖南等北伐后方根据地。

汀泗桥一役，宋大霈几乎全军覆灭。直系军阀主帅吴佩孚亲自指挥贺胜桥决战。贺胜桥号称“鄂南第二门户”。吴军在桃林铺、印斗山和贺胜桥构筑了三道防线。加入贺胜桥防守的军阀部队有陈嘉谟、董政国、叶开鑫、马济各部，合计不下 10 万人，配置铁甲车几十辆，大炮数十门，重机枪 200 余挺，军队数量高出北伐军好几倍。吴佩孚叫喊：“限三日夺回汀泗桥” 。

北伐军攻占汀泗桥后，士气高昂，战意旺盛。8 月 29 日，前敌总指挥部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陈铭枢、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与会。决定乘敌立足未固，增援部队尚未全部到达之前，迅速攻下贺胜桥。定于 8 月 30 日凌晨开始进攻，要求部队 29 日晚全部进入阵地。

8 月 30 日天将破晓时，第四军独立团和十二师等攻击部队，向铁路左右两侧敌之重要据点吴家湾、黄石桥、北路学校进击，并占领了这些地方。得到胡宗铎、钟祖培各旅的配合后，即向北军第一道防线重要阵地桃林铺、王本立进攻。吴军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刘玉春第八师、陈嘉谟第二十五师，以优势兵力和密集炮火，向北伐军疯狂反扑，并出动铁甲车助战。北伐军第四、七两军协同进攻，直冲敌阵，白刃肉搏，以一当十，前仆后继，奋力拼杀，终于攻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

吴军退到第二道防线后，妄图凭借江湖港汊、灌木丛蒿作掩护，重新组织反攻。吴佩孚令刘玉春、陈嘉谟各备大刀队赴前线押阵，并亲自率卫队团、宪兵队，竖“吴”字大旗，乘专列在贺胜桥往来督战。吴传令：凡作战不力，畏葸退却者，立即射杀。

30 日上午 10 时许，北伐军各路向第二道防线进攻，独立团攻敌主要阵地印斗山。随后，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向敌防线全面进击。火力之猛，前所未有，敌军抵挡不住，纷纷向后退却。吴佩孚怒不可遏，下令机枪手“向退却者扫射，积尸累累，血流成河” 。吴还亲自手刃退却之旅、团长十余人，以惩戒作战不力之军官。督战队用残暴手段屠杀后退官兵，引起溃兵向督战队开火，敌军混乱，互相厮杀。北伐军第四军乘胜攻占了贺胜桥。吴佩孚所乘军车亦中炮弹起火，敌军兵败如山倒。吴知难以扭转贺胜桥战役的败局，仓惶回车北逃武昌。吴佩孚专列过处，“败兵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堕，宛转呼号，惨不忍闻” 。从桃林铺至贺胜桥，吴军士兵断头缺臂，露肠破肚，呻吟哀叫者，比比皆是 。贺胜桥战役，俘敌军官 201 人、士兵 3334 人，缴获大炮 24 门、步枪 2900 余支，机枪 30 余挺，毙敌近 2000 人。此役为北伐出师以来的空前激战。吴佩孚为“死守贺胜桥，以保武汉，巩固华中”，集直系十余万军队于贺胜桥，并亲自督战，妄想一举打败国民革命军，重振北洋军威。然而在短短 5 天内，号称“常胜将军”的“吴大帅”，一败于汀泗桥，再挫于贺胜桥，损兵折将，精锐消耗过半。其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师刘玉春第八师，在贺胜桥一役中，士兵损失一半，三个团长全部阵亡，30 多个连长中只有 5 个活着 。贺胜桥之战，成为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军事走向溃败的重要转折点。

北伐军在贺胜桥战役中，冲锋陷阵，英勇无畏，“前兵甫倒，后卒即继”，“置生死于度外，欲胜利之在我” 。仅一天间，就打败了装备精良、数倍于己，号称北洋劲旅的直系主力，摧毁其精心设防的军事要塞贺胜桥，从此，“北伐军声威震动全国”。第四军是鄂南会战的主力，独立团是北伐进军的

开路先锋，他们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建树的奇功，受到“民众称誉”，“咸以‘铁军’目之” 。

2. 克复武汉

汀泗、贺胜两桥失守后，吴佩孚为保住其在华中的统治，8月31日，在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汉防务。会议决定放弃保定，调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南下；起用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提升鄂军将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会议还任命湖北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陆军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靳部师长高汝桐为汉阳、汉口守备军总司令。南下各师驻防广水、花园一线，蛇山、龟山、江汉水面重点防守。

9月2日，在吴军部署尚未就绪时，北伐军第四军已兵临武昌城下，第七、八两军已抵鄂城、纸坊、金口，三路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包围。当天，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余家湾车站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军事形势，认为攻取武汉“贵在速决”，不宜拖延。决定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路主攻武昌；第八军第一、二、四各师、鄂军第一师进攻汉阳、汉口；第一军第一师为总预备队，攻占武汉三镇，主要战场在武昌。

武昌为湖北政治、交通中心，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英雄城市，城防坚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由刘玉春、陈嘉谟、余荫森、孙建业、宋大霈、马济等约两万人防守。他们虽是鄂南会战溃退之师，但几乎都是吴佩孚的嫡系。9月3日，进攻武昌的战役打响，一、四、七军各一部分三路攻城，敌人防守严密，北伐军攻城均未得手。9月5日第二次进攻武昌，李宗仁为攻城司令。蒋介石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 。攻城部队编为左右两翼，以奋勇队为前锋，环城发动进攻。各师的奋勇队配备云梯、手枪、斧头、炸弹、绳索和爆破器材，冒着敌人的炮火，攀登攻城。独立团奋勇队在队长、第一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的带领下，有进无退，一度攻上城头与敌展开了短兵肉搏，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与高度的牺牲精神。由于敌人严密的火力封锁，城墙过高且有重兵把守，致使奋勇队“竹梯甫架，伤亡随之”，独立团阵亡营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八十余人 。自9月13日以来，北伐军“两次强迫登城，均未奏功，伤亡两千余人” 。

9月5日午后，蒋介石偕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南湖、洪山一带视察，见到武昌“城垛坚固，居高临下”，攻城部队，“牺牲过大”，感到硬攻无效，才下令暂停攻城。6日下午，蒋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武昌暂取包围封锁，由第四军和第八军的一部担任围城任务，第七军主力开赴鄂东作战。为了断绝武昌与汉口、汉阳的联系，孤立围困武昌之敌，北伐军发动了攻取阳（汉阳）、夏（汉口）的作战。守阳、夏的敌军有吴佩孚嫡系高汝桐师、鄂军刘佐龙师、以及杜锡钧的水上游兵，共计4万余人。担任攻取阳、夏的北伐军，是唐生智的第八军的三个师和鄂军夏斗寅师。

阳、夏战役前，为分化瓦解城军，董必武、陈谭秋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特别市党部，争取刘佐龙起义，并对汉阳兵工厂、武昌第一纱厂等工人，做了配合北伐的组织发动工作。

9月5日，北伐军何键和夏斗寅两师万余人分水陆两路攻取汉阳，遭到了敌防军高汝桐师和敌援军阎日仁、宋大霈等部的顽抗。进攻龟山的北伐军也“三攻三挫”，后得刘佐龙部的起义与汉阳兵工厂工人武装的配合，集

中火力猛击龟山阵地，同时炮击汉口查家墩吴军司令部，才使汉阳守敌动摇。经过通宵激战，汉阳吴军阵线崩溃。吴佩孚由江岸站乘车出逃，高汝桐向汉口、刘家庙方向流窜，一部分敌军缴械投降。9月6日，第八军攻占了汉阳。当晚，第八军第二师及刘佐龙师一部，强渡汉水，进攻汉口，与敌守备军靳云鹗部展开肉搏，苦战多时，将靳部防军击溃。7日凌晨北伐军占领了汉口。阳、夏之战，毙敌2000余人，俘敌官兵900余人。北伐军占领阳、夏，任命刘佐龙为阳、夏临时公安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

阳、夏光复后，革命势如破竹，旬日之内，连克横店、孝感、广水、东簏店、九里关、武胜关、平清关，将敌军赶到信阳。尤其是北伐军夺得“鄂北天险”武胜关之后，锁住了敌军南援的通道。武昌守敌，至此彻底陷入孤立。

为解救武昌几十万民众于倒悬，9月17日，北伐军武昌攻城军司令陈可钰，在南湖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决定趁敌粮尽、弹缺和兵疲之机，攻取武昌。次日，北伐军总部向守敌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陈嘉谟、刘玉春无投降诚意，并发炮轰击北伐军紫金山阵地。21日拂晓，北伐军下令攻城。城内敌军居高临下，以守待攻，北伐军三次攻城未克。从9月下旬起，北伐军决定掘地道实行爆破攻城。10月1日和3日，守敌曾两次冒险突围出城，均遭北伐军迎头痛击而惨败。10月6、7日两天，守军几次派员与北伐军谈判开城投降。为了不让古城毁于战火，给敌人一条活命自新的生路，北伐军同意谈判。商定10月10日吴军全部撤出，接受改编。嗣因刘玉春拒绝交出武器，谈判再度破裂。守城豫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团长贺对庭，知其顽固困守，无异于自寻绝路，遂单独与北伐军议降。约定10月9日晚开城让北伐军入城。10日拂晓以后，北伐军分途从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通湘门涌入，围歼顽敌。在督军署、学兵营、省长公署等地展开了激烈巷战。陈嘉谟、孙建业、宋大霈、余荫森等部敌军，因饥饿疲惫，无力抵抗，未经激战，即行投降。顽军刘玉春部却困兽犹斗，拒不放下武器，独立团将其包围聚歼，直杀得敌人举枪投诚方止。主将陈嘉谟、刘玉春化装潜逃，被北伐军巡逻兵捕获，10月10日上午，独立团占领蛇山。至此，围攻40天之久的武昌城宣告攻克，江城武汉完全收复。

武昌战役，俘敌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740余人，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60挺，步枪7000余支。革命军在攻克武昌的作战中，伤亡官兵1157人，其中军官伤亡97人。

在武昌攻坚战役中，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的官兵，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健儿，作战英勇，所向无敌，屡建奇功。独立团长叶挺，三十六团团团长黄琪翔指挥作战，身先士卒，骁勇善战，杀敌果敢，立下了特殊的战功，为全军将官的表率，国民政府军委会破格授予叶、黄两团长少将军衔。__独立团伤亡官兵400余名，为表彰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在洪山修建了巍峨的烈士陵园。

武汉是华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吴佩孚称雄中原、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策划进攻广东和兼并西南的战略基地。武汉的光复，捣毁了直系军阀在华中的巢穴，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侵略势力，巩固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推动了两湖地区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鼓舞了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

三、两湖地区工农群众对北伐的支援

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战场作战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固然是由于革命军作战英勇，北洋军阀腐朽反动；然而工农群众对北伐的积极支援，也是两湖作战节节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

北伐先遣队入湘以后，沿途得到工农民众的热烈支持与帮助。独立团抵安仁时，农会负责人陈兵林、周德仔等即向叶挺报告敌军情况，带领团长察看地形。在安仁县的作战中，有十几支农民武装参加战斗。进军攸县途中“农民向导队带领独立团夜间行军，翻山越岭，涉水渡河，给独立团提供了难以估价的帮助”。

醴陵战役打响前，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救国团，在中共醴陵地委的领导下，组织了向导队、运输队、侦察队、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疑兵队、铁道交通破坏队，支援部队作战。他们把醴陵的地形、敌军驻防情况、县内交通概貌，绘制成图，呈送第四军军部，供制订作战计划参考。泗汾桥作战，农民武装 300 余人积极配合，用松树炮轰击北军后方；梭镖队、大刀队夜袭敌人阵地；疑兵队满竖北伐军大旗，吹号呐喊，招摇四方，扰乱和分散敌人军心。独立团得农民武装之助，迅速拿下了醴陵的屏障泗汾桥。当北洋赣军唐福山部由江西萍乡增援醴陵敌军时，株萍铁路工人把湘赣交界地的湘东铁桥炸毁，同时掘断铁轨数处，使敌军车无法通过。《向导》周报评论：“此次醴陵之役，……能于数小时内把万余敌军冲散者，得株萍铁路工人之帮助，诚不小也”。北伐将领陈铭枢、叶挺曾对醴陵民众支前参战给予高度评价：“若不是醴陵民众的许多帮助，打败敌人，攻下醴陵就不会这样快”。第四军政治部指出：攻占醴陵“得农民帮助之力甚大，人民之引路者，送情报者，破坏敌人之交通者，所在皆是。敌败走时，则引我们抄到敌人前方截阻，虽敌炮火猛烈，无丝毫惧色；妇女送茶送粥者，虽高山打仗，仍运送上来”；人民全力支援使“我军能一攻而克”。为表彰醴陵人民支援北伐，第四军军部赠锦旗一面，奖金 1000 元。北伐军收复省城长沙时，省工团联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动组织了 1000 余人的工人保安队，配合革命军警卫大街通衢，收缴散枪，缉拿溃兵，镇压游匪的抢劫活动。“长沙此次未经北军蹂躏，……全赖长沙工人之力”。唐生智、李宗仁在省会各界“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上致答词时，一再强调：“此次七、八两军攻击敌人，以五分之一的兵力，而消灭敌人如此之多，……实是民众援助，人民与革命军合作的硕果”。

平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北伐战争。第四军进抵平时，“平江农民自动组织队伍为前导，对于敌方之主力阵地装置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以及沿途地势均一一详述”。故北伐军发动平江战役时，“某地驻敌若干，某地敌人埋伏若干”，“哪里有工事，哪里有地雷，哪里有路可通”，革命军都了如指掌。使“吴军之防御工事，完全失效”，北伐军“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长驱直入”。第四军强渡汨水时没有船只，农民交通队“以门板、禾桶等件作船筏，渡革命军于白湖口”歼敌。运输队员为北伐运送粮米、弹药，连送数日“不稍露倦容”，“不索取报酬”。队员潘曼云、胡筠、喻杰等随军到了汀泗桥，并且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攻取平江县城的作战中，平江东乡、南乡和浯口、梓江农民武装组织数百人的敢死队，配合北伐军参加了鲁肃山、童子岭、审思岭、天岳山、古城岭的作战。在进攻白石岭的战斗中，“农民大举帮助围剿，……冒弹冲锋，勇猛登山，敌军大乱，夺得枪支无算，毙敌甚多”。从白石岭至青水岭 30 余里间，

农民武装杀得“敌兵节节退却，死亡载道，……农民攻击太猛，阵亡者至十三人”。__在三阳坪，农会会员赖丰林等用梭镖、锄头击毙敌兵两名。张家碑农民敢死队用梭镖、土炮杀死北军8人，夺取步枪10余支。农民曾某，见一荷枪北兵逃窜，即持扁担追击，被敌兵枪伤腹部仍追击不舍，卒用扁担将敌击毙，夺其枪支。曾某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据《湖南民报》、《战士周报》记载：平江战役中工农支前参战在几千人以上，农民毙杀敌军200余人。平江工农民众为北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广州《民国日报》所载：“此次北伐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

吴军从汨罗溃逃经过临湘时，农民手持锄头，在白荆桥、聂家市及县城沿河埋伏，遍竖青天白日旗迷惑敌人，协同县清乡营迎击溃军。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湖北广大工农群众，在中共湖北区（省）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领导组织下，积极支援北伐军攻夺汀泗桥、贺胜桥和克复武汉的作战。汀泗桥一役，鄂南广大工农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为北伐军送茶送饭，抢救伤员，带路送信，修筑工事，割敌电线，破坏敌后铁路交通，直至参战。在贺胜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武（汉）、长（沙）铁路工人组织铁路交通破坏队，设置路障，拆断铁轨，使敌军车、铁甲车无法开动。当北伐军追击贺胜桥溃敌，来不及埋锅造饭时，沿途工农民众在工会、农会组织下，积极为军队挑茶、送水、熬粥、煮饭，全力支援前方。北伐军发起阳、夏之战时，武昌第一纱厂9000多工人，汉阳兵工厂3500工会会员，江汉码头工人、汉冶萍轮驳船工、人力车夫在各工会领导下，全力支援北伐。他们在敌后组织罢工，拆毁桥梁，沉没船只，瘫痪敌人运输交通；京汉铁路工人以江岸分会为核心，制造事放中断军运；汉阳兵工厂工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9月1日开始了总罢工，拒绝为北洋军阀生产军火，配合北伐军攻占龟山。汉阳县农民为北伐军2万余人的攻城部队准备了3天以上的干粮。汉口、汉阳的店员工人，串联停业罢市，在军需供应方面为难吴军。9月5日，唐生智第八军进攻汉阳时，汉阳兵工厂工人武装配合军队解除了该厂反动门卫武装，消灭了驻厂北洋军一个营。他们打开武器库，夺取了大批弹药枪支，还在厂房顶上架起机枪、火炮，协同北伐军夹攻敌龟山阵地。汉阳克复后，兵工厂工人全体复工，“为革命军制造枪炮”、“日产步枪120支”，支援前线作战。__

上述事实说明，两湖战场的每一个战役，都有工农群众的支援或参战，这是北伐军以弱胜强，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胜利来得这样快是不可能的。

第三节 北伐初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 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

一、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

北伐军克复武汉，消灭了英帝国主义培植的直系军伐吴佩孚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统治。伦敦政府惶恐地感到：北伐战争在两湖地区的节节胜利，武汉将变成第二个广州，这不仅意味着英国在华政治、经济权益的丧失，而且危及英国在印度以及整个东方国家的殖民地统治。所以，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中，英帝国主义者充当了急先锋。

首先，大造各国联合出兵、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舆论。

1926年8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以所谓“在华外侨之生命财产受到危害”为借口，叫嚣英、美、日等“关系国”应联合对华进行“外交干涉”。9月9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宣称：对于最近中国之“排外”行动，“列强应采取强硬态度。所谓妥协和衷等等绝无何等效果，不过徒使事态趋于恶化而已”，极力主张联合“日、美两国”，“共同干涉”。9月10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社论，声言对目前中国的时局，“英政府必须出以积极政策”，其第一步“应与日本合作，因为‘日本在华利益，较之英国尤为重要’，其遭受‘南方共产主义攻击，较之其它各国尤烈’。因此，武装干涉中国，当先与‘日本合作’”。9月27日，伦敦《每日快报》社论，主张英美政府联合“组织讨伐军，借日本之臂助”，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该报还声称：“倘日本袖手旁观”，英美可“单独行动”。英国首相鲍尔温，保守党议员布理顿·鲁克，外交部长张伯伦，也异口同声，主张英国政府“采取必要手段”，“与列强合力对华”。

在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反动舆论的煽惑下，法国、日本、美国的报刊，也展开了列强“共同制华”的宣传。法国的《小巴黎时报》、《每日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什么“中国内争，直接害及列强”，为保持“远东之尊严”，赞成用“决然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

其次，支持北洋军阀抵抗国民革命军。大沽口事件后，日本军舰经常为奉鲁军运送武器弹药，掩护奉鲁军的舰只驶入海口。英国政府一次就给张作霖3万具钢盔的军事援助，在讨伐“南赤”的口号下，鼓励奉系出兵南下援吴。北伐军进入武汉时，英国侵略者又“赶运一万五千支枪至汉口助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的喉舌《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煽动孙传芳出兵援助吴佩孚，进攻北伐军：“孙传芳如能善用其优势的地位，侧面攻击北伐军，给北伐军以致命的打击，那他便将受到全中国的尊敬”，将来可以“代替”吴佩孚的地位。果然，孙传芳在英帝国主义怂恿和支持下，调集军队，进攻国民革命军。

第三，推行炮舰政策，进行武装挑衅。“湘鄂战争初起之际，驻沪英、日、美各国舰队司令，曾一度会议”，策划武力干涉中国革命。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频繁调动军舰来华。英国远东舰队，“在南以香港为集中地，在北以刘公岛为军港”，大小军舰46艘，其中21艘停泊在长江。万县事件后，又派来巡洋舰1艘，从地中海舰队派来军舰8艘，飞机20架。与此同时，日本派往长江的军舰增加到17艘。美国自北伐军进攻武汉后，派往长江的军舰由原来的两艘增加到11艘。法国的亚古尔号、亚尔太号、摩里

号来华，分驻汉口、九江，其最大的巡洋舰“求里米来”号载海军 1000 名驻上海。意大利为执行“五国军舰联合行功”的诺言，亦派 3 艘军舰驻泊长江。此时，列强集中在长江水面的军舰，多达 64 艘。为了封锁广州，扰乱北伐后方，颠覆广东国民政府，列强云集在香港海面的军舰共 56 艘，“湾泊香港海面，宛如星罗棋布”。英国军舰卸衣露械，闯进了广州省河，威胁两岸居民，水兵多次武装登陆，制造一连串暴行。1926 年 8 月，英舰在梧州挑衅，封锁广东西江，指使水兵上岸捕人，勾结地主民团，破坏工会、农会。9 月 4 日，沙面英国军舰两艘越界闯入省河，占领西堤河面，驱赶来往船只。水兵 50 余名手提机枪登陆，强占码头，捣毁工人饭堂。9 月 5 日，英水兵无理捕捉、殴打、抢劫广州工人纠察队 2 人。9 月 6 日，英政府下令，将珠江流域、汕头等处省港罢工工人作为“海盗”论处，并派舰只到这些地方进行骚扰。9 月 7 日，英舰水兵 45 名携带机枪，武装抢夺中国轮船，捆绑值班船员，并将船上纠察队员枪械全部收缴。9 月 8 日，英舰无故向中国轮船开枪，并将该轮扣留。9 月 9 日，停泊在第一码头之英舰，架起大炮机枪，指向西壕口和堤岸行人；泊第二码头之英舰，将附近停靠之民船用武力强行驱走。9 月 10 日清晨，全副武装水兵 50 余人从第二码头登陆，向工人、市民挑衅。

1926 年 9 月 5 日，四川万县“九·五”惨案，是这次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最严重的事件。英国的商船、军舰，横行川江，屡肇祸端，撞沉和浪翻川江木船的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1926 年 6 月 13 日，英轮“滇光”号在万县箱子石浪沉木船一只，淹死川民何兴泰等 5 人。7 月 8 日，英轮“万流”号，在丰都立石镇撞沉木划一只，川军六师营长田雨亭等溺死。8 月 2 日，英舰“嘉禾”号在万县涪滩、白水溪一带，连续浪沉木船多只，淹死川军十师官兵 10 余人，沉没饷款 20 余万元。8 月 29 日，“万流”号在云阳江心故意加快航速，撞沉木划 3 只，溺死杨森部官 6 名及士兵 50 余名，损失枪支 56 支，子弹 5600 余发，饷款 85000 银元。杨森的师长郭汝栋从万县江岸搭乘英轮返回涪陵，上船以后，护航英兵竟将郭的随从弁兵缴械。郭将受辱经过呈报杨森，杨森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对他的省政府和总司令部的侮辱和挑衅。

朱德、陈毅得悉“万流”轮肇事之后，坚决支持杨森同英国侵略者作斗争。8 月 30 日，当英国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下驶万县时，杨森命宪兵副司令于渊率兵一排将该两轮扣押，并电重庆交涉员季叔平向英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惩凶和赔偿损失。万县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机关、学校联合快邮代电，揭露英帝国主义在万县的暴行，要求全国声援。

9 月 1 日，驻重庆英领事卢恩德抵万县，同杨森谈判两天，他威胁杨森：扣留“万通”、“万县”两轮，“显系作战行为”。杨森据理驳斥：英轮肇事川江先后 5 次，人命财产损失甚多。“万流”轮在云阳肇祸，我方损失官兵 58 名及乡民数十人，丢失款项 85000 元，多次提出交涉，贵方置之不理。贵国兵舰大炮指南津街，作轰击万县城的架势，谁有作战行动，不待评论。谈判无甚结果。

英国侵略者蓄意扩大事态，不断向万县增派军舰，给杨森施加压力。中共万县党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9 月 4 日，在西较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朱德在会上发表演说，揭露英帝国主义长期掠夺、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号召万县同胞起来抗英雪耻。大会发表宣言、通电，提出：不供给英人油盐米炭，不与英人贸易往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内河不得行驶英国军舰，取消内河航行权，惩办

肇事祸首，抚恤死亡商民、官兵的家属，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道歉^{__}。会后，雪耻会组织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

9月5日下午，“嘉禾”号英海军陆战队员63名，在舰长达礼尔指挥下，由英舰“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掩护，企图用武力劫走“万通”、“万县”两轮，开枪打死中国士兵2名。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打死英水兵13名，击毙舰长达礼尔。英国侵略者趁机扩大事态，用12厘米口径的大炮，对准万县繁华区南津街、杨森总部李家花园以及万县中学等处，轰击近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300余发，万县城内烈火熊熊，尘烟滚滚，无辜居民惨遭横祸。“九·五”事件，万县城有33处遭到敌炮火轰击，烧毁房屋无数，死伤军民1000余人，损失财产逾2000万元，这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二、北伐初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

武汉因国民政府迁入而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原来潜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朗化起来。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大搞军事独裁。以军驭党，以军操政，排斥异己，压制工农，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克复南昌后，蒋介石将他的总司令部搬来这里，在此别树一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阴谋另立中央。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活动，加剧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内蒋、唐矛盾进一步扩大。北伐军收复长沙后，唐生智把第八军扩充成28个团，相当于10个师的编制。控制湖南的政治、军事，实力与蒋相抗衡。北伐军入鄂后，蒋介石为夺得武汉地盘，派第八军攻取汉阳，想借吴佩孚之手，削弱或消耗唐生智的实力。唐生智在作战中，得到鄂军刘佐龙师之助，很快克复了汉阳。实力不仅没有多大的消耗，反而收编了刘佐龙部，汉阳兵工厂也落入了第八军之手。蒋介石指挥第四、七两军攻打武昌，武昌却久攻不下。唐生智得到了许多兵员、枪械，立即把第八军扩充为三个军，掌握了湖北的政治、军事实权，对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在攻取武昌后，让陈铭枢当上武汉卫戍司令，但第四、第十一军的许多将领，蒋介石却指挥不动。武汉地区不是蒋介石的实力范围，只好转移江西。蒋、唐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和其他北伐军将领的裂缝由此进一步扩大。

其二，蒋介石推行专制独裁和分裂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强烈不满，国民党内出现了“迎汪复职”的反蒋运动。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排挤了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的领袖地位，让右派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主席。不久，他又亲自担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兼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蒋介石独专党权，不仅国民党左派、工农群众反对，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官兵、黄埔军校的师生，也强烈地表示不满。希望汪精卫回国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1926年7月起，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江西和上海、武汉等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纷纷致电汪精卫，请其“回国视事”。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和拥护汪精卫为国民党领袖的决定。“迎汪复职”得到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支持。但是，统一战线内部不同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对“迎汪复职”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蒋介石则表示坚决反对。宣称：“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__}。他要共产党帮助维持其总司令地位，不要让汪回国。有的人主张“迎汪倒蒋”，抬出汪精卫打击蒋介石。有的人主张“迎

汪限蒋”，希望以此削弱和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是主张“蒋汪合作”以汪限蒋的。“迎汪复职”在一定程度上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活动。但它不可能调和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不可能达到提高党权和限制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目的。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又挑起了迁都之争。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升级，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分裂。

其三，蒋介石等袒护地主资本家，打击工农运动。随着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工农群众在积极支前参战，援助北伐的同时，还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而进行斗争。城市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参加工厂管理进行了斗争。农民群众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反抗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的斗争。工农运动的高涨，引起了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北伐军里一些出身地、富的反动军官的不满和仇恨。他们造谣诽谤，挑拨离间，说什么：“工人运动过火”，“妨碍北伐”；“农会共产共妻”、“干涉行政”，“扰乱北伐后方”。打击和破坏工会、农会，限制和镇压工农运动。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政治会议公然作出决定：“北伐期间，禁止罢工”。这一反动决定，支持了反动资本家和工贼向工人阶级的进攻。1926年北伐开始时，广州不法资本家为了破坏工人运动，用金钱收买工贼陈森，组织御用工会“广东总工会”，分裂广州产业工人队伍，杀害工人2人。7月16日，广州工代会数千人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司令部请愿，要求惩办凶手，解散东家御用工会，通缉凶手陈森。当革命群众抓获工贼陈森，押送公安局惩办时，蒋介石竟站在“广东总工会”一边。以总司令名义写信给公安局，命令将杀害工人的刽子手陈森无罪释放。此后，广东各地的反动资本家和土豪劣绅，明目张胆向工农反扑。摧残工会、农会，杀害工会、农会干部和农村特派员的事件时有发生。东江区行政委员何应钦张贴布告：诬蔑农会“聚众示威、要挟官吏”、“武装游行，惊扰闾阎”，命令取缔农会。留守广东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竟颠倒黑白，诬告农会通匪，借“剿匪”为名，派军队围剿农会。

1926年11月，武汉卫戍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诬称武汉工会“私擅逮捕人民”。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用北伐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栽诬工会“私擅逮捕，触犯刑律，罪在不赦”，杀气腾腾地准备向工农开刀。在这个布告的煽惑下，各种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向工农群众疯狂反扑。

湖北省总工会为此事致信武汉卫戍司令部，严厉驳斥其诬蔑工农运动的无稽之谈。指出工会扭送工贼，请求政府惩办，是“证据确切”正大光明，合情合理之事，“在手续上并无不当，在革命上且为必要之行为，安能认为擅自逮捕和不法行为？”工人的革命行动，“革命政府应当鼓励，安能视为触犯刑章？”信中还揭露了蒋介石布告所举“事实”纯属“臆断”，并质问“贵司令……是否无地用武，必须向工农团体示威？”——蒋介石的布告表达了国民党右派叛卖工农的险恶意图，是蒋介石镇压工农的信号。武汉地区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没有屈服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及时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给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蒙上了中断和夭折的阴影。

第四节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及其后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等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2月17日大会正式开幕，蔡和森（化名苏方）代表中共向大会致贺词，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3月15日的会议上，李立三（化名陈京佑）报告了“五卅”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情况。这次会议，比较重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民族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合”，是革命“获得胜利的保证”。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会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继续作出指示。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六次扩大全会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军阀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统治的支柱，他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因此，“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整个封建军阀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民主革命政权，是国共两党“革命联盟的基础”。《决议》谴责了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等破坏活动；对国民党“二大”肯定“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人结成战斗联盟”给予了赞扬。

关于革命武装问题：六次扩大全会指出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由于封建军阀集团的崩溃和分化，由于民主组织的影响的扩大，“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道路”。在这方面，广州政府也创造了更加彻底的民主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国民军在华北的建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成就，它和广州军一起成为建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军的基础。《决议》指出：这些武装力量的使命“是坚决打击封建军阀集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维护民族的独立”。

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四亿中国农民群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国工人一道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决定性的革命斗争”。农民问题首先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千千万万农民没有土地，一贫如洗”，地主富户的“租赁条件又十分苛刻”，“弄得民不聊生”。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想方设法帮助扩大和深化广州政府所实行的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应当在各地组织地方的民主机构，实行土地改革”。1926年10月1日，即北伐军进攻两湖以后，鲍罗廷在广州作农民土地问题的讲演时进一步指出：农民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国民革命是要首先解决土地的问题，若不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够成功的”。

关于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的当前任务》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和肯定。文件指出：上海、香港和天津的罢工，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已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成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和主要力量”。又说：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是中国人民反帝解放斗争的转折点和全民运动的起点，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是民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

者和主要战士”。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不断巩固自己的组织，不断加强自己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罢工，以改善工人的待遇。《决议》提醒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国际改良主义”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破坏和影响，及时揭露其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叛徒嘴脸”，党在反对“有害的倾向的斗争中”要加强工会工作，“在工会内部建立党支部”，使自己的组织不断扩大和团结一致”。这样，“党才能保持自己对运动的领导”。

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的上述指示，其基本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重视农民问题，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以及自身的建设，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革命的指示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和失误：首先，在国共合作方面，《决议》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性质及其作用估价偏高。会后，共产国际领导集团内部对国共合作出现了严重分歧。《决议》认为，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广州国民政府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了联系”，“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和“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也是“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样板”。这就夸大了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性，忽略国民党内还有地主、资产阶级反共右翼势力的存在。由于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价过高，因而六次扩大全会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加入共产国际，把蒋介石当作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名誉委员。六次扩大全会闭幕不久，中国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对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出现了分歧。季诺维耶夫等主张“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斯大林等则认为退出国民党，无异“使共产党人从各种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斗争中退出来”，共产党人应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斯大林等主张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强调国共合作时，同样忽略了对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反共篡权活动进行斗争。鲍罗廷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执行和贯彻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估价偏高和对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共产国际的这个政策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策，也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国际由来。其次，在革命武装方面，同样存在把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革命性估价过高。《决议》对这两支军队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具体分析，概然称之为“彻底的民主武装力量的组织”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军的基础”，把建立革命武装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官和对旧军队的收编上，没有提出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问题。六次扩大全会后，共产国际来中国的代表，都没有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的观念。“中山舰事件”后，中共提出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势力”，国际代表不赞成，甚至批评中共在武装问题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过分注意军事工作”。他们害怕“引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因而反对武装农民，把从苏联运来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蒋介石。由于共产国际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军队，不同意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独立掌握正规军队。当国民党反动军官发动军事叛乱时，人民革命力量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再次，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由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估价过高，因而把解决农民土地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希望广州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实行土地改革。其实，广州国民政府执掌

军政大权的要员，“大部分出身于中、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对土地改革怀有反感”。因此，依靠广州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

北伐军占领两湖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迫切要求铲除封建剥削，改变土地所有制。共产国际代表时而提出在北伐军已克复的地方，“一俟政局稍定”，即“从速解决土地问题”；时而指示中共：“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开始重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也未指出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闭幕后，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没有即时回国。蔡和森留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向警予等留苏联学习。

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李维汉、彭述之、项英、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还有团中央代表和各地区负责人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

会议是在革命发展的重要转变时刻召开的：即一方面，国民革命军北伐正在向湖南战场推进，工农群众运动从“五卅”运动后开始在全国蓬勃开展；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出现了“讨赤”的反革命联合，制造大沽口事件，炮击国民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策划“三·一八”惨案，指使段祺瑞政府血腥屠杀示威群众。与此同时，在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起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策划了“整理党务案”。

面对变化着的复杂的政治形势，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继续贯彻中央二月北京特别会议精神，发展大好形势，掌握革命领导权，打破国民党新右派对北伐的控制，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然而这次全会未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报告》，还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和《军事运动议决案》等13个议决案，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

上述议决案和主张，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作了一些正确的分析，原则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会议受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影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首先，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央政治报告》和《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中国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军阀残酷压迫及其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目前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到了一个“新时期”。但另一方面，美、日等帝国主义者与直、奉北洋军阀，基于维护自己反动统治的政治需要，在反对“南北二赤”的口号下暂时协调合作，正在策划扑灭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党在当前任务是：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建立各阶层人民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

的统治。这种分析和提法，理论上原则上是对的。但是《政治报告》和《对时局的主张》对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却采取消极的态度，只字不提北伐的意义和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任务，也没有把正在胜利发展的北伐战争作为推翻军阀统治的主要手段，离开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实际，空谈“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强调国民会议运动“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种脱离当时革命斗争实际，把国民会议运动作为党在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和基本口号，企图以国民会议取代武装斗争、结束军阀统治和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这只能导致无产阶级在北伐战争中领导地位的丧失，这是党还不重视武装斗争的表现。

其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议坚持了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提出要“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政治报告》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国民党的成分作了分析。认为：军阀、官僚、买办、新旧士绅代表中国的“半封建势力”，“他们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是“反革命”的；工农群众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遭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有感觉革命之必要”，工农阶级应争取团结他们；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同，他们和帝国主义、军阀有矛盾，“有倾向革命之可能”，但又容易和它们“妥协”，甚至“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政治报告》还认为国民党内已分化为四派即代表工农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共产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代表资产阶级的中派（即新右派）；代表军阀、官僚、买办、新旧士绅的右派。国民党内部这种分化，正是“上面四种社会势力”的“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议决案》中指出：“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新右派策划的一次“对共产党进攻”，适应了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的需要，“是反革命的行动”，并检讨了中共对“中山舰事件”的妥协退让政策，同时批评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上述分析对认识近代中国国情，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有益处的。然而，《政治报告》和《议决案》中又提出了与之互相矛盾的错误观点，如在分析资产阶级时，说它在民主革命中，“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它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这种过高估量，实际上否定了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又如对“中山舰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说是由于中共对国民党“包办过多”，“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掩盖了新右派为篡夺领导权而阴谋策划的事实。基于上述错误认识，因而在实施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具体方针、政策上，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不敢对其反动倾向作原则性的斗争，陷入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关于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争取，主要不是同资产阶级争夺国民党党权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是局限于群众运动、群众组织，“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下，中共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日益削弱，党、政、军实权，均被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掌握。《议决案》规定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之“密切地联合（汪精卫、甘乃光等）”，“共同应付中派（新右派蒋介石戴季陶等），公开反对右派（冯自由、古应芬等）”。“扩大左派”就是“帮助”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扶助”他们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不是“代替左派”。《议决案》认为，中派已取得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中共对他们应采取“竭力赞

助”的政策，只要中派不镇压工农群众，就要帮助他们发展。会议对新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阴谋活动，未加有力的揭露和谴责。

再次，关于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问题。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一致地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并对保障农民最低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作出了规定。如限定租额不得超过农民收获量的50%；月息最高不得超过2分5厘；农民有集会、结社自由；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司法等职权。但是，《议决案》借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因而对农民运动提出了种种限制。其一，规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在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口号下，主张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团结”，中立“不积极作恶的地主”，混淆了农村阶级阵线，使农民最低的政治、经济要求无法实现。其二，不许农民运动超越资产阶级政权所允许的改良主义范围。规定农会“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主张“以正绅代替劣绅”，保存地主阶级绅权；“地主与农民有冲突时”，应让受地主阶级控制的“旧农会居调停地位”；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能用“自卫军名目”，“以免引起误会”。《议决案》之所以对农民武装实行种种限制，就是害怕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即害怕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农民政权，取代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社会地位。

在《军事运动议决案》中，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随时都准备武装暴动”，在民族革命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但所规定参加的武装斗争工作，只是帮助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发展。即在军阀部队中作军事运动，以促其分化瓦解，并争取其归附到国民党方面来；通过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促使其“团结”和“革命化”。当时，在无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些工作客观上是帮助资产阶级发展军队。《军事议决案》虽然提到要“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但同时又在农民运动等《议决案》中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工农武装力量采取种种限制。

北伐战争时期，本是发展中共领导的武装的极好时机。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也由于中共在当时对争取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扩大会议没有提出建立中共直接领导人民军队的任务。

扩大会议是北伐大举进军湖南和占领长沙之后召开的。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大好的形势。然而会议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移到北伐战争方面来；会议提到了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然而却把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这些极重要部位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虽然认识到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运动，但又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限制在改良主义的“合法”圈内；至于事关大革命发展全局的无产阶级掌握军队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则很少涉及。也就是说，在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策略上，扩大会议陷入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扩大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政策，但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全面执行贯彻。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各地党组织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仍以北伐战争为主要工作任务，满腔热情地领导群众直接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及时纠正扩大会议在北

伐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号召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推动北伐战争，这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谭平山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邵力子以共产国际同情党中国国民党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这时，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中国大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它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震动了东方国家和世界。鉴于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需要重新思考和确定。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的第一天，选举了布哈林、斯大林、曼努意斯基、谭平山等22人组成了大会主席团，成立以彼得罗夫为主席的中国委员会，11月29日，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30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12月16日，全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从理论和策略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严重性。

斯大林说：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是极端错误的。在现今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决不限于直接派兵入境，更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等直奉军阀的“反赤联盟”的形成，就得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金钱和军械的援助。共产国际《决议》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民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者认识到“军阀不再是破坏革命运动完全合用的工具，便通过和解政策在民族运动内部寻找其他同盟者”。即一方面，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政府相继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教唆”对革命“一直持观望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部分大资产阶级，乃至军阀”，“转向广州政府方面”来。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从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中夺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阻止革命的发展”。《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警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策略手段的新变化，戳穿“其背后隐藏着”的“反对革命的敌对阴谋”。

第二，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斯大林批驳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只有“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而满足农民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最必要的条件。他要求国共两党，都应设法帮助农民满足其最切身的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决议》进一步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也“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谁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谁“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

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当立即实现如下土地政策：减少地租；取消或减低捐税负担；没收反动军阀和与国民政府为敌的买办、地主、土豪的寺庙与土地；保障佃农的佃权；限定地租最高额；解散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支持农会；资助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清楚地表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又是土地问题。

第三，阐述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批评了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忽略和低估了中国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批评他们“不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做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他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中国封建军阀共同绞杀革命的严重事实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论断。并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研究军事”和“学好军事”，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而应看成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共产党人应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模范的体现者”，争取在革命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第四，指明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政权的性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大体上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个政权，“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那么，这个“过渡”是否一定胜利并且绝对胜利呢？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但“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争取“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前途。斯大林批评了某些中共党员提出现在退出国民党的极错误主张。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及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从思想理论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及帝国主义干涉的严重性；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批评了中共领导机关在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土地革命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对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有积极的意义。

七次扩大全会虽然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但由于斯大林等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实情知之不多，也由于中国大革命形势发展变化迅速，因此，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未能在制定具体政策和指导革命实践上充分发挥作用。

其一，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决议》都提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如不满足农民要求，“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以满足农民的要求。然而，七次扩大全会并未提出明确具体的土地革命纲领，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寄希望于广州政府自上而下没收地主土

地，减免农民的捐税，实行土地改革。但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右派手中，要依靠他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

其二，关于革命武装问题。斯大林过高估价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把它们概称为“中国的革命军队”。认为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对其缺乏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忽略了它们仍在限制工运、压迫农会的事实。由于夸大了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革命性，因此只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尽力加强政治工作”，帮助它们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体现者”，根本不提共产党人争取军队的指挥权，更没有提出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任务。

其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批评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多次提到无产阶级要“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面向着无产阶级”。《决议》亦提出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巩固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对农民的领导也应由无产阶级来实现，“共产党应该领导农民运动”。但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怎样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以保证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议》都没有提出明确、彻底的纲领和政策，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指导思想是模糊的，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例如，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虽然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但又规定只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把广州国民政府，看成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民主专政的萌芽”，共产党人“应该参加”，“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促使广州政府”满足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至于关系中国革命成败进退的革命武装和农民土地问题，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和决议，从未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建设自己领导的人民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反而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约束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实际上把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没有及时把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提上议事日程，因而土地革命也就无法实行。中国共产党不牢牢掌握军队和没有依靠工农做坚强的后盾，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也就在事实上被架空。这是七次扩大全会在中国革命基本策略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在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错误认识 and 主张，吻合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了中共中央大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把大革命推向新高潮和变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胜利的有利时机，这也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

第五节 北伐战争在赣、闽、浙战场的胜利

一、决战江西

北伐军光复江城武汉，消灭了吴佩孚直系军阀的主力，两湖战场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实现北伐的战略目标，国民革命军将军事重心由两湖转移江西，同北洋直系另一军阀集团——孙传芳为首五省联军作战。

江西位处湘、鄂、闽、粤、浙、皖之间，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是吴佩孚、孙传芳屏障东南五省和进攻湘、粤的前哨阵地。江西战场是北伐军同孙传芳军阀集团作战的主要战场。

吴佩孚的主力在汀泗桥、贺胜桥被打垮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同北伐军作战。1926年8月3日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抽调兵力，组织援赣军进入江西作战。

9月，孙传芳把赣军和援赣军合编为五个方面军，分别以赣军邓如琢、苏军郑俊彦、浙军卢香亭、闽军周荫人、皖军陈调元为各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合计20余万人。除周荫人第四方面军留闽外，其他四个方面军都到江西作战，计11个师又12个旅。南浔线上，战将云集，大兵如潮。

国民革命军三路入赣作战。一路由第二、第三两个军5个师组成，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总指挥，从醴陵向赣西攻击前进；另一路由第一、第六两军3个师组成，由第六军军长程潜任总指挥，由湖北咸宁向赣西北进击。第三路由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军第四十六团组成，由湘粤边境的汝城、南雄进入赣南。三路合计4.6万人，计划从赣西、赣西北、赣南分进合击，会攻南昌，夺取江西。

北伐军攻取江西的作战，以攻取南昌为标志，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926年9月初开始。

9月5日，朱培德指挥第二、三两军5个师，从醴陵入赣，大破赣军邓如琢、唐福山、张凤歧各部，先后占领赣西的萍乡、宜春（袁州）、分宜、新余、清江等重要城镇。与此同时，程潜指挥的3个师从湖北通城向赣西北进军。在修水、铜鼓与孙传芳嫡系劲旅苏军谢鸿勋师激战多日，重创强敌，占领修水、铜鼓、奉新、高安等城市。为配合赣西、赣西北的作战，赖世璜指挥的原驻粤、赣边境的北伐军，在赣南打垮了赣敌杨如轩、杨池生部，占领安远、信丰及赣南军事重镇赣州。9月中旬，三路北伐军已对省城南昌形成包围之势。9月19日晚，程潜指挥所部，乘敌防务空虚，一举攻占了南昌。

革命军占领南昌后，孙传芳大为震惊，即令卢香亭、郑俊彦、邓如琢等三路反攻南昌，限18小时内夺回省城。

当时江西战场总的军事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程潜孤军冒进南昌，与北伐军其他部队失去配合，当敌军分三路大举反扑时，程潜寡不敌众，所部损失过半，9月23日仓猝撤退，南昌得而复失。

江西作战的第二阶段开始于9月下旬。

孙传芳夺回南昌后，亲赴江西前线指挥作战，制定了一个兵分三路反攻北伐军的计划，阴谋占领长沙、武汉。

这时，蒋介石亦率北伐军总司令部人员赴前线督战，设总部于高安。9日，北伐军劲旅李宗仁第七军主力2万余人奉命入赣，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与孙联军精锐苏军谢鸿勋部、浙军卢香亭、李俊义部，在赣北发生激烈战斗。敌谢鸿勋部溃不成军，卢香亭、李俊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第七军连

克箬溪、德安、王家铺，三战三捷，歼敌 1.5 万余人，打乱了孙传芳的全部作战计划，改变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不利形势。

与第七军屡挫强敌，连战皆捷同时，北伐军第三军两个师和第十四军，9 月 24 日，打垮了赣军蒋镇臣部 6000 余人。占领赣江中游的重要城市吉安，随即挥师东进，占领了吉水、永丰、乐化、宜黄、广昌、新干等城市，继而乘胜北上，10 月初，连克赣江中游战略要地樟树和丰城。

与此同时，朱培德第三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与敌苏军郑俊彦四个旅鏖战，歼敌 2000 余人，占领了万寿宫。

北伐军三路告捷，对南昌再次形成三面合围之势。10 月 6 日，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蒋介石亲自到南门口督战。由于敌军事先周密布防，从 6 日到 11 日，久攻不克。蒋介石下令强攻，北伐军阵亡官兵数百人。10 月 14 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围，第二次攻打南昌失败。

10 月中旬，北伐军开始江西战场第三阶段的作战。

国民革命军总结前两次攻打南昌的经验教训，重新制订作战计划，将入赣北伐军编为左、中、右三路，由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任各路指挥官，蒋介石为总指挥，统一部署，协同作战，集中兵力于南浔路与孙联军决战，消灭其主力于赣北，夺取南昌。并定 11 月 1 日开始总攻。为加强江西战场北伐军的力量，总司令部电令第四军入赣作战。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北伐军发动抚州战役，歼敌刘宝题、杨如轩等部官兵 1000 余人，占领抚州，截断了孙军南窜入闽的通道，从东南方向形成对南昌的合围，为决战南浔路创造了条件。

11 月 1 日，国民革命军左、中、右三路大军向南浔路各据点发起总攻，加伦将军和蒋介石都到前线指挥。第七军、第四军张发奎师，首先攻占了南浔线交通枢纽德安。11 月 3 日，张发奎第十二师，贺耀祖独立第二师及第七军一个旅，在马回岭等地与孙军嫡系颜景崇、马登瀛、上官云相等部发生激战，占领军略要地马回岭。

北伐军占领德安、马回岭，将南浔路敌军截成两段，南昌、九江之敌首尾不顾。11 月 4 日，独立二师 3 个旅进攻九江，围歼颜景崇、马登瀛、上官云相残部 3000 余人，九江攻克。

九江乃赣、鄂锁钥，“七省通衢”和南京门户。九江攻克，赣北敌军望风溃退。11 月 5 日至 7 日，北伐军连克赣北军事要地瑞昌、湖口和武穴，敌向南京逃跑。

与第四、七两军及独立二师发动德安、九江、马回岭战役的同时，程潜第六军沿南浔路南下追击浙军卢香亭部。11 月 5 日，在乐化与敌 6000 余人相遇，歼敌 2000 余人，占领乐化车站。继而挥师北上，11 月 6 日占领涂家埠，与李宗仁部会合，逐个歼灭孙联军在南浔线上的各个据点。11 月 7 日，敌军主帅孙传芳从湖口乘快舰逃回南京。

南浔线上各次激战，消灭了孙联军的主力，南昌敌军 1 万余人孤立无援。11 月 8 日，北伐军攀墙攻城，敌守城军司令官唐福山、岳思寅等无力抵抗，缴械被俘，南昌回到北伐军手中。

南浔路决战，为时不过旬日，北伐军以破竹之势，摧毁了孙传芳在江西的十几万精锐之师。这次战役，革命军俘敌 5 万余人，缴枪 5 万余支。此后，孙联军作鸟兽散。孙军马济部退守太湖，陈调元败走安庆，王普回芜湖，卢香亭走杭州，郑俊彦溃窜江埔。他们有的宣告独立，有的等待时机再起。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作战的胜利，打垮了孙传芳集团的主力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扩大了国民政府管辖的范围，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创造了条件。北伐军占领武穴、九江、湖口，抓住了控制长江的锁钥，掌握了进军苏、浙、皖的主动权，对北伐进军东南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二、占领福建

福建战场是北伐进军东南五省的重要战场，战略地位仅次于江西。北伐前，统治福建的是闽省督理兼第二师师长周荫人。所辖的军队号称6万。内部矛盾重重，周荫人能指挥动的兵力不过3万余人。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后，周荫人部编为第四方面军，周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将所部改编为四个军：张毅、李凤翔、刘俊分任一、二、三军军长，第四军军长周自兼任。周不是孙传芳的嫡系，但也属于孙的势力范围，奉命屯兵闽、粤边陲，牵制和威胁广州政府。

当时，闽、粤边界驻防的北伐军是何应钦第一军三个师：即谭曙卿第三师、冯轶裴第十师、钱大钧第二十师的一个团以及张贞的独立第四师，共计7000余人，不及闽军人数的三分之一。

9月中旬，周荫人奉孙传芳之命，兵分三路进攻粤东。令张毅第二军两个旅出潭州，攻诏安、饶平；李凤翔第二军曹万顺、杜起云两旅由岩前、大坝进袭蕉岭；刘俊第三军两个旅出永定、峰市，向松口、大埔、梅县推进；第四军作总预备队，集结于长汀、上杭。共计兵力2.5万人，周荫人设行营于永定，坐镇指挥各路。

闽军的行动严重威胁着北伐军后方的安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命令驻防粤东的何应钦第一军，由驻防军转为攻击部队，率领所部进军福建。

福建战场的战幕拉开前，国共两党对闽军做了不少的策反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派共产党员到福建上杭策动曹万顺起义参加北伐。北伐军总司令部派出国民党左派在曹万顺部官兵中做争取工作。1926年10月8日，闽军第二军曹、杜两旅在蕉岭通电起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任第二师师长。曹、杜倒戈，削弱了闽军的实力，为北伐进军福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伐军在福建战场作战，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军闽西南，击溃闽、粤边界闽军，攻占永定、松口、长汀。时间是10月初至10月底。

永定为闽、粤交通要道，是闽军补给中心和前线指挥首脑机关所在地。10月8日，何应钦令谭曙卿师由大埔进攻永定，并命冯轶裴师攻占峰市，切断闽军永定至松口的交通，使永、松之敌首尾不顾。10月9日，谭师两个团进击永定，战幕由此拉开。10日，谭师第七、八两团分别从西南的老虎寨、城东的书院岗包围夹攻永定城之敌，守城卫队旅为周荫人之精锐，抵抗顽强。永定城内民众及城外民军积极配合北伐军作战，守城敌军在前后夹击和内外受困的情况下，大部分挂起白旗投降。周荫人于乱军之际，率少数卫队化装逃跑。永定一役，俘敌官兵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800余支，守敌几乎全军覆灭。

北伐军占领永定后，回师进攻松口之敌。松口守敌为刘俊第三军7000余人，是闽军侵粤的主力。10月11日，冯轶裴师占领峰市后，与第三师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松口攻击前进。12日，迭克观音凹、大金坑等高地。13日凌晨，合力猛攻松口，敌军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至下午2时，闽敌刘俊放弃抵抗，向隆文、松源突围逃跑，遭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的截击。除刘

俊率 200 余人突围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刘俊残部流窜闽西，沿途遭到民军袭击，途经连城附近，被民军乱枪击毙，至此闽军第三军全部覆灭。松口战役，俘敌旅长李宝珩及营团以上官佐 60 人，连以下官兵 5900 余人，缴枪 5700 余支。松口攻克后，10 月 15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入闽作战的北伐军合编为东路军，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

永定、松口被革命军攻克后，从永定败退之敌孙云峰第四军与驻守上杭闽军李凤翔第二军，慌忙撤退到汀州（长汀），妄图凭险固守，牵制北伐东路军，并策应江西战场孙联军作战。此时，北伐军曹万顺第十七军向汀州进击。赖世璜第十四军亦奉命从江西入闽加入东路军作战。10 月 27 日，该部东出瑞金，29 日占领长汀城西北高地。北伐军第十四、十七两军，分别从东南、西北两面夹击李凤翔、孙云峰残部，随即占领长汀城。李、孙率少数随从逃走。

永定、松口之役，北伐军以寡击众，以少胜多，连克永定、峰市、松口、长汀。闽军第二、第四两军和督署卫队旅溃不成军，闽军劲旅第三军全军覆灭，主帅周荫人易服出逃，骁将刘俊阵亡，瓦解了闽军士气，扬了国民革命军的声威。此后，闽军纷纷向北伐军投诚，因而加快了国民革命军在福建作战的胜利进程。

福建战场第二期作战是进军沿海、闽北，肃清周荫人残部，占领省城福州。时间为 11 月初至 12 月中旬。

闽战初期，踞闽南的闽军第一军张毅部 1 万余人，曾一度占领闽粤边境韶安、饶平，拟向汕头推进。永定被北伐军攻克后，张毅立即撤回漳州，与孔昭同部会合，在漳州、南靖、天宝一带筑阵防守，妄图阻止北伐军向福建沿海进军。

北伐军东路军奉命追剿闽南之敌。11 月 7 日占领南靖，8 日克复漳州。接着，连克同安、泉州、仙游、莆田、永泰，一路势如破竹，直抵福州附近。张毅余部节节向闽江下游败退，企图与驻福州的闽军会合。

驻福州的闽军是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部和海军第一舰队，兵力雄厚。北伐军兵临福州城时，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国民党左派代表施秉政以及何应钦的代表，先后同李生春谈判，争取其“易帜反正”。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国民党人林森、中共福州地委负责人，还做海军司令杨树庄、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秀良的工作，充分肯定他们同情北伐的进步倾向，希望同他们携手合作，经过多番谈判争取，李生春、陈秀良等联合一致，拒绝张毅入驻省城。12 月 2 日，李、陈发表联合宣言，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加入北伐阵线。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推李生春任保安司令，维持省城秩序。李生春、陈秀良等附义北伐，为国民革命军占领福州，消灭张毅顽军创造了条件。

江西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奉命进军闽北，协助东路军第一军和第十四军，歼灭周荫人部。11 月下旬，该师官兵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共产党员）、师长戴岳、副师长朱耀华率领下，从南昌出发，经抚州、资溪，进入福建，连下光泽、邵武、建阳，直驱建瓯。在此，与闽北陆军警备队何麓昆 3000 余人相遇。何部在北伐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缴械投降。与此同时，闽北民军卢兴邦部袭击了驻延平（南平）的苏埏第三十混战旅旅部和孔昭同第二十九旅，配合北伐军打击闽军。12 月初，东路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连克邵武、建阳、顺昌、将乐、泰宁等地。第六师在党城、政和两地歼敌 3000 余人，并乘胜追击，周荫人率领闽军残部，从松溪等地逃

入浙江境内。至此，福建战事遂告结束。12月18日，何应钦率第三、十四两师进驻福州。

北伐军在福建作战的胜利，消灭了孙联军的第四方面军，粉碎了孙传芳利用福建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阴谋，打通了北伐军由闽入浙的通道，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同孙传芳决战，为进军苏、浙、皖准备了条件。

北伐军在福建战场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首先是闽军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和领导核心。闽战初期，孙传芳命周荫人掌握福建军政大权，将福建境内各军统编为第四方面军，但闽军各部仍各占一方，没有真正统一过。就是北伐初期周荫人统治最得势的时候，他能指挥得动的军队不过一半。张毅自成系统，与周荫人分庭抗礼，周派旅长孔昭同，跟踪监视张毅的行动。第二军李凤翔同周有矛盾，周派亲信刘俊第三军尾随李凤翔部，随时准备缴第三军的械。此外，闽系陆军和海军的矛盾也很深。由于闽军内部矛盾重重，各军之间互不协调，貌合神离，按剑相防。因此，在战争中势必导致兵力分散，指挥不一，作战不配合。福建战场，闽军人数虽几倍于北伐军，但北伐军能有效地利用闽军的矛盾和弱点，各个击破，战而胜之。

其次，国共合作积极开展对闽军的争取和瓦解。东征福建，国共两党在北伐军中，在福建民众和闽军中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闽战前夕，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李木庵，北伐军总司令部派孙祥夫等赴上杭，争取闽军第二军曹、杜两部起义。共产党人王荷波、郭滴人、朱积垒、徐琛、陈明，国民党左派陈卓凡、张旭高等，以东路军政工人员，国民政府地方干部，工农运动特派员等身份，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治理整顿地方政权，建立和健全工农团体，组织民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蔡姗，共产党员陈烈、国民党人钮永键、林森、国民党左派施秉政等，亲自到闽军中做统战和策反工作。策动福建海军起义，争取福州城防司令反正，分化瓦解敌军，对加快福建作战的胜利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人民群众的支援和福建民军的配合。广大工农群众支前参战，福建战场也不例外。北伐军入闽后，福建人民都以各种形式踊跃支援前线。革命军打永定城时，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割断电线，破坏交通，使周荫人与各部队失去联络。北伐军所到之处，福建的工人、农民纷纷组织运输队和交通队，为军队挑行李、运粮食、送弹药、侦察敌情、联络交通。人民群众踊跃支援是北伐军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周荫人督闽期间，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其苦，以“抗周自卫”相号召，自发聚众反抗。各地民军，应时而起。闽省境内，南起永定、龙岩、上杭，东到莆田、会安、晋江，西至连城、清流、汀州，闽北、闽中的延平、戈田、龙溪，纵横数十余县，“民军蠭起，多至不可胜数”，“大者拥众三四千，小者亦有三四百，对周军均取敌意”^①。福建战役打响后，闽西民军罗伟部，在清流、连城等地截断长汀闽军逃窜的去路。闽南的陈国辉、叶定国、陈烈臣、林志民各部，或合攻泉州，或进击长泰，或袭扰漳州。闽北的卢兴邦部，阻止延平南下增援之敌，骚扰袭击周荫人部。总之，各部民军在“肃清省内各敌”方面，“所在有功”^②。福建民军大都来自农民，深受军阀的剥削和压迫，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北伐军在福建战场的作战，起了很重要的配合作用。闽战结束后，东路军将福建民军收编成三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三个独立团，组成新编第一军，委谭曙卿为军长。

三、进军浙、苏、皖

浙、苏、皖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军阀孙传芳的腹地。孙传芳在江西战场败北逃回南京后，为稳住其对江、浙的统治，他一方面将余部集结沪宁、沪杭西线；另方面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捐弃前嫌，共组安国军，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1926年12月上旬，孙传芳在南京召开苏、浙、皖三省的重要将领会议，妄图以浙江为基地，从北伐军手中夺回江西。

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和收复福建之后，为消灭北洋军阀在长江下游的势力，决定移师浙江战场。1927年1月初，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进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确定先期攻取沪、杭，然后会师南京；将北伐军作战部队编成东、西、中三路，以东路军为主担任浙江战场的作战任务。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沪杭、沪宁两线，并以杭（州）、嘉（兴）、湖（州）为其驻防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故东路军在浙江的作战，多在浙西钱塘江流域及浙、赣路沿线。

浙江作战，从1927年1月初开始至2月18日结束，可分为两个阶段。

战争初期，由于北伐军东路军的主力仍在福建，浙江战场兵力对比敌优于我。1927年1月初，孙军嫡系部队、浙军总司令孟昭月部以三师之众，在闽军周荫人的配合下，向驻富阳的东路军第二十六军的第一、二两师发起了进攻。由于敌众我寡，第一师虽经顽强苦战，仍不能击退优势敌人的进攻，被迫放弃富阳，向游龙、衢州方向退却。1月上旬，敌孟昭月、李俊义、刘宝题各部，分兵数路继续向游龙、衢州地区追击北伐军，对北伐军大有三面包围之势。面对敌军重兵合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方面指挥各师转守为攻，放弃衢州，转移严州及其以西地区，在运动中击溃来犯之敌，先后占领了游龙、汤溪、洋埠、游埠等地；另方面致电北伐军总司令部，迅速派兵增援浙江战场。

1月中旬，东路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十四、第十七各军相继入浙，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浙江作战进入第二阶段。此时，进入浙西的北伐军，左、中、右三路分兵，主动进击敌军。1月29日，浙军孟昭月从兰溪向杭州逃走；敌李俊义、周荫人、王森各师向诸暨、浦江、桐庐仓皇溃退，至2月初，北伐军前后歼灭敌军2000余人，占领兰溪、金华、开化、淳安等城镇。2月3日，中路军占领了严州，随后占领桐庐；右路军进占浦江，继续向诸暨进军；左路军占领淳安后，主力向分水追击。

2月中旬，敌孟昭月从兰溪逃回杭州后，不甘心其失败，在杭州纠集各部，向北伐军疯狂反扑。孟亲临富阳督战，孙传芳派出卫队旅进攻桐庐，周荫人师在诸暨向革命军阵地反攻。国民革命军迎头痛击各路来犯之敌。15日克新登，16日克富阳，诸暨、余杭等地相继被北伐军占领，杭州为之震动。17日凌晨，孟昭月、周荫人、浙江省长蔡朴，率所部2万余人，仓猝离杭，退走嘉兴、松江。18日下午，北伐军克复杭州。在粉碎敌军反扑的作战中，北伐军俘敌官兵8000余人，缴获步枪6000余支，机枪100挺，大炮10余门。

与东路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十四、第十七各军在钱塘江下游及沪杭线上追击敌孟昭月部的同时，东路军第四、五、六三个纵队，由闽入浙，分途向浙江南部的江山、处州（丽水）、温州兼程前进，占领这些城市，乘胜向浙江中部和东部推进。2月17日，东路军第五纵队进抵金华，18日占领绍兴。

2月14日，东路军第六纵队进军临海（台州）、奉化，21日，占领了浙东水陆交通中心宁波，敌从海路逃走上海。东路军各纵队，在浙东绍兴地区胜利会合，至此，北伐军占领了全浙。

北伐军在浙江作战，得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在汤溪、兰溪作战中。中共杭州地委负责人、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宣中华，组织省党部代表团随军行动，沿途组织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支援北伐军作战。孟昭月退出杭州时，沪杭铁路工人拆毁铁轨，破坏交通，造成敌军运输瘫痪。杭州工人和市民，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纠察队，维持市内治安，清剿散匪溃兵。浙东各地农民，自动组织运输队，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奉化农民自造土枪土炮，配合北伐大军，围剿周荫人残部。人民群众的支援，是东路军在浙江战场迅速胜利的重要原因。浙江克复后，为北伐军进攻苏、皖和夺取沪、宁创造了有利条件。

孙联军从浙江败退后，收其余部集结于松江、青浦、上海和苏州，并在苏、浙两省边境的嘉善、枫泾设置防线，与鲁军张宗昌部合作，妄图卷土重来，与东路军作最后的较量。

2月23日，东路军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攻取沪、宁和占领苏、皖的作战计划，决定：东路军第一、二、三各纵队沿沪杭线进攻上海；第四、五、六各纵队沿沪宁线攻取苏（州）、常（州）；然后与进攻安徽的程潜、李宗仁江右、江左军会攻南京。

3月中旬，东路军第四、五、六各纵队，在沪宁铁路工人的协助下，首先占领了常州、丹阳，将敌沪宁防线中段突破，切断了上海、南京之敌的联系。北伐军在沪宁线上左右开弓，一路东进松（江）沪，夺取上海；一路西取镇江，与江右军会攻南京。

3月21日，东路军各纵队分途出击，分别占领了松江、青浦、苏州、昆山，俘敌2000余人，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3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武装起义，消灭北洋直鲁军5000余人，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

当东路军在沪杭、沪宁线上节节胜利之时，北伐军江右、江左各军，向孙传芳、张宗昌的“安国军”发动了强大的军事攻势。江右军占领了皖省重要战略城市安庆、芜湖和当涂；江左军控制了合肥、六安和蚌埠。2月下旬至3月上旬，孙联军刘宝题，皖军陈调元、王普，湘军叶开鑫等各部，在安庆和皖南地区，相继更旗易帜，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分别就任北伐军的军长。这样，北伐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安徽。

北伐军东路军占领了上海、苏州、常州和丹阳，江右军收复了安庆、芜湖和当涂，江左军控制了皖中的六安、合肥和蚌埠，南京之敌陷于三面包围。3月20日凌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命令各纵队，向南京外围敌军各据点发动总攻，经过三天作战，摧毁了敌南京外围据点，扫清了攻取南京城的障碍。23日，紫金山下炮火连天，硝烟如云，程潜率江右军进攻南京。经过浴血奋战，24日上午，占领了历史名城南京。

上海、南京，是孙传芳反动统治的中心。北伐军收复东南五省和占领上海、南京，标志着孙传芳反动统治的覆灭。

第六节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湘鄂赣三省工人运动的发展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湘鄂赣三省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在湖南，北伐军占领长沙后，9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省总工会。在省总工会的领导下，长沙、衡阳、常德等20个县成立了总工会。全省产业及职业工会已有76个，会员11万人。10月12日，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决定三项原则：“1.本党公开的领导工人运动，使工人自然立于本党指导之下来活动；2.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取得领导地位；3.工人阶级应仍随时随地作经济斗争，以逐渐改善其生活状况。”大会发表的宣言提出了工人有言论、集会、出版、罢工之自由；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取消假工会，铲除工贼，制定劳动保护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额等17条要求。湖南工人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政治和经济斗争。

在政治斗争方面，湖南工人与商界和学界联合组成了“湖南工商学大联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9月7日，长沙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反帝示威游行，发表了反帝宣言。万县惨案发生后，湖南工商学联合在长沙举行了有3万余人参加的反英大会，并向英领事馆送交了通牒。长沙、衡阳、宝庆、常德、湘潭、安乡等县开展了对英经济绝交和各种打击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英货经理处和行栈被封闭，英货被查封或焚毁，英人在湖南的经济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经济斗争方面，株萍铁路、粤汉铁路工会促使路局发清了所欠工人的工资。锡矿山工会于10月6日召开3万人的加薪大会，迫使矿主承认工会提出的工人权利和改善待遇的12项条件。长沙邮务、人力车、靴鞋业、染业、织袜、石印等行业，平江纸业、烛业，宝庆水泥，醴陵瓷业等行业工人也进行了改善经济待遇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随着政治经济斗争的胜利开展，工会组织巩固和发展起来。至1926年年底，全省工会总计有533处，工会会员32.6万余人。12月1日，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大会由郭亮等三人主席团主持。李维汉、毛泽东、谢觉哉在会上作了报告。中共湖南区委致函大会，提出了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17条，大会通过了《统一工人运动决议案》、《关于工人武装自卫决议案》等18个决议案，并颁布了《纠察队组织大纲》。大会推动了湖南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

1927年初，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48万。2月9日，英国军舰水兵在长沙登陆行凶，打伤工人纠察队员多人。湖南总工会联合各界人民举行10万人的反英示威大会，并组成了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号召海员和洋务工人罢工，同时扩大对英经济绝交。3月20日，湖南邮务工人赶走了美籍湖南邮务管理局长，收回了邮政管理权。4月间，长沙和（岳阳总工会分别收回了长沙和岳阳海关。）

在湖北，北伐军克复汉阳、汉口后，工会组织迅速恢复。1926年9月上旬，汉阳兵工厂、汉口英美烟厂、汉阳铁厂等工厂和洗衣、轮驳、织袜、水泥等行业的工会先后恢复。同时还新建了火柴厂、五金、邮务等工会。9月14日，武汉工人代表会在汉口举行各业工人代表恳亲会，决定将武汉工人代表会改组为武汉总工会。与此同时，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

办事处，由李立三、刘少奇分别担任主任和秘书长。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到12月，工会组织发展到300多个，会员人数达到30万人。

在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和省总工会领导下，湖北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罢工浪潮高涨起来。到1926年底，先后发生了和记蛋厂、中兴纱厂、大正电灯厂、英美烟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口洋务工人、印刷业工人等许多工厂和行业的罢工，这些罢工多属经济斗争，都在工会领导下进行，所提要求大都得到解决。但在工人运动中也开始出现“左”的错误倾向。如有的工人对改善生活要求过高过急；有的过多的缩短工时等。

在工人运动高涨中，李立三、刘少奇等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12月下旬编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为工会组织的巩固，工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即将召开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1927年1月上旬，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在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的主席团领导下进行，通过了《大会宣言》、《湖北省总工会章程》、《组织问题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等文件和决议案，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今后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其中强调整顿和巩固工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战斗力。

大会后，湖北各级工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工会会员迅速增加，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湖北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在江西，1926年秋，中共江西地委派曾延生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北伐军攻克九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周一光筹备九江市总工会。1926年12月26日，九江总工会成立。同时，南浔铁路、兴中纱厂等也建立了工会。在江西南部的赣州，1926年10月，中共赣州特支书记陈赞贤领导组建了赣州总工会筹备处和56个基层工会组织。在此基础上，11月初召开了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3日成立了赣州总工会。南昌攻克后，1927年1月17日，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随后店员、瓷业、轮船等73个行业成立了工会。此外，景德镇、萍乡、吉安等地也成立了总工会。

各地工会组织建立起来后，工会会员迅速增加，九江、赣州等地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罢工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1927年2月23日，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代表全省10多万工人会员。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统一工会组织案》、《工人经济要求案》、《工人政治要求案》、《纠察队案》等12个决议案，发出了《告工友及各界同胞》书、《反英出兵中国通电》等。大会选出了陈赞贤等9人为全省总工会执委，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江西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了高潮。

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龙字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急速成立农委”，“努力农运工作”，“尤其在河南与湖南，此项工作更是中心”。同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没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根本倒塌。所谓国民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他号召革命同志下

定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11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到上海任中央农委书记。15日，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民运动要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直隶各省全面铺开，并以湘、鄂、赣、豫四省为发展农运的重点。上述中央文件和指示，对湖南和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湖南农民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26年1月至9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7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易礼容为委员长，柳直荀为秘书长。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40万人，受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100万人以上。10月至1927年1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民运动获得迅速发展。10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出版、抗租之自由权；有武装自卫权；制订农民保护法；乡村自治权交乡民会议；县政府由人民选举；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团防、民团、警察不得任意捕人；地方财政公开等等。经济方面：减轻租额，佃农所获不少于50%；禁止重利盘剥，借贷年息不得超过2分；不得预征钱粮；限制粮食出境；废除苛捐杂税、扫除厘金积弊；清丈土地、清丈湖田、统一度量衡；没收逆产赈灾；整顿农田水利，举办农村合作救济事业等。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至11月，全省75县中成立县农会57个，区农会462个，乡农会6967个，会员发展到136.7万余人。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和工代会同时在长沙揭幕。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大会。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李维汉、谢觉哉等分别就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国民革命与工农运动作了发言。28日，毛泽东又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反革命方面已经有了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还严厉驳斥了“情农运动”之类的污言秽语以及“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等谬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大会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通过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制订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和农民自卫武装等40个决议案。宣言和决议指出：土豪劣绅是封建军阀政治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目前“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过程，若经过目前的斗争，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民主秩序之目的”，“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因此，必须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由，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必须完成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易礼容当选为委员长。这次大会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在1000万以上。4月，湖南农会会员达518万人。6月湖南农会会员超过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湘潭、湘乡、长沙、醴陵、浏阳、宁乡、衡阳、平

江等县农民，几乎都加入了农会。湖南农民组织起来后，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在农村开展了一次旋转乾坤的大革命。

首先，从政治上惩罚农村的封建恶势力。各级农会坚决贯彻省农代会“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决议，组织农民向地主豪绅作斗争。他们根据土豪劣绅罪恶的大小，分别判处清算、罚款、示威、戴高帽子游乡、进监狱、驱逐和枪毙，从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彻底否定地主阶级的绅权，使他们威风扫地。湘乡的胡淮生、韶山的毛堂甫、钟鼎彝、耒阳的谷应民、醴陵的汤先群、衡山的刘岳峙、湘潭豪绅集团的大头目晏容秋等，分别受到了农民协会的清算、罚款、戴高帽子游乡以至枪毙等惩处。惩罚一个，震动全县。对打击不法地主的破坏和捣乱、瓦解土豪劣绅控制的乡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地主的权利被打倒，农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其次，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凡农会得势的地方，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限制租额，“佃户所得不少于50%，规定银钱借贷年利不得超过二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衡阳县农民把田租由五成减到五成以下。醴陵、永兴等县实行三七减租，东三佃七。浏阳、安化各地减租、退押时，农民从地主手里收回了大量现金和粮食。攸县等地农会清算了地主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根据情况废除了一些陈年旧账。

平粜阻禁，是农民同地主进行经济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不法地主屯积米粮，勾结奸商，偷运外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造成农村粮荒。农民遂组织“平粜委员会，禁止谷米出境，勒令地主按平价卖粮给农民”。

第三，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湖南地主武装力量雄厚，县、区乡都有团防局武装，平均大县有枪700余支，小县有枪300余支，全省75县共有步枪4.5万多支。北伐军在湖南打跑了吴佩孚的军队，但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地主武装团防局。这帮东西，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凶作恶的工具，不把它铲除掉，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保障。

建立农民自卫武装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成立农民梭镖队；二是夺取地主团防局的枪支。1926年冬天，湖南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梭镖队或农民自卫军。长沙县19个区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乡组织了纠察队，每户农民都有一柄梭镖。宁乡县有农民纠察队员8万多人，枪500多支。衡山县有农民纠察队员5000余人，枪500余支。湘阴县有农民梭镖队10万余人。浏阳县农民武装趁开大会之机，一次就夺取了警备队枪支700余杆，成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大队。湘潭、平江、岳阳、益阳、衡阳、宝庆、耒阳、汝城等县，大都组成了几百上千的农民自卫军，惩处了一些横行农村、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团防局长。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这种农民看了壮胆，地主见了害怕的梭镖队，已普及于全省75县2000多万农民之中，几乎“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

第四，对封建宗法迷信思想和制度开展猛烈冲击。湘潭、湘乡、衡山等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开堂祭祖，搬出宗法族规，玩弄族权神权，压迫妇女，对抗农民运动。醴陵、株洲一带的地主，修祠建庙，尊神信鬼，愚弄群众。农民手持梭镖、木棒，结队成群涌进祠堂，同族长进行说理斗争，把族权打翻在地。农民不迷信鬼神，征用祠堂庙宇办夜校，砍掉菩萨当柴烧。浏阳、湘潭各县广大农村妇女，组织女界联合会，冲破“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剪下巴巴头，扔掉裹脚布，走进祠堂“吃酒席”，造“族长老爷”的反，争

取男女平权，婚姻自主。

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地主阶级的乡村政权和民团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切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族权、神权和夫权，开始土崩瓦解。高利贷剥削、买卖婚姻、封建迷信、牌赌大烟，概被禁止。清匪缉盗、整顿治安、修桥筑路、移风易俗。湖南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

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

湖北农民运动在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高压之下，发展极为艰难缓慢。虽然1925年12月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但有农会组织的不过黄梅、黄冈、黄安、汉川、枣阳数县，会员不过3000人。省农会成立不到3个月，即被直系军阀封闭。至1926年7月，农会会员也只有3万余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农民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农会组织的县40余个，会员增加到40多万人。1927年1月，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大力发展农民运动。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代表184人，代表41县，81万农会会员，陆沉主持大会。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徐谦、李维汉等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蔡以忱等相继发表演讲。大会通过了扩大反英、土地、地租、雇工、县政、工农联合、没收逆产、禁止烟赌、取缔高利贷、查办土豪劣绅等35个决议案，选举陆沉、邓演达、蔡以忱等17人为省农会执行委员，22日大会闭幕。这次大会是湖北农民运动大发展的起点。4月，农会会员发展到100万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武装。6月，全省69个县中，有54个县，380个区，3852个乡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猛增到2848239人。各地农会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惩罚不法地主、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4月24日，成立了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实施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逮捕、监禁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5月27日，仅咸宁县一次就枪决了勾结夏斗寅匪军残杀农民的土豪劣绅周爱惠、王德真等7人。

江西的农民运动，到1926年8月，成立了6个县农协、28个区农协、128个乡农协，有会员6276人。国民革命军入赣以后，为配合革命军行动，农民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会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为适应农运发展的需要，在赣东、赣西、赣南设立办事处。会员由5万增加到30余万，农会由6个县扩大到54个县。1927年2月20日~28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45县的140名代表，郭沫若和方志敏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会务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选举方志敏等为省农协负责人。通过了对英经济绝交，惩办土豪劣绅，清除县政积弊，成立农民自卫军，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肃清匪患，严禁烟赌，保护妇女等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等28个重要决议案。大会以后，江西的农民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

河南的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8月，它的特点是农运的发展与红枪会运动密切结合。1926年4月28日~30日，信阳、许昌、荥阳等19县的57名农会会员代表开了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省农协执委会组织大纲和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选出省农会执委7人，发表成立宣言。到5月底，已有4个县、32个区、230余乡正式成立了农会，会员27万人，其中农民自卫军约10万人。并且还在30多个县开始了农运的组建工作。1927年3月中旬，在武昌

中央农讲所召开了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691 人，代表 45 县的 40 万武装农民。于树德、邓演达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邓演达、李立三、周以栗等分别向大会作了讲话。5 月上旬，在信阳开办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政治军事特别讲习所，仿效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培训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政治军事骨干，第一期学员 98 人。

到 1927 年 3 月底止，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热河、察哈尔、绥远等 17 省。6 月全国已有 230 多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 1000 余万人。这年 3 月底，在武汉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彭湃、方志敏、易礼容、邓演达等 13 人，被推为执行委员。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

在此同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等 1 个多月的筹备，于 3 月 7 日开始上课。4 月 4 日，补行开学典礼。农讲所有来自全国 17 个省区的学员 700 多人。担任专职和兼职教员的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周以栗等共产党人和邓初民、陈克文、李汉俊等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农讲所在农运高潮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农村大革命的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引起了一切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反对。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围绕着农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联合起来，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白化党”、“保产党”、“左社”等反革命团体，和农民协会对抗；指使流氓、走狗组织伪农会，篡夺了村政权，发动反革命暴乱。1926 年下半年到 1927 年初，广东的广宁、东莞、电白、中山、花县、五华、三水、揭阳、曲江、淡水、潮阳、惠来、四会、仁化等县；湖南的宁乡、益阳、郴县、岳阳、桂阳、嘉禾、湘阴、安化、宜章各地；湖北的阳新、监利、麻城、黄梅等县，都发生了土豪劣绅纠集地主民团武装，勾结流氓土匪，捣毁农会和国民党党部，杀害干部和会员。如 1926 年 8、9 月间，广东花县民团总局局长江侠庵，纠集叛军陈炯明残部和流氓土匪 1000 余人，围攻田美、李溪、象山等 10 多个乡农会，枪杀农会干部，抢走财物，焚烧民房，强奸妇女。1927 年初，湖南湘阴土豪陈伯纯，指使团防武装，摧残农民协会；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戮农民 300 多人。湖北阳新的地主恶霸，纠合流氓和土匪数百，捆绑县农协、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 6 人，用煤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次日，复集土匪流氓 4000 余人，组织反革命暴乱，在全县农村大肆焚烧抢劫。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反扑，在河南、江西、广西等省也不断发生。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害怕起来，对农民运动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叫喊农民运动“过火”，要求加以“限制”，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农民问题成了左右时局发展的关键。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支持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而且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指责和压制农民运动。

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于 1927 年 1、2 月间，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进行了 32 天的实际考察。3 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作阐明了如下基本思想：（一）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

党领导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农民运动“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二）必须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毛泽东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利的革命”。没有这个夺权的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的斗争，都决无胜利之可能，必须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武装是政权的支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提出了党在农村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的不同，因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在“乡村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完成革命大业的“元勋”，他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贫农参加，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农民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惩处土豪劣绅，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罪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了当时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

第七节 国民军联军在甘肃陕西的胜利

一、甘肃的平定和革命运动的兴起

北伐战争前夕，直奉军阀除了联合晋系军阀进攻退守南口——晋北一线的国民军，指使刘镇华收集旧部进攻陕西的国民军外，还策动甘肃军阀陇东镇守使张兆铎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出兵消灭驻甘肃的国民一军刘郁芬部。吴佩孚委任张兆铎为讨贼联军援甘总司令，孔繁锦为副司令，并暗中策动回族各镇守使响应张、孔。这时刘郁芬部只有孙良诚和张维玺两个师，兵力不足万人，省城兰州城防空虚。张兆铎等人认为有机可乘，于1926年5月间发动了对甘肃国民军的进攻。

5月12日，张兆铎部首先向驻定西的国民军梁冠英旅开火。随后，驻兰州附近阿干镇的黄得贵部、驻固原的韩有禄部和驻狄道（临洮）的宋有才部开始向兰州进攻。在兰州危急的形势下，刘郁芬急令梁冠英撤回兰州附近地区，与张维玺部连成一线，以缩短战线，固守待援，同时从宁夏调来两个团加强防御，并电请张之江派援兵来。

6月下旬，援军郑大章骑兵旅、吉鸿昌旅等部陆续到达兰州。刘郁芬即下令分两路分别向东向南反攻。南路由张维玺率领，首先击溃了黄得贵部，接着向陇西孔繁锦部进攻。7月初围攻狄道，孔部败退天水。张率轻骑追击。8月18日，孔向陕西陇县逃走，次日张部占领天水，分兵追击。孔部纷纷投降，残部逃往陕西汉中，投靠吴新田。

东路由孙良诚率领进攻陇东张兆铎部，张部退守祁家大山。吉鸿昌旅袭击张部侧背，迫使张部向平凉撤退。刘郁芬令马鸿逵部向固原推进，威胁平凉。张兆铎在北面马鸿逵、南面张维玺、西面吉鸿昌的包围下，放弃平凉，仓惶逃往陕西。8月30日，孙良诚率部进入平凉。至此，甘肃局势大体稳定了。

甘肃国民军在3个多月内就消灭了陇南陇东地方军阀势力，基本上平定了甘肃，这主要是由于：1.张兆铎和孔繁锦的兵力虽较多，但战斗力很差。张原有兵20营，但官兵实数不过6000人，装备也差。开战后，张给各地土豪以营连长名义，令其自行募兵筹饷械参加战斗。如此扩充兵力，号称48营，实为虚张声势。孔原有兵两个旅，后又增兵十数营，兵力较张多，军械也较充足。但张、孔统治陇东、陇南多年，横征暴敛，丧尽民心；克扣薪饷，官兵不愿为他们卖命。2.国民军争取了甘肃回族部队的支持或保持中立，使孔、张陷于孤立。回族将领马鸿逵参加了对孔、张的战争，甘州镇守使马麟也派兵助战。西宁的马骐和凉州的马廷逵保持中立，马骐还应刘郁芬的要求，开放西宁筏运，使兰州粮食供应不断。3.国民军战斗力较强，战略措施得当。参战的国民军属国民一军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在开战时，根据敌众我寡，战线长，兵力不足的情况，国民军采取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坚守兰州待援的战略方针，从而避免了被各个击破和敌乘虚直捣兰州的危险。而当援军到达后，又不失时机地转守为攻，对战斗力弱的敌人发动反攻，使其迅速溃败，余敌势孤力单，不久即被歼灭。

国民军稳定了甘肃的局势，使南口战役撤退下来的国民军能够向甘肃方面撤退，并使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这对于国民军以后进军陕西和参加北伐都是有利的。国民军在甘肃的胜利，也对甘肃革命运动的兴起起了促进作用。

早在 1925 年 7 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曾派人来兰州秘密组织了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但没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 10 月,刘郁芬率部进驻兰州时,由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宣侠父、钱清泉、贾宗周等共产党员随军来到兰州。他们联合当地共产党员于同年冬成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由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清泉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帮助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整顿党务,使它由秘密走向公开。共产党人并同国民党省党部内的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斗争。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活动,在兰州建立了少年同志会,举办了民众夜校,并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名义主办了《革命青年》周刊、《民声》周刊;以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的名义主办了《醒狮》周刊。特别支部还在兰州挑水、理发行业中建立了工会组织。共产党员保至善以国民党省党部农工部长的身份,先后在兰州七里河、西固和皋兰县等地建立了 10 多个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推动了甘肃农民运动的发展。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后,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派共产党员吴天章、冀明信接办《平凉日报》,组织“新文化剧团”,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举办政治训练班,建立工人组织,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推动了平凉地区的革命运动。

二、五原誓师与西安解围

1926 年 1 月 1 日,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后,于 3 月 20 日起程赴苏联考察。4 月间在蒙古库伦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5 月 9 日,冯玉祥一行抵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在苏考察期间,冯玉祥会见了一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观了机关、工厂、学校和军事设施,访问了工人和士兵,同时还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对冯玉祥积极地进行了帮助。刘伯坚以华人协会等团体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冯玉祥,并应冯的请求介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见面。蔡与冯及其随行人员进行了 3 天的谈话,并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使冯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6 月间,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及共同革命的计划。刘骥于 7 月中旬到达广州后,通过协商与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冯玉祥统率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 此后不久,8 月 23 日,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7 月间,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冯于是着手准备回国。苏联政府对冯回国参加北伐战争给予大力支持。除应冯的请求派来乌斯曼诺夫等军事顾问外,并调拨了大量的军械弹药。

8 月 17 日,冯玉祥离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同行。刘向冯提出了一些建议,冯表示同意。冯还致函陈独秀要求“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 冯玉祥在苏联只停留了 3 个月,由于他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由于苏联革命成就对他的影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使他有较大的进步。这是他回国组织国民军联军的

思想基础，也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重要条件。

冯玉祥回国时，正值国民军在南口战败之后，西撤的部队军心涣散，纪律废弛，“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陕西方面，西安被围已5月，亟待解救。冯玉祥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没有丧失信心。

9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绥远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随即发表回国宣言。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明他过去对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没有办法，而现在是有办法了。他宣告：“我现在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这个宣言表现了革命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9月17日，冯玉祥召集在五原诸将领举行会议，会上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由于右任、孙岳、鹿钟麟、方振武、弓富魁、史可轩等各军将领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随即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职。同时还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他代表全军宣誓，要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授予旗帜。大会发出通电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通告全国同胞。大会之后，冯玉祥和于右任率誓师队伍举行了游行。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标志，也是国民军在南口战役后重新崛起的起点。五原誓师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了革命势力，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也促进了敌人阵营的动摇和分化。正当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在敌人侧翼出现了这支革命军队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敌人，而且能直接给敌人以打击。

因此，当时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军的再起，认为这支部队在北方的存在，在现时可以牵制奉军的南下，使北伐军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在未来的对奉战争中，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对国民军寄予厚望，希望它“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要“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晓得为什么而战”；“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10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9月间蔡和森提出的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三原则。即：1.“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2.“党（指国民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指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3.“不要限制冯职权”。《决议》对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国民军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的下层政治教育，不可怂恿

其急于向外发展”；“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对陕甘绥的农民运动，“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这些从国民军和陕甘绥地区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决议》还对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态度及与冯玉祥和其部下的关系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重冯玉祥，使他们都服从冯”；“不可强迫冯采用他还不真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忌妒”；“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影响他，不可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去纠正他”；“我们勿怕冯玉祥利用农民群众，他如愿做农民领袖，我们更应该促其成”。这些规定只要求帮助冯玉祥巩固和取得在国民军和群众中的领导地位，而没有提出党应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政策有右的倾向，只限于帮助他们，而没有去争取领导权，以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冯玉祥和国民军虽然正式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协助下，进行了几项重要的工作。首先是组成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石敬亭为政治总部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薛笃弼为则政委员会委员长，其他各部处也都任命了负责人。接着，9月27日，在五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

领导机关建立后，即着手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总司令部政治总部设组织、宣传、总务三大处。其下各军设立政治处，每师设有宣传员20人。当时政治工作干部很缺乏，中共中央应冯玉祥的请求派去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作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还帮助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国民军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大纲》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是军队中的勤勇者，应和士兵同幸福同艰苦”，“应知道兵士的心理，不要有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上“要作革命的模范”。《大纲》规定了政治工作部门与国民党和军事系统的关系，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战前、战中、战后的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政治工作的开展在部队整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改编部队是当时一项重要任务。自南口败退，部队东零西散。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将零散的部队归并或补充起来，并着手收集失散的部队。他重新任命各军军长：一军张之江，二军邓宝珊，三军徐永昌，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在收集部队的同时，针对军纪废弛的状况，着重整顿军纪，使军纪迅速恢复起来。

国民军联军成立后，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是全军上下所关心的问题。这时军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由五原回师南口，进攻北京；另一种是进攻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早在9月20日中共中央就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

退亦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击奉军。”正当国民军议论未定之时，李大钊给冯玉祥送来密件，建议国军民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与北伐军会师北伐。冯玉祥及其将领看到按此计划既可解西安之围，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于是“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而实行这个计划还需要采取巩固甘肃这个后方基地和争取阎锡山合作或保持中立的措施。国民军联军于是确立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确定后，冯玉祥即作了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的部署。西安国民军自4月中旬即遭到刘镇华部的进攻。5月15日，刘军实现了对西安的四面包围。守城军在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李虎臣、杨虎城率领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甘肃方面国民军进军陕西；任命方振武为援陕副总指挥，率领五原方面国民军南下援陕；任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率石友三等部留驻包头，防备奉军袭击。

1926年10月上旬，孙良诚部到达兴平。刘镇华为缩短战线，撤去围困三原的军队。10月20日，由榆林南下的于右任、史可轩部进占三原。此时孙良诚部已进至咸阳外围，与刘镇华军成于猴儿寨与三桥之间，因兵力少，与敌相持没有进展。冯玉祥在五原得到孙求援报告后，即令方振武、马鸿逵等部火速增援。11月上旬，方、马与孙良诚会师后，立即发动进攻，大败刘军于猴儿寨，11月23日占领咸阳。随后国民军联军分兵三路进攻西安：中路孙良诚部由咸阳进攻；左路方振武部向泾阳东南推进，攻西安城北之敌；右路马鸿逵部向户县东北推进，攻西安城南之敌。刘镇华集中兵力向中路冲击，孙良诚部处境危急。此时刘汝明、孙连仲两部援军相继开到前线。援陕国民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打迂回战，袭击敌之后路，即由刘长明从左翼绕到西安之东，攻击敌后方十里铺；由孙连仲从右翼向兰田方面迂回攻击。11月26日拂晓全线开始总攻击，同时城内守军也配合作战。经一昼夜激战，27日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刘镇华部向潼关等地溃退，国民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潼关。

国民军联军长途跋涉，驰援陕西，以较少兵力击败刘镇华8万之众，解西安之围，战绩惊人。这主要是因为：1.五原誓师后，全军有了统一的坚强的领导；部队经过整顿，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恢复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2.甘肃基本平定后，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从这个后方不仅派出了主力部队，还提供了军费和军需物资。3.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人民群众的协助。援陕部队入陕前后，魏野畴等曾拟定《解围运动草案》，并分发给关中地区中共党团组织，要求统一认识，积极支援入陕国民军的战斗，特别是在刘镇华军败退时，必须带领群众严加截击。由于党组织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工作，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积极帮助国民军筹募军粮和物资，并担任运输物资和护送伤兵的工作。当刘镇华军东逃时，临潼、渭南等地农民奋起截击，给逃敌以有力的打击。

西安解围对于国民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形势也有较大影响。首先，西安解围扩大和巩固了国民军的根据地。陕西关中平原物产丰富，有了这块根据地，对于国民军整训部队，恢复力量，准备出师北伐是很有利的。其次，西安解围使西北形势改观，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国民军据有陕西，与甘肃和绥远的一部分连成一片，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这个新形势对奉系军阀是个新的威胁。正如当时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最令奉军恐怖

的还是冯玉祥在西北之再起，随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①这个新形势对阎锡山也是个直接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对国民军进一步采取亲善的态度，而对奉系则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这个新形势对吴佩孚更是严重的威胁，使吴军内部矛盾激化，吴撤了主张和冯反奉的靳云鹗讨贼联军副总司令职，改派寇英杰继任，靳军与寇军打起来，豫南陷入一片混乱状态。靳部任应岐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靳云鹗、魏益三也在暗中投向国民革命军，吴军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由此可见，国民军联军在陕西的胜利有利于北伐军集中兵力东进，对北伐军取得江西、福建、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三、陕西革命运动的高涨

西安解围后，当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党团联席会议作为全省的临时领导机关。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统一领导陕甘党组织和革命工作。耿炳光任区委书记，魏野畴、李子洲等为委员。与此同时，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共产党人赵宝华、刘含初、杨明轩当选为委员。

在陕西国共两党组织的协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在西安成立。它是陕西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由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杨晓初、王尚德分别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保卫部部长、教育厅长、民政厅副厅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局长等重要职务。这个临时政权机构实际上成为陕西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政权组织领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使陕西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革命运动的发展急需培训大批干部。西安解围后不久，中共陕西党组织就在西安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军事政治队。1927年2月初，共产党员刘含初、李子洲等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领导筹办中山学院。3月10日中山学院正式成立，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王子休、徐梦周、呼延震东等共产党员先后分别担任教育、训练、总务三部领导职务。中山学院开始设军事训练、党务和农民运动三个班，以后又增设了妇女运动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学生共700人。在创办中山学院的同时，又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中山军事学院举办了两期，培养了军事政治干部1000余人。

宣传鼓动工作的开展，对于促进革命运动高涨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共产党员雷晋笙、刘天章先后担任社长，杨慰祖等担任总编辑。该报每日销售2000余份，是当时陕西地区销售量最大的革命报纸。陕西共产党组织在西安领导创办了“廿八”书报社和“十一”小书店，发行各种革命书刊。西安城内各军政机关、学校大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宁主义研究会、中山纪念堂、中山俱乐部等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西安解围后，在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陕西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早在1925年9月10日，西安各业工人举行集会，成立了西安总工会。在该会领导下，西安鞋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并于同年12月22日成立了鞋行工会。与此同时，在绥德等县也成立了铁匠工会等行业工会，开始了罢工斗争。西安解围后，1927年二三月间，西安各

业工会陆续成立，同时陕西邮务工会、印刷工会、制造局工会、电话工会等也相继成立。4月5日，陕西全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5月初召开了陕西省总工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章程，选出了章含辉等13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了领导机构。在各行业工会和省总工会领导下，陕西工人阶级进行了改善待遇的斗争，积极地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

农民运动是陕西群众运动中发展最为突出的。1926年9至10月间，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陕西学员乔国桢等16人回到了陕西。他们在三原、渭南、华县、临潼、咸阳、周至、户县、兴平一带进行了秘密农运工作，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西安解围后，各地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中共陕甘区委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组织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共产党员黄平万等5人任委员，并在农运发达的地区设立农民办事处。1927年3月27日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至5月底，全省已有5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共约37万人。6月1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工农兵联合决议案》等26个决议案，选举了王授金等13人为执行委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领导机构。

农民在组织起来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击地主豪绅。如长安县第五区农民协会公审并枪毙了劣绅刘大汉，肤施（今延安）东乡农民将恶霸陈青山拉出游乡，华县农民公审了前任反动知事叶振本等等。农民开始认识到：“救苦救难的，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农民协会；不是真龙天子，而是我们自己。”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农民自卫军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省武装起来的农民在10万以上。各地农民自卫军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肃清土匪和维持地方治安的活动。

陕西的青年学生运动自1923年起就逐渐发展起来。1926年1月，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提出了“到民间去”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口号。西安解围后，陕西青年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1927年3月13日，共产主义青年团陕甘区委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团的工作计划。这时陕西全省有团员525人，到5月底发展到2400多人。陕西全省学生会在3月间有134处，到5月便增加到416处。5月22日，全省学生联合会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参加政治运动决议案》等12个决议案，号召全省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平民教育和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妇女、商民和儿童运动也逐渐兴起。关中和陕北一些县成立了妇女协会。西安、神木、商县、渭南等地成立了商民协会。1927年3月下旬，陕西省商民协会成立。6月中旬，西安儿童总团成立。

陕西各界群众较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后，在革命斗争中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讨蒋运动、追悼李大钊和“四·二八”烈士、以及声讨反动军官何经纬屠杀农协会员的罪行等斗争中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与南方两湖的革命群众运动遥相呼应，壮大了全国革命的声势。

第四章 大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共中央召开汉口特别会议

一、迁都之争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早在 1926 年 10 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就讨论了迁都武汉的问题。当时蒋介石为了有利于他控制国民政府，主张立即迁都武汉。孙科等人在会上提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但偏于中国南部，如迁至中部，指挥上比较可以便利”。 吴玉章等根据中共中央防止抬高蒋之权威的指示精神，反对立即迁都武汉。他们指出：“现尚未届国民政府迁移之适当时期”，“政治之根据地，此时仍在广东，并不因军事之发展而骤变。” 经过讨论，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

至 11 月上旬，北伐军攻占南昌后，长江中游的革命阵地巩固起来，迁都武汉的条件已成熟。11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便决定于短期内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于武汉。为慎重起见，于 16 日派遣司法部长徐谦、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及宋庆龄、鲍罗廷等前往武昌考察，为迁都作准备。2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旬日内迁武昌。

12 月 1 日，宋庆龄、鲍罗廷等抵南昌，随后于 5 日至 8 日在庐山与蒋介石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表示赞成迁都武汉。10 日，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鲍罗廷等由九江乘轮抵达武昌，受到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2 月 5 日，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宣布：“政府迁都在即，现已停止办公。” 7 日，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等数百人，从广州出发，经南雄转江西赴武汉。另有吴玉章等少数中央党部负责人则走水路经上海赴武汉。由于谭延闿、张静江等尚在途中，因而各种重要问题不能及时办理，为了不使中央机关工作中断，已到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 12 月 12 日召开谈话会，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决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13 日，正式通告：“本会议已于 15 年 12 月 13 日在武昌成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到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加上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各一名代表组成，其成员有：徐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詹大悲、董必武、于树德、王法勤、柏文蔚、蒋作宾以及顾问鲍罗廷，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伦为秘书长。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内设财政、外交、交通、司法四部，由宋子文、陈友仁、孙科、徐谦分任各部部长，它实际上是武汉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中，左派力量占居优势。鲍罗廷是临时政府的政治顾问，是政府中最重要的决策人，名义上共产党人尚未正式参加临时政府，但共产党人吴玉章、于树德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董必武以湖北省党部代表身份参加了临时政府；政府成员中有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以及左倾的徐谦、陈友仁、王法勤等。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先设址在武昌，后迁往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简称南洋大楼）。1927 年元旦，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在汉开始办公，外

交、财政、交通、司法四部开始行使职权。国民政府命令将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临时首都。

迁都武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苏联决定派加拉罕为驻汉大使。英国政府派驻华使馆参赞台光满为驻汉代表，并致电陈友仁，希望派代表驻英。德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说：“我们庆贺你们的国民政府迁移到中国中部”。“我们一定要要求德国政府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之真正的政府。”

蒋介石这时主张迁都武汉，是“因害怕广州工农革命力量”。同时，也是企图“一面借此范围唐（生智）等，一面拒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

但是，没有多久，蒋介石出尔反尔，反对迁都武汉。12月底，谭延闿、张静江等抵达南昌后，突然接到广州来电说，汪精卫“已经病愈，日间可动程回国”，蒋介石便以此为借口，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在会上，张静江、谭延闿反对迁都武汉，邓演达、宋子文、朱培德、陈公博主张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却强硬作出结论说：“多数都表示国府留赣，那么国府就不迁汉罢！”会议背弃广州原案，决议：“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回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未开会前暂住南昌。而在国民政府未确定国都前，在武汉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仍然设立”。至此，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蒋介石这时反对迁都武汉，是因为“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同时，唐生智在两湖的势力远胜过蒋介石的势力，武汉的局势并非蒋介石所能控制得了的。蒋介石便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把国民政府也迁到那里，这样“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摆布，为所欲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实现其封建思想中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阴谋”。总之，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是他的军阀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蒋介石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7年1月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9次会议决议：“因革命势力之发展，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有立即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必要。临时联席会议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议，于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前，由临时联席会议先行非正式的通知现不在鄂之中央执行委员，即刻首途来鄂，以省正式召集之时间”。并发出正式通告。6日，徐谦、孙科致电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说：“政府不迁汉消息，暂宜秘密。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将受影响”。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11次会议决定：“（一）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先发一电报，说明党部与政府地点，由在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迁鄂，先推一部分委员来鄂准备；牯岭谈话亦认此举为须要。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联席会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议决应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二）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

同日，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等致电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要求“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同日，南昌中央政治

会议临时会议讨论徐谦等 6 日来电，坚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地点仍定南昌，并决议指派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用威等 13 人组织政治会议武昌分会。11 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省农协、省学联、武汉商协、武汉店员工会、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政治部也纷纷致电要求迁都武汉，一致认为迁都武汉对革命是有利的。就政治上说，两湖和武汉的革命运动已有很大发展，武汉已成为革命的中心和新根据地；就军事上说，武汉建都后，北可沿京汉路直趋河南而取北京，东可顺长江直经赣而到浙江，西扼四川，南沿粤汉路连接湖南广东，可以控制西南，并且有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就经济上说，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区域和经济中心。所以，迁都武汉是理所当然的事。

12 日，蒋介石为了坚持其迁都南昌的计划，从南昌来到武汉。他竭力劝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遭到他们的批驳。在欢迎他的群众大会上，在他招待各界和党部代表的宴会上，群众和代表们都强烈地要求迁都武汉，并向他提出质问，使他狼狈不堪。鲍罗廷也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坚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从速迁到武汉来，主张在武汉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但蒋介石却回答说：“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地点，须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至于中央政治会议仍应在南昌开会，不能即时到武汉来”。

15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 13 次会议，讨论是否停开联席会议，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问题。会议认为：“政治分会为一省指导政治机关，此间应有代表中央之机关，武汉为革命中心地，若在南昌设立政府，便为两个中心，应付收回英租界事亦复困难，政治分会暂时无庸成立”因此决议“联席会议仍有继续之必要”。

18 日，蒋介石离鄂返赣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停止开会。同时派戴季陶自南昌来武汉，催约他们赴赣。对于蒋介石的电令，武汉方面的答复是：在南昌的委员们到武汉任职以前，临时联席会议暂不取消。

26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随戴季陶赴南昌，再次敦促蒋介石让在江西的各委员启程来汉。这时，武汉各阶层人民、各机关团体和《民国日报》等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文章或社论，一致主张执行迁都武汉的决议。

蒋介石为了缓和舆论，于 2 月 8 日，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表示：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日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但他又借口江西省政府在 20 日成立，拖延迁汉时间。

由于阻滞于南昌的各委员即将来汉，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于 2 月 16 日召开了第 25 次会议，认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任务已经完成，决定由临时联席会议召集中央执监委员扩大会议，结束联席会议。

2 月 21 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在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性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后，决定即日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在汉办公。

蒋介石接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自 2 月 21 日起宣布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汉正式办公的决定通知后，于 2 月 22 日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电告武汉：“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

行办公”。但由于大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实际早已赴汉，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蒋介石被迫在3月3日表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3月6日全部迁鄂，全体委员于是日启程赴汉，12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至此，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结束。

迁都之争，实质上是政权之争，是统一战线内部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这场与革命前途息息相关的斗争，迎来了武汉政府时期的革命高潮，同时也暴露了统一战线内严重的危机。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早在2月12日即向党内发出了通告，指示说：“现时武汉K.M.T.中央政府联席会议诸人，以徐谦为领袖，坚决反对国民政府移南昌，反对蒋之个人独裁，他们预备在3月1日以前先在武汉召集一中央会议。以免为蒋先发制人。自然这个汉口的会议，右派分子一定不肯来参加的，我们务须尽量帮助左派，使这个汉口会议能够开成。凡是我们的同志之为K.M.T.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或候补监察委员者，均须前往出席。各地左派分子为中央执委及中央监委正式、候补委员而又反对政府迁南昌者，均须设法劝之赴汉，时机迫切，望各地接洽后立刻进行”。“我们当竭力帮助左派，宣传蒋之罪状，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惟各地宣传时须十分注意：A.只能在口头上宣传；B.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而只是依据以上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反蒋”。

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这次会议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废除主席制；决议恢复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团制，废除主席制；决议裁撤中央军人部。这就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全会还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这些规定都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全会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中央各部部长。但在选举中，仍然选举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并且仍然保留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仍然选举当时还远在海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就为尔后大革命的失败留下了祸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全会通过了农民问题案，提出了十项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措施；通过了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提出的《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批准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及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组织了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决议严厉镇压阳新县反动派，支持农民运动。

全会讨论了改选国民政府委员案，规定国民政府委员由原有16人增加到28人，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陈友仁等为委员，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为常务委员。经过这次改选，共产党人谭平山、吴玉章，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彭泽民、王法勤、陈友仁等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而国民党右派张静江、张继、戴季陶、古应芬等落选了。

全会讨论了设立国民政府各部案，决议增设农政部、劳工部、教育部、实业部、卫生部（后三部实际上并未成立）。根据《统一革命势力案》中关

于“共同担负政治责任问题——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党政府及省政府”的规定，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苏兆征担任了劳工部长。

全会再一次肯定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就及其各项决议案的继续有效，指出：“对于去年12月中在武汉成立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认为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在该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以来之经过，为领导革命民众向帝国主义者努力进攻，而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结果，使国民政府对外威信得以提高，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解放运动得初步之成功，实足以证明临时联席会议为适合革命之要求。该临时联席会议现虽结束，但所有议决案，在全体会议认为继续有效”。

3月24日，国民政府新当选的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典礼，林祖涵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词，各委员宣誓就职。至此，武汉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是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无产阶级代表以及一部分地主阶级代表参加的、具有新民主主义因素的联合政权。但是，这个革命政府在5月中旬以后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二、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在江西战场取得打败孙传芳的决定性胜利后，北伐军席卷东南已成定局。这时，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帝国主义看到“革命军内部蒋派和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稳健派”的首领，如果他得势，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利益决无不利，因而对他进行拉拢。同时，原来依附于北方反动势力的官僚政客黄郛、张群等也来到蒋介石身边，对他施加影响。在当时就有“政治南伐”的说法。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处理革命阵营内部开始突出起来的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分裂活动，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革命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据以制定党的斗争策略。在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这次会议对于造成革命危机的原因的分析，尤其是对克服这种危机所提出的各种措施完全是错误的。

陈独秀在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他认为，“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左”倾做法夸大成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就把事情的主次完全颠倒了。报告在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蒋介石实际行动很右，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把它看成是最危险的倾向之一。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这次会议提出的对策的中心内容就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而实际上则主要是

反对党内的所谓“左稚病”。为“反对党内的左倾”，会议不但提出把革命的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党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还提出把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也一并交给资产阶级。陈独秀指责共产党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日，五月十五日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陈独秀极力贬低解决土地问题的严重意义，反对共产党包办农民运动。他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会议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在《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根本就没有提出土地问题，议决案还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即共产党——引者）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为了使资产阶级获得群众，取得全面的领导权，会议还决定要从“上中下三层”帮助国民党左派，即：第一，“我们要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第二，“我们要在社会下层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第三，“我们要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领袖和下层左派群众间之链锁”。这就是说，广大的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都要推给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上层领袖，实际上也就是推给资产阶级。由此可见，这些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在精神和实际工作中作好应付突然事变到来的各种准备，而是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压制了工农群众运动，为蒋介石、汪精卫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方便。这次会议没有解决党在关键时刻面临的迫切问题，反而把党引向错误的方向，即以牺牲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限制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去迎合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并自愿地把领导权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表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已进一步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并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制定的策略方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赞同。但是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共中央。这个决议案在中共中央引起了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等根本问题的辩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对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解释》批判了“二次革命论”，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连锁关系，指出：“在整个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机械的将他们画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一句空话；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解释》并决定立即依据这个决议案的方针与战略“制定一切工作计划。”中共中央于是针对汉口

特别会议的错误，在 2 月 12 日向党内发出重要通告，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一切右派反革命分子皆集中到蒋介石左右”，“积极作反共、反俄、反工农运动”。“我们对整个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通告》并要求：“在各地应即刻开始反蒋的宣传”。至于对国民党的政策，则“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要联合左派向右派进攻。同月，瞿秋白写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指出中共中央这个通告“是非常之大的进步，改变了汉口会议之杂凑的政策了。但是可惜未曾明显的说以前原则上事实上的错误，使同志们警惕而陡改前态”。

由此可见，汉口特别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及应采取的策略方针，又有向正确方面的转变。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所改正。在革命群众运动继续高涨之际，3 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上海区委领导上海工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未能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仍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以致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又发展起来，并在中国革命的紧急阶段中又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第二节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一、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武汉人民在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时，不断地为收回英租界而斗争。早在1925年5月17日，武汉学界致电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主张。192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奉运动。12月26日，武汉市民30万人举行了反英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英帝国主义者非常害怕和仇视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1927年1月3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派出由30余人组成的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面靠近英租界的广场上讲演，英帝国主义者立即调动大批武装水兵登陆，架起机枪16挺，向赤手空拳的听讲群众，放枪威吓，并用刺刀在人丛中乱戳，当场死1人，伤30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一·三”惨案。

惨案的发生，震惊了武汉临时政府。这时正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接到汉口市党部李国暄，湖北全省总工会许白昊，武汉洋务职工会屠宗根以及总政治部章伯钧的口头报告后，立即讨论了这一严重事件。会议决议：“（一）本会推定徐谦、蒋作宾两同志向一码头群众作下述文字之公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被伤，不胜义愤。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24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事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在新市场于1月4日午后7时宣市。（二）外交部立即对英租界当局严重交涉，撤退武装水兵，保障秩序安全；并对英方切实声明，如不撤退水兵，政府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责任。”当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武昌市长和公安局长一方面当即与英兵交涉，请退至掩护线。并指出：“我即报告政府，在我离开此地时间，不准开枪”。另一方面，请群众退后，英兵答应不开枪，群众也退至三码头附近。4日凌晨，徐谦、蒋作宾到一码头宣布公告之后，愤怒的“群众深为谅解，渐次散去”。3日晚，外交部长陈友仁前往英国领事署提出口头抗议要求英领于24小时内撤退水兵和义勇队，但是英领事却以“兹事项须缓至24小时后，俟请示英公使，始有负责答复”为借口，拒绝答复。英领事起初气焰嚣张，但后来“见英界形势，至晚犹甚严重，知非解除戒备，由中国军警接防，无法维持”，乃被迫于4日晨将水兵和义勇队撤至舰上，将巡捕撤回巡捕房，将新设沙包电网一律撤除。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界。国民政府随即派军队4连入驻英界，省总工会也派工人纠察队300名入界，配合维持秩序。

惨案发生后，武汉人民十分愤慨。当天，正在举行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立即发出《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六条要求：“（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应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演讲等自由；（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湖北省农民协会也发出通电，提出下列要

求：“（一）收回租界；（二）收回海关；（三）收回内河航行权；（四）撤退英驻汉军舰；（五）向国民政府道歉谢罪；（五）赔偿死伤损失；（七）行凶水兵交中国政府惩办。”

4日上午，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余团体代表500余人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省总工会的6条要求为基础，决定了八项对英办法：“（一）请政府立即向英领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领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三）令英领将行凶水兵交我政府惩办；（四）撤销驻汉英舰及英界沙袋电网；（五）撤销内河航权；（六）英领向我政府道歉；（七）英界巡捕缴械；（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并推定14名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请政府据以向英领事提出严重交涉，限于72小时内圆满答复，如不答复或答复不圆满，即请政府：（一）封锁英界；（二）收回英界；（三）收回关税；（四）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会上还组织了有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部、省学生联合会等10个团体参加的武汉市民对英外交委员会。

这时，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对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的指示中，肯定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所议决八条件很好”，并提出了对英斗争应注意：“1.所提条件应以低而能坚持为原则，2.外交上应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因为现时的政府实质是能受我们影响的），要群众与政府合作，3.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人住宅商店等，当使群众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是有计划的行动，须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4.政府派往租界的军队必须选择纪律最严的军队，不仅注意使外人无所借口，并可向外人表示革命军纪律训练究竟与北军不同，这个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

4日下午7时，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这次惨案的态度和办法，表示：“对于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八项条件，决定全部接收”。接着，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又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南洋大楼开联席会议，报告与英领交涉经过及派兵入驻英界情形。

5日，斗争进入高潮，武汉人民群众举行全市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的指挥下，武汉20多万市民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大会发出通电：“经议决8项办法请求政府即刻向英领事提出，限其于72小时内有圆满之答复，否则自动封锁英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并请求政府为防止此后再有此类惨案发生，应立即自动收回英界，收回海关，撤销英人在华内地航行权，撤销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杜后患”。会后，群众冒雨示威游行，“直接向租界冲，把巡捕都打跑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其委员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各派一人以及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长和联席会议党代表共5人担任。外交部对于此委员会的组设，除遍出布告外，并正式照会英领事。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又议决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改由外交、财政、交通3部长组成，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另组织秘书厅和警务处，警务处由公安局及一、二特区拨警190名，派汉市公安局督察长饶任华为主任。8日晨，入驻英界的中国军队和工人纠察队全部撤出。

6日晚，外交部长陈友仁拜访英领事，指出：“我国民众运动，是反对英水兵暴行屠杀我革命民众，对英国侨民绝无仇视之意，不必自相惊扰。至总工会前虽有对英总罢工之警告，但总工会现在一切行动，确已具有模范之

资格，不至任便实行总罢工。现在英租界既由国民政府接管，关于惨案交涉，政府已根据人民之请求，正在进行。在本案未得圆满解决以前，英侨之生命财产，由国民政府完全负保护安全之责”¹。

在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胜利鼓舞下，九江人民也收回了英租界。

英帝国主义制造汉口“一·三”惨案之后，又制造了九江“一·六”惨案。1月6日，九江码头工人纠察队捕获工贼一名，为外国人搬运行李上船，破坏罢工，罢工纠察队员伍宜山上前阻止，被英水兵枪击，当场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而死，另有几名工人被打致重伤。更有甚者，英舰发炮两响，威吓群众。“欲效轰击万县之故事”，“一面断绝租界交通，以便掩藏一切杀人的证据，一面唆使英国妇孺登轮，以便嫁祸我方”。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慨，他们手持扁担棍棒，撤除租界四周的沙袋、木桩、带刺的铁丝，撬开了大铁门，冲破了英方的武装戒备，潮水般地涌进了英租界，在江海关和工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伍宜山报仇”等标语。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组向英领事提出：“如不能维持界内治安，请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我师派兵入界维持，以免再生意外之事。”英领事复称：“俟必要再为讨论”。但“因风潮日形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到翌日午前11时，英领事忽派人来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于是，独立二师遂派秘书与英领事交涉，指出：“非将水兵一律撤尽，退回兵舰，及正式请求我师入租界维持秩序，我师绝不能负此重大之责任”²。英领事起初仅肯以口头之语，作为暂时请求，经再三交涉，始将其正式请求公函一件，由秘书带回。是日下午4时半，正式接收租界，并派独立第二师第三团团团长驻扎界内，担任警卫职务。8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召集独立二师长官、九江关监督、各群众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善后办法，决议一面由该监督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并函催税务司回署供职，一面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一切事务。

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不发生于前，而独发生于汉口惨案之后，所以这次九江惨案实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英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其故设圈套，有意挑衅，于此可见”。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次惨案的根本方法：“九江的事件决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决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宣言还阐明了反英斗争中的政策，指出：“我们反英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并且应该打倒的。但我们并不是反对和打倒英帝国主义的任何个人，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消长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反英运动，并不是仇视一切英人，当然更不是仇视一切外人，外人凡非帝国主义的一切英人，都可以安心罢”³。

随即，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外交部委派九江交涉员周雍能，外交部特派员赵畸，会同各团体代表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商同军警，主持一切。11日，管理委员赵畸，周雍能致函英领宣称：“本月十日在租界旧巡捕房，将委员会组织成立。召集原有巡捕，照常办理租界内应办各事，并商同

就地军警，保护界内中外人民安全。现秩序如常，所有原住外侨，大可返其故居”__。同时，管理委员会在租界内贴出以下中英文布告：“（一）案奉国民政府外交部命令，组织委员会，管理九江英租界，所有界内治安及外人生命财产，均由本委员会会同负责军警，切实保护，合行布告界内各外侨，一体知悉，此布。（二）案奉国民政府外交部命令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等因合行布告旅居牯岭外侨一体知悉。务各安居落（乐）业，毋自惊疑，切切此布”__。至此，租界秩序完全恢复，日、美、法各国在租界的人员，均由管理委员会发给护照，在界内自由出入。“租界内之各处公共牌示地方，均贴满各种革命口号标语，平素阴森有鬼气之英租界，一时充满革命空气。”__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1月10日，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汉口事件宣言》，号召说：“我们要一致起来，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英帝国主义，湔雪我们百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我们对于此案要向英帝国主义提出严重的抗议，赔偿死伤，交出这次屠杀我们同胞的凶手由政府惩办，要收回我们的租界，还要打倒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霸权”__。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汉工农商学联合会，武汉码头总工会，武汉店员总工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第四军、第七军政治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湖南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上海学界联合会，天津总工会，北京国立各大学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等发表通电或宣言，声援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月14日，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浔惨案委员会，召开了10万人大会，决议：“（甲）通电全国，维护武汉民众对汉案的八条，主张作最低限度的要求，并请国民政府与民众一致坚持斗争，（乙）通电全国，主张根本废除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撤销英人来华领事裁判权，撤退英人驻华军警，使以后不致有此种惨案发生，（丙）通电全国，抵制英货，厉行对英经济绝交，（丁）通电全国，一致反对英公使最近提案以二五加税帮助张作霖、孙传芳。”__16日，长沙也举行了20万人大会。此外，南北美洲及欧洲南洋等地国民党党部“闻英人在汉口九江枪杀同胞，异常愤激，纷纷致电中央海外部讯问详情，并请指示办法”__。

汉浔案既起，驻北京英公使遂派其参赞阿马利于1月12日赴汉交涉。在初次谈话中，阿马利无理“要求退还汉口英租界，恢复以前状态”。外交部长陈友仁则声明：“如此办法，必致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不能以以前之状况为根据”。阿马利无法否认这一现实，双方遂以此为根据于15日开始正式谈判。22日，英国政府仍以帝国主义者的口吻宣称：“（一）事变前党政府不无怂恿群众运动之处，近日则党政府确努力制止轨外行动，此是谅解者；（二）英政府对汉案只认陈友仁为地方政府代表，故关于本案事实问题，可由汉口英总领事与陈协商局部的临时的办法，其法律问题，如修约及交还租界，仍保留至将来有正式政府办理”。__22日，陈友仁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中国因战败而被英人剥夺之完全的自由”。这个目的“倘一日不能达到，则中国民族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必无妥协之可能”。“倘中国人民不欲沦胥以亡，则建设一新国家为刻不容缓之事。倘此新国家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以建设之者，则中国首先须有处理自己事务之权，换言之，即独立是也”。“在此新中国内产生之政府，即抱新见解、新政策，……此新政府自当规划恢复国权之政策，而解决中外之争端。其政

策，一方面在实施中国之主权，及维护国家重要之利益，而他方面仍将尊重外侨应得之公道的观念”。宣言严正声明：“本政府愿与单独任何列强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其他附属之问题，但此项谈判，须根据经济平等之原则，及彼此主权互相尊重之权利”。“本政府对于汉口事件之处置，与上述之政策完全符合”。“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之政府，……国民政府代表豁然觉醒之中国之真实精神，为革命运动之工具，……国民政府为抱民族主义之人民所授权，所拥护，列强与之修睦，初无危险之可言”。

议案谈判，于1月底即已就绪，但英国政府却从本国及印度调集大批军队，以上海为集中之目的地，进行武力威胁。于是，陈友仁拒绝签字，声明签订条约与否，以英方能否中止派兵并愿否撤回军舰为先决条件，故谈判于2月1日中断。阿马利致电英政府及英公使请示后已有变通办法，7日起继续谈判。9日，陈友仁说：“自从我们拒绝签字后，已与英代表会见三次，……英方要求先签字，签字后即将英兵调开。先签字办不到，必英方先将调集之兵改换方向，始能言其他。昨日又有一度重要谈话，本人提出一议，可以与英交换保证，即英将兵调开，我们则重新声明以前之宣言。英代表答以当向其政府请示，约3日后当可答复”。2月中旬，英代表声称：调遣来华军队之大部分将不集中于上海，而改向香港进发。陈友仁认为此种声明使汉案交涉有签字之可能，但大多数英国军队虽已改变方向，而仍有少数军队已经在上海登陆。除一面仍向英国抗议上海英国少数军队已经登陆，认为与条约抵触外，一面准备签字，乃于2月19日在外交部与英代表签定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并同时声明此种协定不得为将来收回中国界内其他租界（九江英租界除外）之前例。《协定》规定：“英国当局将按土地章程召集纳税人年会，于3月15日开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在华人之新市政机关于3月15日接收前，租界内之警察，工务及卫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国当局办理。英国工部局一经解散，国民政府即当依据现有特别区市政办法，组织一特别中国市政机关，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区域。”英帝国主义被迫与国民政府签订的这个协定，“虽然表面上还承认某些特权，可是实际上已经收回”。20日，中英双方又签订了《收回九江租界之协定》，规定：“关于汉口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在最近九江之骚乱中，英国侨民若受有直接损失，凡系出自国民政府官吏之行动，或由其重大之疏忽者，国民政府允担任赔偿。”嗣经详细调查，允以4万元给与英国为赔偿；由英国担保，若有盈余仍行退还国民政府。复经陈友仁与阿马利继续磋商，英代表允许变更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原来协定，而将九江英租界于3月15日无条件交还国民政府。

至此，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一斗争是一次空前的壮举，是反帝斗争史上光辉的篇章，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第二次高潮

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帝国主义发动了干涉中国革命的第二次高潮。

英帝国主义除了自己增派军舰和军队来华外，还策动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遣军舰和军队来华。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照会美、法、日、意四国提出订立出兵协定，增派海陆军至上海。1927年3月中旬，帝国主义集结

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军舰共 170 余艘，其中英舰 76 艘，日舰 48 艘，美舰 30 艘，法舰 10 艘，意舰 4 艘，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各一艘。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兵力达 3 万以上，其中英军 1.27 万余人，美海军 3500 人，日海军 4000 余人，法海陆军 2500 余人，还有“万国商团”和巡捕的武装。帝国主义作了随时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准备。

在吴佩孚、孙传芳相继被打败之后，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的同时，更多采取软的方法，以分裂革命统一战线。1927 年 1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激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

1927 年 1 月 29 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表演说，阐明英国对华方针，表示英国“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并“希望中国统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开始修约交涉”。英国对于“领事裁判权”、“关税束缚”、“租界制度”，“均愿予以变更”。__表明英国政府实行炮舰政策为主的前提下，也企图以微小的让步，换取国民政府的妥协。同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外交政策宣言，宣称：“愿将吾人对华条约所规定的关税支配与治外法权从速解放”。关于关税自主权，他说：“美国自谈判华盛顿公约，迄至今日无时不准备与中国任何政府，或可代表中国发言之代表，开始谈判；‘俾不独立实行华盛顿公约附税，且亦全部解放关税支配，而将关税完全交还中国。’但是，他又说：“顾美国所期望者：中国当以最惠国待遇给予美国，未可在关税上或捐税上利于他国人民，或予以特殊利益，而歧视美国及其人民，当保持在华贸易均等机会之门户开放，并当对于美国人民及其产业与权利，予以种种之保证”。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凯洛格说：美国政府“于中国准备以法律与法庭保护美人及其权利产业时，即开议解放治外法权事”。“主张组织法权调查委员会，附以该委员会有权于其报告中载入逐渐放弃治外法权条陈之谅解”__。表明美国政府坚持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同月，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议会演说中宣布对华外交方针：“第一，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第二，期望增加两国间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第三，对于有理之中国国民的希望以同情与好意迎之，不辞协力进行使之实现；第四，对于中国之现状，尽量忍耐宽大之态度，同时觉悟用合理的手段，竭力拥护我国正当且重要之权利利益”。__此外，币原在回答议员添田寿之时强调说：“对华不干涉内政主义，与拥护我国正当之权利，系属两个问题，然两者并非互相反对者。余深信万一中国之事态竟至于波及我国家之存亡安危，日本仍当继续不干涉内政主义”__。币原了解到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正在分裂，蒋介石就是“稳健派”的首领，于是企图拉住蒋介石，利用他压制革命派，实现南北妥协，确保日本在长江一带的权益。至于法国政府的态度，“就各方面看来，法国的对华政策，似乎是和日本一致的。法国政府机关报的论调，都承认中国形势不致十分严重，没有出兵的必要。所以法国与英国一致行动，为不可能的事”__。从可靠方面得情报察之，法国现在对于中国当维持其观望形势之态度，其意见以为非判明汉口事件之运动，是否系对在华外国人全部之运动，不能对中国加以干涉”。__当然，法外长白里安会晤驻法英使克鲁时又宣称：“法国准备于必要时与英国合作，防卫上海以拒攻击。法租界有义勇队与水兵，足

资保护，此种事由法领事办理之，法领事有与英司令合作之全权”。至于意大利政府的态度，“意国因在欧洲方面的关系，比较的和英国更为接近。意政府曾表示对英国新提案相当的赞成。至于此次英国出兵，意国恐未必取一致行动，因为意国在远东的利益关系太少，她在目前实还没有向远东方面发展的趋势”。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所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更增加了革命统一战线分裂的危机，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向中国国民运动进攻，无论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都比前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第三节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上海市民自治运动

一、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兴起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在上海各阶级、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7月1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保证工人人身权利，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11条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次大会的号召下，全市工人积极投入罢工斗争。7月有7万余工人举行罢工。8月，日商纱厂工人2万人为反对日商内外棉纺织厂大肆开除工人领袖，举行了持续28天的罢工。自6月至9月，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20万人。尤其到8月以后，工人们已逐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在此期间，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国民党头面人物，不再热衷于为孙传芳维持统治的所谓东南五省和平运动，转而谋求推倒孙传芳，实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虞洽卿因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解散了由他控制的商团武装南、北市保卫团，而与孙交恶。鉴于上海总商会已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虞遂另组上海商界总联合会与之对抗。9月初，当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时，虞洽卿接连发表了一些左倾言论，主动与共产党人联络，希望助他“取得上海政权”。国民党驻沪军事特派员和国民党上海特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也准备乘北伐军向东南进军之机，在上海建立国民党政权。但他自知国民党群众基础薄弱，武装力量涣散，因此很想借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总之，“北伐军势力的进展，给各阶级民众以新的希望，不独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都行动起来，并且一部分大的及中等的资产阶级都动起来，抛弃从前依附军阀的心理，转而依附北伐军”，上海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上海开展自治运动和市民武装暴动，以便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统治。9月6日，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市民团结起来，组织职业团体，实行区域联合，加入革命政党，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进行反抗斗争，“以图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夺取民众的政权”，“建立民选的自治机关”。随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共同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计划》虽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成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又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组织和战斗力不强，所以在暴动中“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我们的方针只能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幻想”用市民暴动的力量，立即在上海实现“平民政权”。中共中央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暴动的目的是“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即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上海区委一开始就把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发动市民自治运动的同时即着手于组织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各分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秘密地开办武装工作人员训练班；组织工人纠察队。到10月，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2000人，其中有武装的130人。

10 月上旬，上海区委派汪寿华去和钮永建、吴稚晖商讨上海自治事宜。经过协商，双方决定组织一个由工商学共同参加的和平维持会。17 日，区委召开会议，提出对于和平维持会的策略：在政治上，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组织上，应以商界占多数，工、学占少数，共产党“不能去占多数，只在旁参加与暗中指导”。__区委遵照陈独秀关于“要特别具体与虞洽卿谈组织地方政府”__的指示，确定以虞洽卿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和中心。虞对中共提出组织“以商界为主体”的政府十分赞同。许诺由他本人负责联络商界头面人物，并希望“工商两界合同动作”。但当北伐军在江西受挫时，他的态度又骤然冷漠，有意避居宁波故里，不愿与闻政事。

10 月 16 日，当和平维持会正在筹组之际，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起义，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翌日，夏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为配合夏超的军事行动，上海区委于 19 日确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振翼（任总指挥）等组成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工人武装，与钮永建控制的武装力量配合，举行武装起义，实现“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并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__20 日，区委再次发出《告上海市民书》，号召市民武装起来！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召集市民会议！组织委员制的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

钮永建原计划于 18 日举行暴动，与夏部里应外合，占领上海；旋因准备不足，改定于 24 日晨举行。至 23 日，夏超兵败，形势逆转。钮虽已闻讯，但仍于仓促中通知上海总工会按预定时间举行起义。上海区委认为夏虽失败，但北伐军已克服九江，形势仍然很好。即于 23 日下午 5 时下令举行武装起义。

24 日零点，中共上海区委组织的各区工人纠察队 350 余人中只有 200 人按总指挥部的部署，陆续到达各自岗位。原相约以军舰炮声作为起义信号，但是直到天明，信号未见发出。总指挥部发现情况有变，命令立即停止起义。此时，有些区的工人纠察队因未接到命令，已经同警察、巡防队接火，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闸北一带的工人纠察队因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较早而未行动。钮永建组织的便衣队，虽号称 1000 人，结果只有 100 余人有所动作。加上这支便衣队又是临时纠合的无业游民，毫无战斗力，一遇军警，即作鸟兽散。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实际上并未发动起来就失败于襁褓之中。孙传芳部在镇压了夏超起义后，连夜转回上海，对工人、市民进行残酷镇压。工人 100 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 10 多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中共上海区委对武装起义完全缺乏经验，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即依赖于夏超的胜利和孙传芳军队的倒戈上，结果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武装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就仓促发动起义。在依靠谁发动起义的方针问题上，由于受中共中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过于着重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把虞洽卿、钮永建之流当作暴动的中坚，缺乏立足于群众斗争基础上进行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甘心让资产阶级当主角，工人阶级当配角。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又未打算组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结果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军事冒险。

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进行武

装起义的最初尝试，它为以后起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二、市民自治运动的高潮和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在反复研讨第一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继续发动群众，推动市民自治运动，适时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成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的方针。

11月初，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大部分被歼。19日，孙传芳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会商，议定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5万携军用票2000万元南下援孙。这使苏、浙、皖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商界人士更是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中共上海区委抓紧这一时机，再次号召上海市民武装自卫，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并针对三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响亮地提出了“拒绝奉鲁军南下”的口号，作为市民自治运动的直接目标。

市民自治运动首先在上海工商学界掀起。11月11日和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拒绝奉鲁军南下。

自治运动在苏、浙、皖三省也得到响应。11月14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虽然三省联合会在其成立之初闭口不提撤退孙传芳驻军，侈谈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其实质是反对北伐军继续东进；但当奉鲁军决定南下后，该会多数人的立场迅速转变，表示要脱离孙传芳，反对张宗昌南下，欢迎北伐军。三省自治运动遂与上海自治运动融为一体。

11月28日，上海各界400余团体5万余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奉鲁军南下；拒绝使用军用票；划上海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等项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至此，上海自治运动形成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潮流。

12月6日，上海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市民公会由上海闸北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大会推举沈钧儒、王晓籁和共产党人林钧担任总务委员。为了把市民自治运动置于中共上海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区委决定建立市民公会党团，党团人员须按区委决议在公会中进行活动。

上海市民公会决定于12月12日召开市民大会，因孙传芳命令上海卫戍司令李宝章严加制止，遂改称团体代表会议如期召开。次日，孙传芳即下令取缔该代表会议，并缉拿其首领。被通缉者达80余人。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相继遭到查封或取缔。上海市民公会也于次年1月8日被查封。轰轰烈烈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沉寂下来。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和初期相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中共上海区委直接参与了对自治运动的组织领导，把分散的团体联合起来；把各阶层群众的不同主张，统一到中共所提出的反对奉鲁军阀，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的政治要求上来。在规模上，自治运动已由初期少数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活动，发展为包括工商学各界群众参加的市民群众运动。这就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月中旬，北伐军向浙江胜利进军，占领杭州，逼近上海。2月16日，

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乘孙传芳部退守江北之际，发动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次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起义。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即发布《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翌日，发布总同盟罢工会和罢工宣言，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等17条最低限度的要求。

上海工人踊跃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19日，首批（15万）工人走上街头。以后几天参加罢工的人数与日俱增。至第四天，增至36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22日，北伐军前锋已接近松江，进抵上海已是指日可待。上海区委决定于当日下午6时，把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以人民武装力量扫除军阀势力，建立市民革命政府。是日正午12时，在区委的主持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它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和暴动胜利后的权力机关。委员会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6人，国民党左派2人。

同一天午后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对岸的海军军舰建康、建成号上的士兵，在担任大副的共产党员指挥下，炮轰高昌庙兵工厂，打响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信号。6时正，各区工人闻讯而动，呼啸而出。在南市和闸北两区，工人和市民群众同仇敌忾，同军警展开了巷战。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起义者因多数人赤手空拳，或持低劣武器，虽英勇奋进，慷慨赴死，终难取胜。战斗一直持续到23日晚。在起义中，有40余人牺牲，300余人被捕。

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24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指出：暂时停止罢工，“决不是对孙传芳和李宝章让步，而是准备更进一步的新斗争” 。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这次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它证明了“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恶势力为一切民众争自由的先锋队” 。

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主导思想上还没有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窠臼，“没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心”。虽然区委确定这次暴动应以“无产阶级的工人及比较革命的学生群众，一部分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为主体，但仍主张暴动后应“完全以比较左倾的资产阶级出来掌握政权”，“无产阶级的工人及许多下层民众，纯处监督地位”，使“民众可以乘此得到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上海区委在罢工前，并没有充分进行思想动员和对工人进行切实的武装准备；待罢工发动起来后，又“等待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了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励”，把“暴动胜利的保障”寄托于钮永建“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 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上。然而资产阶级对罢工和起义却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拒绝宣布罢市；虞洽卿甚至不同意把他的名字列入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而公诸于众；钮永建也毫无作为，致使武装暴动没有形成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

其次，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还缺乏领导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经验。

对“罢工几乎没有具体的策略和具体的行动要求”，“罢工前没有宣传鼓动，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更没有为这次罢工而设的军事组织”。上海总工会在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时，并“没有指明上海的行动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泛的宣传”，以致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直到21日，上海区委才觉察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立即发出“特别通讯”，着重提出“目前我们唯一的重大责任，在于指示上海的市民、工人阶级创造民主的革命的市政府”，但为时已晚。

再次，在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时机的把握上，上海区委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上海区委认为北伐军进驻松江是起义的最佳时机，以为北伐军立即可以打进上海，支援工人起义；岂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因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而停止向上海进军，致使李宝章得以集中全力镇压工人起义。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市民政府的建立

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在决定停止暴动的同时，还确定了“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的方针。会议决定建立特别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委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等八人组成。会议还决定组建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特别宣传委员会，具体负责武装群众、宣传群众等工作。

特委会成立后，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就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热烈讨论，统一了认识。陈独秀主张要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进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武装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武装，召开群众的代表会议，进行代表选举的工作，成立“民选市政府”。为了确保工人阶级对市政府的领导权，他还提出工人代表应占市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一半。周恩来也提出应“使工会代表加多，各产总都要派代表，且组织党团”，以加强共产党对市民代表会议的领导。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纠正了右倾错误之后，确立了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正确指导思想，即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动员广大市民群众，用暴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市民政权。

在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为第三次武装起义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为了把武装起义变成广大工人和市民自觉的行动，特别宣传委员会通过印发报刊等宣传材料，组织宣传队、讲演队，向群众大力宣传中共提出的“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打倒直鲁联军，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民众政府”这一总口号。同时，上海总工会拟定的《上海总工会对于今后之进行方针》，提出了工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共22条，把武装起义和工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这就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特别军事委员会则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工会组织，扩大工人武装力量方面。从2月底到3月中旬，仅半个月的时间，上海工会会员就由28.9万人增加到38.9万人。工人纠察队也增加到5000人。同时还组织了1000人的自卫团。特别军事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武器，武装工人纠察队；又委派一批军校出身的共产党员到各区加强对武装工人的训练。上海总工会配合军事委员会，加强对各级工会的领导。3月4日，总工会召集全上海各工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50余人，代表80多个工会。大会通过了第二次总同盟罢工的

议案。3月1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提出总同盟罢工的8条纪律，要求全体工人遵守，以加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

此外，特委会还为起义胜利后建立民选的上海市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准备工作。2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民众书》，号召全市人民在罢工取得胜利后，应“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权！”在政权问题上，特委会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存在着分歧，其焦点是“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¹特委会就此问题，专派罗亦农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及国民党特派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反复协商。钮、吴等反对民选市政府，主张“以党治国”；市政府委员应由国民政府委任；认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所以不能实行代表会议”²。在选举方法上，他们反对中共提出的以职业为单位，主张以区域为单位。其实质是企图排斥工人群众当选为代表。中共代表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坚持市民政府必须是民选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3月12日，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300余人，代表200余团体。会议通过决议，剥夺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公民之意志，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³。会议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工人8人，大、中、小商人8人，学生3人。共产党员11人，占总数的38.7%。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是上海市民开始争取民主政权的具体而积极的表现，是组织未来市政府的第一步工作”。⁴

3月18日，北伐军占领吴江、苏州。当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0人，大会决定组织60万工人罢工，援助北伐军。次日，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召开联席会议，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会。这时驻上海的奉鲁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派代表与钮永建谈判，表示愿意投降。条件是投蒋不投国民政府；将上海和无锡划归他管辖；应有军长以上头衔等。钮见毕无诚意，予以拒绝。何应钦、白崇禧等原准备待毕投降后再进驻上海的计划落空，遂率部向上海进发。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先头部队薛岳师进至上海南郊龙华。至此，响应北伐军，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宣布于12时全市同时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

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总同盟罢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1日，上海8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向预定的地点集中，旋即转入武装起义。按照计划，武装起义又分别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7个区发动。特别委员会指派周恩来、赵世炎担任正、副总指挥，组成作战指挥部。

从下午1时开始，起义队伍以武装工人纠察队为先锋，群众队伍紧随其后，起义者的目标是夺取各区警署和兵营。经过激烈的巷战，至下午5时，除闸北区外，其余6个区全部为起义者占领。

闸北区是直鲁军重点防区，设有军事据点20余处。周恩来、赵世炎坐镇

该区，指挥战斗。10 万罢工工人和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纠察队，分头向北火车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警察五区总署、广东街分署、中华新路警察分所等 6 个主要目标进攻。在激烈的巷战中，街道居民自动献出木板、砖石、麻袋，帮助修筑街垒工事。各处饮食店昼夜赶制熟食，供战友们充饥。佩戴着红十字袖标的男女济难队员，冒着弹雨硝烟，抢救伤员。敌军警自恃武器精良，企图顽抗待援。起义者以人多势众，采取包围战术，将敌人团团围住。经过通宵激战，敌军虽多次企图突围，均被阻挡回去，最后不得不举起白旗，缴械投降。至 22 日下午 4 时，起义者已攻占了湖州会馆等 5 个据点。总指挥部立即指挥各路工人纠察队一齐向北火车站发起攻击。直鲁军困兽犹斗，发炮向市镇狂乱轰击，焚烧民房一片，以阻止起义者前进。愤怒的群众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拼死向前。经过 1 小时的殊死战斗，终使敌军失去战斗力。毕庶澄眼看大势已去，遂只身逃入租界。毕部群龙无首，纷纷溃散。下午 6 时，起义者胜利地夺取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小时的鏖战，占领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全部华界地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起义中共歼敌军 3000 余名，武装警察 2000 余名，缴获枪支 5000 余支。在战斗中有 200 多名工人纠察队员英勇牺牲，1000 多人受伤。

这次起义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中共特别委员会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前两次重视资产阶级力量的右倾错误，明确地把工人阶级作为武装起义和建立政权的主体，从而调动了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是中共特别委员会汲取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加强了对起义的组织领导，组建训练了一支战斗力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第三，由于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市民积极参加斗争，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因而在起义中形成了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第四，武装起义是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时刻举行的。虽然北伐军为坐收渔利，按兵不动但对敌军还是起到了威慑作用，致使敌军军心涣散，不敢恋战。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为上海人民推翻军阀反动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提供了条件。22 日上午 9 时，当武装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战斗还未结束的时刻，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了。1000 余团体的 40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工人代表占半数以上。大会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有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光、侯绍裘、王汉良、陆文韶、郑毓秀、谢福生、李泊之、王景云、顾顺章等 19 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 10 人，占半数以上。次日上午 10 时，临时政府开始办公。25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上海特别市政府委员会为上海市民最高权力机关。

上海市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市政府为上海革命中心，承认上海总工会在武装起义前提出的 22 条经济、政治总要求；宣布以力求解除压迫之痛苦，实现工商学各界所提各项要求为施政原则。市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还制定了《市政府政纲草案》共 107 条。该政纲在政治方面的内容包括：肃清军阀残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奴等一切反动势力；收回租界，废除不

平等条约；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绝对自由；上海治安由上海人民自卫武装维持等等。它集合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是一个较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上海市民政府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

中外反动派决不允许代表人民的上海市政府存在。已经准备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于3月26日一到上海，就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市民政府成立。29日，当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时，蒋介石派人送去一封信，要求市政府“暂缓办公”。在遭到拒绝后，蒋介石又指使投递恐吓信，声称：“限二十四小时解散市政府，否则要以最后手段对付”。还胁迫政府委员退出市政府。于是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白崇禧、钮永建、虞洽卿、陈光甫、杨杏佛、郑毓秀等先后宣布辞职。面对蒋介石的破坏，中共上海区委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决定补选孙科为国民党代表出任政府委员（孙未到职）。4月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会议，选举王晓籁、孙科、汪寿华为常委，王晓籁为主席。遂使蒋介石瓦解市政府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最后蒋介石图穷匕现，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这个刚刚诞生24天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第四节 国民革命军的发展泸顺起义

一、国民革命军的发展及其进军苏皖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民革命军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是北伐誓师前的国民革命军各军大都进行了扩编。

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不仅在军械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而且在江西、福建战场中大肆扩充其部队。在江西，蒋介石将俘获的孙传芳部4万人编入该军，成立补充第一、二两师，收编时只调换旅长以上的官佐，旅长以下的官佐均不更动。在福建，早在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入闽前，蒋介石就批准他编练补充兵3个团，入闽后，何应钦又将归降的张毅部编为4个团，隶属于第一军。

第二军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在湖南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队伍。1927年5月，第二军扩充为两个军，原该军教导师扩充为第十四军，师长陈嘉佑升任军长。同时，原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辞职，由副军长鲁涤平继任。

第三军由于在江西收编了滇军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又从湘黔边境将滇军金汉鼎部调到江西，朱培德升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于是，5月间，原第一师师长王均升任第三军军长、金汉鼎部编为第九军（后改为第三十一军），金任军长。这时，朱培德部由1月间的1.6万人骤增至6万人。

第四军在北伐中战功卓著，荣获“铁军”称号，于是1926年11月下旬，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原师长陈铭枢升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同时，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原师长张发奎升任副军长。第五军留守广州，未参加北伐。

第六军在北伐开始后，补充新兵5个团。1927年3月间，第六军攻占南京后，蒋介石施展调虎离山计，将该军挤出南京，4月8日，将第六军十七、十八两师开往江北，密令何应钦和贺耀组解除共产党人较多的第十九师的武装，遂在该军“清党”，升十七师师长杨杰为第六军军长。6月间，程潜在汉口重建了第六军，在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林伯渠的协助下，整理训练，很快又成了劲旅。

第七军也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收编了军阀旧部，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第八军由湘入鄂后，竭力招募吴佩孚溃兵，又得汉阳兵工厂的军械，遂新编了31个团。到1927年1月间，由原2.6万余人骤增至约6万人。2月上旬，第八军扩编为3个军：第八军、三十五军和三十六军。

其次是一些旧军阀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北伐战争开始后，云、贵、川地方军阀纷纷归附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最先来归附国民政府的是黔军袁祖铭。1926年6月初，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及其一师师长王天培、二师师长彭汉章都派遣代表到广州接洽，表示愿意加入北伐，会同唐生智反攻长沙。7月中旬，国民政府任命袁祖铭为川黔国民革命军联军总指挥（也称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兼第十二军军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国民政府令袁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

原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部驻扎滇桂边境百色、平马一带，9月下旬，国民政府委任范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11月底，改任第十六军军

长。

杨森属四川军阀降吴（佩孚）派，但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在 1926 年 4、5 月间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表示愿意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李大钊同杨森的代表会谈后决定派在中共北方局负责军事工作的彭泽湘随杨的代表到四川万县去和杨谈判。彭、杨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湖南时，杨即出兵攻鄂西；杨出兵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接受广东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8 月间，杨森又派代表到长沙，与北伐军接洽，再三申请国民政府给以名义。国民政府为使杨森牵制鄂西一带的北洋军阀部队，10 月初，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并委派朱德为该军党代表。杨森采取两面态度，虽接受委任，但并不就职，甚至应吴系卢金山的请求，组织援鄂川军总司令部，自封为总司令，图进犯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的反击下，才于 11 月 16 日宣布就职。

四川军阀刘湘自认和杨森相比，颇不得志于吴佩孚。当北伐军进军两湖时，刘湘联络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通电讨吴。国民政府也派代表赴川，策动刘湘出兵，响应北伐。但是，刘湘一面宣称即将“出师北伐”，一面采取出巡检阅部队的办法，以期拖延时日。当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刘湘等的反吴态度才较为坚定，因此，11 月下旬，国民政府分别委任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 月以后，他们陆续通电就职。

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反对刘湘、赖心辉、杨森的扩张政策。12 月中旬，蒋介石分别委任邓、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军长。但邓、田宣称“南军所委军职能否就职，须视能否奠川为准。”直到次年 1 月，邓、田才就职。

周西成是贵州军阀集团中强有力的人物。1926 年 8 月间，蒋介石派李仲公赴贵州招抚周西成，周受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12 月中旬，在贵阳就职。

第二，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孙传芳集团土崩瓦解，一些非嫡系部队纷纷归附国民政府，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号。

江西督办方本仁觉察到孙传芳对己不利，乃派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孙得知后，便任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使邓逐方。方离赣赴沪，国民政府委詹大悲为驻沪代表，与方接洽江西问题。6 月初，方与詹同赴广州。8 月 10 日，国民政府委任方为江西宣抚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

驻扎赣粤边的赖世璜与坐镇赣州的杨池生、杨如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民政府派陈赞贤（共产党员）做争取赖世璜的工作。8 月下旬，蒋介石调令赖世璜师作为攻克赣州的主力部队，委任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

浙江省长夏超非孙传芳的嫡系。总政治部派杜伟、胡公冕（共产党员），国民政府派戴任、郑炳垣、马叙伦、许宝驹等与夏超联系，敦促他独立，截断孙传芳退浙后路。10 月 16 日，夏超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的委任，将其保安队改编为第十八军，宣布独立，起义反对孙传芳，沿沪杭路向淞江进攻。

由于条件不成熟，起义很快遭受失败，夏超被杀。夏遇难后，孙传芳令浙军第一师长陈仪回浙，继任省长。但陈仪早已与北伐军有秘密联系，曾派其参谋长葛敬思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要求给予名义。12 月中旬，蒋介石委

任陈仪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此事被孙传芳知晓，遂令孟昭月部入杭，并将陈软禁起来，将其第二团缴械。但第一团在石铎带领下驻扎在绍兴，陈仪脱险后，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陈仪任军长。

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任九江警备司令时，隐居在九江英租界的国民党人对周进行了策反工作。总政治部派杜伟，国民政府派赵舒前去做争取工作，与周协议易帜事宜。局部旅长斯烈之弟斯励在总政治部工作，也奔走于沪、杭、浔之间。周凤岐令工兵营长樊崧甫赴武汉与北伐军接洽。当南浔路孙传芳军处境危急时，周企图返浙，与夏超联系。孙本忌周，这时对周防范更严，想调安徽省长陈调元回九江，解决周部，但陈对周持庇护态度。当北伐军向浙江进军时，12月中旬，周在衢州宣布废除浙军名义，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任军长。

为了反击福建督理周荫人的进犯，国民政府决定夺取福建、夹攻浙江，以驻守潮汕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及独立第四师编成东路军，并联络福建第三师师长李凤翔为内应，任李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但李狐疑不决，而其部属第三旅旅长曹万顺，第四旅旅长杜起云毅然投归国民革命军，10月17日，国民政府将其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任曹为军长。

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安徽省省长陈调元派代表赴赣，请求改编，蒋介石任陈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同时，蒋介石也任皖军第一军军长王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

第三，吴佩孚在其主力于两湖被消灭之后，即率残部退居河南，但这时原属其系统的一些部队却举起了反吴的旗帜，归附国民政府。

靳云鹗部是吴佩孚残部中实力最大者，辖有高汝桐、阎得胜、徐寿椿、马吉第4个师，约2.5万人。对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态度，靳云鹗和吴佩孚意见相左。靳力主联冯讨张，吴主张联张讨冯。1927年2月初，当奉张以援助吴佩孚反攻武汉为名，分两路进攻郑州和开封时，靳发表拒绝奉军入豫的通电，靳自称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司令。自奉军入豫后，靳即与武汉政府通声息。国民政府决定给靳、魏以军饷援助，委任靳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

魏益三原为郭松龄东北国民军参谋长，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魏率余部投靠冯玉祥，以后又投靠吴佩孚，但与吴的关系不深。在吴、靳矛盾中，魏站在靳一边。1926年12月，魏派代表与北伐军接洽，蒋介石委魏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

任应岐部是从樊钟秀建国豫军中分化出去的，1926年吴（佩孚）岳（维峻）战争后，被吴收编，但任与樊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同吴若即若离。当北伐军向武胜关追击时，任即在郑州宣布独立，反对吴佩孚，并派代表向樊请愿投诚，共同讨吴，得到樊的允许，同时派代表到武汉，与北伐军接洽。9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任应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这时党掌握的武装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五师是第四军参加江西战役后新建立起来的，师长朱晖日，副师长叶挺，下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团。七十三团是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团长周士第（共产党员）参谋长许继慎（共产党员）。七十五团是新组建的，起初由叶挺兼任团长，叶挺从独立团抽调一批干部作为该团的骨干，并亲赴广东、湖南进行筹建工作。他在广东收集独立团留下来的伤病人员，组成第一营，在湖南收集独立团留下来

的伤病人员，组成第二、三营。后来，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和七十四团一个重机枪连参加了南昌起义。

2.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四·一二”之后，叶挺由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调来担任该师师长。该师辖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党从七十三团抽调一部分人员作为二十四师的骨干，如调许继慎担任七十二团团团长，宛旦平、黄克健、袁也烈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同时，党还在该师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和一个教导队。后来，叶挺率部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时，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后来，二十四师全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3.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1926年冬，朱德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过去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来到江西南昌，着手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次年2月底，军官教育团开学。朱德任团长，魏瑾钧任党代表，刘介眉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为陈奇涵）。该团学员1100多人，编为3个营，团内建立了党支部，陈奇涵任书记。教育团积极参加校外反对AB团的政治斗争和支援农民运动，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4.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7月初，继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总指挥部警卫团也相继成立。这个团是共产党组建起来的，党一方面从七十三团调去一部分人为骨干，另一方面从别的部队调去一部分党团员。该团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是共产党员，指导员辛焕文是党支部负责人。该团团营干部绝大部分是党组织介绍来的，连排长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士兵大多数是农民协会送来的。后来，全团2000多人在卢德铭率领下，参加了湖南秋收起义。

此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程潜部的两个团、陈嘉佑部的两个营、湖北省政府警卫团，以及国民军联军中的驻陕总司令部卫队师（师长史可轩）、第一路第三师（师长张兆丰）和中山军事学校也都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到大革命后期，国民革命军由8个军发展到40多个军，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是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

北伐战争不到一年时间，就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的主力，削弱了张作霖军阀集团的力量。在反革命势力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三大军阀集团中的非嫡系部队，便纷纷归降国民政府，挂起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以保全其原有的实力。这是北伐战争巨大威力的结果。当然，这些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仍旧建立在军阀统治的基础之上，军阀们仍利用雇佣兵制度，掌握着兵权。他们并未得到改造，有的甚至在北伐过程中随降随叛。他们归附国民政府的行动，对于促进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在客观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北伐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第二是国民政府的策反工作。

这些归附国民政府的小军阀，由于和吴佩孚、孙传芳存在一些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的影响，国民政府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对他们做了分化瓦解工作。受国民政府委派去做策反工作的，有一部分是共产党人。朱德、陈毅做争取杨森的工作就是一例。

第三是蒋介石的收罗。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竭力推行一条使北伐战争循着争夺地盘、取北洋军阀而代之的路线。蒋介石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对旧军阀部队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师长升为军长，军长升为总指挥。他对反正过来的原孙传芳部队中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委以重任，仍让其掌握兵权，他滥委军长至数十人之多，而新投靠过来的军阀都是拥蒋的。总之，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竭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旧军阀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表面上归附国民政府，新旧军阀这样一结合，便使得国民革命军得到迅速的扩充。

第四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努力。

共产党掌握的军队由一个叶挺独立团发展到几支部队，主要应归功于党中央军委的努力。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中央军委，十分重视“铁军”第四军共产党掌握的武力。第二次北伐中，第四军牺牲最大，当其返回武汉后，军委利用其补充人员的机会，派去了不少共产党员。军委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第四军当士兵。军委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人的工作。派朱德到南昌创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陈毅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中共党委书记，刘伯承到南昌准备武装起义。此外，叶挺在“铁军”中扩充党掌握的武力中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国民革命的发展壮大，使其继续向苏皖进军较为顺利。

北伐军占领浙江后，孙传芳将其残部撤至松江、上海一带整编，并在嘉兴至枫泾设三道防线，同时电请张宗昌调直鲁军至镇江、常州一带驻防。张宗昌于是令入豫直鲁军转赴江苏，并于2月23日到南京与孙传芳开军事会议。双方商定，孙军全部开赴松江前线作战，以鲁军3万人驻守沪宁线。会后，孙、张同赴上海部署。25日又开军事会议。孙因屡次战败，对作战已无信心，为保存残存的一点实力，忽又提出拟将前线各部队调回后方休养和训练，请鲁军担负前线军事任务。张宗昌当即表示同意，随后调鲁军赴前线接防。

这时，北伐军东路军何应钦、白崇禧也于2月23日在杭州召开了军事会议。他们认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的集中地，为避免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决定先行截断沪宁线，与江右军会攻南京。

会后，白崇禧率东路军第一纵队（第二十六军）、第二纵队（第一、第二十二师）、第三纵队（第二、第二十二师）主力集中于嘉兴、平湖一带、对上海取攻势防御。何应钦则率第四纵队（第三、第十四师）、第五纵队（第十四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军）及江右军之第二纵队（第二军），从苏、皖、浙边向常州、丹阳进攻。

3月17日，何应钦所部占领溧阳，第二军占领溧水，随即向常州、丹阳推进。北伐军得到沪宁铁路工人的协助，拆毁无锡附近路轨，切断敌军退路，敌军由常州退守镇江。20日，何部各纵队占领常州、丹阳等地。

当何部围攻溧阳时，3月16日，白崇禧令所部开始向淞沪方面推进。在攻占松隐、后岗后，以主力进攻松江。这时，江苏水上警察厅厅长何嘉禄乘机起义，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六师师长职，派所部缉私队袭扰敌军后方。同时，沪杭铁路工人也积极支援北伐军。敌军凭借坚固工事和白俄兵团铁甲车队，以猛烈炮火，顽强抵抗，使北伐军在嘉兴一带被阻。中共杭州地委立即指示铁路党组织尽快发动工人制造铁甲车供北伐军使用。在中共党员沈干城、洪德生带领下，铁路工人在三天中改装成六辆命名为“中山号”的铁甲

车开赴前线。经过两昼夜激战，北伐军于3月21日占领松江。同日，北伐军第二十一师占领苏州，第一师进至上海附近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北伐军才开进上海。

当北伐军东路军开始向常州、淞沪推进时，程潜指挥的江右军主力第一纵队（第六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二师）由皖南向芜湖、南京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李宗仁指挥的江右军则自鄂东向安庆、合肥推进，牵制江北之敌，以配合江左军作战。2月20日，江右军第一纵队进至至德附近，第三纵队进至祁门。这时，刘宝题率部在徽州起义，就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并以主力向芜湖推进。皖军陈调元、王普在1926年12月间已派人向北伐军投诚。当江右军一部3月4日进至大通时，他们决定易帜，参加北伐军。5日，陈调元通电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普宣称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时皖南叶开鑫部也接受改编。于是北伐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安庆、芜湖和皖南大部分地区。

3月中旬，孙传芳所部已全部退集江北，南京附近仅有鲁军万余人。3月17日，江右军第一、三纵队占领当涂，同日，第二纵队占领了溧水。江左军也已进至六安、合肥，与北路军陈调元部一同牵制江北之敌。北伐军已对南京形成围攻之势。

3月20日，程潜令江右军各纵队向南京外围各据点发起全线总攻。至23日，各纵队已进迫中山门、光华门和雨花台，24日占领南京，受到南京人民热烈欢迎。

二、泸顺起义

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1926年11月中旬，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杨兼任军委书记，军委会负责领导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四川武装起义，其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中站住脚根，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3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1个军6个师，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

可是泸州起义首先爆发。赖心辉部属第四混成旅袁昌文部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与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矛盾很大。重庆地委决定以袁部为骨干力量，吸收陈兰亭参加，在泸州组织起义。12月1日晨，袁昌文利用邀请李章甫前来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的机会，将李扣留，宣布起义，向李部发起攻击。次日，起义军占领泸州城。袁、陈当即发出起义通电，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四、五路司令的名义，出示布告。泸州各团体召开欢迎袁、陈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

泸州起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重庆，杨闇公决定派刘伯承赶赴泸州，率起义军前往顺庆。正值此时，顺庆武装起义也在12月3日爆发。鉴于顺庆是计划依托的根据地，遂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随即驰援顺庆，指挥整个起义部队驻在顺庆的是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何平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反对国民革命，被人称为“活阎王”。何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吴玉章等人策动下，逐渐靠拢革命。3日下午，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起义军向何光烈师部进攻。次日晨，起义军控制了顺庆县城。

黄慕颜接到秦汉三、杜伯乾起义的电报后，即在合川举义，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坝前进。刘伯承在大河坝赶上了黄部，决定改变行进方向，

挥戈北指顺庆。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10日，合川和顺庆的起义军70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在起义军的拥护下，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职，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一、二、三路司令职。

在刘伯承的部署下，起义军以黄慕颜所属司令部为基础，扩编为顺庆方面总指挥部。按原定计划，应以顺庆为根据地，待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然后向绥定进击，消灭顽固军阀刘存厚。然而，泸州、顺庆、合川的起义，使四川军阀们恐慌起来，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10多天来迟迟没有向北运动的样子。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区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国民政府靠拢。正当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忽然接到杨闇公的紧急密信，称已严令泸州起义军火速向顺庆集中，指示一、二、三路原地坚守，等候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于是，刘伯承重新部署坚守顺庆。

在敌人的进攻下，12月14日，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议会，讨论放弃顺庆向东转移的方案。22日，刘伯承率领起义军余部2000多人，撤到开江县整顿。

12月8日，对泸州起义进行指导和联络工作的吴玉章到达武汉。中旬，杨闇公派李嘉仲前往武汉，找吴玉章联络，向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报告，说明起义的经过情形和起义部队实力情况。并紧急请示如下事项：“一、委刘伯承以军长名义，统率黄、秦、杜、袁、陈五部；二、拨款以济军中急需；三、政治部派人前往服务”。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上，吴玉章提议给泸顺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番号，委任刘伯承为该军军长，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在当时，对起义军尽快给予政治上的承认是有重大作用的。但谭延闿却借故拖延，说什么要经过蒋介石，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带往南昌让蒋介石“划行”，故意从中作梗。后来，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邓演达提议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会议通过。1927年5月上旬，武汉政府正式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1927年1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召开军委会议，紧急筹划泸州作战方案，商定由刘伯承即刻赴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但是，从4月中旬开始，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文辉等包围了泸州城。刘伯承带领泸州城军民英勇地坚持了40多天，起义军一些将领投降了敌人。在危急情况下，刘伯承于5月16日突围出来，经西安、郑州到达汉口。同年夏，秦汉三、杜伯乾率起义军余部越过大巴山，沿川陕鄂边前进，向武汉政府靠拢，后来，在鄂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泸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震慑了四川军阀，他们纷纷易帜，表示拥护国民革命。这就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对巩固当时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节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 第三次高潮和蒋介石酝酿 分裂革命统一战线

一、蒋介石酝酿分裂革命统一战线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不仅未加收敛，而且变本加厉，日益公开化。

蒋介石于1月28日由武汉转回南昌后，即以南昌为大本营，加紧进行分裂革命的活动。他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同日本政界对话，以求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和支持。在牯岭，他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作出如下保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如期偿还外国借款；保护外国人在华投资的企业。他还和日本海相财部彪的私人代表，也是他昔日在日本求学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促膝长谈，他表白心迹说：他本人没有受苏俄的利用和指导；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对币原外相1月18日对华政策演说表示欣赏，并“愿意同日本握手”。2月初，蒋介石在九江与日本军部特使铃木贞一会晤。铃木转达了日本陆相宇垣一成的意图，希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国民运动”。蒋当即表示“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3月10日，蒋在南昌与日本政友会代表团山本条太郎、森恪、松冈洋石等人会谈，向日方通报了他准备在攻下南京、上海后即实行“清党”，镇压革命的计划。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去日本游说，向日本朝野说明他的政治态度。又派心腹黄郛去武汉拜访日本领事高尾亨等政界人士。通过以上活动，使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决策者确定了促蒋反共，镇压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

在联络日本的同时，蒋介石没有放弃谋求和美国建立联系的机会。1月间，当美国为避免上海出现类似汉口英租界被革命政府收回的厄运，而策划上海租界中立化活动时，蒋介石即通过亲美派人士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斯取得联系，向美方说明：国民党军为避免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可以不进驻上海地区。并向美方透露，他准备镇压上海工人起义，美国政府在了解到蒋介石的真面目后，竟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命令驻汉总领事洛克哈特把要求维护上海租界中立的照会正本文给蒋介石，只将照会抄本送给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以表示对蒋地位的承认和支持。2月间，蒋介石又委托他的一个亲信拜访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透露了蒋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矛盾已达到“永久性的破裂”；建议“列强若想将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这个说客还解释说，蒋介石之所以还与俄国人合作，“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向蒋提供武器弹药”；如果列强中的任何一国能给蒋军火援助，“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

蒋介石为取信于帝国主义，在向东南进军的途中，就接二连三地制造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的惨案，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2月21日，蒋在南昌发表演说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半个月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赣州发生了残杀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员陈赞贤的惨案。

陈赞贤是杰出的工农运动领袖，自1926年10月担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南党务及17县工农运动指导员以来，在他的主持下，出版了《国民

日报》、《青年之路》等宣传革命的报刊；创办了赣南工农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工农运动骨干；积极发展工会组织，仅在10月份就成立了56个基层工会，会员发展到1.8万人。11月初，赣州总工会成立，选举陈赞贤为委员长。他积极领导赣州各行业工会大力开展罢工斗争，推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允许在他统治的地区开展工农运动，他密令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前往赣州，负责改组赣州总工会，严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初，陈赞贤在南昌参加了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省总工会副委员长。会后，他冒死回到赣州。3月6日，陈赞贤在总工会开会时，被倪弼逮捕，押往县公署。倪弼限令陈赞贤在3分钟内在解散总工会的命令上签字。陈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严辞拒绝。倪弼等反动军官恼羞成怒，疯狂地向陈开枪。陈赞贤身中18颗子弹，壮烈牺牲。

赣州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江西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他们网罗地主豪绅、官僚政客，成立非法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于3月16日强制解散南昌市党部、江西学生联合会，查封《贯彻日报》。3月17日，蒋介石在九江指使段锡朋纠集流氓地痞，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及国民新闻社；打死市党部工作人员、工人纠察队长、农协干部共6人，制造了九江惨案。

3月20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又制造了一起夺取安徽省党政大权的反革命暴乱。23日，蒋介石授意总司令部行营特务处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等，以每名大洋4元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的百人敢死队举行暴乱。他们手持枪械狂呼“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捣毁了安徽省临时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市妇协等机关团体，打伤6人。随后，蒋介石亲自操纵，成立了以易帜不久的军阀陈调元为主席的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从而在实际上控制了安徽省党政大权。

继安庆反革命暴乱后，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蓄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大惨案。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订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抗议英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大会。刘湘闻讯，密报蒋介石。蒋电令刘湘严加镇压。30日，刘湘派师长罗议三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委、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进行恫吓，妄图迫使杨取消群众大会。杨闇公不为所动，决定大会如期举行。31日上午，重庆市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约2万人齐集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当杨闇公、李筱亭、漆南薰、陈达三等省党部执行委员登上主席台时，预先埋伏在会场内外的王陵基便衣冲锋队突然从四周冲向人群，乱砍乱杀。顿时尸横遍地，血肉四溅。死难者达四五百人，伤者不计其数。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们又接着捣毁了四川省党部、省农协、县市党部、市总工会、市妇协、四川日报社等机关团体，四处搜捕杨闇公等省党部负责人。4月4日，杨闇公不幸被捕。4月6日，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被敌人残害于浮图关。

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重庆等地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就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

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运动，公开反对共产党，使革

命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机，使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相继被消灭，张作霖势单力孤，已不能构成对革命的威胁；又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两股反革命势力，开始朝着破坏中国人民大革命的统一目标汇合，因而国内主要矛盾已由人民大众与北洋军阀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与新军阀蒋介石的矛盾。

二、炮轰南京事件和“宁案交涉”

北伐军进占上海、南京后，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了炮轰南京事件，对中国革命实行武力制裁。

炮轰南京是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行动。英国保守党内阁在失掉汉口、九江租界后，为防止汉、浔事件在上海重演，为保护其在上海的经济权益，决定实行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这一侵略政策得到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认同。英国从1月下旬开始，陆续从本土和印度调遣两万军队开赴中国。美国政府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命令亚洲舰队舰艇由马尼拉等地驶往上海。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也派遣十几艘军舰驶进长江，并抽调1500名海军陆战队增援上海。到了3月初，英、美、日、法、意等列强军舰90余艘在黄浦江上虎视眈眈，游弋示威。3月7日，北伐军攻打南京的战役还未打响，美国驻南京领事戴伟士和美舰“诺亚号”舰长史密斯就把他们共同制定的“南京防卫计划”推荐给英、日海军当局。这份计划成为尔后三国联合防卫南京的方案。该方案确定，当南京一旦成为中国南北两军作战的战场时，三国将联合行动，共同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侨民”。3月22日，北伐军向南京城进攻。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美军舰已作好战斗部署。它们利用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住宅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设置信号站，派信号兵进驻，随时将北伐军攻城的战况通报给英美军舰。同时命令军舰炮手将炮口瞄准预先测定好的界标，以便开炮时炮弹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帝国主义蓄意干涉中国革命已是剑拔弩张。

23日夜至24日，以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为主力的江右军攻进南京城。帝国主义借口外侨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大肆进行武装干涉。美国领事戴伟士当即命令信号站向停泊在江面上的外国军舰发出炮击信号。从24日下午3时30分开始，英舰翡翠号、美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一齐向南京城内预定的目标轰击，长达1个多小时，发炮100多响。打死北伐军官兵、市民共43人，重伤26人，轻伤无数，许多居民因房舍被炸毁无家可归。南京人民蒙受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炮轰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实行武装干涉中国人民革命的最严重事件，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也引起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各界80多个团体召开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反英大同盟，扩大反英斗争；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制止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决议。湖南省工、农、商、学各界一致行动起来，收回了被帝国主义把持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和岳州海关，接管了亚细亚和美孚洋行。3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炮轰南京事件告全体男女工人、全体劳动者、劳动青年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英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因为中国革命最近的胜利威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炮火是反对整个民族革命战线的炮火”；号召世界劳动人民“最坚决地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支持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发表题为《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独立运动之武装行为》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

反抗压迫中国民众之国际行动，组织大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

炮轰南京事件后，围绕“宁案”善后处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一场以出卖中国革命成果，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交易。

南京事件发生后，对中国实行武力制裁的呼声一时间甚嚣尘上。25日，英美日驻南京海军指挥官商定，共同要求南军最高长官前来舰上道歉，否则将再次炮轰城内军事设施。三国驻北京公使也一致认为应抓住所谓“南京暴行”的机会共同采取行动，把席卷长江以南的革命火焰扑灭下去。为了制造进一步武装干涉的借口，他们对南京事件大肆渲染，用所谓“义和团之祸重演”之类危言耸听的宣传，煽动反华。美国大使马慕瑞要求“海军当局应提供轰击江阴炮台的恰当理由”，他认为“除了封锁上海以南的中国港口，以对中国施加压力外，没有更有效的方式” 。

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已由安庆到达芜湖。他连夜派随从到日本驻芜湖领事馆向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南京事件由他本人负责处理；希望日本出面调停。蒋还请人转告日本驻南京领事：他“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以解决事件” 。25日中午，蒋介石乘楚同舰到达南京下关，在舰上召见了前来迎接的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下午2时，杨杰衔命前往南京日本领事馆会晤日本领事森冈正平。杨杰说，蒋总司令对这次事件感到遗憾，愿以诚意谈判解决善后；南京事件是军队内部部分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26日，蒋介石兼程赶到上海，公开声明来沪目的是“办理一切善后”。当天，白崇禧向上海各国领事保证，国民党军队“无意进攻租界”，他表示“愿尽力维持秩序”。

蒋介石对南京事件的表态丝毫未对帝国主义表示谴责，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和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的责任心，他那谄媚、卑躬的态度成为列强制定“宁案交涉”方案的依据。

日本外相币原根据驻华使馆发回的情报，作出了与南京事件真相相悖的判断。他断定“南京事件是一部分广东军队和一部分山东败兵所为，他们是由于受到广东过激分子的煽动，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 。他估计中国“稳健派”与“过激派”的分裂即在眼前。币原“相信蒋介石乐意并且有能力维持秩序”，因此目前采取任何强硬手段，“只会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只会使广东的过激分子取得对广东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 。他认为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怂蒋反共”，假蒋介石之手扑灭革命，“维持秩序”。

3月2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在北京商定了《宁案通牒》草案，向武汉政府提出道歉、赔偿、严惩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发生同类事件四项条件。草案还附有如下内容：敦促蒋介石“限时”采取令人满意的行动，实施上列条件；否则列强将有权“采取良认为适当的措施” 。币原外相完全赞成《宁案通牒》草案提出的四项条件；但认为有关“限时”的措词，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不利于争取蒋介石，应予以删去。币原认为，目前“列强的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的手维持中国的秩序” 。应对蒋介石等“稳健分子”软硬兼施，给他以施展能力的机会。出于以上考虑，币原立即训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要他在各国公使会议上提出建议，把“限时答复”的字样从抗议通牒上删去 。

3月30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对日本没有参与炮击南京事件表示感谢。他恭维说：这足以使人看出：“日本对华外交是与英美的压迫政策相分离而独立的，相信会有好的影响”。矢田也以关切的态度向蒋介石

石透露了《宁案通牒》的四项条件，接着十分忧虑地说：当前英、美都在谋划对中国增兵，“实处在千钧一发的严重关头，可以说危机四伏，些微细故便会激成大事件”。他希望蒋对维持上海治安“负起全部责任”方可化险为夷。蒋介石当即表示，充分了解矢田的意思，“必当采取严厉制裁措施”¹。31日，蒋介石公开向报界宣布：关于南京事件“对外国人一定有相当满意的办法”；至于收回租界，“我不主张用武力及暴力出之”，“各友邦侨民可以放心”²。

4月1日，矢田约见黄郛，传达了币原3月30日给他的《训令》，并请黄郛转告蒋介石。《训令》歪曲事实，以假乱真，诬称“南京暴行”是共产党分子、党代表和军官事先策划的排外行动，其目的在加速搞垮蒋介石；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在策划这种阴谋。《训令》对列强炮轰南京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说是列强因对国民革命军的前途感到绝望，难免采取共同防卫的手段。《训令》责备蒋介石缺乏管束共产党跋扈的决心，并以威逼的口吻表示：对于蒋介石本人，当前究竟是取得国内外信赖，在收拾时局上获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丧失时机，取决于蒋介石本人的决心。黄郛在听完矢田的传达后，立即表示：蒋介石本人的诚意“早已毋庸置疑”，一定慎重处理此事件。他认为“当前必须加紧解决的问题，一是尽快解决南京事件；二是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黄郛希望日本政府体谅蒋介石目前还必须和武汉政府维持隶属关系的处境，并建议“西方的正式抗议宜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最好以半数军舰秘密集结于汉口，施以某种压力），而实际处理则由蒋负责”。他强调指出，如不采取这种方式，将“使蒋遭受猛烈攻击”。关于解除工人武装，黄郛认为“要特别注意方法。如果贸然行动，将会引起与军队的冲突，使总工会下达罢工的命令”，后来就难以收拾，“也使蒋介石遭到没有能力维持治安的责难”³。

4月2日晚，蒋介石再次请黄郛会晤矢田，转达他对币原《训令》的态度。蒋表示他对训令充分理解；他已下决心对国民政府进行整肃，“目前正招集将领反复计议，俟准备完成后即付诸实行，四五天之内可见分晓”。“整肃问题，即与共产派分离问题解决后立即着手解决”南京事件。关于整肃问题，黄郛胸有成竹地对矢田说：“现在上海有中央执行委员五名，中央监察委员四名，以此可将总部从武汉派那边夺取过来，然后排斥共产党。而在进一步实施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⁴。上述事实说明币原“怂蒋反共”的分化策略已初见成效，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正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美国政府从它对华扩张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宁案”的处理采取了审慎的态度。4月2日，美国国务院训令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应向蒋介石发出通牒，俾使“宁案”获得“完全满意之解决”；但“不希望该通牒含有最后通牒式的限定时期的措辞”。当日下午再次训令马慕瑞：可以由美英日法意五国向蒋介石和陈友仁分别提出无时限的“宁案通牒”。训令指出原草案四项条件不变，但有关时限的措辞可改成“同时通过我们的总领事通知蒋介石，如果他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他打算迅速答应这些条件，关系列强将不得不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训令强调：“假如一定要实行制裁，那末美国政府将对不论采取那种制裁措施保留自己的意见”⁵。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尽可能避免实行武力制裁。这时，币原外相正式向英美驻日大使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他郑重声明：如果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使蒋介石垮台，而诱使蒋

介石主动迅速解决南京事件，“可以免得蒋介石和列强都落入共产党的圈套” 。美、日两国政府的立场不谋而合。英国政府也就不再坚持武力制裁。就这样经过一番信使往还的磋商，三国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了共识，决定用分化策略取代武力制裁。

4月11日，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分别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和蒋介石递交了不加时限的《宁案通牒》，同时声称：通牒所列有关“ 惩凶”、“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等要求是针对某些“ 中外势力”而发 ，公开鼓动反苏反共。蒋介石立即作出响应，在通牒发出不到10小时，便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武汉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生命安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炮轰南京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立即电令第六军军长程潜对外国兵舰开炮情形进行详查，以便据实提出抗议。3月31日，陈友仁在汉口召见英美驻汉总领事，提交武汉政府的抗议书，郑重声明：“南京之骚扰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之所为”，“对于英美兵舰炮击户口繁多之南京之举，特提出严重之抗议” 。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答复五国对南京事件的通牒，严正表示：五国关于惩罚及道歉的要求，乃臆断国民革命军为有罪，国民政府断不能接受；屠杀友邦人民，及炮攻友邦城池，为万国公法及文明国通例所严禁，故国民政府主张将来国际调查委员会不独调查南京事件，而对“ 五卅”惨案、沙面惨案及万县惨案亦当一并调查；关于各国要求担保安全一项，国民政府认为最佳之保证是废除不平等条约 。

帝国主义在炮轰南京后所进行的“ 宁案”交涉的全过程，充分表现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特点。当时斯大林就指出：“帝国主义者轰击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表明，他们在寻找民族资产阶级的援助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 。帝国主义者施展圆滑的外交手段，实行分化策略，最终的目的是把蒋介石从革命阵营中拉出去，成为它们的同盟者，并假蒋介石之手把胜利在望的中国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三、汉口“ 四·三”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以分化政策为主的“和平外交”的同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强硬政策。就在币原极力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京事件，并得到英美等列强响应的时候，竟发生了日本水兵在汉口屠杀中国民众的“ 四·三”惨案，充分暴露了币原“不干涉政策”的虚伪性。

4月3日下午4时半，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一家日本酒馆门前，有两名日本水兵因拒绝付足车资而同中国人力车夫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个名叫大冈胜芳的水兵，凶狠地踢伤了车夫，并将上前来打抱不平的一名中国工人刺死。该处市民闻讯赶来，群情激愤，围住两名水兵不放。此时从酒店里又冲出来一群日本水兵，企图驱散群众救出同伙。愤怒的群众和他们展开了搏斗，抓获日水兵6名、日商人4名，扭送至省工会，后转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日本驻汉领事立即调集海军陆战队500名登陆，用步枪、机关枪追杀群众，至下午6时许，打死群众7人，击伤数十人。这是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又一起严重惨案。

“ 四·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撤退登岸的陆战队，而且从大冶、南京、镇江、上海、青岛等处火速调遣多艘军舰，驶往武汉，妄图扩大事态，进一步进行武装干涉。

惨案发生当天，湖北省总工会发出通电，号召全体工友“ 严肃团结，为

政府外交后盾” 。4月4日，武汉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后改为湖北省各界外交后援会）；同时拟订通过了与日本领事交涉的7项条件，呈送武汉国民政府。7项条件是：1.立即撤退日本水兵；2.收回日租界；3.凶手交中国法庭严惩；4.赔偿死伤损失；5.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6.日本不得因此次事变关闭工厂，辞退工人；7.日本担保以后不得有惨杀中国人民的事情发生 。7日，武汉数十万群众分别在武昌和汉口举行追悼大会。大会通过了四项主张：整个取消中日不平等条约；政府应对帝国主义绝对不妥协；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巩固新根据地；立即继续北伐，铲除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张作霖、张宗昌等残余军阀 。

南京事件后，武汉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鲍罗廷提出的争取日本，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策。4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由顾孟余、陈友仁、陈公博组成一个委员公，起草对日本人民宣言，试图争取日本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同情。4月2日，陈友仁约见日本驻汉领事，陈述了“自南京事件之后，中日两国颇有谅解之可能”；希望“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也不用恐惧” 。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参与英美对中国的武力制裁。

“四·三”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采取报复行动，一面派出大批军警保护日本侨民和他们的工厂、商店；一面派外交部官员到日本领事馆进行交涉，要求立即撤退日本海军陆战队，“并声明国民政府保护日人一切安全，倘日水兵仍在陆上示威，激起民众愤慨，发生争端，则由日本方面负完全责任” 。武汉政府对于肇事的日本人采取了宽容政策，这是违背民意的。4月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将抓获的4名日本商人送交日领事。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尚未取消，决定将日本水兵预审之后送交日本领事。武汉国民政府的软弱和妥协，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致使谈判一拖再拖，至4月25日才商定了以下6条协议：1.日本方面撤退水兵，拆除防御工事；2.日商复业，发还工人工资；3.武汉政府撤退驻防华界的军警和工人纠察队；4.工人绝对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日人；5.武汉政府负责保护日人财产；6.“四·三”案保留，俟适当时期再开谈判。 协议基本上没有涉及武汉各团体会议提出的7项正义要求。

和“一·三”事件相比较，武汉国民政府在处理“四·三”事件中，再也表现不出“铁腕外交”的气魄。在日本帝国主义公开进行武装干涉，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情况下，武汉政府还希图以妥协策略拉住日本，这是外交路线的大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

第六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反蒋斗争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3月26日,蒋介石由南京到达上海后,即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他将“清党”军事方面的部署委托给白崇禧。白“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七军三日内赶回芜湖、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渡浦口抵御直鲁军,将第六军附共之十九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分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歧两部接防上海”。与此同时,蒋介石收罗孙传芳部驻扬州之第五师师长白宝山和驻南通之第九师师长李宝章,分别任为第三十五军和第八军军长。他又组织工贼流氓袭击杭州总工会,屠杀革命工人。这样,蒋介石就控制了上海和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孤立了上海革命力量。

为了使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邀请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和李济深、黄绍■、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到上海进行策划。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李宗仁、黄绍■八人在上海开会,会上吴稚晖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会议决定由吴稚晖拟具草案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石曾、李宗仁、黄绍■八人在上海开会,会上吴稚晖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会议决定将吴稚晖呈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提出:“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并附上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等在内的应先看管者197人的名单,要求作“非常紧急处置”,此项咨文发出后,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看管监视”共产党员,“免予活动”。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3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孙中山故居举行了秘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古应芬等人,蒋介石提出必须马上要做的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精卫赞成。汪认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会谈决定依据汪精卫的主张:“望再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并且商定立即在上海召集会议讨论主要办法。在讨论前,汪精卫“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内最要三条:1.共同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共产党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来解决以前,不用接受上项命令;3.现在各军队及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共产分子阴谋捣乱,其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来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飭属暂时取缔,在党部、各机关各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止”。

汪精卫参加蒋介石的秘密会议后,在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据汪精卫说:4月1、2、3日,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诸人曾告他“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慌的局面。”他听了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称决无

此事，他以之转告吴等，吴说：这是口头骗人的话，不要信他。他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__他并说这是“一篇辟谣宣言”。《联合宣言》宣称“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并且说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公然放弃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联合宣言》极力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竟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__《联合宣言》不仅没有一言一字揭露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竭力为蒋介石辩解，这就使工人阶级解除了思想上的武装，放松了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警惕性，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打了掩护。宣言发表以后，陈独秀自以为国共关系从此可以好转，他随即和汪精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蒋介石到上海后，即勾结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由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资助金钱枪械，阴谋捣毁工会，屠杀工人。蒋介石还指派董福开、张伯歧等一些流氓兵痞，设立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来对抗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蒋介石不仅给他们提供经费、武器，而且派遣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这帮流氓党徒则宣誓“投袂奋起”，“甘作前驱”。__蒋介石并将受到革命影响的第一师从闸北调往南市，调派反动的刘峙第二师驻闸北，以便就近监视设在闸北的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乃以兵工联合同乐会等方式，与第二师士兵联络感情，进行宣传教育。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官兵终究不放心，遂又将第一、二师分批调往南京，另调新近投靠过来的浙江军阀周凤岐二十六军担任“沪上防务”，充当屠杀的刽子手。

3月底，蒋介石命令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地驻军，自4月1日起“均特别戒严，遇有行迹可疑工人即加检查”。5日，更借口“日来形势严重”，由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戒严。9日，各报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由蒋介石指派白崇禧和周凤岐为正副司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淞沪警察厅也根据戒严条例下令禁止集会、罢工、游行等事。蒋介石为了破坏革命的上海市政府，先要市政府“暂缓办公”，接着又策动资产阶级代表退出市政府，最后指派其党羽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于4月8日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布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__蒋介石破坏了上海市政府之后，即下令取缔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并捕去办事职员19人。

蒋介石一面加紧屠杀革命人民的准备，一面使用其欺骗与麻痹手段。3月28日，蒋介石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__蒋介石还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亲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于4月9日离沪赴宁，临行前布置其心腹杨虎留驻上海，直接监督执行其阴谋计划。据这一阴谋的主要执行者白崇禧后来供认：“第一师调离上海后，我着手部署清党之工作。……在开始行动前，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工友中有不少系地方帮会分子。所以我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

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事前，我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进行交涉，请其准许清党之部队经过法租界，因为由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是一条捷径”。

4月12日凌晨4时左右，蒋介石发出了大屠杀的命令，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好了的青红帮流氓凶手遂分头冲出，在闸北、南市、沪西等地与反革命军队一起动手向工人纠察队进攻。在闸北湖州会馆（即总工会会所），凌晨4时许，有60多个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20余人奋起抵抗，未及10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的部队开到。假装将便衣军缴械，并用绳索捆绑，随即逼令纠察队缴械，纠察队不允，二十六军将机关枪对准会馆，随即占领会馆。5时20分左右，身着军服手缠白布“工”字符号者二三百人来到闸北商务俱乐部（即纠察队总指挥处），向俱乐部图书馆三层楼射击，顿时枪声大作，纠察队也据图书馆俱乐部各窗口堆起米袋，作防御战。至8时许，第二十六军二师五团开到，即向俱乐部取包围形势，并拟进内交涉缴枪，纠察队不允，后敌军采取欺骗手法，将纠察队骗去游行，敌军即乘机占领俱乐部，1000余枪支被全部搜去。此外，在闸北商务总厂，闸北天通庵，南京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沪西曹家渡、浦东、吴淞、江湾等地的敌人也多用同样的方法向工人纠察队进攻。总计12日晨被缴械的纠察队共有14处，死伤工人百余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在11日晚自闸北去法租界赴杜月笙之约，陷入了反动派预先布置的圈套，因而被害。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之后，即由白崇禧、周凤歧以淞沪戒严司令名义，发布通电和布告，诡称流氓袭击工人为“工人内讧”，所以缴械。同时颁布严禁罢工令，防止工人罢工援助。

工人纠察队缴械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致赞扬蒋介石处置得当。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也热烈捧场。

事件发生后，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市民代表会和市政府、市学联、市妇联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文电或提出质问，一致声援上海总工会，指责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第二十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十分愤慨，反对无效，因而留书出党。赵出走后，该军政治部全体人员，亦自行宣告解散，并有数十名革命士兵携带枪械逃离部队。

12日中午，数万名工人在闸北青云路举行集会，会后出发游行，由青云路、宝兴路、而中华新路，抵达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一致要求军队撤退，交还总工会会所。军队起初拒绝撤退，工人群众悲愤填膺，一拥而入，驻军始被迫退出。湖州会馆夺回后，总工会继续办公，并立即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宣告全市总罢工。总工会发布了紧急罢工命令、总同盟罢工宣言、对全国各界同胞的通电和责问蒋介石的电文。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全市参加总同盟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以上。

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到会工人6万余人，学生和市民加入者亦甚多。大会通过下列决议：（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工人群众整队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支，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接到屠杀密令并布置在里弄

内的第二师士兵，即分头奔出，向毫无准备的徒手群众开枪，将群众的队伍冲散，接着用机枪扫射，一时秩序大乱。当场死者至少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数计。其时雨势甚猛，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反动派为掩护其血腥罪行，于2时10分立刻实行特别戒严，禁绝行人，用大卡车把死者运往荒郊埋掉，尚有重伤未死者，亦被放置车上装往郊外活埋掉。

群众请愿大流血后，当日下午，上海总工会立即发表第二次宣言，号召全市工人坚持总同盟罢工，誓死奋斗。

当日下午，反动军队重新占领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反动派组织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随即发表所谓《就职通电》，宣布取消上海总工会。随后，反动派为了缓和工人群众的反对，又将臭名昭著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

上海总工会被反动派占领后，上海市一切革命的机关团体均陆续被反动派封闭和解散，稍有进步气息的团体概遭取缔。反动派下令查封一切工会组织，疯狂搜捕、屠杀工人领袖，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赵世炎、张佐臣、杨培生、郭伯和等人，均先后光荣牺牲，上海变成了“狼虎成群”的恐怖世界！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上海总工会于14日下午召集全体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决议忍痛复工。复工令规定：“着即命令已罢工各业各厂工友，自十五日起，于开追悼会后，一律忍痛复工”。并表示：“此后本会仍本初衷，领导全上海工友作政治与经济的奋斗”。号召“各工友仍当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派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死难烈士之精神不死，全上海工友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继续死难烈士之精神以奋斗。”

上海总工会于15日将“四·一二”事变经过及蒋介石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呈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并特派代表前往武汉当面作详细报告。呈文要求中央党部和政府“迅速将蒋介石免职查办，明正典刑，以平民众之愤怒”，彻底肃清“一切附和蒋逆之反动分子”。“对此上海八十万忠实革命被压迫的工友和东南数省陷入水深火热的民众，迅速予以援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精心策划的。蒋介石被帝国主义拉过去了，他成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他的叛变使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失败。以此为转折点，中国革命进入了紧急阶段。

随后，蒋介石集团又在广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南宁等地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二、反蒋斗争的开展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对蒋介石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4月13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高喊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械的行动“已经是叛徒了”，“简直是反了”，主张“用国民政府或中央党部的名义电令各军查办这事的主动及负责人”。于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蒋介石、白崇禧，“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长官，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

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处分蒋介石等问题，决

议对蒋介石、张静江开除党籍，并“交与前方将士及各级党部严行拿办”，将戴季陶、陈果夫、古应芬开除党籍，令蔡元培、吴稚晖停职三月，对李石曾加以警告。

在 15 日召集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对是否讨伐蒋介石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会上，董必武首先提出“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这个意见得到与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邓演达认为：“中央是应决定，并数其罪恶、加以讨伐，始能伸张党纪”。彭泽民、吴玉章支持邓演达的军事讨伐主张。但是，顾孟余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得到谭延闿、徐谦的支持。会议决议对蒋介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职务，着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至于讨伐问题，因涉及军事策略，拟交军事委员会讨论。

在 18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经吴玉章提议，通过了由他主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所拟的惩治蒋介石的训令和宣言，并决定予以公布。训令号召：“一致团结，努力奋斗，对于蒋中正及类似蒋中正之一切反动派，严行肃清”。

22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让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

5 月 6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惩办反动分子案，决议开除胡汉民、吴敬恒、古应芬、蔡元培、甘乃光、李济深、陈果夫等 7 人党籍，并议决重组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和北京分会，指定陈嘉祐、蒋隆芬、邓中夏、彭湃为广东分会委员；指定王法勤、顾孟余、徐谦、江浩、于方舟、李希逸、李秀容、李北海为北京分会委员。

由上述可见，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态度由暧昧逐渐变为明朗，在政治上的声讨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他们因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各种联系，又企图为日后的继续合作留一条后路，故反对在军事上讨伐蒋介石集团，表现出严重的动摇性。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反蒋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宣言》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宣言》深刻地指出：蒋介石叛变革命，“这不一个人违叛党国，违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的刽子手，消灭蒋介石，就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么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

早在 4 月初，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独秀不在武汉，未参加），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阐明了当

时全国和上海的形势，指出局势非常危险，斗争已到了中国整个革命和党的最严重时期，敌人的进攻已到了万分紧迫的时期；（二）指出了过去对蒋介石，对资产阶级一味妥协退让策略的错误；（三）指明了蒋介石已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如再不准备反蒋，不积极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出路；（四）要沪区同志改变过去的策略，集中力量准备反蒋，但不要立刻实行反蒋，要等待武汉军队到东南时，上海再来一次暴动。会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维金斯基到上海贯彻执行。李立三等从武汉动身去上海，4月12日路过南京时，获悉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于是他们立即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找到罗亦农、赵世炎等，于1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等六人。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宣布特务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有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维金斯基、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纳佐诺夫、福金、阿尔布雷希特）。会上讨论了中央决定的准备反蒋的新方针。讨论前，会议首先议定，在讨论有结果后，由特委会联名把讨论意见电告武汉。在会上，周恩来提出先东征后北伐的主张，指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该打一份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致电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南，讨伐蒋介石。并决定由周恩来执笔起草电文，由个人亲笔签字署名。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给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接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调动革命军队东征讨蒋的主张，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和组织下，武汉地区的其他革命组织也一致声讨蒋介石。湖北全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全国学生总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汉码头总工会、武汉纺织工会、武汉店员总工会、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都纷纷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反蒋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4月20日，军校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倡议召开各界同志同胞联合讨蒋大会。23日，在军校的倡导下，武汉各界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讨蒋大会，军校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负责人、共产党人蒋先云担任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历数了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大会发表了讨蒋通电，会后举行了游行，这次大会的召开，使武汉地区声讨蒋介石的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为了加强反蒋斗争的领导，5月6日召开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黄埔各期毕业学生讨蒋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讨蒋运动委员会，随后并派人赴湖南、江西组织分会。

“四·一二”之后，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名义主办的、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导反蒋斗争。4月13日的《反对？打

倒？》社论，明确指出了蒋介石是英美日各帝国主义一个镇压中国国民革命、讨赤的新工具，是革命民众、革命同志的刽子手；是总理的最恶劣的叛徒；总之蒋介石是“唯一的最厉害的敌人”。提出“要继续和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先要打倒这个障碍，这个敌人”。17日，还发表了社论《不能再迟疑了！》，指出：“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中央党部对于蒋介石的反叛行为，要有一个断然的处置：（一）撤销蒋介石在本党内一切职权；（二）免除蒋介石在政府一切职权及总司令职务；（三）开除党籍；（四）令各军将士、各级党部及各民众武装拿解中央，依法惩办。”社论提出的这些主张，对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对蒋介石的免职令是起了作用的。

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反蒋怒潮也席卷到了其他一些省份。

在湖南，4月24日，湖南省总工会印发了《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即《蒋介石的八十条罪状》）一文，该文全面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一系列罪行，并且得出结论说：“蒋介石从前是假革命，现在是反革命”。“蒋介石是总理的罪人”，“蒋介石是工人的死对头”。文章号召：“工人阶级一齐起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26日，长沙举行讨伐蒋介石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示威大会，会后群众出发游行，各商店均停止营业，工厂、学校亦一律罢工、罢课。同时，湖南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大同盟发出长篇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敌人，不仅是帝国主义和奉鲁军阀，尤其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新工具蒋逆介石。”湘谭、湘乡、祁阳、安化、攸县、茶陵、益阳、南县、宝庆、汝城等县纷纷召开讨蒋示威大会。

在陕西，4月24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发表特电，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25日，《国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专政、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以挽救党和革命。27日，国民党省党部和西安市党部召开5000余人的党员大会，一致通过反蒋决议七条，表示“现在中央毅然决然开除蒋之党籍，解除蒋之职权，实为正当的处置，应一致拥护”。5月5日，西安市各界民众在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含初、史可轩等的领导下，于“红城”举行了约10多万人的纪念“五·一”、“五·五”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蒲城、富平、旬邑、岐山、咸阳、固市、绥德、临潼等地也召开了万余人以至数万人的大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蒋斗争。

在江西，5月7日，南昌市举行了10万余人的讨蒋示威大会。都昌召开“五·一”纪念市民大会，发出讨蒋通电。国民党九江市第八区二分部发出讨蒋通电。

在安徽，国民党安徽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呈诉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横暴情形、请迅速治罪。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议此事交军事委员会处理。4月29日，太湖县人民举行了“反蒋示威大运动”，一致拥护三大政策，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打倒叛徒蒋介石，取消南京伪政府。

武汉政府时期的这场反蒋斗争，是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高峰，这场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一定胜利，首先是由于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实行了正确领导，执行了一条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加之，在武汉地区一些反蒋态度坚决的共产党干部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机关、团体、学校和报纸。如吴玉章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林祖涵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董必武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毛

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委，恽代英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常委，刘少奇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厅主任，蒋先云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沈雁冰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们在反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国民党左派发挥了积极作用。反蒋斗争的领导机关，在前期，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和行动委员会；在后期，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机关，如反蒋运动委员会，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左派势力在这些机关中占了优势。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掌握实权的秘书有3人，其中共产党人占了2人，而实际上又是由吴玉章一人负总责。无论在临时联席会议，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都起着重要作用。邓演达也是反蒋旗帜最鲜明的一人，在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场反蒋斗争，从其政治影响来说，是胜利了；但是，从其结局来说，又是失败了。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将政治斗争发展为军事斗争，没有将反蒋斗争进行到底。原因之二，是错误地依靠了汪精卫，把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左派的领袖，是武汉政府的中心人物。正如周恩来深刻指出的：“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 当时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未能识别汪的真面目，错误地依靠了他，这就必然导致反蒋斗争的最后失败。

第七节 工农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一、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及其特点

“四·一二”之后，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两湖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潮。

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相继召开，是新高潮的一个重要表现。

5月20日至26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中国革命中心——武汉举行。出席的代表有：中国15人，日本6人、苏联5人，美国2人，英国1人，法国1人，爪哇2人。

20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举行开幕典礼，首先由大会主席苏兆征致开幕词，他说：“今天太平洋劳动代表会开幕，正是帝国主义者猛烈向我们进攻时期。帝国主义剥削世界工人阶级，用经济阴谋来破坏我们联合战线，我们为求自身解放，愈要加紧团结世界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是为团结世界工人力量，与帝国主义者作最后之斗争”。大会发表了《庆祝太平洋劳动大会告工友》，指出：太平洋劳动大会是对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轰击的“一座伟大的坚固的炮台”。“太平洋各国工人阶级从此以后，当有了统一的组织和一致行动的力量。”

在大会期间，苏联代表蔡米洛夫演讲《世界职工运动与中国革命》，中国代表报告中国职工运动，上海工会代表报告上海劳动运动情形、过去三次暴动及蒋介石在最近的大屠杀，法国代表拉克门报告法国职工运动状况，朝鲜代表、爪哇代表均有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代表中国工人阶级表示“要与太平洋工人阶级在赤色职工国际之下，亲密地团结起来，制止世界第二次大战，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于太平洋工人的大屠杀，改良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及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大会决议成立太平洋工会秘书厅，其任务是：“（一）联络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二）调查和统计各国劳动运动情形；（三）搜集帝国主义者压迫工人阶级和弱小民族的事实，作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运动；（四）巩固东亚职工运动；（五）筹备下次太平洋劳动大会并出定期刊物（须译成各国文字）名曰太平洋劳动者。”大会通过了《童年和青年劳动问题案》、《中国革命进行中之职工运动案》、《致中国劳苦民众书》以及《太平洋各国工会组织原则》等。

26日，大会举行了闭幕式，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在闭幕词中说：“以前太平洋各国无产阶级，均各自为战，此后既有了统一指挥机关，当会一致的团结起来，对着我们的敌人共同进攻。我们的决议案是很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努力去实行。我谨以至诚敬祝太平洋劳动大会万岁。世界职工运动统一在赤色职工国际之下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武汉举行。

19日，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开幕典礼，大会主席苏兆征致开幕词，指出了大会的任务是：“第一便要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第二要反对蒋介石屠杀民众；第三要与国民政府同生死；第四要帮助农民打倒封建势力。”

在大会期间，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会务报告，罗佐夫斯基报告了世界职工运动状况，苏兆征作了海员工会报告，罗珠作了香港工会报告，向忠发报告了鄂省职工运动情况。此外，广东、四川、江西、湖南、北

方、大连、上海、铁路工会、电报工会、邮务工会的代表都作了报告。

会上，各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挽救革命的意见，主要是：反对白色恐怖；上海工人正在准备第四次大暴动，打倒蒋介石，并请国民政府明令讨伐；要求在上海开第五次劳动大会；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没收帝国主义手中一切产业；帮助农民解决一切土地问题；反动势力下，工人准备大暴动；国民政府不要对反革命优容；工人要参加国有产业管理；要求国民政府三次北伐，直捣幽燕；请全国总工会派员到北方去领导工人运动；共产党是真正为工农谋利益的，国民革命没有共产党参加，是不会成功的。此外，湖北代表团提议，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替上海死难工人复仇，要求主席团请共产党负责人来大会讲演。上海代表团提议，请继续发扬上海死难烈士精神，回到本地去准备第四次暴动的后援。浙闽代表团提议，东南各地代表赶快回东南去，打倒蒋介石，为死者复仇。这些倡议均被大会通过。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组织问题、经济斗争、童工女工问题、反法西斯主义等 10 多个决议案。

在会上，李立三宣布了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宣言；邓中夏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大会书；苏联职工总工会给大会赠送满地红的胜利旗，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爪哇代表赠旗上书“劳工神圣”；李立三致了闭幕词。大会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工人运动新高潮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政治方面，从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进展到要求参政。共产党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担任劳工部部长职务，就是工人阶级实现参政要求的典型事例。

在经济方面，从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取得团体契约权，进展到参加企业的管理。4 月中旬，全国邮务工会致电北京邮政总办，要求在本月 20 日以前答复他们的 58 条要求，“否则，全国邮务总工会接收邮政管理权，自行管理”。

汉阳县宏顺机器厂厂主周仲宣、周文轩因压迫工人，破坏工运，5 月中旬，国民党汉阳县党部根据群众的要求，以合法手续，将其拘押、送交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审讯，并查封其财产，由机械工业工会、五金业总工会等团体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当时报纸称之为“破天荒之工人管理工厂”。在 6 月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李立三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工友参加国有产业管理的实现”问题，各地代表在报告中也提出了工人参加国有产业管理的要求。

在组织方面，工会权力逐渐集中起来，从分散的各行业组织，进展到产业结合，各地方的总工会具有最高的权力。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执委会议决拟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成立全国各产业总工会并通告各产业工会积极进行筹备。随后，印务总工会为了统一全国印务工人的组织，也发出了通告，拟在武汉召开全国印务总工会，要求各省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并举派代表前来出席成立大会。

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三方面的新要求，就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特点。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到 6 月下旬，全国工会会员已达 290 余万人，其中湖北工会会员达 50 多万人，湖南达 39 万人。

二、农民运动的新阶段

在“四·一二”之后，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镇压土豪劣绅运动高潮的出现

“四·一二”之后，镇压土豪劣绅运动由个别镇压发展到镇压高潮。

湖南省镇压土豪劣绅运动早在1927年初就在高涨。“四·一二”前后，湖南省镇压土豪劣绅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主要特点是坚决处决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4月14日，在长沙召集了湖南人民第二次铲除反动分子示威大会，大会宣布需要捉获的反动派与潜逃的反动派的名单，将长沙两名反革命首犯当众枪决，轰动全城。5月上旬，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如下声明：“一、为保障北伐胜利，巩固后方，对于反革命者须采严厉之处置；二、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以反革命论罪，由特别法庭判决，处以徒刑或死刑：甲、有违背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一切决议案之言论及企图者。乙、传播蒋介石主张及受蒋介石之唆使指挥者。丙、以武装袭击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者。丁、暗组团体，私立机关，以勾结敌人，企图危害革命者。戊、加入三爱党，保产党等反革命团体者。己、以言论、文字、图画，企图扰乱军民心理者。三、凡党员及政府机关在职人员，有二条各项之行为者，加等治罪；四、凡知情而不举发者，以同谋论罪”。同时声明，抓人不能自由处理，应送交特别法庭裁判。“三爱党”的两名罪魁在长沙被处决。各县也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湖南“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是很激烈的。”

湖北省镇压土豪劣绅运动的高潮是在“四·一二”之后出现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经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后，湖北省党部函请省政务委员会即予公布，通令各县县长、各县司法委员一体遵照办理，并通令各县党部会同各人民团体、县长、司法委员迅速组织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4月24日，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国民党省党部两人，省农协两人，省政府两人，省总工会、省学联、省妇协、省商协各一人组成，推举邓初民为审判长，其性质为复审机关，省审判委员会成立后，共开庭审判四五十次，捕捉土豪劣绅四五百人。

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公布和省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广大农村的打倒土豪劣绅运动。黄梅、罗田、竹山、石首、阳新、鄂城、武昌等许多县都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监利、浠水、松滋、天门、咸宁、鄂城、沔阳、崇阳、黄陂、圻春、长阳、罗田、黄冈等县都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各县押送至省农协的土豪劣绅不下数十人。

2. 农民自卫军的扩大

“四·一二”之后，湖南省的农民武装有了更大的发展。4月中旬，省农协通令各县组织农民自卫军，指出“惟最近各县土豪劣绅以及反动分子反攻日激，有非颠覆革命势力不已之势，……在此期间，我革命民众，若不图自卫武装起来，将何以铲除土豪劣绅所代表之封建势力，而巩固乡村政权，确定民主政治之基础。本会有见及此，特决定两项办法：（一）各县协如有未设自卫部者着即增设，以统一自卫军之组织与训练；（二）各县自卫军如已有枪械，或只有纠察棍及梭镖之类者，着即切实整顿，一律施以训练。”

根据省农协的训令，湘潭、浏阳、平江、岳阳、宁乡、益阳、衡阳、衡山、宝庆（今邵阳市）、汝城等县以及长沙近郊农协，都组织了数百以至上千人的农民自卫军常备队。5月初，长沙、常德、衡阳等县共产党的地方委

员会，还酝酿各成立一个武装的工农师。全省农民自卫军拥有枪支 3000 支以上。

为了提高工农自卫军的军事素质，培养军事指挥人才，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会决定在长沙开办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4 月 21 日，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决定训练队招 200 名，向政府请拨枪支 300 支，课程设置政治课、军事课和军事操，训练期限为 5 个月。与省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开办的同时，汝城、醴陵、浏阳等县也开办了军事训练班，加紧训练和整顿农民自卫军。

在湖北，1927 年春，广大农民群众在与土豪劣绅的生死搏斗中由于“多未武装，缺乏自卫能力，……致常发生惨案，如阳新、沔阳、天门、监利等县是其特甚者”。基于这种教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协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5 月 10 日省农协添设自卫部，以便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指挥和领导。省农协急电“各县农协，迅速将散在各区枪支集中农协，并将全县农友一律武装起来，以便集中势力，肃清反革命派，使北伐后方，巩固如磐石”。^①由于沿江各县散存乡间枪支甚多，5 月下旬，省党部特函请省农协“派员分途前往各县，将所有枪支设法统一，以免资敌，并藉此以厚武装农民之实力。”

为培养武装农民人才，省农协开办了农民训练班，招生 300 名，于 6 月 1 日正式开学。为了整顿与加强农民武装力量，6 月 21 日省农协扩大会议通过了《武装问题决议案》，规定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民武装的具体办法，主要有：“在各县农民协会之下，有常备的农民自卫军，现在区农民协会的自卫军，要设法使他们在县农民协会统一的指挥管理之下，集中起来。”“农民自卫军应完全受农会的指挥，不能有独立自由行动，县农民协会应设自卫部，县自卫部应受省自卫部的指挥”，“各县须组织百名以上的常备队，以忠实勇敢之会员充当指挥的人，要注意施行军事与政治训练”，“凡属会员除老弱残废者外，一律加入非常备队，都要有一件武装，如戈矛大刀土枪土炮等，也须有严密的组织与训练”，“凡各地反动势力的武装（如保卫团等），会匪溃兵的武装，都是打杀农民破坏革命的东西，我们要注意夺取敌人的枪支，就是消灭反动的武装来增加革命的武装”。^②

在省农协的指导下，各县的农民自卫军迅速建立和扩大起来。据 6 月份统计，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达二三百支，少者亦有二三十支，全省共计枪支约 2000 支，全省农民自卫军 30 万人。

3. 农民革命政权的发展

“四·一二”之后，农民革命政权由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到建立乡村自治机关。

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的问题，最先是由湖南提出来的。早在 1926 年 12 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指出：“为保障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发展革命的民权，建立民主的自治。而实现此种民主自治的方式，首在举行乡民会议，建立完备的乡村自治机关。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之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在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之要求，发展农村之经济。乡民会议之组织，在最低级自治区域，当为乡民全体大会；在高级自治区域，当由低级自治区域之乡民全体大会选举之代表组织之”。“乡村自治机关，当由乡民会议产生，采委员制”。“为实现新自治制，目前应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的民众团

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①1927年1月21日，湖南省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通过的《湖南省行政大纲》规定：“克期筹办区乡自治、某县区乡自治完成后，即举办县市自治，民选县市政府委员，但长沙县市自治与区乡自治同时举办”，“乡自治机关成立后，乡镇警察一律裁撤”。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也指出了湖南农村建立乡村自治制度的迫切性。4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为建设民主的新湖南问题发表宣言，强调必须通过斗争来建立民主政治，指出：“民主的建设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够以和平的方法去建设，惟有要建设民主的政治，更要继续斗争，我们应再唤出一个口号，从斗争中去建设民主的新湖南。”^②

湖南提出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的意见得到国民党中央的肯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由区乡居民按照区乡自治法组织之，管理区乡一切行政经济财政文化等事宜。农民协会应在本党指导下，为组织与指导此自治机关的中心”。“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委员会（必要时，乡自治机关内亦可设立之），由农政主管机关派员及农民协会代表组织之”。“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乡自治机关，如有不服从者，即应依照处置反革命条例办之，区乡自治机关，应有改组此等武装团体之权力”。^③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决定：“应由农政部从速拟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催促各省党部省政府实现本党最近对农民决议（如关于组织乡村自治等之决议）”。^④

湖北省执行了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决议，6月，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提出：“建立乡村自治政府，完成民主主义的国家”，“立即进行县区乡自治……巩固农村革命的联盟”，呈请国民政府颁布《乡村自治条例》。黄梅县多云乡成立了乡政委员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看成是机会主义的口号，因为农民协会本来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尽管在革命时期在实际上起了乡村政权的作用，但它本身仍不是政权组织形式。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它与革命形势是不能完全适应的，而建立乡村自治机关，则有利于广泛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者和革命者，建立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免去农民孤军奋战的危险。而且，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主张还明确提出，在建立乡村自治机关时，不得让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参加，并防止土豪劣绅包办，这种乡村自治并非与地主阶级实行妥协。所以，就其内容来看，是正确的；就其实行的具体条件来说，若经过了革命时期的农村是可以实行的，因为在这样的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下去了，农民的权力长起来了，由农民掌握自治机关的领导权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若不着农村的具体条件，而普遍推广，就有为土豪劣绅操纵的危险。

4. 部分地区农民自动解决土地问题

“四·一二”之后，两湖农民运动由减租减息斗争发展到分配土地的斗争，这是农民运动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正如中共“五大”所指出的：“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⑤

湖南的农民群众要求分配土地的斗争最为迫切。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于2月16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指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⑥2

月 16 日，中共湖南区委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中也提出：“现在贫农中流行的思想是‘平均地权’，他们觉得每个农民应该有两亩田的耕种权”，“必须于最近期间使这些贫农能够满足这一低度的要求”。3 月 24 日，由谢觉哉主办的《湖南民报》发表社论，提出“要从土豪劣绅地主手里夺过土地来。”湖南省党部同省政府曾就土地问题讨论数次，结论是要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中共湖南区委于 4 月初发表宣言，指出：“农村中革命斗争的发展，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程序的第一项”，“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主张立即召开省民会议来解决这一“严重而急待解决的问题。”5 月中旬，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县、市、特别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一方面肯定了“土地问题不但是农民问题，而是整个国民革命的存亡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不只是解决农民问题，实际是废除地主阶级加给农民的一切剥削，打破整个的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规定解决土地问题应遵循的原则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荒地分配无地耕种或不足以赡养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及努力革命的军人的土地，应加以保障”。“实行全省一律减租为百分之二十五的政策。”这个决议是贯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土地会议精神的。

在 4 月 2 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委五次扩大会议上，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提议，决定成立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毛泽东、谭平山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负责讨论土地问题。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从 4 月 8 日至 5 月 6 日召开过土地委员会会议三次，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五次，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四次，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党部负责人，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军事负责人（军长、师长及各军政治部主任和秘书），出席者代表的省份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热河、奉天、察哈尔、吉林、山西等 15 省区。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三）佃农保护法；（四）处分逆产条例；（五）农民政权问题；（六）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分歧也很大，大体有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第一步实行政治没收，即先没收反革命的土地；第二步实行经济没收，没收一切出租土地。第二种意见只赞成政治没收。第三种意见主张普遍实行经济没收。第四种意见以各种借口强调分配土地的困难，实际上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第五种意见主张土地委员会只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规定，至于没收和分配的具体办法由国民政府农政部颁布法令，由各省区依据当地情况实施。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当前只能做到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通过下列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决议案》、《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以上七个决议案，除了《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已经由国民政府命令公布外，其余五个决议案，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核实，但当提交到 5 月 12 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批准时，由于谭延闿、汪精卫、陈友仁等人的反对，议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暂时保留，《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通过而不公布。这样，解决土地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

当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往湖南贯彻土地会议精神时，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全盘接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同中共湖南区委开联席会议，“决定遵照中央的政策。现在实行的只是政治的没收，在省城内有逆产清理委员会，各县也有。至于革命军人的家属同财产绝对的保护，丝毫不侵犯，谁侵犯谁就是反革命”。但是，政治没收既无具体办法，更未采取行动。于是，湖南这个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实际上被取消了。

到了插秧季节，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已迫不及待，各级党政部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农民们就不得不自己动手解决了。不少地区，都在农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区、乡土地委员会，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1）分田。由长沙附近霞凝乡农民自行提出。湘潭、醴陵等县也有此类事发生。分田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2）平均佃权。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由农会动员佃田多的农户拿出一部分田给少田的农户耕种，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3）清丈田亩。地主收的租额大多不是按田的实际面积而定。如长沙市郊，照常规计算只能缴租一石的田亩，地主却要收租四石。农民要求所缴的租和田土的面积相当，乃起而清丈田亩；（4）插标占田。清丈田亩是佃农的权利，可是许多失业农民仍无田可耕，因此倡议标田，就是将田土的耕种权重新支配，某人耕某田，插标为记，益阳、衡阳、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县皆有此项行动；（5）分谷。此举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

以上事实说明，“湖南农民最强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

湖北农民的土地要求也非常迫切。3月间，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的代表在演说中，一致强调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同一时期召开的湖南、江西等省的农民代表大会所没有提出的问题。4月间，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湖北代表丁陶庵作了土地问题报告，他说，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后，地主阻禁粮食及资本便引起了对土地的要求，他们觉得非得土地不可。现在农民运动大部分在政治斗争方面，各地惨案甚多，故农民实无力顾及土地问题，但亦因此使他们认识土地问题的重要。他们知道，要推翻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势力就必须打破他们的经济基础，即解决土地问题。他还说：现在农民无政权。政权或在土豪劣绅手里或在代表土豪劣绅利益的县长、司法委员手里，这样必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现时农民希望颁布乡村自治机关的条例。5月19日，蔡以忱在省党部执委会常会上作《最近湖北农民运动概况》报告中也指出：“他们的经济斗争已进至要求土地问题了。这是我们三个月以前不曾梦想得到的，有许多地主自愿献出土地，对于这些自愿拿出的土地没有适当的处置方法，就是省农协现在也还没有具体的方针，并且罗田、黄冈、阳新等县的农民已提出分配土地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亟应具体的准备，可能免去一切混乱的现象”。5月15日，在国民党黄冈县党部第四次全县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陈学渭报告说：“现在农民要求的是解决土地问题”。黄安、黄梅等县农民也提出了土地要求，汉川县农协筹备组织土地委员会。“阳新、夏口、孝感等地农民自动的提出‘耕地农有’，要求政府发给田亩耕种”。5月下旬，国民党省党部通过了省农协提出的农民问题议案12条，议案指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农民由减租减息的运动进而要求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议案规定了解决土地

问题的办法：“（一）由政府规定办法，没收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二）保障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之土地所有权；（三）已没收其（的）土地由原佃耕种。向政府缴纳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税；（四）地主租给佃农之土地，实行减租，租率之最高额由县政府当地党部农民协会规定之”。6月下旬，省农协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也规定了没收土地的办法：“已没收之土豪劣绅的土地，交由政府机关管理，农协应与党部及其他人民团体组织委员会监督之，已没收之土地以原有佃户耕种为原则（必要可能时亦可变更）。由原佃户与政府农协三方面订立合同”，“租额目前至少要实行百分之二十，绝对禁止均分土地的运动。”显然，这些规定都是贯彻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精神的，但是并没有规定没收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土地的具体办法，也没有认真实行。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两湖农民群众的组织程度也有了提高。到6月止，全国18个省都成立了农会组织，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达到915万人（江苏约二三十万，未计算在内），其中湖南、湖北增长最为显著。湖南到4月底，农会会员由1月份的200万激增到518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到“马日事变”前夕，又发展到600万。湖北农会会员由3月份的80万骤增到6月份的284万，湖北的农会组织，以阳新县最为发达，黄冈、麻城、应山、孝感等县的成绩亦颇佳。

第八节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一、武汉政府继续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出现了三个政权鼎立的形势。革命势力以武汉政府为中心，统治着湘鄂赣三省地区；新军阀势力以南京政府为中心，占据着闽浙两省和苏皖两省的江南部分以及粤桂滇黔川等省；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股势力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着豫鲁直以及东三省。

蒋介石联合粤桂川黔等省的军阀从东南西三面分路向两湖地区进攻。他任命川军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令其出兵进攻鄂西；令黔军李燊第四十三军开抵巴东；令贵州省长周西成第二十五军由黔东出兵湘西；又令李宗仁和王天培所部开至安庆、九江间，威胁武汉。

在武汉北面，奉军占领郑州、开封后，分两路南下。4月初，右路军占领许昌，左路军由朱仙镇南下，前锋已进至上蔡。靳云鹗所部因反攻受挫，兵力损失大半，继续南撤，请求武汉政府出兵援豫。

面对这种形势，如何打破新旧军阀的军事包围的问题，成了当时武汉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武汉政府内部开展了一场北伐奉张与东征讨蒋的争论。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汪精卫、徐谦、顾孟余、孙科等主张先北伐。唐生智、张发奎等主张先东征。

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主张北伐的。斯大林认为武汉政府必须对奉军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他认为如果武汉政府进攻上海，就会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推迟与冯玉祥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得，反而会面临着与帝国主义进行更激烈的战斗，而“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将上海问题全部提出”，则是比较适当的。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分歧。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建立革命基础。”鲍罗廷的主张当时被称为“西北学说”。罗易主张：“不征不伐，在两湖深入革命。”“鲁（罗）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这两种意见，当时叫做“深入”与“广出”之争。

在中共中央内部也有争论，多数人不主张东征的，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等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瞿秋白主张先打南京再北伐。起初，罗易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内部占了上风。4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并建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作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

自4月16日开始，在汉口南洋大楼连续举行了几天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出席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共产党方面是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几次商量的结果都是关于应付现在时局的方法”，并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积极北伐，二是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赞同，也由于鲍罗廷和国共两党主要负责人的同意，18日，国共联席会议决定先行北

伐。中共中央撤销了《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同意了国民党立即北伐的决定。在这期间，在上海的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在4月16日特委会第一次会议后，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未被接受。

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军事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与冯玉祥会师京汉路；第二期是三个月打到北京。为了执行第一期军事计划，以唐生智及张发奎所部为主力，由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统率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官张发奎，指挥第四、第十一两军及贺龙独立第十五师，任右翼；第二纵队司令官刘兴，指挥第三十五（为总预备队）、第三十六两军，任中路；第三纵队是新编的杂牌军队（包括田维勤、靳云鹗部以及梁寿恺暂编第三军、庞炳勋暂编第五军、安俊才新编第十四师、张万信新编第十六师等），任左翼。北伐军装备差，补充困难。奉军装备精良，供给充足。奉军兵力比北伐军多。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飞机场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军事委员会发出了第二次北伐的通电。20日，第四军最先出发，29日，第十一军出发，至29日北伐军完成了在信阳和驻马店附近的集中，准备分左、中、右三路北进。右路军经汝南、上蔡进攻开封，中路军沿京汉路北进，进攻郑州，左路军沿京汉路西侧地区前进。28日和29日，唐生智、张发奎也离开武汉，北上督师。

5月13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开始与奉鲁军展开激战，其中以西平、上蔡、临颖三次战役最为激烈。

1. 西平战役。西平、上蔡是奉军的前沿阵地，再往南之遂平、汝南则驻着暗投奉军的张万信师和段国璋师。当时，奉军有一如意算盘：以张、段坚守遂、汝，牵制北伐军于驻马店地区，然后奉军两路南下，一路至西平阻击，一路由上蔡经汝南，迂回北伐军后方，围歼北伐军于驻马店地区。但是北伐军一开始就在西平、上蔡扭住了敌人，打破了奉军的如意算盘。担任西平战役的主力是第三十六军。5月初，三十六军由广水进至驻马店集中，原拟会合靳云鹗部，一鼓击破漯河、郾城之敌而北上，但敌方早有准备，奉军一面勾结豫南反动分子，利用土匪假冒红枪会，在东河、柳林一带破坏交通，掠夺给养，一面自郾城南下，直薄西平、遂平，并包围靳云鹗部于驻马店以北地区。三十六军接到总攻击令之后，立即对当面之敌，施行反包围，与敌之铁甲车及骑兵连展开激战，于14日占领焦庄，肃清西平附近铁路沿线之敌。15日，经过反复争夺，占领西平车站，敌一部退入西平城，闭城固守。16日，战斗重心转为攻城。敌为解西平之危，急调兵两旅和骑兵一团增援，总兵力达3万人。北伐军全力猛攻，两日鏖战，终于在17日攻破西平城。北伐军乘胜追击，于21日攻克漯河，并分兵三路围攻郾城，敌败退临颖。在西平战役中，北伐军冲锋七八次，牺牲1000余人，破敌阵地10余处，毁敌精锐7团以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第二次北伐开辟了道路。

2. 上蔡战役。担任上蔡方面攻击任务的是北伐军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之七十三团、七十四团，第十一军之第十师，第二十四师之七十团、七十一团和第二十六师。敌军为奉军第十一军第六旅、第十二旅、第四十六旅和骑兵、炮兵各一个团。

5月14日下午，北伐军第二十五师在蔡部口东北地区与奉军第十二旅接触，经激战后，敌退至上蔡城郊。15日晨，上蔡西门外之敌反攻，被击退。

北伐军进占上蔡外围之西洪桥、水寨。16日至17日两军在东洪桥、西洪桥、水寨等地进行了激烈战斗。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七十三团猛打猛冲，击溃了西洪桥方面敌人。随后，水寨、东洪桥方面的敌军也全线溃退。北伐军包围了上蔡城。守城之敌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被迫投降，接受改编，北伐军遂和平进占上蔡城。

上蔡战役自5月14日下午2时至17日上午10时，激战三昼夜，“其牺牲之巨为素来所未有”， 但我军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伤毙敌人约3000，俘虏数百人。这次战役“植二次北伐胜利之基”。 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特电令嘉奖，指出经过此役“第一期会战胜利完全达到”。

3. 临颖战役。临颖为许昌之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奉军自失去漯河天险之后，即大批增援，集中临颖，反攻正面，企图由漯河城长驱直下，直逼武汉。张学良亲赴前线誓师，撤换军长赵思臻，枪决旅长一名，团长三名，企图以此振奋其溃退的军队。奉军司令部急由开封、郑州调来了第十军全军，及由郾城方面退来之第十七军大部与第八军残部及飞行队。所有坦克、轻重迫击炮都调集临颖。共计6万余人。同时，修筑环城20余里坚固工事，作最后之抵抗。

27日晨，北伐军第四军十二师，第十一军十师、二十六师，三十六军以及独立十五师分途向临颖前进。是日下午2时，十二师前进至十里头附近，与敌之警戒部队接触，一面驱逐其警戒部队，一面侦察敌情。下午7时，北伐军向北里头攻击，敌步步后退，步步增援，北伐军步步进展，因敌有大部队驻扎北里头附近，至9时许，两军相持于此。北伐军乃令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所部开赴新庄，抄敌左翼，俟拂晓一齐动作。28日拂晓，北伐军全线进击，因敌多我数倍，器械精足，工事坚固，地势优越，以致愈战愈烈，双方交互冲锋，几成混战状态，虽正面之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各团奋勇拼杀，但不能将其冲破，此时所希望者在抄敌左翼之七十七团蒋先云部，但蒋阵亡，官兵伤亡三分之二。遂派七十六团增援，但未几团长参谋长受伤，又先后急调七十一团和十师增援。下午2时，十师先头部队到达阵地，经北伐军猛攻，敌全线动摇。坚守北里头之北伐军亦乘机反攻，敌军大败，即弃临颖城而逃，是日晚第十一军二十六师进驻临颖城。“这是在讨奉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是役北伐军伤亡过半，仅十二师就死伤8000以上。重大的牺牲换来了重大的胜利，歼灭了奉军在豫的主力，为占领郑州、开封铺平了道路。

在北伐军出师河南的同时，4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所指挥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五一”节，冯玉祥在西安红城召集军民大会，宣誓就职。宣誓之后，即改组为第二集团军的编制，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根据作战的任务，将所部组成中路军、左路军、右路军、东路军、南路军、北路军。

5月5日，冯玉祥发布命令，率师东征。以国民军联军方振武第一、三两路为先头部队，由潼关直趋灵宝等地，首先打击刘镇华、张治公等部。6日，冯玉祥进驻潼关督师。8日，国民军联军击败了刘镇华，占领了陕州，并向渑池前进，刘镇华退往洛阳。22日，冯部将新安包围，猛烈攻击，张治公部溃败逃往巩县，乞援于奉军。23日，当方振武部进至滋间时，即有万福麟率奉军五旅之众来援，连同张治公残部，不下4万余人，与方振武部激战数日。25日，孙良诚率石友三、王和民等部赶到，又以郑大章部骑兵抄袭洛

阳以东至鄆师一带，于是万福麟东走，张治公率残部入南山。第二集团军跟踪追击，于27日占领洛阳，俘敌2万余人，缴获火车6列。攻克洛阳后，即兵分两路，一路由孟津渡河向新乡进发，以截敌归路；一路由铁路东进，进攻郑州。28日，过鄆师。29日，击败奉军增援部队于黑石关。30日，占领孝义。同日，第二集团军的骑兵集团，出巩县以东，向汜水、郑州方面追击，遂于当日午后进占郑州，并进而向开封方面追击。31日，骑兵集团张华堂旅进据开封。

奉军在临颖战败后，被迫向许昌总退却。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北伐军乃选编精锐组成挺进队，以铁甲车为掩护，沿京汉路向前急追。北伐军飞机队也进行侦察和轰炸。右路军张发奎部于21日下午占领许昌，两路纵队联合北进，30日又占领新郑。

这时，奉军由于正面受到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侧面受到冯军的攻击，后路又受到阎锡山的威胁和红枪会的困扰，决定放弃郑州、开封和徐州，退守山东、直隶，并从关外急调军队5万人至京汉路，掩护退却。29日，张学良、韩麟春转车退至河北。30日晨，奉军数万人从铺木板的黄河桥北撤，急于逃命，狼狈不堪。当日，奉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6月1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进驻郑州，与国民军联军会师。同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入开封。次日，第四军、十一军、独立十五师及靳云鹗部进驻开封。至此，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第一期计划得以实现。

二、武汉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四·一二”之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武汉政府除实行军事威胁外还进行经济封锁。4月28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武汉中央银行的钞票在其统治区域使用。同时又大量吸收武汉的现金，使武汉的货币贬值。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煽动奸商扰乱金融，使武汉物价飞涨。他们断绝各大商埠与武汉的商品流通，任何物资都运不到武汉，甚至救护伤兵的药品也不让进来。武汉出现了严重的米荒和煤荒。他们煽动关厂歇业，致使失业工人高达“三十万之多，内中有一半是码头、建筑，香烟三种工人”。

“四·一二”之后，武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减少，来自广东每月约1000万元的收入没有了，东南各省的财政收入也没有了。江西方面因蒋介石曾在南昌滥发临时兑换券，金融问题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财政部代部长张肇元报告说：“财政情形，现在是困难已极，支出有加无已，收入反而减少了一半”。

为了反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克服财政上的困难，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委七次扩大会议上，鲍罗廷提议：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其责任为采取必要方法，以促进讨奉作战之胜利，由国民政府任命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5人组织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他的提议。25日，武汉政府公布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拟就的财政委员会议决的战时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由于5个委员都是兼职的，负有政府的重要工作，不能专心研究经济问题，于是，国民党中央召集总商会及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代表会议，经商讨决定设立金融讨论会，为战时经济委员会的顾问。

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武汉政府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一）集中现金。为了巩固财政，严防奸商吸收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现金出口，4月17日，颁布了《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规定：“凡完纳国税，

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货币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之汉口通用钞票为限”。“凡持有现币或其他商业银行货币，得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各邮局，随时兑换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货币”。“凡收付银两，均用货币，每元法定七钱一分，不得自由增减”，“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凡拒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货币，或收买现币，或抑勒货币价格，或提高物品市价，及其他违反条例规定之行为，经人民告发查明确有者按律严办”。同时，财政部命令各军警关卡厘局以及缉私处，严密查拿现金出境。凡百元以上均扣留，加以处罚。于是在很短时间，就集中了现金 400 余万元。由于 1400 万元纸币都发完了，武汉政府又增发了一批纸币，使市面上的流通的纸币由 4 月 18 日的约三四千万很快增加到 6256 万余元。

同时，武汉政府财政部颁发了《国库券条例》，从 5 月起两次发行票面额为 1、5、6 元的国库券，计达 1339 万元。结果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和债券达 7595 万元。战时经济委员会还决议从 6 月 5 日起，发行有奖债券 500 万元。但是，湘、鄂、赣三省人民的负担本来已很重，已经发行了一次公债，还没有发完，现在又要发行有奖债券，就有可能引起大恐慌。

（二）供应粮煤。武汉的米荒是严重的，在 4 月底，汉口仅存米 8 万石，但每日要消耗 7000 石，故只能维持 10 天左右。每石的价格上涨了二元。为了解决米荒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时湖南存谷 50 万石，湖北沌口存米 2 万石，江西九江存米 6000 石，安徽芜湖存谷 50 万石。为了使这些地区的谷米运来武汉，由劳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单位组织食米采办委员会，汇款 10 万元到湖南买米 10 万石，并由中央党部致电湖南省党部转农民协会，命令开放米禁，由军事委员会发放通运护照。湖南省党部和农民协会遵命执行。军事委员会还通令各处不得扣留米船。财政部免除米商的税收。

4 月 28 日，汉口特别市党部致电湖南省党部、省政府、省总工会、省农协从速设法于最短期间，使湘米运输武汉，以避免民食之恐慌而保障革命之胜利。湖北省政府函省农协通令各县开放米禁。同日，湖北省总工会电促粮食供给委员会赴湘代表即日采米 3000 石，电九江总工会于 3 日内采办粮食 1 万石运汉。

26 日，省总工会赴九江运米 5000 石来汉。同日，武汉商协由黄冈运来米粮 12000 石。27 日，由湖北省各团体派赴湖南采办米粮的代表已购办湘米 20 万石抵汉。江西省党部复电武汉，每天军米 3000 石，照数接济。

武汉的煤过去靠日本供应。“四·三”惨案后，煤源断绝，只有用萍乡的煤来接济，而汉冶萍公司一向停工。于是，武汉政府将私有的汉冶萍公司改为官办，由财政部、劳工部、交通部组织委员会来管理，由财政部拨 10 万元为开办费。4 月中旬，武汉组织解救煤荒委员会，同时运出萍乡存煤。当时估计萍矿开发后，每日可出煤 3000 吨，足供武汉之需要。4 月底，“四·三”惨案救济委员会派代表赴萍乡采办煤炭。27 日，又由河南运来煤炭 23 车，约计 1000 数百吨。

（三）救济失业。早在“四·三”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就组织了救济委员会，办理一切救济事务。在 4 月 11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救济委员会请求批准其具体办法，会议决议照办，由财政部拨款救济。同时，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向忠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设立失业局，研究

救济方法，并请求拨款 3 万元，建筑大棚 3 所容纳码头失业工人。4 月 29 日，政治委员会提出讨论，当即通过交国民政府劳工部办理。5 月 14 日，湖北失业工人救济局成立，局长为共产党人张计储。该局拨了大批款项，拟在慎昌墩子、大智门及联保里侧隙地建筑奇宿舍，并每日发给每人生活费。16 日，省总工会又进一步拟定了详细的救济和安插计划，呈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准。这个计划提交外交劳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逐条议决实施办法，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后实施。救济局向劳工部领到大批款项于端午节前每个失业工人发 1 元，到 6 月 17 日止已发款 10 万元左右。救济委员会解散时还将存洋 9000 元，移作救济洋务、蛋厂、铁厂三种工人之用。

单靠消极的救济办法是不能圆满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的。所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一些人曾提出一些建议，试图寻找一些积极的途径。有的主张恢复建筑业。由于失业工人以建筑、码头两种工人居多，所以他们认为“唯一救济的方法，就是恢复建筑事业，只要建筑事业恢复，马上可收容十万以上的工人。” 有的主张使停闭的工厂开工，因为“救济工人要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是一点也没有用，目前设法使工厂开工，在相当的范围内或者还可以做到”。 有的主张继续北伐，因为工人失业“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单是开工厂也解决不了，例如交通不便，柴米油盐等必需品不能来，都有影响。只有希望打到郑州，才有办法”。 高达 30 万之多的失业工人，经过救济局的救济以及参加北伐运输队以后，尚有六七万人。

由于各方面的配合，武汉政府反经济封锁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武汉政府未能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财政经济困难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濒于崩溃，政府每月收入 150 万元，而支出倒有 1300 万元，负债 2000 万元；米荒仍然严重，20 几家米店，仅有 7 家有存货；钞票贬值，市面对钞票视若废纸，物价无法控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未能搞好生产，开源节流。《我们对经济封锁的唯一生路》一文曾提出“只要各消费者或各企业者都联合起来，向生产上发展，不但可以解脱目前的经济封锁的苦痛，而且可以求得经济独立，永远免除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与经济封锁的祸害”。 而当时武汉政府只注意集中现金，滥发纸币，未能真正发展生产事业。二是没有东征讨蒋。当时主要威胁是来自蒋介石方面的经济封锁，正如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所指出的，“我们为着要解除这种困难，只有向东南打开一条出路”。 而武汉政府没有及时东征讨蒋，没有找到粉碎经济封锁的主要途径。

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大革命处于紧急关头时刻召开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党的方针政策，以挽救革命。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报告，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通过几项决议，选举中央委员会。

大会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过去党的策略的总结。陈独秀为他在“三·二〇”事件上的右倾错误进行辩解。大会发言者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特别指出他在“三·二

○”事件上的错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也指出从“五卅”运动到“三·二〇”事件阶段中，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对“四·一二”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陈独秀错误地认为“虽然革命队伍在数量上减少了，然而他在质量上提高了”，所以，“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现在革命已进行到第三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阶段”，应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这个决议案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由此而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这就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在此同时，却把已经在汪精卫、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唐等人仍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应有的警惕。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公开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对政权的领导权，他认为“无产阶级现在并不希望完全掌握政权而且目前手中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共产党还没有能够统治政府的足够的军队”。瞿秋白、蔡和森在大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大会的决议也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但是，却没有提出如何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所以，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五大’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瞿秋白针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理论而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虽在会上分发了，但是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够重视，正如李立三后来回忆说：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第四，土地革命问题。由于土地革命问题是“五大”的中心议题，所以大会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充分估计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现阶段农民运动“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决议案》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主要是：“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有收”。[—]这些规定表明党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个决议案只是个初步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它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东南各省地少人多，大地主很少，大多是中小地主，其子弟又有不少人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军官。如果这些人的土地都不没收，那么可没收的土地就不多了。当时中共中央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而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仍然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对此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这次大会的土地纲领成为空谈。

这次大会把土地问题列为中心议题是正确的，问题是没有解决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的军队和政权问题。军队问题虽然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大会却没有集中力量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大会根本没有打算立即着手建立和扩大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忽视军队问题，这是大会的一个致命缺点。王若飞曾经指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有了武装就会有办法组织一切。”

第五，革命发展方向问题。陈独秀在大会上宣扬和发挥了鲍罗廷提出的所谓“西北学说”。他说：“现在，革命在向西北发展，而不是向东南发展，东南是帝国主义基础”。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是一种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理论。大会批评了“西北学说”。指出：“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但是，这种批评的影响是不大的，大会代表对“西北学说”的内容和危害并不是清楚的。

总之，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大会就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职责。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而陈独秀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其错误，仍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大会后革命局势日益恶化。

第九节 反动军官的武装叛变和宁汉合流的酝酿

一、夏斗寅、杨森叛变和武汉政府的平叛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令杨森率部进攻鄂西的同时，密令驻防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夏斗寅部“会同杨森之川军及李桑的黔军向武汉方面进迫，以资牵制”。杨、夏等在接奉蒋介石的反共密令后，双方商定了如下进窥武汉的计划：以夏部自宜昌防地顺江东下，至嘉鱼登陆后，沿武长路经蒲圻、汀泗桥、咸宁，直逼武昌；同时，杨森部由万县东下至宜昌、荆门、沙市后，沿长江北岸东进，集结所部于岳口、天门、汉川之线，向汉阳进逼。根据计划，杨森于4月19日，召集所部师旅长会议，决定出兵4.5万，编成4个纵队，以范绍增为先遣队司令，王正钧为先遣队前敌总指挥。5月4日，杨森向其部队下达动员令。翌日，该部自万县东下，占领归州（今奉节），继续向宜昌进发。夏斗寅与杨森密切配合，一面火速调派轮船20艘，协助杨森运兵东下，一面佯作战败，于5月7日率部自宜昌退出，主动让给杨部。当日，杨森进驻宜昌后，立即下令捣毁各级党部，解散总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接着于5月9日发出拥蒋，反共，“讨伐”武汉政府的通电。

为了麻痹武汉政府，夏斗寅向武汉中央谎报战功，说已在荆沙击退杨森，并声称：“我们是宜昌的屏障，不让四川军阀杨森侵犯我们的防地一步”。而当军事叛变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夏斗寅遂领衔于5月13日（元日）发出反共通电，对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工农群众极尽诬蔑和毁谤，公开反叛武汉政府。反共“元电”发出后，夏杨两部按原订计划，齐头并进，直趋武汉。夏部任南岸，于14日至沙市，15日至嘉鱼，16日到达咸宁、汀泗桥，拆毁武长路轨八华里余，17日，夏部五六百人已抵达距武昌仅30余里的纸坊镇。杨森部任江北，于14日进占荆沙，17日至岳口，直逼仙桃镇，威胁汉阳。

南京蒋介石政府致电夏斗寅，对其反共“元电”极表赞赏，并鼓动夏部“锐进救援，勿稍瞻顾”。5月22日，蒋介石公开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宣称：“夏斗寅之起而宣言反对共产，与杨森、刘湘同受余之命令”。

夏、杨军事叛变直接威胁着武汉的安全，一时间，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混乱。中国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审时度势排除干扰，迅速动员组织广大革命群众投入反击夏斗寅，保卫武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削平夏斗寅的反叛！并庄严地宣布：“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翌日，武汉三镇50万人分别在武昌、汉口、汉阳举行讨夏大会。董必武在武昌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夏逆打出拥蒋的旗帜，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讨夏便是“表示革命民众对反动派绝不宽容，与之誓不两立”。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于18日发布命令，对夏斗寅给予“褫职拿办”的惩处。

在军事上，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成为平叛的主力。18日下午，武汉卫戍司令、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奉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率该师第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所属第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的一团驰往纸坊镇。19日1时30分，夏斗寅叛军分两路向纸坊进攻。第七十二团和第七十五团也分两路迎击敌人，而以中央独立师为总预备队。激战至8时，革命军占领叛军

炮兵阵地，叛军遂向土地堂撤退，革命军衔尾追击，至 10 时。追至土地堂以北地区。叛军凭借两个团的援军和占据有利的地势，以重机枪集中火力向铁道上猛烈扫射，以阻挡革命军前进。叶挺师长鉴于正面进攻难以克敌制胜，且伤亡很大，遂调遣七十二团之一部由右翼绕道抄至土地堂车站，攻敌之侧背；同时，命令正面及左翼部队向前突击。至下午 2 时 20 分，革命军夺回土地堂车站。叛军狼狈溃逃，革命军穷追不舍。20 日，革命军进至咸宁，叛军残部向崇阳、通城方向逃遁。

武汉革命军讨夏战斗首战告捷，使武汉得以转危为安。本来革命军可以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夏斗寅残部，但是“汪精卫主张调解，唐生智这时也说可以招呼夏斗寅。于是，派了陈公博等进行调解”。——并强令叶挺停止追击。夏斗寅部遂得到喘息机会，于 6 月初窜驻安徽的宿松。蒋介石称赞夏斗寅“厥功甚伟”，擢升夏为新编第十军军长，指定安庆为其防地，这就为尔后阻挡武汉政府军东征设下了第一道防线。

在反击夏斗寅的同时，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 5 月 25 日，下令抽调二、六、八军各一部组成西征军，由程潜任总指挥，率部讨伐杨森。是日，西征军自武汉出发，开赴仙桃镇，与叛军展开了拉锯战。自 6 月 5 日起，革命军协力一致，与叛军激战，先后收复岳口、浩子口和沙洋，6 月 15 日，占领荆沙，取得了决战的胜利。革命军再接再厉，一鼓作气，于 6 月 24 日收复被叛军盘据了一个半月的宜昌。杨森叛军遂分两路，退守巴东。西征军的胜利，使杨森暂时无力再进窥武汉，从而使武汉政府免去了西顾之忧。

在反击夏斗寅、杨森的战斗中，工农群众给予革命军队以有力的支援。18 日，湖北省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友们报名参军，“以便正式荷枪实弹，去剿灭夏斗寅这个败类，来巩固（我们）的根基”。——《通告》发出不到 4 小时，就有上千名工人报名参加工人义勇队。汉口、汉阳 1000 余武装工人前往武昌支援。粤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一支铁道交通队，迅速修复被叛军破坏的铁路。湖北省农协积极招募农友 1000 余人，组成运输队、救护队，为革命军运送粮草和救护伤员。同时还组成宣传队，携带传单 10 余万份，随慰问团赴前方进行宣传慰问。湖北省农协训练班全体学员向农协请愿，要求上前线杀敌。省农协将五六百名学员分两批送往军队政治学校，加紧训练，随时听候调遣。咸宁县农协要求全县农民自工军参战，协助革命军，围剿叛军。蒲圻农民自卫军 2000 人堵截叛军于嘉鱼一带，切断叛军退路。当第六军一部攻占天门旋即挥师南下岳口追剿杨森叛军时，天门县各群众团体作出讨杨参战决议，并组成向导、运输、交通、慰劳、侦探、粮秣、宣传、卫生等 8 个股，支援革命军作战。平叛斗争胜利后，在咸宁举行的军民祝捷大会上，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高度评价了工农群众的支援是平叛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他指出：“我们所以胜利，是因为不怕死，人人都有死的决心，而且我们每次打仗都得着工农的帮助”。——

二、马日事变和农军进攻长沙

继夏斗寅杨森叛变以后，5 月 21 日在长沙又发生了反共军事政变，史称马日事变。早在 4 月底，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反共军事政变计划，会议决定首先在湖南发难。会后，何键将移驻长沙受训的三十五军学生队扩充为教导团，由王东原任团长。又将独立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从湘乡、湘潭调往长沙。同时委派三十五军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作为他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发动叛乱的各项准备工作。5 月 17

日，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等在许克祥团部举行会议，推定许克祥为叛乱的指挥官，并决定在5月21日星期日夜間发动。

5月21日夜晚11时，叛军1000余人在许克祥指挥下，分几路同时向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省农协、省党校、省农运讲习所、省工运讲习所等革命机关发动疯狂进攻。叛军进攻总工会时，27名工人纠察队员奋力抵挡，以掩护正在开会的工会干部撤退，但因寡不敌众，20名纠察队员壮烈牺牲。叛军冲进总工会乱砍乱杀，打死干部和工人七八十人。进攻省农协的叛军向农协大院内投掷大量手榴弹，炸死农民自卫军数十人。在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叛军向赤手空拳的学员们任意射杀，并将校内财物洗劫一空。叛军在长沙城内整整杀了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约100余人。

长沙大屠杀后，在常德、溆浦等地的反动军官相继叛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24日，常德有200余人惨遭叛军杀害。同日，溆浦县各机关团体代表100余人扛着酒肉前往陈汉章警备司令部进行慰问联欢，突遭陈部枪杀，当场被打死30余人。翌日，溆浦县属各区，均遭陈汉章叛军蹂躏。

23日，许克祥、王东原等公开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办事处”，又以“救国临时主席团”名义发出反共通电，宣布释放一切在押的土豪劣绅，发还没收他们的财产。次日，许克祥主持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湖南省救党委员会”，以取代合法的湖南省党部。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以全国农民协会名义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的训令》，号召工农群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反抗反革命的屠杀政策。但是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认为“绝对不能以武力”反击叛军，否则会“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至于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则幻想以“查办双方”这种貌似公允的和平方式平息叛乱。5月2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派谭平山、彭泽湘、陈公博等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赴湘，鲍罗廷亦随行。其任务是一面查办工农运动“过火”，改组湘省政府、党部及农协、工会；一面“裁制越轨军人”。26日，特委会一行衔命到达岳阳，却被许克祥等立即逮捕，就地处决的一纸电文吓退回去。

中共湖南省委对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政策进行了抵制，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同反革命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1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鉴于原省委书记夏曦已自行出走，乃推郭亮担任省委书记组成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当晚，郭亮与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等商定以省总工会、省农协名义，通知长沙周围各县，迅速组织工农武装，待命行动。23日，柳直荀到湘潭，与该县县委书记兼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在湘潭设立总司令部，正式发出了各县农民武装于5月31日会攻长沙、平定许克祥叛乱的命令。各县党组织接到命令后，立即配合工会、农协，整顿工农武装，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备战。几天内，各地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总数在10万以上。

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经过周密的筹划，制定了分四路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湘潭、湘乡、宁乡农军为第一路，从西南方向攻打长沙；醴陵、株洲、衡山农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为第二路，分别由东南和正南方向长沙进攻；长沙东乡、浏阳农军为第三路，从东面向长沙出击；长沙西乡、岳麓山一带农军为第四路，作为其他各路的应援队伍。

中共中央在得知湖南农军准备进攻长沙的消息后，立即下达了湖南问题

应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军停止进攻的命令。31日除浏阳县农军因未接到命令已于拂晓出发，直扑长沙城外，其余各路农军，有的尚未出发，有的已行至中途，均因接到命令而折返。浏阳农军兵分两路，分别攻入长沙城东的小吴门和南门口。此时聚集在河西岳麓山的农军听到枪声，立即出击，与浏阳农军形成了对长沙东西夹攻之势。长沙城内顿时“成恐怖状态，全市商家闭门，许多兵士把服装及枪抛在街上，只顾逃命”。浏阳农军在城垣奋力拼杀，击毙敌军连长1人，排长2人，士兵数十名，本可一鼓作气，深入城内，但终因得不到各路农军配合，只得主动地向永安市退去。10万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虽然令人痛心的流产了，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初步尝试。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没收土豪劣绅土地分给农民及革命军退伍士兵”的行动口号，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工农群众进行英勇的斗争，从而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潮。

农军进攻长沙失败后，许克祥等叛乱军官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土豪劣绅、旧团防武装横行乡里，残酷杀害革命人民。自马日事变到6月上旬，在长沙及周围各县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工农、学生即达2万余人。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田波扬、杨昭植、贾云吉、陈爱元等惨遭敌人杀害。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各群众团体组成“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向武汉政府提出明令讨伐许克祥；解散湖南救党委员会，恢复被解散的各革命团体等7项要求。中共中央也于6月4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敦促武汉政府“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予）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但是在叛军的压力和反共潮流的影响下，汪精卫、唐生智的态度很快向右转。他们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宣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常，中央早思制裁”，“对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表示“谅解”，并派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以解决长沙事件并布置省防为名，到湖南去安抚叛军。而周斓于6月6日一到长沙，即与张翼鹏、许克祥等同流合污，于6月9日发表反共演说。14日，湖南省军事厅发出15路清乡电令，限10天完成，遂使反革命叛乱更加蔓延开来。

三、武汉政府的蜕变

面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封锁、颠覆，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不景气和财政危机，武汉政府汪精卫集团对革命前途产生了严重的动摇，其对内政策也随之起了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工农运动的压制。

汪精卫集团本质上是国民党内以地主、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为主体的一个反蒋派别，“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反民众的情绪在军队中最为明显，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的叛乱就是军队与人民为敌的突出事例。汪精卫以“叶公好龙”的心态对待工农运动，他本想借助武汉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同蒋介石一决雌雄，争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然而他于4月10日一到武汉，又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感到惶恐不安。他本能地意识到“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经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国共两党已经到了“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下决心立即“转舵”。

5月，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城乡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汪精卫政府采取加紧压制工农运动的政策去安抚叛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局势。5月

1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各项训令中，对工人运动规定许多条条框框加以限制。在制定“劳资仲裁”条例的幌子下，偏袒工厂主、商店老板，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制定劳动法”的法律手段，限制工人享有参加罢工、游行、集会等政治权力；把工人、店员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统统视为“过度要求”，而予以制止；对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为维护工人正当权益向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也加以限制和干预。训令最后宣布：各级党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训令各项规定；对于胆敢违反或不执行规定的党员，“应加严厉之制裁”，如各级党部执行不力，“中央必予相当惩戒”。__20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向各级党部发出“纠正农运”的训令，对抵制其训令者则指控为“藉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责令“各地党部随时制裁”。__同日还发布“制裁越轨行动”的训令，指责“各种民众运动往往于中央决议案有所出入，甚者躐等，尤甚者或至背驰”；宣布：“中央为矫正此种现象计”，决定在武汉政府所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切实执行中央决议”，对“越轨之行动”，“必加以制裁”。__

汪精卫集团采取组织手段，对所谓“越轨之行动”实行严厉裁制，最突出的事例是解散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和黄冈县农民协会。

黄冈县农民协会拥有区农协 16 个，乡农协 300 多个，会员 24 万，是湖北省较大的一个农民协会。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在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封建剥削斗争中，成绩卓著，深受群众拥护，但同时也就必然遭到反动地主、土豪劣绅的仇视。5 月 28 日，黄冈县团风禁烟分局局长罗永泽和湖北省烟酒公卖处处长华煜，致函武汉政府财政部，诬告黄冈县党部、县农协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汪精卫即借题发挥，对农民协会大肆攻击。他指责道：“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上不要中央，下不要农民”，“试问究竟是什么主义！”6 月 1 日，中央党部未经调查核实，完全以诬告信为根据，即以黄冈县党部、县农协“挖烟苗、抗纳酒税”之举动“危害人民财产、妨碍国家税收，与中央训令相违背”的罪名，训令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立即将黄冈县党部及农协解散，并逮捕其负责人，加以惩处。__

6 月 3 日，湖北省党部派党部执行委员、省农协副委员长陈荫林赴黄冈执行中央训令。黄冈县农协接到中央训令后，立即致电省农协说明事实真相。电报指出：“烟叶一项，大多为穷苦会员自行栽种，若谓会员铲挖烟苗，则是自绝其生路，于情于理，决不至此”；中央列举各端“实属绝无其事，纯系反动派捏造谣言，冀图离间政府与人民团体之感情，以为破坏革命的地步”，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原案，登报声明，使奸人诡计，无可设施”。__6 月 7 日，陈荫林将调查结果报告省党部，说明“挖烟苗，抗纳酒税各节”，“全属子虚，乃反动派故意中伤”。__直到 6 月底，经过湖北省党部反复调查，据理力争，汪精卫集团仍固执己见，声称“中央到湖北来，就是冤枉解散一个县党部也没什么关系！”后又圆滑地表示“黄冈县党部之所为系在中央训令之前”，中央以宽大为怀，决定对该党部“从轻发落”。__

5 月以来，当城乡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的严重时刻，一个革命政府理应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依靠工农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然而汪精卫集团却在健全法制和加强纪律的幌子下，极力限制革命群众的正义斗争，其结果助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动摇了革命政权的根基。到 6 月中旬为止，仅湖北省就有 26 个县受到夏斗寅叛军的骚扰，发生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猖

獯情形”。湖北全省有农协组织的 54 县，经过叛军的扰害，到 6 月初只剩 33 县有农协组织。夏、杨叛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勾结叛军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农协、妇协干部“达三四百人以上，连同死难的农民合计有三千人以上”。

汪精卫集团倒行逆施，使武汉政府逐渐丧失了原有的革命性，从一个执行三大政策、维护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府，向着背离三民主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府蜕变。

四、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宁汉合流的酝酿

6 月初，武汉政府北伐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分别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赴前方指导政治”。6 月 6 日，汪精卫偕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启程赴豫。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是和冯玉祥会谈，争取冯玉祥支持其反共反蒋计划。如前所述，汪精卫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政治立场已经逐渐转向反共、反工农，但对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首先，前方战事胜负未定“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动摇，无异给张作霖一个绝好的机会”；其次，第四方面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要靠他们在前方与奉系军阀酣战，因此“不便提出分共问题”；再次，北伐军主力均已开赴前线，两湖地区留守部队难以对付共产党。汪曾多次向唐生智建议：“鉴于战线太长，贵部留一小部分在漯河、信阳一带，公率大部，回镇武汉”。唐生智一向以军队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为了维持他本人在军中的权威，对部下的反叛采取明压暗抚的态度。他既担心部下纷纷投靠蒋介石，又担心因军队叛变，激起两湖人民暴动，而丧失他的地盘。因此唐生智也急切地希望结束战争，以解后方之燃眉之急。总之，汪、唐都“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指望在和国民军会师后，让国民军沿陇海路东进，武汉军队顺长江东下讨蒋；同时，把河南事务交给冯去处理，武汉部队全部撤回，以便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于是，郑州、开封的克复，第二期北伐的胜利竟成了汪精卫集团蓄谋分裂统一战线，“清党”反共、叛变革命的契机。

8 日、9 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先后抵达郑州。郑州会议于 10 日召开。武汉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孙科、徐谦、唐生智、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张发奎；国民军方面有冯玉祥、鹿钟麟、于右任、刘伯坚、刘骥；另外还有苏联顾问加伦以及两方军政人员熊哲民、何其巩、孙良诚、何键等间或参加过会议。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拉住冯玉祥既反蒋又反共的双重目的，因此在会上摆出左右开弓的姿态：一面发泄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不满，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诬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必须予以“严厉制裁”。一面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断，大加谴责，声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在会上，冯玉祥对共同反蒋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再表示：“希望今后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当邓演达问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时，他说：“我只知打仗，不管其他”，有意回避。冯玉祥对反共议论则产生共鸣。会上，徐谦在冯面前大放厥词，污蔑共产党“残暴”，鲍罗廷“专横”，武汉“秩序混乱”等等，鼓动冯玉祥出面驱逐鲍罗廷。何键专门捏造所谓革命军人受害的谣言来刺激冯玉祥。冯玉祥受了这一

番挑唆，“大为动容”，当即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

会议主要就党务、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了协商，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党务方面：决定取消西安、北京两个政治分会，另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由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等 11 人组成，以冯为主席。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分会顾问。开封政治分会主要负责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其后于不就任，由石敬亭代理），刘郁芬为甘肃省府主席。军事方面：第一，第四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三十六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第二，取消河南地方武装靳云鹗的保卫军，交由冯玉祥改编；第三，承认冯玉祥在北伐战争中扩编的七个方面军，并任命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别担任七个方面军的总指挥。

以上决定表明，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政府的支持。但当会议甫告结束，汪精卫等忽然接到朱培德的电报，“里面有许多不好的消息”。于是，汪精卫一行于 11 日夜，背着冯玉祥匆匆南返，这又反映了汪、冯之间仍互存戒心，只不过是貌合神离罢了。

郑州会议虽然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但汪精卫集团通过会议达到了联冯反共的目的。会后，唐生智班师回汉，执行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和“制裁”共产党的反革命任务，这就为汪精卫集团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聚集了大量的武装力量。所以，郑州会议的召开实质上是汪精卫公开反共的信号，是他背叛革命的重要步骤。

紧接着郑州会议之后，6 月 20 日至 21 日，蒋介石约请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刻和冯玉祥会晤，是为形势所迫。在武汉部队攻克郑、汴的同时，南京部队也于 6 月 2 日占领了蚌埠、徐州。宁、汉双方的军事主力都在反奉的名义下集结于陇海线上。南京方面要想继续前进，直捣幽燕，必须克服来自奉系军阀和武汉方面的障碍。张作霖在失去郑、汴、徐三大战略要地后，亟谋作最后挣扎，匆忙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成了安国军政府，从而取得了调遣各路军阀部队的权力；加紧重整旗鼓，急调东三省部队入关，以全力对付国民革命军。加上郑州会议后，武汉部队加紧进行东征部署，对南京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推测武汉“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也”。他担心一旦武汉部队顺江东下，南京必然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如何走出困境，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冯玉祥。因为冯的国民军在进入河南后，经过扩编，力量大增，在宁汉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能争取冯的支持，实现蒋、冯合作，北可以合力对付奉军，继续北伐；南可以牵制武汉，甚至吞并武汉。

冯玉祥从自身地位和国民军的前途考虑，也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扩充为十个方面军，号称 50 万，是几个集团军中人数最多的部队。要维持如此庞大军队的给养，单靠武汉政府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南京政府。再从国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来看，国民军“虽得有豫省，然其身处四战之地，顽敌当前（奉鲁军阀），且心腹之患，处处皆是”，深感“种种掣肘之苦”。在这种形势下，“如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必卷土重来，

他首当其冲，孤立无援，力量不足，势非失败不可”。有鉴于此，冯玉祥认为只有宁汉合作，一致北伐，才有可能打跨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国民军也就有可能在河南立足。郑州会议一结束，武汉部队撤走，部署东征战事，宁汉之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冯玉祥更感到必须立即同蒋会谈，解决宁汉争端，共商北伐大计。

为使徐州会议达到联冯制汉的目的，蒋介石在会前作了周密的安排。他了解到冯军给养困窘和冯本人力主调和宁汉纷争，以贯彻北伐初衷的迫切愿望，从而认定“大力接济”和“继续北伐”是争取冯玉祥的两个关键问题。在会议的规格上，蒋决定以最高会议的形式举行，以表示对冯玉祥的尊重。19日，冯玉祥率卫队抵达徐州。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迎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当晚，蒋在徐州东门大街花园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为冯洗尘。蒋向冯当面许诺，自7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按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另外还馈赠50万元犒赏冯军。蒋介石的慷慨支援，使处于困境中的冯玉祥感激不已。冯当众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

徐州会议议程共八项：（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除第六、七两项未及讨论外，其余六项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中心是北伐和所谓“清党”。关于北伐，蒋介石希望冯玉祥与他合作，先对武汉用兵，清除内部之忧，再移师北伐。但冯玉祥认为当前国民革命的真正敌人是奉鲁军阀；汉宁之间的冲突是内部问题，不宜诉诸武力；况且武汉已经开始“分共”，宁汉之间也就不再存何分歧，如果此时“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势必给敌人造成反攻的机会，北伐大业有功败垂成的危险。他表示自己愿对宁汉双方负调停之责。关于继续北伐，冯玉祥提出两项主张：（一）“联晋制奉”。他认为“晋阎实力不能敌奉，现闻奉方三路攻晋，晋必不支，宜援助百川，以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他认为“目前军事胜利，宁汉双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要求“武汉军队仍须回至河南，加入前线，共同一致完成国民革命”。蒋介石同意冯的主张，并制定了联合作战的具体方略。

关于“清党”，蒋、冯之间没有分歧。冯玉祥声称，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党部存在，武汉方面的忠实同志，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和我们合作奋斗，不要被人利用”。会议作出决定，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由冯先发一电向武汉提出警告。蒋介石要求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及其辖区实行“清党”；冯表示回去后即着手进行。

21日，蒋冯在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他们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宣称“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誓：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悛”。实际上，他们已经践踏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玷污了孙中山举起的国民革命旗帜。

徐州会议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次带有决策性的反革命会议。事后，蒋介石曾说：“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他认为这次会议对其“党国”的存亡、成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是“冒国民革命之名”，“布全国恐怖之毒”，搞得“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要共产党“暂时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要求武汉汪精卫

集团“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党”，“分共”。当时《国闻周报》就评论说，这篇电文措辞强硬，无疑是“蒋冯的哀地美敦书”，限令武汉立即实行分共。就这样，冯玉祥用共同“清党”这条线，把蒋介石汪精卫联在一起，进行宁汉合流的酝酿，从而加速了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的步伐。

第十节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和陈独秀 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

一、共产国际五月指示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议程是中国问题和战争危险问题。在5月24日的第十次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长篇演说，全面地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5月30日，全会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为了及时指导中国革命，挽救革命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斯大林讲演的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连续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两道指示，史称“五月指示”，其要点是：

1. 必须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指示”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指出开展土地革命，最主要的应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

2. 必须建立工农革命武装。“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以解决不可靠的部队。具体做法：拟“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

3. 改组国民党。“指示”要求对国民党现存机构加以革新，必须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去充实国民党的上层领导机构，同时还必须靠工会、农民协会会员去扩大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4. 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

上述挽救革命的具体政策，其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的右倾指导思想的制约，因而难以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最集中的表现在对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具体表现在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支持蒋介石；甚至当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已准备就绪，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共中央自动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继续同蒋介石保持联盟。结果使革命力量蒙受巨大损失。在八次执委会上，右倾指导思想仍未得到纠正，全会通过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充满幻想。全会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并强调这种合作“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会把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策略，当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过程的最高指导原则，而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

例如，全会在指示中共应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同时，特别强调“共产党还应当由政府内部实行一种能由政府本身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意思是自下而上地搞土地革命还是要征得武汉政府的同意，并且最好还是由武汉政府本身来发动。又如，“五月指示”要求中共迅速建立一支以工农和共产党员为主体的革命新军；但是全会却把这支部队看作是“武汉用来在前方

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近卫军”，__是“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__言下之意，这支军队仍然从属于武汉政府。

总之，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每一项具体任务，都是要求在不使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原则下去贯彻执行。然而，实际情况是日趋反动的武汉政府既不愿实行土地革命；也不可能听任共产党去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更不允许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则无视这些严峻的事实，它既要中共刻不容缓地贯彻上述指示，又要求保持统一战线不破裂，这在实践中必然造成原则和具体政策的冲突，其结果绝不可能两者兼顾，或者不顾原则，或者放弃具体政策。不过在共产国际看来，搞好同所谓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汪精卫的关系，是一切政策的中心，那么就得分对他们作某些让步，也就是放弃必要的斗争去迁就汪精卫集团。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原则与具体政策的矛盾，加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到达中国已为时较晚，因此它没有起到挽救中国革命免于失败的作用。

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

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罗易和鲍罗廷、陈独秀对待国际指示采取了两种态度。

6月5日，罗易未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私下把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报副本送给汪精卫看，显然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泄密行为。罗易的错误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__对汪精卫十分信任。罗易认为莫斯科的电报是要求中共依靠武汉国民党来执行国际指示，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做出最后的努力，重新获得汪精卫的信任”。__他自信能够驾驭汪精卫，共同贯彻国际指示。罗易还认为实行土地革命和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两者可以同时并举，于是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下革命”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

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观点与罗易相反，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与北伐并举，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举的策略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办，就意味着统一战线的破裂。他们本打算保密，不向党内同志传达“五月指示”。而当鲍罗廷得知罗易已把机密泄露出去时，十分恐慌，预感导致国共分家的一场大祸即将来临。他一面拍电报给莫斯科，要求火速撤回罗易；一面匆匆忙忙地提出了一份限制土地革命，依靠汪精卫和唐生智，纯粹“自上”的退却计划。陈独秀和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还有维金斯基等都站在鲍罗廷一边，表示无法执行“五月指示”。罗易当时因“泄密”，正遭到攻击，也就不再坚持“自下革命”的主张，附和了多数同志的意见。

6月15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面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一面又声明：这些指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__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准备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仍坚持实行投降式的退让政策，幻想以此拉住汪精卫集团，维持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其退让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自5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

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是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应当予以纠正。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2. 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郑州会议后，新老军阀反共叫嚣甚嚣尘上。陈独秀连忙向汪精卫表白：“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他甚至重弹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老调，以赞许的口吻说：“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主张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反击。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提出了两项建议：组织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抗议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起初，他的建议得到蔡和森等同志的支持，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来临到要付诸行动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鲍罗廷为此气得要死；彭述之到处宣传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谭平山则臭骂罗易犯了左倾幼稚病，他们一齐主张取消

这项带有进攻色彩的提案。结果，中央政治局来了个折衷方案，把抗议国民政府的罢工、示威行动，改成举行一次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集会。

陈独秀、鲍罗廷不打算独立组织自己的力量以阻止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行动，而把赌注下在汪蒋的矛盾和斗争上，热衷于推行“东征讨蒋”策略。当唐生智班师回汉后，陈独秀、鲍罗廷盲目地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既然武汉北伐军已经撤回，那就说明了冯玉祥所唱的宁汉“共同北伐”计划已经打破，“共同解决 C.P. 的危机已延缓”，__今后主要任务应拉住汪、唐进行“东征”。他们只看到唐生智野心勃勃。他同蒋介石争夺地盘，并主观推断唐在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于和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胸有成竹地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致跑掉”。__为了拉住汪、唐进行东征，鲍罗廷建议应拟订一份专为适用于东征的政纲，并强调这份政纲“不要提土地革命”，“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还应“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__总之，鲍罗廷幻想着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条件，换取汪精卫、唐生智“东征时期不要分共”。

3. 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 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建议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还允诺发枪 2000 支。湖北省委也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而陈独秀又持异议，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这项指示，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有少量的军队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及武汉军校、武汉工人纠察队。可是陈独秀等不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到 6 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 月 28 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周恩来、张太雷都报告了何键将起事的消息。他们认为何键等大造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是和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借口一样的。谭平山报告说，邓演达在离开汉口时，也说过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接着，张太雷提出纠察队和童子团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于是，与会者就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还是准备抵抗？发表意见。鲍罗廷主张还是自动缴械为好。多数委员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__解散童子团。

同日，颁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该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__所有前领枪弹即刻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并请该处派员于 29 日上午 10 时来敝会点收。

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作山了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决定下达后，党中央机关和总

工会机关呈现出一片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气氛。而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李品仙派了一个机枪连占领全国总工会会址。何键也派人来要房子。反动派甚至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各业工会，抢劫财物，殴辱工会负责人员。事态并没有按陈独秀、鲍罗廷的主观愿望发展，工人纠察队是自动解散了，然而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不仅未停止，反而加强了。这是大革命最后时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妥协退让策略的典型事例。

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该决议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重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要求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决议强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民众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决议指出：为了“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入军队”。根据上述决议精神，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职务。谭平山在辞职书上，竟称自己“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向汪精卫“引咎辞职”。

《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持同汪精卫集团的合作，不惜把党、政、军乃至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这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式的让步”。它充分证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三、蔡和森、毛泽东等挽救革命的斗争

在革命形势日趋恶化的严重时刻，蔡和森、毛泽东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策略，进行过多次批评和斗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积极探索挽救革命的正确道路。

蔡和森一贯认为“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建立革命武装“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他不同意陈独秀关于继续同国民党合作是中心问题的观点；主张把工作的中心点放在扩大工农武装，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蔡和森拟定了一份两湖问题决议案，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该决议案分湖南湖北两部分。关于湖南，其要点是：坚决号召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力量解决许克祥，对长沙取围攻之势；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在反许克祥的斗争中应发展农民军5万以上；在最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30万以上，准备推翻已经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关于湖北，其要点是：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利用尚在我们手中的省政府、县政府，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肃清一切敌人；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共产党的武装，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迅速发展群众势力，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该决议案和后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精神基本一致，罗易等人表示赞同，于是比较顺利地得到通过。会后，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湖问题决议案》，专门组成湖南特别委员会，负责指挥湖南暴动。但是，当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并付诸实行时，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

际代表又犹豫起来，他们把湖南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对计划拨给各地准备暴动所需之款项迟迟不发；后来又以共产党在湖南的努力已经完全瓦解为借口，取消了暴动计划。蔡和森挽救革命危机的规划遂付之东流。

6月下旬，蔡和森因病在武昌毛泽东的家里休养。他仍然为湖南的局势忧心如焚，在6月25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焦虑。信上说：“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他建议“中央机关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在这以后，他又多次写信给中央常委重申他的主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蔡和森准备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正确主张，也是党内许多同志的共同愿望。在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必须保存武力的主张，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主动要求去湖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建立根据地。

当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纷纷要求中央立即在湘、鄂、赣三省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刘伯承认为“自郑州会议以来，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农的机关，国民党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团体”，因此我们和他们的联盟关系当然应该断绝，中央就应该立即“指导群情激昂的工农、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发奎及其他同志队伍，在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暴动起来与他们斗争”。7月初，恽代英将中央独立师、叶挺将其指挥的部队分头集结，枕戈以待，准备一旦有变，即在武汉政府的腹心举行暴动。

自6月以来，湖北省委在张太雷、董必武的领导下，努力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积极地组织群众，保卫革命。6月6日，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他认为当前湖北省政府急需做的工作应该是对反革命实行镇压，以革命的军律处治许克祥等叛乱头目；应使国民党部群众化；应有正确的政策去影响民众，必须帮助农民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帮助农民起来自卫。

张太雷等认为必须把两湖农民运动遭摧残的真相告诉广大群众，使他们分清大是大非，激发他们向反动派斗争的勇气。6月12日，在湖北省委的推动下，武汉各界3000余人举行追悼各地死难农友工友大会。次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发表《为追悼死难农友告民众书》，愤怒地控诉了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罪行；驳斥了所谓农民运动过火的谬论；号召全省农友“一齐继续死难者的精神踏着他们的血路前进”！6月22日，省农协召开扩大会议。陈潭秋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词。他表示：虽然在这次大屠杀中，中共党员牺牲不下300余人，但“我们决不畏缩，誓本革命初志，与各农友携手前进”。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此刻不是退让的时候，而是整齐我们的步伐，向敌人猛烈进攻”。扩大会议后，湖北省委指示各级农协迅速建立农民自卫军，以抵抗反动派，保卫革命。

6月22日至26日，董必武亲自主持召开了湖北省市县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农民武装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为巩固革命的基础及稳定动摇分子之革命观点起见，非武装农民不可”，为此，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农民运动议决案》，对农民运动在政治、经济、组织、宣传诸方面的任务作了

具体规定。会议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农民武装自卫，加紧对农协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会议考虑到目前政府的枪支不够分配，不能多给农民以武装，只有到军队中去找枪。为此，会议提出了“革命群众到军队去”的号召。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蔡和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暴动对付反革命暴动的策略思想和主张，湖北省委为武装农民保卫革命所作的努力，虽然因受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和打击，未能挽救革命危局，但却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十一节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汪精卫集团加紧反革命部署

6月5日，汪精卫看到了罗易交给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副本。他的反应和罗易的初衷完全相反，不仅未把此看成是给自己的“再度保证”，而且认为“五月指示”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并以此为借口，加紧进行反共部署。

郑州会议结束后，汪精卫回到武汉，“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 他排除谭平山、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召集主席团会议，一连开了十几个晚上，密谋策划“驱逐共产党”的时间表。“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 由此可见，汪精卫是以排除了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司令部，以军队作为反共的基本力量，而以“五月指示”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的凭据，策划反革命叛变的。

汪精卫既然认定军队是他反革命叛变的基本力量，因此加紧在军队中煽风点火，怂恿军队率先“驱逐共产党”。

武汉北伐军由河南回到武汉后，张发奎发起在阅马场举行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汪精卫到会致词。他以大会宣传大纲没有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为口实，对四军政治部大加指责。他训斥道：“这些C.P.分子幼稚到忘了根本，只知道三大政策，不知道三民主义”；攻击共产党“简直闹得不象样子”；大骂工人纠察队“胡闹到天翻地覆”。 他还借题发挥，拿着宣传大纲去质问陈独秀，声称共产党应对此一事件负责。事后，汪精卫指示张发奎对政治部加强控制，对于政治部发表的宣传文件必须严加审查。他还提请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关于政治部及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军事长官的决议。

7月5日，在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就职典礼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词，在发泄了一通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后，就宣布所谓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阴谋”。他别有用心地指责说：共产国际“说国民党不能够领导革命，要由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怎样去领导呢？就是消灭国民党！” 由于第二方面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该军张发奎、黄琪翔等高级将领的思想感情一时统一不到汪精卫的训话上去，因而在他们致答辞时，对汪的蛊惑未表示响应，这使汪十分尴尬。

汪精卫对朱培德在江西率先“清党”分共公开予以鼓励和支持。

朱培德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他在宁汉对立中采取脚踏两只船的骑墙态度，“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 马日事变后，朱培德立即响应，首先强迫南昌的《三民日报》停刊，接着又查封了这家报馆。5月29日，朱培德以请政治工作人员谈话为名，把在南昌的全部政治工作人员召集到军部，命令他们离开江西。理由是“现在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诸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起不好的结果。” 当天，打着“欢送”的幌子，在一个团的武装押解下，强迫第三军全体政工人员142名遣返武汉。

同日，朱培德致电武汉政府，报告江西军事政治形势不稳，要求派陈公博到江西指导党务。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指派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为中央特派员，组成江西特别委员会，由朱培德任主席，负责执行

中央各项训令。这是汪精卫集团对朱培德“清党”的实际支持。

朱培德依仗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6月4日，朱培德又将在江西省党部和南昌市党部工作的刘一峰、方志敏等22人强行遣送出境。同时下令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以及各县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卫戍司令部派出武装宪兵在各处设岗哨，收缴农民自卫军的枪械。随后，江西各地土豪劣绅大肆活动，吉水、南昌、新建、铜鼓、弋阳、泰和等地土劣勾结反动军队，捣毁革命团体，捕杀农协委员，抢夺农民的耕牛、农具。于是，江西也笼罩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

对于朱培德的反共行径，武汉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向武汉政府请愿，要求惩办朱培德。湖北总工会准备于6月15日举行的“欢迎铁军凯旋”大会上，声讨朱培德的反共罪行。汪精卫闻讯，立即出面加以阻止，还跑到陈独秀、鲍罗廷面前告省总工会的状，诬告省总工会联络武人来倒他。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汪精卫一再为朱培德开脱罪责，并对朱呈请辞职“勿庸议”，以示挽留。为表示对朱培德的支持，会议同意朱的请求，派陈公博赴江西“指导党务”。

6月29日，陈公博、朱培德共同拟定了一份所谓“党员宣传大纲”。宣称“集中权力于党”，对“不守纪律的马上加以制裁”，为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提供依据。

朱培德所谓“礼送”共产党出境，是武汉高级将领中第一个以武力为后盾的变相“清党”，是汪精卫集团进行反革命叛变的一次试探性行动。

在武汉，何键、李品仙等反动军官，自恃实力雄厚，竟以“分共”为东征的先决条件，要挟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C.P.东征！”并于6月29日发出反共训令，煽动武汉军民“共起急图”，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声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南京的胡汉民为何键的反共训令拍手叫好，他说何键宣言“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何键鼓励他的官兵做反共的急先锋，命令部下“应一致的联合起来，向共产党进攻”，“勿稍松懈的向前猛冲”，何键的反共叫嚣充分暴露了反动军官的狂妄和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二、“七·一五”分共会议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会议接受了汪精卫“分共”主张，提出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并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务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

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电报译文，然后发表了长篇讲话，对“五月指示”进行了全面攻击。其要点是：（一）攻击由下没收土地的政策违背了国民党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指责改组国民党，增加工农领袖是“破坏本党组织”；（三）攻击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四）歪曲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的政策。他说：“组织特别法庭，不要C.P.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作刽子手”。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简直是“破坏国民党

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据此，他提交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们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他声称：“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应决定一个对共产党的“处置方法”。他强调指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即国共不能并存，必须清除共产党！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以上三项决议的要害是第二项。所谓“制裁一切违反本党政策之言论行动”，实质就是“制裁”共产党，这就表明汪精卫集团已经公开抛弃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扯起了反共旗帜，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反共政变，最终叛变了革命。

7月16日，汪精卫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恶毒攻击中共中央7月13日《对时局宣言》是“对本党厚诬丑诋”，“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声称：既然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这是汪精卫向党、政、军发出的全面“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

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训令》伪称：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训令》伪称：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这两项训令是一切反革命派欲盖弥彰的惯用伎俩。就在训令颁布的同时，汪精卫集团就在武汉动手大捕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间即捕去20余人。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也于是日占据汉阳，次日又占据汉口。第三十五军一个团长在孔垄镇，一次就枪毙了20多名党员。国民党已着手在武汉工会组织中“清党”，专门组成特务委员会，改组各级工会。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在党、政、军各部门大规模地厉行“清党”。

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7月14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该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这是正式把共产党当作敌对党进行取缔的反动法案。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该书攻击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湖南共产党对于土地问题“自布一种经济没收的办法”，是“自绝于本党的表现”。该书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从此，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投入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汉

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人间地狱。

三、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为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而斗争

当汪精卫集团策划发动反革命叛变的紧急时刻，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为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同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7月14日，宋庆龄请陈友仁代表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发言，对汪精卫的“分共”主张提出严厉批评。她严正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同日，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于18日在汉口公开发表。《声明》首先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接着对汪精卫割裂三大革命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本质联系的谬论进行了严肃批判。她指出：“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其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改变三大政策，“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她警告说：“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国民党“就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在《声明》的结尾，宋庆龄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前途的无限憧憬。她表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因为“已站在本党旗帜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将遵循“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达到最后的目的”。她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

宋庆龄的《声明》是一篇战斗檄文，淋漓尽致地揭露和鞭鞑了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它又是一篇宣言书，泾渭分明地宣布与叛徒实行彻底决裂；它还是一个战斗号角，勇敢刚毅地号召革命人民高举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旗帜，继续进行新的战斗。

7月中旬，宋庆龄离汉赴沪。蒋介石乘机散布宋庆龄将参加南京政府的谣言。为此，宋庆龄特意约见合众社记者，向他们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在革命事业不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内，决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毅然决定赴莫斯科访问。行前，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她7月14日声明的立场。她指出：“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使革命“推进到黄河岸边”，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她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尽管“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从此，宋庆龄迎着反革命滚滚恶浪，昂首挺胸，勇往直前，和中国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休戚与共，为实现孙中山革命理想，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矢志不移，奋斗不息。

国民党左派的另一杰出代表邓演达，为推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郑州会议上，他对于汪精卫集团企图“分共”十分不满。会议结束后，他多次于深夜走访汪精卫，就联共问题同汪精卫进行激烈的争

论。他坚持主张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力劝汪精卫“坚持革命，不要动摇”；并反复强调“只有依靠民众，才是生路，依靠军阀枪杆，结果是死路一条”。

在多方劝说不奏效的情况下，他曾打算抛开汪精卫，与吴玉章、陈友仁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以挽救革命，但没有成功。他痛感形势日非，革命即将流产，心情十分沉重，决定出走，以表示同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彻底决裂。

邓演达于6月30日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留别书，又于7月3日发表题为《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的文章。7月13日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在上述文稿中，邓演达愤怒地谴责汪精卫集团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背叛”。他以充分的根据戳穿了汪精卫两面派的伪善面孔，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他得出结论说：“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排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他保证自己将始终以“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作为自己的“立场”，并希望中国国民党党员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

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前夕，邓演达为挽救革命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充分表现了他恪守三民主义、捍卫孙中山开创的国民革命事业的坚定立场，表现了一个革命者高尚的气节和情操，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

四、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组成中共中央“七·一三”宣言

7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当前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武汉已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已经“由革命斗争之因素变成它的桎梏”，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断然地撕破这种联盟”，应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决定》号召中国共产党员起来纠正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接受鲍罗廷的提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此，陈独秀即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并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首先肯定了自国民党改组以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取得的胜利；并指出这些胜利的原因主要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宣言》对三大政策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它指出：“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惊失措的伟大力量”。《宣言》强烈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它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不实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拒绝公布土地问题决议案；限制工农运动；放任反动派自由地进攻革命，致使反动军官反攻民众运动的反动恶浪陆续掀起，造成“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

消灭！”《宣言》最后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公开准备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根本主义与政策，将使国民革命“陷于渐灭”；“使武汉同化于南京”，使旧军阀统治，一变而为“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强烈抗议“七·一五”分共会议作出的反共决定。《通告》指出：这次会议的决定表明国民党中央除宋庆龄、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提出如下反对反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策略：（一）必须“攻击其反动行为”，揭露汪精卫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的罪恶行径；（二）立即召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仍应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团结下层左派分子组织在野反对派；（三）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宋庆龄、邓演达的声明；（四）揭露汪精卫借国际紧急指示煽动分共，以掩饰其反革命的罪恶目的；（五）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颁布所谓保护工农，实行“二五”减租的虚伪性；（六）积极领导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七）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抗租运动，建立农会政权；（八）领导城市贫民开展要求平抑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的运动；（九）做好转入秘密工作的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还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该信剖析了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的阶级本质及其叛变革命的根源，明确指出：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当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切实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伟业，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

上述三个文件说明中共中央在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以后，一反过去对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一味迁就、妥协、退让，转而采取了彻底与之决裂，并且与之坚决斗争的政策，这就给倍受压抑的广大革命群众以支持和鼓舞，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准备发动军事暴动和秋收暴动，中共中央派遣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等赴九江了解张发奎部队的情况；并根据恽代英的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7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组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同时和中央农民部共同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通告。通告阐明：由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武汉政府的叛变，中国革命开始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当前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坚决反对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积聚一切革命努力，开展土地革命。通告强调指出，在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必须使共产党真正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此外，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其内容包括反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工人、农民、军人、教育、妇女等八个方面。关于反帝国主义，具体目标是：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收回租界；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之特权；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等。关于经济，具体政纲是：减轻税收、统一财政；取消苛捐杂税；合并“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发行一种全国通

行纸币等。关于政治，提出了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促进中国的统一；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组织乡民、市民、县民会议及省民会议；筹备召集国民会议；澄清吏治；建立廉洁政府；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组织革命团体之一切自由等项目标。__总之，这是一份内容十分广泛，目标具体而明确的行动纲领。它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恪守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原则；同时也证明只有代表中国广大被压迫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担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敢于团结群众，带领群众，以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把中国人民革命推向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结束语

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经历的时间不长，又以惨痛的失败告终，但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却极为重要，它所留下的经验教训对于其后的革命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大革命已过去 50 多年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进入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但是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先驱者的光辉业绩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而磨灭，而且更显光彩。今天回顾大革命的历史，人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深刻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并能够从中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益的启示。

一、大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 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人民大革命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但是无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革命，或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广泛深入地发动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斗争。而大革命时期广泛的群众运动则是前所未有的。就其成分而言，包含有各阶级阶层和各界的人民群众，不仅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商人运动，市民运动也兴起来了。就地区而言，不仅南方革命政府统治的地区、北方国民军统治的地区和群众运动高涨，北洋军阀统治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也都发动起来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

这次大革命出现空前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是偶然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从过去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中，逐渐觉悟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下，只有自己起来斗争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才能解除自身的苦难。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斗争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这就为广泛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时，中国共产党人数量还很少，但是他们思想觉悟较高，有组织才能，朝气蓬勃，富于献身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领导和推动下，无产阶级不仅本身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了，而且把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也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了。这样就形成了这次空前的人民大革命。

2. 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大演习，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转折，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随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辛亥革命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

社会向前发展，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为大革命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是大革命的先导，是大革命迅猛兴起的前提。

但是辛亥革命终归失败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孙中山等为挽救革命，继续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和“护法”斗争，也都失败了。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此终结。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时代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登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强暴的敌人，以非凡的英雄气概联合中国国民党担当了这个沉重的历史任务，组织和发动了这次人民大革命。历史发展表明，这次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在这次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领中国人民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经受了严峻的锻炼，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举凡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问题，在这次大革命中都提出来了。无论是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领导、前途等基本问题，还是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都摆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通过这次大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些重要问题上获得了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提高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些经验教训和认识对于此后的革命斗争，对于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都是非常宝贵的启示。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特别是粤、湘、鄂、赣等省群众由于受过革命高潮的洗礼，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虽未重视抓革命军队，但仍然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这些对于以后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革命斗争的再起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证明，大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巨大规模的演习和前奏。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转变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其开端，而其转变的关键则是大革命。大革命处于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继承辛亥革命未完的历史任务和革命传统，为其后的革命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作用。

此外，还必须指出，大革命在国共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革命，自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大革命开创了国共合作的历史，取得了中国革命前所未有的成就。“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到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又“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这段历史对于以后抗日战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173 页。

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335 页。

争时期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中说：“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抖起来了。……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决不会有象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中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些以大革命时国共合作历史为借鉴的谏言，对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正因为建立和坚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今天，中国人民正担负着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吸取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将有利于早日圆满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3.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20年代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革命浪潮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欧美，德、匈、意、美、法、保等国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亚、非、拉，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印尼、越南、菲律宾、埃及、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这两股革命潮流汇合在一起，冲击着帝国主义营垒。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相继被镇压下去。到1924年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仍在持续高涨。中国大革命就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的显著表现。与此同时，1924年至1926年摩洛哥爆发了里夫人反对法国、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斗争。1925年至1927年，叙利亚——黎巴嫩爆发了反法民族起义。1926年，朝鲜爆发了反日的“六十万岁”运动。同年，尼加拉瓜人民开展了反美游击战争。1926年至1927年，印度尼西亚爆发了反荷民族大起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援的。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促进和支援了中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也支援了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和支援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1.大革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中国革命是长期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各国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后，于1924年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复苏，政治上也较安定。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暂时和平相处，没有爆发新的战争。但是战后兴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仍在发展，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后方并不安宁。在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它们联合起来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是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联合起来进行干涉。帝国主义有着奴役和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丰富经验。它们交替

运用政治和军事两手策略。在中国，它们长期以来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在辛亥革命之后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仍然根深蒂固，十分顽强、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先是支持北洋军阀，企图借他们之手将革命镇压下去。北洋军阀与各地方军阀也企图凭借帝国主义势力扑灭革命，巩固其统治。待到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时，它们就加紧进行直接干涉。在调兵遣将进行武装威胁和干涉的同时，更着重于使用分化革命阵营的策略。

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内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外，还有一些地主、买办、官僚、政客混杂其间，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始终是以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为主。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是革命力量之一，又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当人民革命力量强大起来，他们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动摇起来，其右翼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必然要转向反动，背叛革命。而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则势必随之更加动摇。

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一个年幼的党。党成立后才两年多，还没有也不可能作好一些必要的准备就投入了来势迅猛、规模巨大的革命斗争，党面对的是强大的经验丰富的敌人，联合的是动摇的资产阶级同盟者。革命的客观形势要求要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可是实际上，党还是年幼的，不成熟的，对于中国的国情，对于敌人和同盟者都还不甚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懂得不多，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较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独立地指导中国革命，因而在大革命中面对十分复杂的情况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

加以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规定应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在其指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共产国际虽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提出了某些正确的理论和原则，但是它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也不可能有较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国民党估计过高，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估计过低，因而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而且长时间难以得到克服，以致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帝国主义利用革命阵营内的反动势力，利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从国民党内先后把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拉了过去。这两个右派集团则利用他们在革命阵营中已取得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势力，利用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破坏革命，使大革命还在其高潮中就被扼杀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既然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既然革命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动摇的，既然共产国际没有也不可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而不可避免犯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又还处在幼年时期也不可避免犯错误，则中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是难以避免的。从一般革命发展规律看来，革命人民在其第一次出击时就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像中国大革命这样规模巨大的革命要在其第一次出击时就取得胜利更

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在主观上少犯些错误，革命即使失败了，革命力量所受的损失也可能要少一些。

中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2.大革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为其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这次大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革命，已开始显示了中国革命的一条根本经验，即：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大都学习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国情大都有一点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开始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构思。但是他们终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掌握得不多，对中国国情也不甚了解，还不可能独立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也正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的主观因素。

大革命的历史已开始昭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熟练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时又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并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观察、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结论，从而据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不断地改进，使之日臻完善，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可能的。

前已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要打倒这样强大的敌人，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可能成功的。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彻底革命的阶级，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很小。无产阶级必须把全国各阶级各界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坚强的革命阵营才能与强大的敌人对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工人阶级外，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的阶级，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将他们联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要把这种客观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要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并带领无产阶级为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指出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同时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又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并且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使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解决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这就使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中国革命由此就开始高涨起来了。

（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取得并坚持革命领导权，正确处理与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革命领导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哪个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革命就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就要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民主革命愈彻底，对无产阶级愈有利。若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由于其软弱性和动摇性，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必然使革命半途而废，走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妥协的道路。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自觉地争取和坚持革命领导权。而要取得和巩固革命领导权，就必须善于处理与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民主革命就是要使亿万农民群众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农民受落后生产方式的局限，有保守、狭隘等缺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大力从事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提高农民的觉悟，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了，革命统一战线才有广大雄厚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能否取得和巩固革命领导权，取决于能否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把农民的斗争领导起来，解决农民问题。

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并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对农民作了大量的工作，把农民空前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这是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重要因素。但是农民问题的基本内容是农民土地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并且有步骤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才能巩固和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而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领导农民逐步地实现其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后期虽强调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却幻想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在大革命中，这个重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彻底的纲领、明确的步骤和可行的办法。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坚定地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逐步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免要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大革命中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重要教训，给以后的土地革命以极大的启示。

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它，与它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它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其阶级本性又使它绝不自愿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而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在与无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后，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不自觉地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实现了联合，但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其右翼的斗争，则甚为软弱，一而再，再而三地无原则的退让，使资产阶级右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野心愈来愈大，导致严重的恶果。历史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回避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不能无原则地退让，而只能及时地明智地迎击。

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涉及到许多方面，不仅存在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于革命统一战线外部；不仅存在于革命群众运动中，也存在于革

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中。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偏重革命群众运动，而自愿放弃对于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在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以在野党自居，制止自己的党员参加各级政权工作。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虽有少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也没有能发挥重要作用。既然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存在于革命群众运动，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等各个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放松任何一个方面的斗争。大革命时期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对于以后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无产阶级政党能否认识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积极争取和组织革命军队，是革命成败的中心环节。

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都是掌握武装的；都是以反革命武装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人民要反抗就要有武装。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偏重于革命群众运动，而不重视武装斗争，没有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不去争取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殊不知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取得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了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也就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的最重要部分，实际上也就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的根本保障。结果是资产阶级右派夺得了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就一步一步地排斥无产阶级政党，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将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使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这次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3.大革命中许多革命先驱者，革命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也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八九十年间，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先后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热爱祖国，为了捍卫祖国，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毁家纾难，殚精竭虑，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中国人民这种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先驱者和先烈，如李大钊、肖楚女、蒋先云、曹渊等人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品德还闪耀着时代的特色。

首先，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危亡，灾难深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缺乏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未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然而要挽救祖国的沉沦，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这是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这次大革命中，革命先驱者和先烈们，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或战士，也无论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员，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革命目标。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当时广泛传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词，生动地反映了先驱者和先烈们怀抱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自觉地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其次，他们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两年多，才有

400 多个党员，但是这些共产党人敢于联合国民党挑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担。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军事政治工作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领域，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创新局面，并不断进取，将革命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廖仲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已经到了绝境，但是他们百折不挠，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这一伟大的转变，也表现了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先驱者和先烈们发扬了开拓进取精神才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

在中国人民担负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的今天，学习大革命的先驱者和先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必将有力地激励 我们奋勇地去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后 记

中国大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奏，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转折，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留下的经验教训对其后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习大革命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都是必要的。在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开设中国大革命史专题课，对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专题课教材，适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作中共党史系、政治教育系和政治学系开设中国大革命史课程的教材，还可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学生和干部阅读和参考。

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力图实事求是地记述大革命的全过程，阐明其规律性，总结其经验教训。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近几年来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利用了《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上、下册）〔主编王宗华，副主编马菊英、顾群、曾宪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一书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有关编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山大学教务处和中大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武汉大学王宗华、张光宇、陈宁生，中山大学马菊英、黄萼辉、祁汉斋、夏炳才、甄欣、王付昌和湖南师范大学范忠程分工编写，由王宗华、马菊英修改定稿。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2年10月

